



Cheng Liang, 蔡仲良, Wang Xun

FORTUNATE SONS

# 幸运儿

（晚清）留美幼童故事  
（第一卷）  
李兆献

## 晚清留美 幼童的故事

# 目录

中译本序言

导论

第一部分

1 新生

2 大清

3 外国人

4 自强

第二部分

5 到达

6 威拉德街上的紫禁城

7 归国

第三部分

8 狱徒

9 一只大水母

10 百日维新

11 日落

后记

译文说明

资料来源

致谢

索引（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

献给丽萨，永远的。

——利尔·莱博维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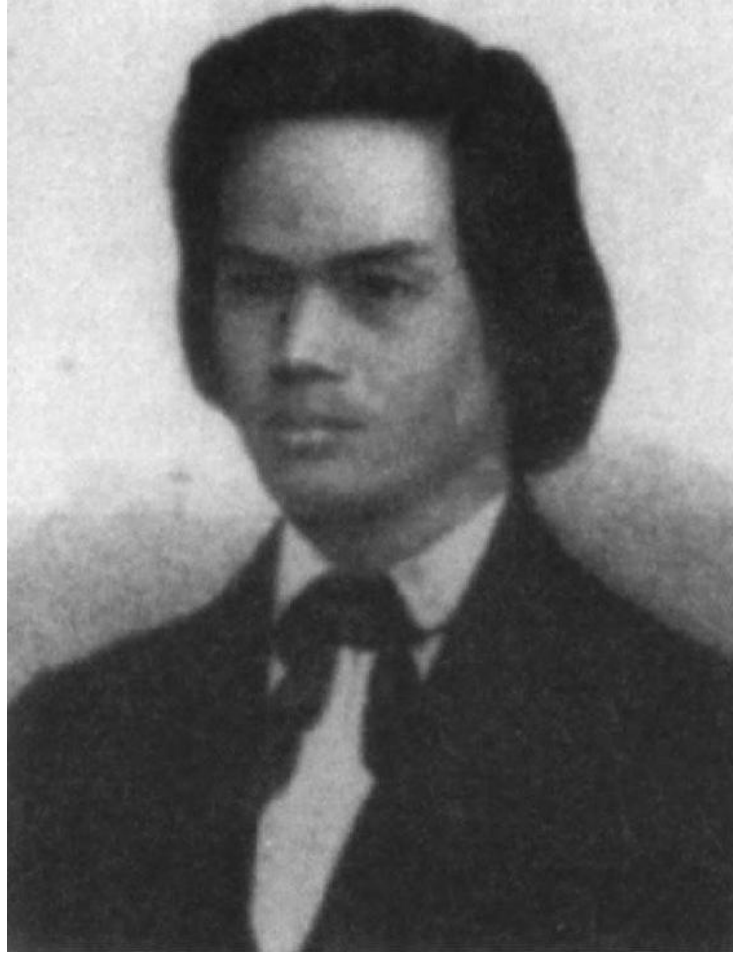
献给C.G.的女孩儿们，常胜的。

——马修·米勒



1850年代的耶鲁大学，现代科学教育的磅礴力量正在田园般的校园中兴起。

图片来源：容阔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耶鲁大学时期的容闳，约摄于1850年。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容阔，约摄于1910年。

图片来源：容阔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容阔的妻子玛丽·凯洛格，在新婚之日。

图片来源：The Thomas La Fargue Collectio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容闳及中国教育计划的亲密朋友约瑟夫·特威切尔（左）和马克·吐温（右）。

图片来源：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在美国当学生时的蔡绍基，约摄于1878年。在后来的人生中，他按照美国模式，在中国建立了一所杰出的大学。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容良，绰号“胡闹的强尼”，约摄于1876年。

图片来源：The Thomas La Fargue Collectio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梁敦彦的自画像，约画于1878年。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海军将领蔡廷干，即使到了老年，他的同学们仍旧称他为“中国斗士”。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梁如浩（左）与唐绍仪（右）留美前的合影。

图片来源：The Thomas La Fargue Collectio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中国教育计划之下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合影，摄于1872年。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留美幼童的棒球队“东方人队”，摄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中国教育计划总部门前，前排左起：陈钜铺、李桂攀、梁敦彦、咏钟。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

图片来源：The Thomas La Fargue Collectio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担任耶鲁大学划船队舵手的钟文耀（上图）及其队友（下图），约摄于1879年。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曾国藩，容闳有力的支持者。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李鸿章，中国，1879年。在这次会见中，李鸿章对格兰特总统说：“格兰特将军，你和我，都是这个世界上了不起的人。”

图片来源：容阔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即将离开美国回到中国的中国教育计划学生合影，旧金山，1881年。前排左起：梁敦彦、欧阳庚、钟文耀及两名身份不明的学生。后排左起：陈钜铺、宋文期、詹天佑（戴帽者）、两名身份不明的学生，以及黄开甲。

图片来源：容阔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回到中国的中国教育计划毕业生在天津的第一次聚会。尽管已经回国将近十年，他们仍旧过圣诞节。前排左起：梁普照、身份不明的毕业生、景扬、两名身份不明的毕业生。中排左起：宦维城、身份不明的毕业生、金大廷、梁普时、陆锡贵、刘玉麟。后排左起：詹天佑、钟文耀、B荣光、Willy Tseng<sup>[1]</sup>。

图片来源：容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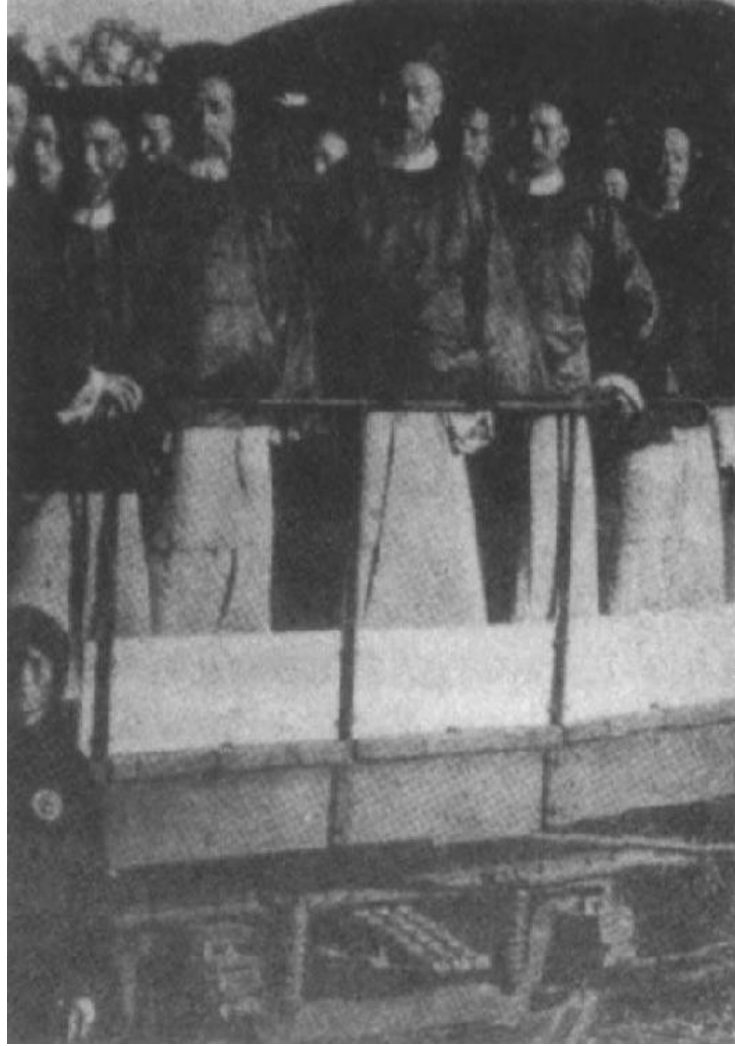
慈禧太后及其侍从。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光绪皇帝。根据一个美国官员的描述，他的声音“像蚊子一样细小微弱”。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李鸿章在詹天佑设计的开平铁路延长线通车典礼上。  
图片来源：容阔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袁世凯。他是中国教育计划毕业生逐渐获得权力的早期拥护者，  
但因其称帝野心，最终让他们失望了。

图片来源：容闭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在朝鲜的唐绍仪，他闲暇时间经常和袁世凯一起骑马射击。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令中国珠海



执行对美国公务中的梁敦彦，约摄于1910年。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1919年，已成为杰出人物的容阔的幼童们在上海的学校相聚，他们曾在此准备前往美国的行程。前排左起：沈德耀、钟文耀、陆德彰、罗国瑞、丁崇吉、吴焕荣、吴其藻。中排左起：程大器、蔡廷干、朱宝奎、陶廷、吴应科、唐元湛。后排左起：周万鹏、唐绍仪、容良、黄耀昌。

图片来源：容阔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中国教育计划毕业生的最后一次聚会，上海，1936年。前排左起：钟文耀、温秉忠、丁崇吉、唐绍仪、周寿臣、吴仲贤。后排左起：周传谏、容良、炳光、苏锐利、陶廷腐。

图片来源：容阔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经过中国教育计划毕业生梁敦彦的协商，一群新的学生在1911年被送往美国的各个大学，由庚子赔款支付学费。

图片来源：容闲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李恩富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Was a Boy in China）中的插图，描绘了留美幼童搭乘火车前往新英格兰途中遭遇劫匪的故事。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李恩富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中的插图，描绘了留美幼童搭乘火车前往新英格兰途中所见到的野牛。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一家美国杂志上刊登的插图，描绘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中国教育计划总部里的儒学课堂。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1884年福州海军遭受轰炸后的一艘毁坏的舰船。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中日战争：九连城浮桥激战图，小林利光作，1894年10月。

图片来源：波士顿美术博物馆，Sharf Collection



一幅庆祝庚子赔款的政治漫画。在所有外国势力中，只有美国利用其在中国赔偿金中的份额来支持中国学生的教育。

图片来源：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中国珠海

[1]. 原文如此。在留美幼童的名单中没有查到这个名字。——译者注

## 中译本序言

李喜所

我一向认为，史学永不枯竭的动力来源于不断发展的客观现实。人们总是由客观现实所凝练和升华的价值追求与是非评判出发，去反观历史，选取那些与现实最贴近、最能展示其价值观的历史画面去深入研究。不管研究者是否意识到这种现实与历史的潜在默契，都难以超越这种最基本的思维范式。所以，只要现实在前进，史学就跟进。我也是在这样的“魔咒”捆绑下，从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汲取了一点点灵感，开始涉足留美幼童及近代留学史的研究。198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容闳与留美幼童》的论文，但并没有引起学界和社会太多的关注。因为那时虽然官方已经有了大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意向，1978年12月26日也有五十名中国留学生赴美，但还是局部的，没有波及整个社会。然而，当20世纪80年代初，自费留学定为国策后，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争相负笈海外，考“托福”、“GRE”的人逐年猛增。许多人为了报名被迫彻夜排队，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这种客观现实，给学界对留学生的研究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我也受此影响，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在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三部关于容闳及留学生的著作。可喜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留美幼童和留学史的研究持续升温，研究人员、相关论著不断增多，一些研讨会也在召开，容闳的家乡珠海还把容闳当作其响亮的“城市”名片，千方百计张扬其历史文化价值，一批留美幼童的后代还需努力搜集其祖上的资料，追寻前辈的辉煌，当2004年南开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在天津、徐州召开“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已经是群贤毕至、硕彦云集，海内外一百二十多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此后，新闻、文艺界也卷了进来，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大型历史

专题纪录片《大清留美幼童》的播出，幼童留美的故事得到广泛的传播。本书的作者就是在北京于电视上看到这部专题片后，撞出了他们的灵感，决定撰著本书的。总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迅速推进，将容闳和留美幼童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毫无疑问，留美幼童是洋务运动所开启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产儿、现代化自然是彰显这一历史事件重要意义和客观价值的起点和归宿。也是揭开其历史秘密的唯一锁钥。本书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思路牢牢把握住了这一点，自始至终以现代化为圭臬。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铭刻着中国文化的特色，有强烈的独特性。他不是欧美那样原发性的，也不是印度那样殖民式的全盘移植，而是在保留原有“本来”基础上的有选择的一种“嫁接”。“嫁接”之后，客体与本体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是难以想象的。围绕留美幼童，引发出传统文化现代转换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幼童到美国接受西式教育，宣告了读“洋人”书的合法化，传统的知识源流和国人的知识结构将发生根本转变，这就从根基上动摇了国家的文化统治地位；幼童留美开辟了高级人才培养与选拔的新途径。对流行了千余年的科举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机制是新的挑战，让清政府摸不着头脑，只能得过且过；幼童赴美留学是多年，接受了道地的美国文化，他们在汲取科学知识的同时，还会受到政治、思想、宗教、道德、习俗等一整套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机制系统的浸染，这与大清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也是清廷派幼童出国时所料不及的；幼童留美是清廷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这又引发出美国如何认识中国和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及西方世界的问题，在幼童留美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经常会波及。此外，还有幼童的管理、宗教信仰、如何对幼童进行中文和儒学等传统文化的学习以及幼童归国后的命运等等。一个不大的幼童留美事件，就引发出如此之多的重要问题，可见准确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何其艰难。不过，问题越多，研究的价值才越高。本书在现代化视角下，对这些问题都有所涉猎，应该说作者在历史价值的判断和研究趣旨的把握上是相对准确的。而且作者总是以历史关照现实，清晰地意识到，在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留美幼童当年“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由于幼童留美时间涉及问题多，又是中国有史以来官方首次派遣的留学生，而且是幼童，在中国全力向现代化搏击的今天，就很容易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和较广泛的社会关注，所以近二十年来有关研究

成果颇为可观。粗略统计，中外学者已出版的专著和专题史料集已有六部，还有数篇博士和硕士论文。如果再加上容闳传记和留学史著作中的有关专章，就更多了。至于论文已有二百六十余篇，还不包括报章、文艺等通俗作品。幼童留美已经是一个起点很高的研究课题。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本书的优势和特色又在何处呢？除了责任编辑外，我作为中译本的第一个读者，至少有三点感受或收获：

### 其一，史料运用上有某些突破。

在国内从事留学研究的学者大概都有一种体会，鉴于语言和出国查找资料的困难，外文史料的使用较少。而留学生毕竟在国外学习、生活、外文资料的缺乏，就难以准确阐述他们的文化选择和思想动向，这无疑是一重大缺陷。目前，留美幼童研究的死穴恰恰也在这里。本书作者则充分利用其美国人的优势，着力从美国的档案馆和报章查阅了一些新史料。其在充分利用康涅狄格历史社会档案的基础上，检阅了《纽约时报》《纽约世界报》《哈特福德报》《费城时报》《春田联合报》等相关报章。利用这些新史料，本书对容闳和幼童留美事件的叙述就丰满多了。例如，容闳与美国基督徒玛丽·凯洛格小姐结婚的场景，以前知之甚少，书中引述1872年3月2日《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容闳先生，中国广东人，现任中国驻哈特福德教育委员会学生监督。周三与玛丽·L.凯洛格小姐成婚。婚礼在埃文市的凯洛格父亲B.S.凯洛格家中举行。由庇护所山公理会教堂的J.H.特威切尔牧师主持，他是新郎的挚友。新娘身着的白色婚纱，是由特意从中国进口的丝绸制作的，有精心制作的丝绸刺绣做装饰。新娘的弟弟和妹妹担任伴郎和伴娘。仪式完毕后，呈上了中式佳肴和美式风味大餐。理事叶绪东(YohShuTung)先生和在中国驻哈特福德教育委员会任教的容运福(YungYunFoo)先生穿着中式服装出席，但早已接受了美国时尚的新郎则身着西式晚礼服，新婚礼物数量众多且价值不菲。之后容闳夫妇乘坐当晚的火车前往纽约进行短暂的新婚旅行。

类似这样形象逼真的历史场景，书中有不少。这对进一步深化幼童留美的研究无疑意义不凡。

### 其二，注重幼童留美细节的叙述。



本书并没有按照幼童留美的派遣、留学状况、中途撤回回国贡献这样比较常见的叙史方式去谋篇布局，而是以幼童的行为、思想、感受及其命运为中心通盘展开，尤其注重几位比较典型的幼童如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李恩富、蔡绍基、钟文耀、詹天佑、蔡廷干、容尚谦等较具体逼真的评述，再现这批幼童留美的历史场景和命运归宿。特别是他们在美国留学时的一些细节的叙述。让读者大饱眼福。例如。书中披露了梁敦彦刚到美国一年半就用英文写的一首诗：

我是一只小花猫，  
名字叫做灰虎斑，  
我居住在乡村里，  
二十里外的乡村里，  
我的眼睛黑中夹着淡褐色，  
我的皮毛软如丝，  
每天的清晨和夜晚，  
我都喝下一整碟牛奶。

看到这首诗，不用加任何说明，幼童们的聪明好学即一目了然。书中还详细描述了1877年在哈特福德举办的中国新年庆祝会，幼童们用英文所做的精彩演讲，令在座的美国政要、专家学者、友好人士和中国官员倾倒。书中记述1876年幼童们在费城世博会上的谈吐不凡和优秀业绩，较一般书上的叙述要详尽精彩许多。该书还首次披露了吴子登上任后，公开在《哈特福德日报》刊文，训斥幼童，其云：

你们应该明白，朝廷为了培养人才，不惜重金将你们送到最好的学府学习，你们固然要用功读书，但也不可疏忽礼节。如果你们现在不好好用功，如何应付将来所需？如何才能不低人一等？如果你们故意不顾母国之礼法，将来回国后如何能与同胞和睦相处？希望此信能让你们思考过去与现在，明了你们在此地时间短暂，而回国时日方长，因此不应根深蒂固地感染外国的习惯，以免积习难改。中西学习应并重，以便今后学以致用。如不如此，你们来此何用？

书中记述了很多幼童留学史的生活故事，描写了他们的性格爱好，乃至英文“外号”等。所有这些，为以前的论著所少见。在研究

基础已经极为丰厚的研究课题上做研究，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应当承认，本书的成功，注重细节是一重要方面。

### 其三，视野广阔，大中见小。

本书将留美幼童的曲折经历和心灵感悟放在中美社会文化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幼童与中美不同社会文化的互动，展示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和中美文化融合的困难，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书中涉及在中国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清朝的创立、鸦片战争、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中日甲午战争、百日维新和光绪帝、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慈禧太后及清朝的灭亡。这些历史背景的简略陈述，紧扣幼童命运的起伏，让读者在不经意间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理解加深了一步。诚然，对中国读者来讲，如此蜻蜓点水的历史陈述，并不解渴，但对西方读者，则不但必要，而且增加不少历史知识。就像书中对美国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的概述一样，可能对美国读者过于浅显，但对我们了解幼童的生存环境和中途撤回就很有价值。例如，书中讲到华工在美国的痛苦生活和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排华恶浪，这和幼童收到少数美国人的鄙视和1881年的中途撤回有直接关联，以往的多数著作，将幼童撤回的原因完全归之于清廷的顽固守旧，而忽略了那时的排华恶剧，显然有失偏颇。书中还披露，1880年的纽约已是一百二十多万人的大都市，但华人仅八百左右，且多是苦力，幼童赴美才让美国有机会看到中上流社会的华人。书中记述那时旧金山、纽约、费城、马萨诸塞州的一些社会历史状况、也颇有价值。平心而论，这些关于中美历史背景的简要评述，绝非画蛇添足，而是深刻理解幼童悲喜剧的必要前提，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书的理论深度。当读者通过留美幼童来透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和美国那时的现代社会时，就比较容易理解作者在导论中富有一定哲理的断言：

在美国，今天的中国人也许还会遇到与当年相同的热情和相同的偏见，时而激励他们，时而阻碍他们。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多到本书难以尽述，但是，从那些幼童开始第一次面对的，中国所面临的的根本挑战，却没有改变。

总体来看，利尔·莱博维茨(Liel Leibovitz)和马修·米勒(Mathew Miller)合著的这本著作，特色鲜明，值得一读。这虽然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专著，但其在通俗流畅的叙述中，体现了其较高的学术见解和

学术深度，融高雅于通俗之中。因此，我们在研读本书中，切不可因其深入浅出而忽略了其在留美幼童研究中的学术建树和富有某种启迪意义的现实关怀。比较客观的态度应是，既要把其当作一本通俗读物，又要视其为了一本学术专著。

关于本书的翻译，文字清新，译文准确，很多历史史实都精心地加以核对。译者李志毓博士，曾跟我在南开大学读过两年博士后，给我的印象是文史功底较深厚，才思敏捷，一心向学，视学问为其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愿这种学术之雅，能持久留香，让学问之美与人生之美同放异彩。

2012年8月18日与多伦多旅次

# 导论

即使是撰述中国历史的一个片段，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需要耐心和仔细的梳理。当我们既要记录错综复杂的历史，又要集中书写那曾在帝国的最后岁月、试图以雄心勃勃的改革引领国家的120个人的人生经历时，这项工作将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似乎注定前景黯淡。但那些关于中国教育计划<sup>[1]</sup>的故事，促使我们不畏艰难，坚持下来。

虽然中国教育计划对于中国、美国和中美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人们对它却知之甚少。我们与它的偶然相逢，是在北京，一个雨天的午后。正在看电视时，突然，屏幕被一些有折痕的、泛黄的照片填满了，照片上的中国孩子，身穿宽大的丝质长袍，身后是朴素的新英格兰景观。这些孩子在1872年，中华帝国的黄昏中，被送到了美国。清政府希望，数年美国名校的学习，能为中国培养出一批领导人，把她从技术和军事的昏沉状态中拯救出来。在康涅狄格、马萨诸塞、新泽西和纽约的高中、大学里，这些现存世界上最老帝国的孩子，与新兴的年轻共和国的孩子们相遇了。他们一起做游戏，相互交换思想。他们的互动，将在未来的数十年和上百年中，在很多方面深刻影响这两个国家。

本书首先是一本历史学著作，同时，也可作为今日中国的借鉴。当今天的中国人漫步在城市的大街上，或在品尝美餐时，本书的主人公或许早已和他们一样，体认到了在推动一个古老国家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那些曾困惑和吸引着他们的许多同样的挑战和机遇。在美国，今天的中国人也许还会遇到与当年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偏见，时而激励他们，时而阻碍他们。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多到本书难以尽述，但是，从那些幼童开始第一次面对的，中国所面临的根本挑战，却没有改变。

清晰地界定留美幼童的生活，是一个挑战。一方面，他们迷恋于现代机器、全球商业和革新、进步的西方思想所蕴含的美好承诺。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忠诚的炎黄子孙，在追求彻底变革的同时，他们仍然尊重中国的礼仪，并为他们的历史和传统感到深深的骄傲。在抵抗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召唤的同时，他们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在东方和西方、过去和未来、自我和国家之间，达到了某种和谐与平衡。

我们希望那些今天主张中国抛弃国粹、全盘西化的人，或是盲目反美、拒绝其一切优点的人，能来读一读这本书。在书中，他们将重温中国向一个现代国家奋斗的历程和美国迈向其国际影响力顶峰的最初起点。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会看到一个故事——来自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人们友好的相遇，并试图去编织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这个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经验，永恒而真实的经验，值得我们去追忆。

[1] Chinese Education Mission本书译为“中国教育计划”，特指1872—1875年间，清政府根据容闳提出的“留学教育计划”，四年之内向美国分批选派120名留学生的计划。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计划。译者注。

# 第一部分

# 1 新生

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征途和大幅的跃进，中国向着现代性的蹒跚行进，仍有待于长足的进步。而这迈向现代性的征程，或许就是从耶鲁校园中的那次只身达阵<sup>[1]</sup>开始的。

1850年10月，整个耶鲁被一年一度的大一新生与大二学生的美式足球大赛席卷着。第一场秋雨后潮湿的土地上，几十个学生扭打在一起，他们为了夺球而猛烈冲撞、扑倒对方、互相擒抱。<sup>[2]</sup>

对于赛场上的学生来说，比赛并不仅仅是体育的竞争。由哈佛大学毕业生创建的耶鲁大学，最初追求创造一种比哈佛大学更为神学式的严格的学术环境。而19世纪中期的耶鲁，正在经历一次激进的转型。学校对于神学与古典语言学的信奉仍然强烈，但推崇专业素质与专门研究的现代精神开始激起变革。1810年，耶鲁成立了医学院，随后，在1843年，又成立了法学院。四年后，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毕业生又创建了谢菲尔德科学学院。这些新的现代性的殿堂召唤“新人”，他们无论是在心智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将有别于以往那些渊博的学者。正如当时一位杰出的评论家所说，体育提供了“培养男子汉气概所必须经受的痛苦和磨难”<sup>[3]</sup>，而这也正是一个成长中的国家自立于世界之林所必需的。与他们谦逊而深受神权教育、过着宁静自省生活的先辈不同，19世纪中期的耶鲁人希望展现出某种活力，以实现《民主评论》编辑约翰·L. 欧沙利文所说的年轻共和国的“天定命运”。欧沙利文的这一说法，深切传达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为了迎接这一“天定命运”，需要人具备灵活、速度和勇猛，这些素质在赛场上比在讲堂中体现得更为分明。体育运动逐渐成为青年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美式足球。这种对于运动的狂热，在



1850年耶鲁的这场大赛中，已初见端倪。那时校际或学院间的联赛还不存在，有关比赛的具体规则也尚未制定出来。每年10月的比赛，都在这些低年级学生身上留下累累伤痕。那天，大一新生的126人全部到场，人数上比123名大二学生稍占一点儿优势。当这些学生出现在位于学院灰色大楼对面、被称为“绿地”的公共广场上的时候，紧张的喋喋议论声，开始在大礼堂的大理石台阶和门廊中间回荡起来。在这里，当地的妇女正在挥舞着小旗，为她们支持的球队助威。这一年，看起来，像是新生会赢得比赛。

可以想见，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多了一年的练习，对比赛规则也更加熟悉，大二学生往往是胜利者，他们也乐于充当大学生活中不成文的等级秩序热情的守护人。在他们看来，初出茅庐的新生是不值得尊重的，除非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们甚至不惜使用卑鄙的伎俩，以护卫他们的荣誉。几年前的一次比赛中，一个大二学生在拼死阻截对手前进时，就曾拔出小刀试图刺伤一名正在猛冲的新生。但1850年是不寻常的一年。新生不但人数更多，而且身材高大，还幸运地拥有几位果断而坚定的青年，他们下决心去追求胜利。由于担心造成严重的伤害，一些教师试图取消这次比赛，但赛事的吸引力已经太大了。到场的观众非比寻常，可谓人山人海。比赛就要开始了。

比赛开场时，双方各站一排，彼此相对，目标是将球推入距离各自50码远的达阵区。双方最矫健的队员——大致相当于今天橄榄球中发动进攻的四分卫，负责接开球，或将球传给最有可能进攻得分的选手。新生队中，这一位置由L.M. 多尔曼担任。他身强力壮，志在必得，被认为是状态最好的选手，足以在几年之内为耶鲁争光。裁判宣布抛硬币猜正反面，赢的队可以获得额外的20码距离，比赛正式进行。

赛场上的一名新生查尔斯·哈洛克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从开球到比赛结束，只见拥作一团相互推搡的球员，连球在哪里都看不到，……时而，缠斗的人群突然散开，就像棉花通过轧棉机漫天飞舞，瞬间布满全场。”<sup>[4]</sup>喧闹中夹杂着大声吼叫和衣服撕裂的声音。因为帆布球衣的配备还是多年以后的事。

在一个成功的开球之后，新生们就找不到球了，它被埋在了扭打成一团的球员身下。多尔曼和他的队友们在混乱的人群中拼命地冲

撞、推拉，但他们看不到别的——除了猛冲而来的顽强反击的对手。人们预料中的颠覆性胜利，似乎不会发生了。

在大一新生当中，有个相貌独特的人正站在一旁。他的身材比多尔曼矮小很多，脑后长长的辫子，被盘起来塞在草帽下面。他身着符合儒家传统礼仪的丝质长袍，醒目地立在人群中。这个似乎不该出现在美式足球赛场上的观众，就是容闳。他在几年前，被长期逗留于中国的传教士带到了美国，是耶鲁大学几个少数的外国学生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眼前的游戏及其暴力性，与容闳的国人对于教育和学术的认识大相径庭。他正试图去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

在比赛的前几天，好奇心曾驱使他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院系的师生们讨论了耶鲁的体育项目。作为一名大一新生，容闳在会上目睹了一个名叫赛罗皮恩(Seropyan)的亚美尼亚人站起来，抨击美式足球是一种野蛮的风俗。容闳对这项运动所知甚少。而耶鲁毕业生谱系中最年轻的一个学生站了起来。他痛斥那位亚美尼亚人“千里迢迢从荒蛮愚昧的小亚细亚赶来”，就是为了诽谤“美好而悠久的耶鲁”最受欢迎的业余活动。这尖酸刻薄的回应，一直缠绕着容闳，当他站在场外看着他的同学们在一起推挤冲撞着的时候，这话语仍在他脑海中回响。突然他发现，球向他滚了过来。

他捡起这个奇怪的东西，用丝袍的长袖子裹起来，向远处看了看，发现门柱就在不远处的小教堂街上。他没有迟疑，飞跑起来。

这个中国人飞奔着，他的丝袍被风吹起来，像鼓满的风帆，这个景象足以在瞬间分散场上缠斗成一团的众人的注意力，但是随即，魁梧的大二学生就追赶过来。目标就在前方几码远的地方。一位旁观者描写了容闳的辫子——这所有中国人忠诚于大清帝国的象征，说：“它在风中飞舞，像水泵的手摇柄。”<sup>[5]</sup>拼命追赶的大二学生抓住了他的辫子，并用力地向后拽着，容闳感觉到一阵剧痛，他把球抛在地上，用尽全力踢了出去。球飞过了球门线。新生队反败为胜。看台上的人们尖叫起来，大二学生黯然神伤。容闳的同学簇拥着他们的新英雄，把他扛在肩上。来到美国之后，第一次，他感觉像回到了家里一样。

虽然一生接受西方人的教育，并在19岁时就移民美国，容闳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康涅狄格州的风俗和习惯，对他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他生长在广东南屏——中国南海沿岸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的习俗与这里格格不入。<sup>[6]</sup>

容闳很小的时候就通过传教士塞缪尔·布朗——他幼年时代在中国的老师，接触到美国人，布朗又将他带到了美国。但是，他仍然感到西方的整个教育理念是陌生而令人震撼的。尽管在中国教会学校接受的初等教育，使容闳对美式教育感到亲切，但是美国的整个教育制度对于一个中国学生而言，仍然是个几乎难以逾越的挑战。它所推崇的逻辑与清帝国的教育制度截然不同。

容闳初来美国的时候，美国教育正经历着迅速的制度化过程。几乎每个县都建立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根据1840年的统计，5—15岁之间的青少年，55%以上进入了小学和中学。<sup>[7]</sup>在教育改革家贺拉斯·曼恩<sup>[8]</sup>的影响下，康涅狄格州依据普鲁士教育模式，建立了一套“公立学校”制度。它信奉的原则是：所有的学生，无论背景和社会地位如何，都有权接受同样的教育和统一的课程。只有通过标准化的教育程序，一个社会内部的社会经济鸿沟才有可能被弭平。

对于像容闳这样深受儒家“因材施教”理念影响的中国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比这套普及教育的理念更陌生的了。<sup>[9]</sup>美国的民主精神，强调以平等的教育和统一的课程，使大多数人获得平等，而中国的教育传统则相信，只有将最好的、最优秀的人与其他资质平平的同辈区分开来，并以历经千年淬炼的经典来引导他们，才能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学生的关键词就是“才”，它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talent”。当美国已在宪法赋予的正当性之下，依靠法律来进行统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仍然奉行着朝廷和地方官员的“人治”。因此，拔擢有才能的人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就成了国家统治成功的关键，而“识才”也就成了政治的第一要务。学生们在他们整个人格形成期，一直在思索着他们有没有才能。很多人因为得不到重视或被忽略，而郁郁寡欢。

对一个有抱负的中国学者，没有什么命运比怀才不遇更为不幸。得不到赏识，没有为国家尽职尽责的机会，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诗人描述着这个悲惨的时刻，那种幽怨的笔调，在西方诗人那里，通常都是用来描写单相思的。例如生活在公元8世纪的王维就写过好几首哀叹怀才不遇的诗，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后来被古斯塔夫·马勒在他的交响诗《大地之歌》中采用了。诗中讲述了一个失意学者的自我放逐：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sup>[10]</sup>

为了选拔出帝国最优秀的学生，一大串的考试被发明出来，它们形成于公元7世纪，历经各朝各代的完善。<sup>[11]</sup>这套复杂的考试体系，如同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是对所有公众自由开放的。考试成功的人能获得声望，并在朝廷或地方得到高官厚禄。无论他的出身和地位怎样，至少在理论上，农民的孩子和贵族的孩子一样，享有飞黄腾达的机会。

但科举制度并非没有缺陷。虽然考试可以自由参加，但是赶考需要旅费；按照惯例，在得中之后，还要携带丰厚的礼品去答谢考官，这些费用是高昂的。参加竞争的人如此之多，录取的名额又如此之少，以至出题者渐渐发现，他们出的考题不是为了选拔最有能力的人，而是为了难住大多数的人。当考官发现大多数考生都被某个问题难倒了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扬扬得意，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自然，在激烈的竞争之下，地下交易也应运而生。一些“专业考生”收取高价替人代考。意识到这些舞弊行为之后，清政府增加了一些预防措施，例如，在进入下一阶段考试的前几天，事先要求学生背诵几行自己初试时所做的文章。但这一措施仅仅是增加了混乱，将用心良苦的制度设计，变成了复杂而又刻板的仪式。

尽管如此，考试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仅凭这一事实，就足以使全国的青年对它抱有希望。生长在南屏的容闳，和其他所有的学生一样，将科举考试视为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的唯一方式。他曾看着自己的哥哥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在村里最好的私塾读书。为此，他需要记住至少431,286个生字，还要能背诵儒家经典



中的大段篇章。宋朝的皇帝宋仁宗在他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教育的看法：“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sup>[12]</sup>

容闳在晚年时，以一种怀旧的心情，表达了对科举考试的赞同。他第一次承认，科举考试虽然有它的缺陷，却始终贯彻着一种精神，它能激励年轻学子为国家服务的热情。中国的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着儒家的精神。它建立在孔子最重要的两个学说“礼”和“仁”之上。礼，即仪式；仁，是内在于所有社会关系之中的道德和义务。这两者都在科举考试中得到了强烈的体现。科举制度是一种礼制结构，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同时，它又清楚地指出了社会成员之间应尽的责任。

在耶鲁校园里，没有苦行者的精神。容闳所处的新的学习环境，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大相径庭。在中国，所有阶层的年轻人，都争着出人头地，进入国家的精英统治阶层。但在纽黑文，特权阶层的孩子混在一起，重申着他们的好运。耶鲁缺乏现代的平等主义精神，但却充满生机和活力。“大学生活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容闳写信给他的朋友塞缪尔·威尔士·威廉姆斯说，“除了学习，我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事情。耶鲁学生们很兴奋，尤其是在精神方面，传统的耶鲁被一种雄心勃勃的气氛包围着，我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兴奋过，但是我很欣赏这种气氛所产生的影响。”<sup>[13]</sup>

然而，兴奋和热情，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成绩。尽管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这位耶鲁唯一的中国学生第一个学期的平均分只有2.12分，刚刚高于及格线的2.0分。在第一学年结束时，他稍有一点进步，平均分提高到2.45分，但微积分没有及格，希腊语也只能勉强通过。所幸，他在英文写作方面的天赋救了他。<sup>[14]</sup>或许是拥有某种中国传统文人对于优美文字的偏好，容闳的文章不但饱含感情，而且逻辑严密，为他赢得了关注和尊重。他拿到了英文写作的一等奖，并凭着他的写作能力，避免了被学校开除。

最让容闳头痛的还不是微积分和希腊语，而是体育。就像宋仁宗的诗中所说的，中国的学者应该坐在窗前诵读诗书，这种四体不勤的生活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只有那些缺乏才华和运气的人，才不得不在田间辛苦劳作。而在耶鲁，一个优秀的学生，不仅拥有敏捷的头脑，更要拥有强健的身躯。这一点让容闳很难适应。在写给威廉姆斯的信

中，他说道：“一个人必须拥有强健的体魄，否则就需要付出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努力，才能很好地完成大学学业，享受大学生生活。”<sup>[15]</sup>他的语气是低调的，如同他的性格一样。这种体力上的要求一直在困扰着容闳。那次橄榄球大赛上的胜利达阵，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他的同学们可以接纳他异族的容貌、他的辫子、他的丝质长袍，他流畅的英文写作和他独特的历史背景，但是他们无法体谅他体质上的孱弱。在1850年成为一个耶鲁人是很艰难的，需要行动的能力。容闳暂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经过艰苦的努力，容闳终于提高了学习成绩。虽然没有再度成为赛场上的英雄，但定期的锻炼让他的肌肉变得强壮，几个学期下来，他越来越像这里的学生了。为了补贴贫乏的收入，他在学生公寓里做了一名兼职服务生，为住在这里的二十个人服务，帮他们端茶送饭，或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至少从他的日记看来，他并没有为这项工作感到丢脸。

1854年，毕业的时间到了。像他前后所有的毕业生一样，容闳也经历了毕业前的忧愁、迟疑和对未来的惶惑。他强烈地思念着家乡，并同样强烈地留恋着美国，留恋着这块土地给予一个聪明勤奋的青年的各种机会。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容闳描述了他当时的两难之境。“美国深深地吸引着我，”他写道，“但是中国的幸福安宁，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中。”他解释说：

我非常想再多住几年，以便去选修一门科学方面的课程。当谢菲尔德科学学院刚刚在诺顿教授领导下成立的时候，我就去做过调查。如果我当时能继续学习一门实用性的专业，也许会更有助于实现我希望中国富强的目标。但是我没有钱，而且我的朋友们认为，长期在美国生活，会使我为了个人的优越生活而留下来，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原因，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促使我回到中国，选修科学课程的计划就被放弃了。<sup>[16]</sup>

当容闳不远万里准备回国时，他希望自己已经具备了报效祖国的才华和能力。但是，19世纪中期的清帝国，迥异于清教徒的新英格兰的精英学校，他将要用尽他毕生的才华，向那些满腹狐疑的“天朝”的官员们证明，他是一个称职的臣民。

[1] 达阵，美式足球术语，指抱着球或用脚踢球穿越球门线得分，译者注。

[2] 后文关于1850年这场美式足球赛的描述均出自CharlesHallock, “Football Forty Years Ago:When Numbers Counted—The Notable Yale Game of 1850”,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1889, 以及 “Armenian vs.Chinaman; Another Reminiscence of Yale Football Years Ago”,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5, 1889.

[3] 引自Jerome Karabel, 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2005), 第29页。

[4] Hallock, “Football Forty Years Ago”.

[5] Hallock, “Football Forty Years Ago”.

[6] 若非特别标注，所有关于容闳生活的信息均出自他的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1909), 可以在网上看到，网址:<http://web.pdx.edu/~lorz/texts.xhtml>

[7] John K.Folger, EducationoftheAmericanPopulation(Manchester, N.H.:Ayer Company Publishers, 1975).3—5.

[8] Horace.Mann(1796—1859), 美国杰出的教育家，以倡导普及教育和推动公立学校的建立发展而闻名。

[9] 引自Chang Ho Chang, ChineseCustomsandTraditions(Boston:Cheng & Tsui, 1987), 193.

[10] 王维，《送别》，出自邱燮友编，《新译唐诗三百首》，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第26—27页；译者:Austin Woerner.

[11] 关于科举考试的论述，出自Ichisada Miyazaki, China’s Examination Hell: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 trans.Conrad Schirokau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 引自Chang Ho Chang, ChineseCustomsandTraditions(Boston:Cheng & Tsui, 1987), 17.

[13] 容闳给塞缪尔·威尔斯·威廉姆斯的信，1850年12月25日，容闳档案，耶鲁大学，纽黑文。

[14] 容闳档案，耶鲁大学，纽黑文。

[15] 容闳给塞缪尔·威尔斯·威廉姆斯的信，1850年12月25日，容闳档案，耶鲁大学，纽黑文。

[16]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16.



## 2 大清

当容闳踏上纽约东河的码头，走向回国的客船时，他预感到，归乡的旅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他曾设想着，他在耶鲁结交的朋友、他寄宿过的家庭，还有那些已经融入他生活的美国人，都会来到这里为他送行。他想象着挥泪告别的场景，白色的手帕迎风挥舞，声声珍重盖过了呼啸的风声和水手的叫喊。但码头上空无一人。

十一月的寒冷海风吹打着他的脸颊，容闳迈着轻快的步伐登上了驶往香港的“尤里卡”号商船。等待他的是拥挤的客舱和将近五个月的寂寞旅程。但是，也并非所遇都是坏事。容闳高兴地得知，船上还有另外一位旅客，更令他惊喜的是，此人正是他在中国时就已经认识的威廉·艾伦·梅西牧师。威廉曾接替布朗牧师出任容闳在香港时就读的小学的校长，他也正打算返回中国。容闳从未喜欢过梅西。布朗校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教育家，能平均分配严格的教义和无聊的笑话。而梅西则是年轻、矜持而又冷漠的。他宣讲的那些理想和观念仿佛存在于某个遥远的领域，除了他本人之外无人能企及，那是一种让年轻学生们厌烦的装腔作势。但是看到梅西被他的行李绊倒在“尤里卡”号狭窄的过道上时，容闳轻松了很多。在此情此景中，容闳想，任何熟人都是朋友。

有梅西的陪伴是多么重要，在一会儿之后容闳见到水手和船长时，就得到了证明。在一小群冷漠的瑞典和挪威水手之中，耸立着一个费城人——船长惠普尔，他有严重的口吃，带着精神失常的神情。拖船拖着“尤里卡”号来到新泽西州的桑迪岬，它将在那里开启向东途经好望角驶向香港的航行，航程一万三千海里。

船一启航，船员们就知道了惠普尔船长疯狂的严重程度。由于他粗心大意的计算，船员们很快发现他们偏离了航道，驶进了狂风之中。这迫使水手们警惕地转帆行驶，而让旅程更加艰难，也让两名乘客呕吐不止。

更糟糕的是，这位精神错乱的船长每天早上都要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每走几步就停下来抬头看看天空，接着就像在履行什么古怪的仪式一样，尖叫、咒骂、吐口水一阵，然后又继续踱步。太阳升起后，船长的行为变得更加怪异。每天中午，他都会上演一出与海风决斗的闹剧，他向空无一物的空中猛击，同时爆发出大笑。多年以后，容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突然间，他停了下来，盯着天边那邪恶的逆风吹来的地方。他的脸因为剧烈的兴奋而涨得通红，眼睛瞪得几乎要迸出眼眶，不可抑制的愤怒在他心中燃烧，他咬牙切齿，挥舞着手臂，揪着自己的头发像是要连根拔起，上蹿下跳，踩着甲板，咒骂着让他逆风行驶的上帝。那时的空气都被从他结巴的口中费力喷射出的污言秽语和亵神的诅咒撕裂了，这使他成了众目睽睽下的可怜虫。<sup>[1]</sup>

到了午后，发疯的船长精疲力竭了。他瘫倒在甲板上，喃喃自语地吐出恶毒的言辞和自怜的哀叹。

海风太轻柔了，不适于充当惠普尔发泄怒火的目标。这位口吃的船长很快就开始寻找更加实在的替罪羔羊。船上那位瘦高的外国人是不错的目标。一天，当船航行至赤道某地时，惠普尔走向梅西牧师，挑起了一场关于《圣经》的尴尬谈话。梅西牧师感到十分意外，船长不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由于严重的口吃，他也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从前也从未说过什么神圣的言论。但此时他却一直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上帝，直到他突然想起了一段似乎令他极为欣悦的话。他对梅西说，这条船遭到了厄运，因为船上有“约拿”。约拿是《圣经》中的先知，他乘坐的船遭遇风暴袭击，惊恐的水手将他抛进大海，风暴就平息了。这一关于被诅咒的先知的隐喻，对梅西牧师没有什么影响，他也不是惠普尔所指的那个现代的“约拿”。梅西不安地看着船长，他正公然地盯着容闳，一遍又一遍的咒骂。“约拿在船上，”他结结巴巴地说，“约拿在船上。”<sup>[2]</sup>

容闳被激怒了。要是在纽黑文的运动场上，这样的侮辱足以让他照着一个人的脸一拳打过去。但是身处“尤里卡”号上的特殊境遇——被困海上，需特别仰赖于船长的好声好气，这足以说服他放弃身体暴力。但轻蔑之情总是要表达的。当船驶过距离婆罗洲不远的望加锡海峡时，一直对着风暴大呼小叫的惠普尔船长似乎找不到船的正确航向了。容闳戏谑地微笑着，用足够让船长听到的嗓门说：“如果我负责这艘船，至少可以缩短十天的航程。”<sup>[3]</sup>船长的脸变红了，眼睛瞪着，但一言未发。

终于，惠普尔指挥着船驶入了香港的港口，热闹的城市景象已经映入眼帘。一艘拖船拖着帆船入港，船长是个随和的中国人，他走上“尤里卡”号的甲板跟船员见面，并发出指令。由于对恶劣环境的长期恐惧，惠普尔跑到容闳旁边，让他去问问那位中国船长，周围是否有危险的礁石和浅滩。容闳张了张嘴，试图用乡音说出这句话来。但是，他在美国生活了八年，这期间很少有机会说中文。他到新英格兰时正处于思维快速模式化的年龄，而这种模式又将影响终生。他又一次张了张嘴，但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他羞愧地看着船长，只得承认，他不知道“危险的礁石和浅滩”用中文怎么说。

听见容闳的话，那位中国船长大笑起来，说着流利的英文，告诉容闳他需要的短语该怎么说。<sup>[4]</sup>

惠普尔、梅西和站在旁边的船员都轻声地笑起来，容闳也跟着笑了，但是涌上心头的不安渐渐取代了笑声。在这漫长而艰险的旅途中，他几乎每天都对自己说，他要回家了。但是祖国是什么样的呢？不懂祖国的语言，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没有接受过传统的教育和培养，他的前途未卜。

容闳抓起行李，大步走下船，走上山坡。那里依旧坐落着他的母校，还有一些他想见的朋友，他们大部分是美国传教士。容闳和萧德锐<sup>[5]</sup>一起度过了一两天。萧德锐是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中国邮报》的编辑和经营者，也是一位慈善家，他对容闳在美国的学业给予过一些资助，容闳很感激萧德锐，能和他相处一些时光，一起谈谈自己在耶鲁的所作所为，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这缓解了重返陌生的故土所受的打击。受到这一鼓舞之后，容闳回家去看望他的母亲。

当他踏上开往母亲居住的澳门的航船时，容闳开始焦虑起来。由于急于见到母亲，容闳忘记了买传统的中国服装。身着美式西装，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西方商人，而非母亲期待中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更糟糕的是他的小胡子——修剪整齐的胡须在美国是风行一时的。容闳在耶鲁大学时，由于他的种族特征，已经够与众不同了，为了融入周围的环境，他很快就留起了胡须。但是在中国，留胡子是有象征意义的，是向世人宣布，此人已经结婚了。单身汉留胡子被认为是愚蠢的，甚至是无礼的。

容闳怀着不知道该期待什么的心情，走进了母亲的房间。当他进去时，母亲向他凝视了片刻，对这个穿着蓝色外衣的高高的绅士，什么话都没说。容闳也没有说话。他紧张地想，母亲也许会拒绝接受他，也许直接转身走开。但她没有这么做。当震惊稍缓之后，她哭着冲向她的儿子，抱住了他。过了好长时间，母亲仍在流泪，她让儿子坐下，告诉她在美国所经历的一切。

容闳听从吩咐，谈起了耶鲁大学，谈到他在学生公寓从事的工作，谈到那些慷慨的新英格兰人，还有他如何努力地学习数学，以及瞬间成了橄榄球场上的明星。母亲认真地听着，但是，当他的故事慢慢停下来时，她插嘴问起了她认为最为重要的问题。

“你得到了什么功名？”母亲问容闳。<sup>[6]</sup>容闳回答说，那叫学士学位，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秀才，字面意思即“才能秀异之士”。这个学位只授予那些成功通过最高考试的年轻人。他告诉母亲，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要郑重其事地印在羊皮纸做成的学位证书上。

“这个学位值多少钱？”母亲直截了当地问。

容闳煞费苦心地向母亲解释说，美国的制度与中国的非常不同。在美国，政府并不保证成功的应试者的职位。美国的学校除了给予毕业生教育之外，不提供任何东西，而是希望这些经过精心培养的年轻人，自己去谋一个职位，挣一份薪水。然而这些，容闳感到，仍不能引起母亲丝毫的注意，这使得他有点不知所措。他告诉母亲，美国人相信，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比没有受教育的人，挣钱更快、更容易；那些受过教育并且拥有良好品性的人，很容易成为领导者，而领导者，几乎是确定的，会挣到大笔的钱。而他，容闳，确信无疑，他能够挣

得一个体面的生活。可是母亲仍然不为所动，他只好开始讨好母亲了。

“知识，”容闳缓慢地说，好像在吟诵一首诗，“就是力量，而力量比财富更伟大。我是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您就是当今中国数不清的无数母亲中第一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母亲。您有一个儿子，他是首位从美国一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这是您的荣誉，这样的荣誉是绝无仅有的。”

这番关于荣誉的言辞，是容闳的母亲可以理解的。她微笑着对儿子点了点头。然而，仍有一个迫切的问题要处理。“我看你已经蓄须了，”她说，“你知道你哥哥比你年长很多，他都还没有蓄须，你应该把胡子剃掉。”

容闳意识到，这是一个考验。从母亲的目光深处，他能感到母亲的不悦。母亲虽然说得轻声细语，但意思很清楚，她是在告诉儿子，剃掉胡须，向我表明，虽然去了美国这么多年，但你还没有忘记你光宗耀祖的责任，还能遵循你的传统。为了显示他的孝顺，容闳站了起来，匆匆走出门外。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向母亲鞠躬行礼，已经刮净了胡子。母亲握着他的手，开怀地笑着，再次拥抱了她的儿子。容闳充满感情地向母亲许诺，他永远回到她身边了，从今以后，只要她需要，他都会随时恭候。

带着一种重新获得炎黄子孙身份的感觉，容闳离开了母亲的住处。他决定，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拾起丢掉的汉语。但他意识到在澳门是做不到这点的，因为在澳门这个母亲居住的小岛上，大部分人口是外国人。如果待在澳门，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说英语。要想真正重新学习中文，他必须走到中国人中间去，去一个不是以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高亢曲调，而是以传统中国的轻柔节奏生活的城市。因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西方人一同度过，容闳并没有亲密的中国朋友或熟人同住。而且，勉强支付了耶鲁的学费之后，他也再没有钱去支付其他形式的居所。容闳找到了美国传教士，丹尼尔·弗鲁曼牧师，希望寻求一些帮助。几天后，在1855年的夏天，他启程前往弗鲁曼居住的城市——广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广州也同澳门一样，到处都是外国人。但无论如何，只能如此了。广州是同名的省份里最大的城市，也是省政府的所在地。弗鲁曼居住的区名叫Ham La Han，位于城



市南端，紧临珠江，这片广阔的区域是政府的刑场，在容闳搬来这个镇子时，刚被地方当局投入使用。

容闳需要用很多的时间，去理解困扰着广东的骚乱的原因。他在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孩童时代就离开了中国。到了如今的年龄，他对米勒德·菲尔莫尔和富兰克林·皮尔斯<sup>[7]</sup>的了解远远多于对那些统治中国的名不见经传“满大人”的了解。然而，当他被酷热中刑场上传来的腐败恶臭所煎熬时，却不得不去面对他一直试图忽视的残酷现实，与清朝的日渐衰亡相伴随的恐怖现实。

从1644年入主中原<sup>[8]</sup>以来，这个统治中国的家族已经带着其成员也认识到为时已晚、不可克服的困难，进入了19世纪。自然过程、简单经济、外国入侵和内部叛乱，不断给古老的帝国秩序施加新的压力。在中国人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陈旧的技术和管理方式是造成显著失败的主要原因。

最根本的问题是迅速激增的人口。在1400年，中国的人口还稳定在1亿人。在清朝统治下，到容闳出生的时代，人口已经增长至4.5亿。<sup>[9]</sup>中国的国土覆盖了全球7%的土地，居住着全球近1/5的人口。大部分人口聚集在城市周边，而非城内。清朝前期食物充足，工作有保障，人口增长了四倍，这给1753—1818年间的中国农耕社会造成了很大损失。根据粗略统计，每个农民平均占有的可耕地面积锐减了43%，人均可耕地面积不足半亩。<sup>[10]</sup>这使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期总体较高的生活水平——在近代来临之前，面临着巨大的下降的压力。在西方，农业产量的局限和人口激增，由工业革命得到了补偿。制造业和采矿业中的机器发明，使得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了新式工厂。但中国，这个创造了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算盘的文明古国，<sup>[11]</sup>却发现它那以象征符号为基础的语言的局限性，以及儒家思想的重要影响，使其无法与那些迅速生长的思想和观念相调和，而那些思想和观念正标志着科学现代化的开端。<sup>[12]</sup>中国的创新时代已经过去了。到了容闳生活的年代，她已衰退到只能用礼教和闭关锁国政策来维持生存。

从1420年起，中国的皇帝就深居紫禁城中，在170英尺宽的护城河和三层楼高、延伸两公里的城墙内，过着仪式繁复的生活，远离他统治下的广袤而充满差异性的土地。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是两批精心

挑选的饱学之士，即军机处和内阁，也称六部九卿。<sup>[13]</sup>深居简出的皇帝通过不足4万名文武官员治理这片广大的领土，管理将近5亿的人口。皇帝所关心的不过是征收临时税赋和维持一支直接听命于他的小规模常备军。<sup>[14]</sup>清朝的统治阶级视现存秩序的和谐高于一切，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那些难以驾驭的新技术和新思想所带来的破坏，就留给野蛮的西方人去玩弄和体验吧。一位同治时期的英国评论者在总结他对于1861年继位的同治皇帝的印象时，坦率地说：这个政权认为它的职责，“似乎就是因循守旧，合法化既成的事实，以及扼杀一切处于萌芽的新生事物。它深知一个伟大的真理——眼睛有两种作用，看，或者不看，但一般来说，它的信念是选择不看。”<sup>[15]</sup>帝国漠视人民的那些统治仪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居住在紫禁城中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的使命并非源自地上臣民的需求，而是奉天承运。皇帝自认为是“天子”，不但自身是神圣的，而且要负责维护天地之间的重要平衡。当思想和行为都关注于和谐和维护神圣秩序时，这种平衡就被最有效地维持了。因此，中国人小心谨慎地避免任何可能会干扰现存秩序的东西——例如工业化和与外国的交往。

数百年来，清朝已经把和谐带给了这片广袤的国土，从冰封的山脉到温和的港湾，从干焦的沙漠到肥沃的河谷。所谓“中国人”，其实是个被误解的概念。<sup>[16]</sup>因为清朝的臣民包含众多不同民族和相互冲突的宗教，通晓多种语言的中国人，常说的主要有七种语言——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湖南话、客家话、赣州话、闽南话，<sup>[17]</sup>每种语言之间的不同，都像德语和法语一样。这个人为建构的民族，必然蕴含着无数的裂缝，清朝在统治过程中必须设法维持稳定。因此，与西方人不同——他们欢迎持续的变动和随之而来的机遇，中国人却更愿意让一切都处在一种微妙的停滞状态。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危险就是“乱”。为了保护从祖上继承下来的平衡体系，清朝以极度的谨慎来实行统治。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遵守长久以来形成的规则。一位与容闳同时代的中国学者，贴切地描述了这种极端保守的精神。“一代又一代人遵循着儒家的教诲，君臣、父子、主仆、尊卑之间正确的人际关系，”他写道，“所有一切都应在正确的位置上，就像帽子和鞋子一样，不可以互换。”<sup>[18]</sup>

但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日常需求仍需处理，在帝国官方权力干涉不到的地方，一套极端复杂的地方权力网络建立起来，并以它的名义进行统治。清朝把几乎全部的自治权都授予了18位地方总督，由他们来行使一些通常是保留给国家元首的权力，例如向国外派遣使节或是军事和经济条约的谈判等，好像北京没有中央政权一样。地方政府中普通的日常事务，如收税、筑路、维护法律和秩序、解决争端等，交给1300位府县级行政官员处理。但是，这些府县太大了，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可能独自治理。因此，在县级行政长官下面，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吏”的阶层，这些人又依赖于当地的宗族首领，并要求这些首领定期向他们呈送有关宗族活动的报告。就这样，整个帝国维持了井然的秩序。

对于清朝统治至关重要的是回避制度。为了防止乡土忠诚的过度影响，朝廷要求地方行政官在远离他们家乡的地区任职三年。在好的意图外，回避制度也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地方长官被安插到偏僻的角落，不熟悉当地的语言，而且只待相对很短的一段时间就离开，因此很多地方长官选择不作为的方式，消磨时光，避免任何可能激怒当地人民的突然行动。官员们适应了令人愉快的腐败生活，在黄河上下修堤筑坝这样的工作长期无人问津，这样才能保证每年雨季到来，洪水淹没临近的村庄时，政府能够开展定期的修补工作，以得到随之而来的回扣。大运河是一条长达1000英里的商用水渠，修筑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在清政府的低效和疏忽之下也遭到了破坏。

虽然这套复杂的政府体制在中国存续了数百年，但它显然已无力应对自身所面临的日益加剧的挑战。从19世纪20年代起，它已开始逐渐瓦解了。对于宫墙里面高高在上的、一直在寻求天朝模式(celestial patterns)的统治者而言，帝国在现代曙光到来时所遭受的挑战有时也像是上天的安排。财政领域的感受最为强烈，用来铸币的铜的日益短缺，将中国经济带入一片混乱之中。<sup>[19]</sup>北京的清朝官吏，没有任何人做过市场研究，就将铜短缺视为宇宙失衡的先兆。但真实的原因则是更为现实的：朝廷把自己的需要放在首位，制定了严格的采矿政策，要求每个铜矿以固定的价格出售一定的份额给朝廷，在此之后才能将剩余的铜以正常市场价向民众出售。随着矿藏储量的耗尽，矿石变得更加难以挖掘，采矿成本迅速上涨，清政府拒绝调整低价合同，使矿场持续损失产出的相当部分，许多矿场不得不关闭。



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货币短缺，并且立即引发了通货膨胀。让清政府感到不安的是，许多外国货币迅速涌入填补了空缺：英镑、法郎、葡萄牙雷亚尔<sup>[20]</sup>、俄国卢布，都很快进入流通。这些外币是被那些强力入侵中国口岸的大量西方商人带进来的。到19世纪中期，甚至连清朝的官员也开始使用外国货币。

最终，正是这些带着硬通货而来的西方商人和随之而来的军队造成了清朝的垮台。曾经凭借长城来阻挡外国入侵的中国很快认识到：变化了的经济、技术和现代国家地位的现实，使闭关自守已不再可能。由于中国缺少专门处理对外事务的中央机构，到达中国口岸的西方人由名副其实的礼部接待。在礼部，外国商人被命令对中国皇帝行正式的叩拜礼，就是有名的“磕头”，并且承认清朝在一切世俗和神圣事物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接受这些的交换条件，这些来访的商人被允许在监管下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交易。对于清政府而言，这是外汇交易的范围。然而，外部世界的发展，将会揭示出这一体系的故步自封。

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已经变成了众多独立民族国家的集合体，每个国家都被视为这个“基督教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分子。这些单一的民族国家不再纠结于彼此消灭，而是窥视着更大的世界版图，并且看到了经济和领土扩张的成熟时机。黑格尔后来写道：中国人认为海洋“仅仅是边界，是陆地的终点”，而欧洲人却渴望超越海洋的边界去扩张自身的影响和统治，突破他所说的“无穷的依赖性”<sup>[21]</sup>，它束缚了任何单纯植根自身土壤的文化。<sup>[22]</sup>西方人还受到了经济自由主义律令的鼓舞，他们在亚当·斯密和其他思想家的感召下，以充满活力的自由贸易哲学取代了传统重商主义者的观点。重商主义认为，全球贸易的总量是不可改变的，每个国家都必须尽量去保持贸易顺差。而自由贸易哲学则认为，无论货币流向何方，更多的贸易才是最终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成了一个十分理想的目的地。早在19世纪初，谈论“打开中国”以及传说中的财富和巨大的消费群体，在欧洲资本家中间就已成为一种时尚。尽管是作为一个单纯的财政使命的宣言被谈论，“打开中国”的想法却从未掩饰其文化和道德基础。对于黑格尔及其同时代欧洲思想家而言，中国代表了东方所有的古老和陈旧。在中国，皇帝以反复无常的方式统治着百姓，而百姓则自视卑贱，“自信生下是专给皇帝拉车的”。<sup>[23]</sup>这是一种存在于“世界历

史之外”的文化，黑格尔写到，需要西方的启蒙，才能让它看到光明。[\[24\]](#)

带着这种观点，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开始迅速转变。在1749年，一位来自波士顿的作家威廉姆·道格拉斯还曾热烈地赞美中国人是“所有人类民族的兄长”。但到了1800年，另一个来中国做商业使节的波士顿人却说，在西方移民中，“中国人的奸诈已经众所周知，特别是那些从事贸易的人”。[\[25\]](#)至于清政府，这位商业使节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还能找到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比中国更具压迫性，也许这是个问题。所有的地方官职都被授予那些能使朝廷里的大官得到最大利益的人，结果是臣民遭受各种压迫。他受到小官吏的压榨，在更高一层同样如此，他们依次受到上级长官——巡抚或总督的压榨。”[\[26\]](#)

当西方开始将中国视为商业贸易的目标和迅速全球化的交易网络中的一员时，这个古老帝国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各式各样的省份以微弱的关系联合在一起，构成了紧张而低效的帝国政府，这样的联合体使西方人愤怒又欣喜，决心以更加坚定的意志进入这个“中国”（Middle Kingdom）。他们既为能轻易拿走它的物产而惊奇，又为中国官僚的复杂作风而困惑。

由于担心那些大胆的商人会打破帝国经过数百年维系而得来的脆弱平衡，清政府试图使西方人处于严格的封闭状态。起初，他们希望通过划出特定的贸易区来限制西方人的影响范围；在1760年建立了广州贸易体系，以外国商人最集中的城市“广州”命名，它开放了少量进出口货物口岸，并建立了中国商人垄断权，即“公行”，以此监督与外国人进行的所有交易。不像早期的商旅和小规模贸易代表团，能够被礼部轻而易举地管理，如今到来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商品和市场份额更加渴望，铤而走险的资本家比中国人见到过的任何西方人更多、更顽强。

起初，对外国人来说，最有利可图的商品是茶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茶叶在英国从一种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变成了日常生活的消费品。到了19世纪中期，茶叶消费占到了英国平均家庭年收入的将近5%。在17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进口约200磅的茶叶原叶；数十年后增至40万磅，到容闳出生时，已经跃升到超过2800磅。[\[27\]](#)

为了支付巨额货款，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出售印度生棉。但是到了19世纪，中国人对进口棉的喜爱逐渐减弱。东印度公司开始考虑替代品，寻找其他更合意的贸易商品。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新大陆的白银。在历史上，英国商人曾把中国茶叶转销到英属北美殖民地，从那里得到白银，再将白银付给清政府，换取更多的茶叶。“波士顿倾茶事件”<sup>[28]</sup>中，美国殖民地居民倒入海中的茶叶，正是中国茶叶。但是在19世纪早期，玻利瓦尔革命堵塞了获取南美白银的渠道，使得东印度公司不得不争夺其他商品，以支付英国人对茶叶不可抑制的消费所产生的费用。

在印度一些地区大量生长的罂粟，似乎提供了最佳的解决途径。鸦片在15至18世纪由阿拉伯人引入中国，此后仅作为药物使用，而且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但是英国人将鸦片作为一种消费品推销给了中国人，仅仅赞扬鸦片的优点，对它的危害却只字不提。于是，鸦片迅速流行起来，大量的中国人染上了烟瘾。据统计，到1850年，有450万中国人吸食鸦片成瘾。<sup>[29]</sup>成瘾比例最高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而正是这两部分人在监管对英贸易，他们可以毫无限制地获得任何经过广州口岸的货物。这些吸食鸦片成瘾的人，正是最初受到朝廷委托限制外国影响的官员，但现在，他们已经无可救药地和西方人拴在一起了。

清政府担心起来，宣布鸦片非法，但这对戒烟无济于事。非法销售网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将鸦片走私到全国的各个角落。清政府提出抗议，英国人恼羞成怒了。如果不能销售鸦片，他们就没钱购买茶叶。英女王的臣民们认识到了他们坚持推行的贸易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东印度公司也意识到了鸦片的罪恶，破例雇用私人船只向中国口岸运输鸦片。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公司努力扩展这项卑鄙交易时，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受到道德谴责。但是，冲突已不可避免。

1839年初，一位清朝的高层官员林则徐到达广州。作为朝廷的钦差大臣，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立即终止鸦片贸易。他一直等到春末，然后就下令所有外国商人上缴他们的全部鸦片。为了表示戒烟的决心，林则徐调用了小股军队包围了西方人的驻地，直到他们交出鸦片。英国贸易监督、海军军官查尔斯·埃利奥特，对于等级和协议怀有一丝不苟的尊重，他立即命令商贩按照林则徐的要求去做。在收缴了全部鸦片存货之后，林郑重地将其全部倒入了南海中。



埃利奥特冷静地要求林则徐对销毁的货物进行赔偿，设想一下也许他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英国人既能拿到赔款，又不用为鸦片贸易的后果感到愧疚，同时中国人也能一劳永逸地远离鸦片的威胁。但是倔强的林则徐拒绝赔偿。他告诉埃利奥特，鸦片是违禁品，这个事实已经清楚地告诉过英国人了，因此不存在任何补偿问题。作为一个能够训练和部署军队的长官，埃利奥特不再需要任何借口。他宣布战争开始。

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道光皇帝开始并不担心。他说，英国人是“微不足道、可恶的种族”。<sup>[30]</sup>但是，当现代武器装备的英国军队将组织不善的中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时，强硬的话语很快被恐惧所代替。1841年，埃利奥特占领了香港岛，接着又攻占了保卫广东港口的要塞。到了1842年8月，一头雾水的中国人已别无选择，只有投降。

双方在南京城北会晤，商定了和平条约，清政府同意了那些将永远束缚帝国的条款。除了赔偿2100万美元<sup>[31]</sup>巨款外，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并同意接受一位英国人在北京担任高官<sup>[32]</sup>。南京条约进一步规定“两国应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sup>[33]</sup>广州制度被迫终止，公行被废除，更多的通商口岸被开放。条约还赋予美英两国公民享有“治外法权”，这使居住在中国的英、美人可以接受本国法律的管辖，而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最后，预料到新口岸开放将造成的商业竞争加剧，英国坚持要求中国给予其“最惠国待遇”，这样一来，无论任何原因，中国都将给予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臣民或公民额外的特权或豁免权，英籍人士也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sup>[34]</sup>

这正是欧洲其他国家翘首以待的发令枪声。贪婪的西方人竞相涌向中国的大门。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葡萄牙、意大利，还有程度稍轻的美国，争相进入中国展开贸易或挑起事端，并以武力威胁清政府，以得到更多的特许权。

偿付给英国的“赎金”，使得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加上战败带来的耻辱，“反清”情绪在整个国家爆发起来。鉴于中国大多数人口是汉族，而清朝统治者却是满族人，是来自遥远北方的“外族”，异见分子轻易激起了种族仇恨的共鸣。17世纪，清朝的建立者打着满族的旗帜集合在一起，冲进明朝的都城，迫使明朝皇帝退位。掌权之后，清朝统治者要求所有的臣民蓄起满人的标志性发

型。他们命令所有中国男人，都必须剃掉前额的头发并蓄起长辫，或者面对死刑。用当时流行的话，叫“留发不留头”，或者“留头不留发”。<sup>[35]</sup>汉人最初激烈反对这项外来的风俗，但他们的反抗遭到了镇压。由于接下来几十年至数百年间的相对稳定和繁荣，清朝的种族认同并没有成为重要问题。

但是，当情况恶化时，将中国的厄运归结为清朝的外来血统和外来统治引起了上天不满的观点，日渐流行起来。太平军，一支组织完善的、在1850至1864年间几乎造成了帝制崩溃的起义军，最好地利用了这种民族敌对情绪。

太平，意指伟大的和平，它是由洪秀全创立的。洪秀全原是广东南部的一位乡村教师，屡试科举不中。怀才不遇的悲愤，让他大病了一场。当他从病床上起来之后，声称自己在梦中看到了耶稣现身，而耶稣则认为他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命令他带领中国摆脱外国人的凌虐。这里所说的外国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入侵的满族人。依靠对自己的族群——客家人的吸引和它的支持，洪秀全利用煽动性的反清言论，把反叛者吸收到他的队伍中来。那是一种掺杂了基督教义与大同理想的激烈思想。太平军的宣传小册子说，满族人“想要荼毒汉人”，“让贪官污吏敲骨吸髓，人民在路边哭泣……富人当权，英雄末路”。<sup>[36]</sup>

1850年2月，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继位，而他继承到的，是不断加剧的反叛。这一年的年底，太平军已经增加到了一万人。1851年1月，在洪秀全37岁生日时，他宣布自己为“天王”，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号称“太平天国”。这种带有强烈帝国色彩的修辞，是他的追随者们很容易理解的。洪秀全主张激进的土地集体化，强烈抵制妇女缠足等陋习，这位太平军领袖力图向他的追随者表明，他是那个漫长的天授皇权序列中的又一个帝王，比可恶的清政府更加神圣而具有正当性。洪秀全频繁地提到上天，并非无的放矢，他自称“天王”，试图从富足而贪腐的“满大人”手中夺回上天赐予的神圣权力。当时一首广为传唱的太平军歌谣说：“百万富翁欠我们的钱，半贫半富耕自己的田，贫而有志的跟我们走，贫困或饥寒，上帝保佑咱。”<sup>[37]</sup>

如此有感染力的歌词，深为未受过教育的底层民众所熟悉，并足以引起他们的共鸣，对于这些被剥夺的底层人民产生了宗教狂迷般的

强烈影响。到了1853年，太平军已经拥有超过70万的士兵。在一场激战之后，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们占领了南京，并立即将其易名为“天京”。洪秀全乘坐十六人抬着的金轿进入了南京，他头戴皇冠，身穿纹龙皇袍，由四位主要的助手簇拥着，他们被封为四个“王”，年纪都在二三十岁。

紫禁城里的学者们在寻找对策，他们遍查古籍寻求解决之道。而洪秀全的军队似乎在迅猛的增长，并且已经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省份，拿走了帝国将近90%的税收。战局像钟摆一样大幅度地摆动，双方各有胜负，中国的城镇和乡村都充斥着暴力，人心惶惶。在广东，总督叶名琛即便在乱世的标准下，也以残暴著称。身体肥胖、心胸狭窄的叶名琛来自内陆城市汉口，根据回避制度，他被朝廷派往广州这个南方口岸任职。在他即将上任新职时，太平军纵火烧了他在汉口的大量财产。叶名琛怒火中烧，发誓要报仇。当他控制了洪秀全及其众多忠实追随者的故乡时，报复立即开始实施了。他给大量平民加上了谋反的罪名，判了死刑，然后又给他们用钱赎身的机会。那些能拿出白银、黄铜、房子和牲畜的人可以活命，否则就要被处死。

当容闳来到广东，寄居在弗鲁曼家中时，叶名琛已经处决了七万五千人。

容闳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中目睹了屠杀的场景：

一天，出于好奇，我放胆向法场走去。但是，天呐！这是什么景象！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体堆积如山，等待掩埋，但没有人清理法场做任何准备。

处决的范围比预计的要大，而事先又没有去找一块足够埋所有人的场地。尸首被暴露在烈日下，仲夏季节的气温从早到晚都维持在90华氏度，有时甚至更高。已完全被血水渗透的土地和至少堆放了两天天正在腐烂的尸体，散发出污秽的恶臭，以致法场周围两千码之内，都笼罩在这种传播瘟疫的浊气之中。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感染源，在人口密集的广州，竟然没有引发致命传染病而人口大量死亡。至少幸运的是，在城西的偏远郊区，找到了一个深广的山谷，它很快变成了一个阴森森的墓地，用来倾倒大量的尸体。没有人会扔土下来，掩埋这些尸首，无数成群的鲜红、丑陋、令人作呕的蠕虫会来完成这项工作。<sup>[38]</sup>

看着腐烂的尸体，容闳加快脚步往家走去，尽量不让自己去想方才目睹的恐怖情景。血流遍地、蠕虫满野的景象太鲜明了，无法忘怀。那天晚上，容闳没有吃饭。在夜里，他徒劳无功地试图入睡，但满脑子都是无头的尸体。

[1]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45.

[2]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47.

[3]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47.

[4]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48.

[5] 萧德锐 (Andrew Shortrede)，英国资深出版商，1845年2月创办《中国邮报》(China Mail，又名《德臣西报》，1974年停刊，是香港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译者注。

[6] 引自容闳与母亲的谈话的记述，第18—19页。

[7] 米勒德·菲尔莫尔 (Millard Filmore) 和富兰克林·皮尔斯 (Franklin Pierce) 是容闳在美时期的美国总统，在任时间分别是1850—1853年和1853—1857年。

[8] 原文“throne”是“即位”的意思，有误，1644年是清军入关，因此译为“入主中原”。译者注。

[9] 引自 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0.

[10] 引自 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0.

[11] 原文如此，中国的四大发明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译者注。

[12] 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致力于发明创造的国家，在近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这是一个困扰了学者们几十年的问题。我们这里引用的两个流行的解释，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以英国科学家、伟大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而得名。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关于李约瑟的更多信息，参见



Winchester, Simon.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The Fantastic Story of the Eccentric Scientist Who Unlocked the Mysteries of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Harper, 2008).

[13] 原文如此，事实上军机处、内阁与六部九卿是不同的概念。明代的六部九卿，指的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尚书，及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史、通政使司的长官通政使、大理寺的长官大理寺卿。清承明制。内阁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明朝为加强皇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殿阁大学士，负责点检题奏，拟票批答等事，因在大内殿阁办事，故称“内阁”。入阁诸臣品级不高，但掌握实权。清代沿袭明制，设中极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军机处是清代为了加强皇权而产生的制度。雍正七年（1729年）因对西北用兵，为办理军机事务，在隆宗门内设军需房，次年始称军机处，后成为常设机构和清朝政治的中心。军机处主要成员为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大军机多由满族亲王或内阁大学士担任，本身无品级，亦无俸禄。译者注。

[14] 引自 Jonathan Fenby, *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Ecco, 2008). 6.

[15] 引自 John King Fairbank, Katherine Frost Bruner, and Elisabeth Macleod Matheson, eds, *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vol. 2*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18.

[16] 作者对于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其内在统一性了解不够，因此出现上述观点。译者注。

[17] 现代语言学一般将中国现代汉语方言分为七大类：北方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译者注。

[18] 引自 Thomas Buoye et al., eds., *China: Adapting the Past, Confronting the Future* (Ann Arbor, Mich.: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Publications, 2002), 59.

[19] 引自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151.

[20] Portuguese real, 一种葡萄牙货币的名称，译者注。

[21] 此处作者引用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原文，因此直接引用王造时的译文，参见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22] 引自 Gerog Wilhelm Friendrich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Dover, 2004), 90—91.



[23] 此处作者引用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原文，因此直接引用王造时的译文，参见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24] 此处作者引用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原文，因此直接引用王造时的译文，参见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25] 引自Rowe, China's Last Empire, 167—167.

[26] 引自Rowe, China's Last Empire, 167—167.

[27] 引自Rowe, China's Last Empire, 166.

[28] 指1773年12月26日北美殖民地人民因不满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政策，抵制来自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茶叶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垄断，而在波士顿港口登上茶叶商船、将342箱茶叶倒入水中的事件。这一事件最终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译者注。

[29] 引自Rowe, China's Last Empire, 167.

[30] 引自 Franz Schurmann and Orville Schell , eds. , Imperial China: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Penguin, 1968), 139.

[31] 应为2100万银元，译者注。

[32] 查《南京条约》原文未见此条。《南京条约》全文中文版见于 <http://nanking.tk/>；英文版见于 <http://www.london-gazette.co.uk/issues/20276/pages/3597/page.pdf>；译者注。

[33] 引自Rowe, China's Last Empire, 172.

[34] 引自Rowe, China's Last Empire, 173.

[35] 引自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38—39.

[36] 引自Jonathan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Norton, 1996), 161.

[37] 此处为直译，查太平军歌谣未见，近似者为：“上等的人欠我钱，中等的人得觉眠，下等的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译者注。

[38] 引自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1909), 19.

### 3 外国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惊悚的屠杀景象渐渐从容闳脑中褪去，他的震惊和愤怒之情让位给了理性的思考。他确信，屠杀象征着清朝制度的腐败。迟缓的官僚制度，让邪恶如叶名琛这样的人为所欲为，让广大的中国百姓苟活在自私、残暴的官僚统治之下。容闳从未严肃思考过太平天国产生的原因，但此时他却对洪秀全和他的队伍产生了同情，后来他写道：“于是我想，太平军有足够的正当性去推翻这个满族政权，我开始彻底地同情太平军的主张，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准备加入太平军。”<sup>[1]</sup>

接连几天时间，容闳在玩味着西去南京，捍卫太平天国的想法。他站在镜子前，用手指卷着辫子，想象自己剪掉这服从满族的象征，像太平军那样按照儒家传统留起长发的模样。但容闳没有加入叛军，他在大学时代对于作文的热衷，训练他能看到一个问题的所有方面，并以雄辩和理性反驳目前的处境。他是个孝顺的儿子，无法忍受对他的母亲说出这个想法。自从容闳的父亲在不到十年前死于鸦片战争之后，她就做了寡妇。如果容闳加入叛军，这无异于让她再一次遭受丧失亲人之痛。最好的平息怒火的方法，容闳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就是专注于他之所以来到广州的理由，也就是——最快地最有效地学好他的母语。

六个月来，容闳集中一切精力，去恢复他已经忘记的母语发音，它的词汇、短语和语法。他拼命地学习，并再次从学术追求中体验到乐趣，学习似乎给他的世界带来了宁静和秩序，否则它将是个不安的世界。不止一次，他透过窗户看着这个挥汗如雨的城市，然后闭上双眼，想象着他又回到了康涅狄格州，那里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最后，当他终于可以不假思索地用中文与广东商人流利地交谈时，他想到，他该去谋个职位了。可是，该去干点什么呢？

容闳思考着他的选择。他有学识但是没有钱财，做好了准备，但是无路可走。如果他有些钱，他可以轻易地捐个功名并以此致富。与日俱增、越来越多渴望升迁的清朝官吏，用巨额贿赂绕开了可怕的科举考试。可他是个穷光蛋，可以选择的机会就有限了。然而，相比于何去何从，更加困扰容闳的，却是他个人的效忠问题。尽管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再去想刑场上恐怖的情景了，但是那一幕却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是忠诚的炎黄子孙，这一点他从未怀疑过。但是，如果中国展现在他面前的只能是愚昧凶残的清政府，或者激烈暴力的叛乱，那么他情愿选择与外国人站在一起。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尽管已经掌握了中文，但是容闳使用起他的母语来，远没有用英文那样得心应手。新英格兰腔调已成了他说话时自然地反应。他的朋友，除了少数几个例外，都是美国或者英国人。他对于基督教的教义比对于儒家经典更加亲切。他有时候在想，儒家安排了一套“礼治”的生活，把服从的重担加在每个人身上，从长者到帝王。而基督教，虽然晦涩艰深，却把责任和义务都落实在了个人的身上。中国人迷恋于“才”，美国人却让他们的孩子充分开发他们的禀赋。虽然侵略战争让他失去了父亲，但容闳并没有怀恨在心。他决定与美国人同甘共苦，而此时似乎没有谁比彼得·派克医生更能为他提供帮助。

派克的身份类似于美国派驻清廷的官方使节。他是长老会派传教士，也是一名内科医生，他的神学和医学训练都是在耶鲁大学获得的。他认为自己的兴趣颇为纠结，喜欢说“医学不过是宗教真理的侍女”。<sup>[2]</sup>1834年刚从大学毕业，派克就来到广东，开了一家眼科医院，专门治疗眼病和身体的肿瘤。

二十年后，派克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以其对医学的追求得到了中国最高当局的高度认可，因此被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任命为驻清廷代表。总统要求这位医生，要在清廷愿意的范围内，得到尽可能多的经济特权。但派克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更感兴趣的是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而非兑换货币，因此不是个特别精明的谈判者。他发现自己更加专注于结识有兴趣的人们，而不是去争辩缔结条约。当容闳

自我介绍并提出工作的问题后，派克立即同意了录用他，尽管他这里并没有什么工作需要这位耶鲁的校友来做。派克觉得，容闳熟悉两种文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助手。他给了容闳一份适中的收入，月薪15美元，后者对此欣然接受了，他成了派克的私人秘书。

相比于一份有报酬的工作，更让容闳兴奋的是他在为一位有影响力的人服务。他仍然是中国传统制度的产物，相信有能力有抱负的人实现追求的最佳途径，就是被一位慧眼识才的达官显贵看中，并为其打开升迁之门。为派克工作，容闳想象着，也能为他提供这样的机会。这份工作，让他既能跟朝廷官员接触，又能跟西方商人交往，也许可以径直达成他的愿望。

然而，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尽管有美好的愿望，派克却不足以提拔容闳这样有雄心而又饱学的青年。很快，容闳就想要离开这份秘书的工作了。在派克的祝福下，他离开了广东，回到香港。再次寄居到他的老友和恩人、著名报人萧德瑞的家中，并在萧德瑞的联络下，在香港最高法院当了一名实习律师，月薪75美金，且有更好的前途。

法律，对于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来说，是条不错的路，萧德瑞向容闳建议，它和任何政府中的工作一样好，可以让容闳接触到有权势的人。而学习法律和获取经验的最佳途径，就是密切地向当地的出庭律师学习。除了在高等审判庭实习，萧德瑞还推荐容闳给他的好友大律师帕森当学生。容闳满怀希望地、愉快地开始了他的新工作。

然而，这一切很快又破碎了。即便容闳讲着优美的英语，即便他身着洋装，即便他热爱莎士比亚，熟知希腊的历史，但是当香港的英国大律师们看着容闳时，他们看到的仍然只是一个中国人在猛力地向着根本不属于他的圈子里冲撞。在除了《中国日报》之外的其他报纸上，一群杰出的律师，纷纷攻击容闳，声称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从事法律。如果他成了一名律师，凭着他过度的双语优势，中英两边的生意必然被他一个人垄断了。当然，这种攻击不是没有殖民地基础作为支撑的。在这场斗争中得胜的英国人，将香港岛视为他们独有的财产，而非与中国人合作的地方。

绝望之中，容闳准备为自己辩护，运用自己的论辩能力，论证一个人——无论他的天赋如何——被整个律师界剥夺工作，这是荒谬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他没有辩论的时间，另有一件事需要他去关注。先前曾支持容闳成为一名律师的新任英国总律师托马斯·奇泽姆·安斯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成了一个激烈的反对者。容闳相信是因为安斯蒂想让他为自己服务，而他却给帕森当了学徒。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安斯蒂对容闳的工作开始吹毛求疵了，声称他翻译的法律文件水平欠佳。这样的攻击和冒犯，使容闳别无选择，只有离开。他曾向帕森寻求安慰，告诉帕森他不在乎收入的损失，只希望能从友好的律师那儿得到坚实的法律训练。但帕森是个软骨头，看到同僚们都在诋毁容闳，他也不想再跟他站在一起，于是让容闳迅速离开。

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容闳的希望第二次破灭了。更糟的是，他一度拥有的与外国人和解的梦想，他可以愉快地与外国人同舟共济的梦想，彻底地消逝了。自从五年前那次耶鲁橄榄球场上的胜利之后，他日渐想象着自己与他的同学们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美国白人、清教徒、殷实的中产阶级的幸运儿。但是香港的律师们一起迫不及待地提醒他，他和这一切没有任何关系。在香港被拒绝之后，容闳别无选择，只得重新回到大陆。

离开之前，容闳漫无目的地在香港港口徘徊，结交了一位波士顿船长，他答应免费送容闳去上海。这座城市听起来是个很好的去处。容闳意识到，他最大的、也许是唯一有价值的技能，就是娴熟的英语。也许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地方比上海，拥有那么多的外国人，可以使他发挥所长。

来到上海之后，容闳向中国海关翻译处毛遂自荐，并谋得了一个职位。他的薪水不多，但是足够，而且是用墨西哥银元支付。因纯度和一致性的估价，外国银元在上海是最流行的货币。尽管工作稳定，但是不出几天，容闳就厌倦了。在这里整天无所事事，沮丧之下，他决意辞职。但是一年之内丢掉三份工作，这未免多了一些，容闳只好依靠阅读英美文学名著来消磨时光。

而他的同事对于官员们应该如何打发光阴，却有不同的看法。传统上地方基层的办事人员都以收取贿赂来补贴收入。这让容闳感到恐



惧、愤怒和绝望。在开始的一两个月里，他试图尽量礼貌地去避开这些问题，不表现出对其同事的贪婪的反感，同时避免同流合污。但是，他们很快就表明了，如果他想要保住在翻译处的位子，那就最好放弃他的原则，伸出他的双手。

容闳拒绝了，他曾经被教导相信一个正当的政府是一个无私的政府，他最怕的就是沾上腐败的污点。心劳日拙之际，容闳找到了海关的总税务司H. N. 莱，问他，像自己这样接受美国教育的中国人，得到提升的机会怎样？莱径直如实答道，没有一个身为中国人的翻译，曾经被提升到一个有权力的位置。容闳当即递交了他的辞职书，然而，总税务司却拒绝接受。他以为容闳不过借此与他谈判，谋求高升而已。于是答应给他的薪水加倍。多年以后，容闳写道：

他从未见过有一个中国人视廉洁与诚实高于金钱。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为什么我在中国的政府中服务，却不应得到与英国人同样的升职机会，为什么我的个性不应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同样的认可与尊重？他想不到我的抱负远高于得到他的职位，我根本耻于与中国海关的那些译员和检查员为伍，他们只知道中饱私囊。凡人欲得到他人之尊重者，首先必须自重。<sup>[3]</sup>

虽然保住了尊严，但是又一次失业了。容闳心烦意乱，他让自己接受那个最痛苦的想法，也许他太过理想主义了，不适合在这个时代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他想不出还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去生活。“我们生而为人，不是为了仅仅像动物一样含辛茹苦地生活，”他后来写道，“为了完成教育，我辛苦备尝，则更应该尽我所能，不仅为自身谋福利，更为我民族谋幸福。”<sup>[4]</sup>

他的民族同胞同外国人一样拒绝了他，容闳决定，他获取成功的唯一机会不在于竭力去迎合那一个又一个多疑的官僚，而在于自主地从事商业，积累财富，以避开那些刻毒的言语和狭隘的心胸。但是，他加入的那家经营丝、茶的英国小公司很快就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他的又一个职位终结了。在前任雇主的家具拍卖会上，容闳站在房间后面，悲伤地望着那些曾经短暂地代表了他的新生活的物品。前来参加拍卖会的人群中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站在容闳旁边的，是一个高大而喧闹的苏格兰人。容闳见过这个人，他是一个本地英国商人的雇

员，属于在中国土地上的那种粗野的外国人之一，他们将中国视为一个乐园，将它的风俗视为一些愚蠢的游戏。

盯着容闳的发辫，那个苏格兰人咯咯嗤笑起来，他从衣袋里摸出了什么东西，做成一些小棉球，系在了容闳精心梳理过的辫子上。他一边窃笑着，一边招呼他的朋友们来参观这一景观。无意与之对抗，容闳礼貌地微笑着，请这位苏格兰人把棉球从他的发辫上解下来，但是，苏格兰人拒绝这么做。他认为，一个中国人没有资格与西方人平等地对话。他转身对着容闳，双手叉在胸前，轻蔑地扫了容闳一眼。容闳不再微笑，他尽可能用平静而坚决的语气，重复了他的要求：把棉球从发辫上解下来，现在！

苏格兰人一拳打在容闳嘴上，尽管他人高马大，动作却很笨拙。容闳出拳回击，打在他的鼻口之间，血顺着他的脸流了下来。苏格兰人被打蒙了，他踉跄几步，抓住了容闳的手臂，一边拼命拧着容闳的手腕，一边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容闳则准备一脚把他踢倒，一举结束这场恶斗。

这时，公司的主人挤进人群，把容闳和苏格兰人分开了。“你还想打吗？”一个粗野的英国人在人群中吼叫道，容闳转过身，从容答道：“不，我不过是自卫而已，你的朋友不但侮辱了我，还打伤了我，我将他当作一个绅士来对待，但他的行径却表明自己是个恶棍。” [5]

这是一个尖锐的指控。感觉到某种危险，容闳迅速离开了。在离开时，他听到一个声音，他听出是一位驻上海的英国领事，带着更多是尊敬而非愤怒的语气，说：“那个年轻人血气太盛，如果他不是把法律握在了自己手中 [6]，本来是可以去英国领事公署的法庭控告这次攻击的，但是既然他已经实施报复，而最后丢在人前的那句话，比那一拳给对手造成了更大的伤害，这样他就失去了法律上的优势。” [7]

然而，法律诉讼，早已远非容闳所想了。当本能的愤怒褪去之后，他渐渐意识到了他所作所为的全部含义。他不在上海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很清楚，当地的中国人，对于身处他们中间的外国人心怀畏惧，恭顺地对待他们，以至于西方人反过来认为中国人都是驯服的动物。因此，他对苏格兰人的反击，是一个激进的行为，是一次挑

战，是一次追求自由的行动。“然而，这个时代就要来临了，”容闳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中国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他们的公、私权利，并在受到侵犯时，有道德勇气去保卫自己的时代。”<sup>[8]</sup>

尽管依旧没有工作，但容闳不再灰心失望了。他那一记重拳在上海被传颂着，这个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尊敬他，西方的绅士们也用带着嫉妒的尊重眼光看待他。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耳语跟随。商人和官僚们都在好奇地谈论这个好斗的新来者，据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当上海首屈一指的一家英国公司的领导人逝世时，容闳受邀翻译他的墓志铭。容闳后来写道：“这一次，我的名字不是作为一个好斗之人，而是作为一个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学生而家喻户晓了。”<sup>[9]</sup>

大出风头有时也有它的好处，容闳的桌上很快堆满了请求书，请他翻译作品者应接不暇。尽管他既无权势又无财富，却受到了上海绅士的欢迎，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将他奉为上宾。在这个上流社会的圈子当中，有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一位英方主管，给容闳提供了一份工作。他告诉容闳，他的公司刚接了一笔生意，向日本市场出口茶叶，需要一位买办，作为本地农民与英国商人的中间人。

这份工作的稳定性和可观的薪水吸引了容闳，但是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应该拒绝。尽管买办的收入丰厚，但毕竟包含着某种奴性，他是个“耶鲁人”，容闳告诉自己说，接受这样一份工作，会让母校蒙羞的。同时，他也是个自豪的中国人，而买办，是西方殖民者的代理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洋行的奴隶中领头的奴隶”。<sup>[10]</sup>容闳一边感谢了主管的慷慨，一边对这位目瞪口呆的英国人说，他不打算接受这份工作。有的时候，人受制于环境，为了生存，必须接受一些卑贱的工作，容闳平静而坚定地对主管说，但是，他目前还没走到这一步。不太能明白这个独立而刚强的中国人到底想要什么，英国主管好奇地问容闳，那么在这家公司中，是否有他中意的其他职位呢？容闳羞涩地笑了笑，回答说，他想做一名丝、茶交易商，无论报酬是固定的薪水还是提取佣金。主管认真地听着，后来他告诉他的一位朋友，容闳虽然穷，却傲骨嶙峋。贫穷和强烈的自尊，往往是相伴不离的，但是他无法忽略容闳的坚韧、自信和智慧。握了握容闳的手，主管答应让容闳来做交易商的工作。



新的工作让容闳深入了广大的农村，远离了他所熟悉的港口城市。一次，他的路线使他穿越了太平军控制的地区，这使他正好有机会亲眼看见“天国”在大地上统治的失败。与他们拼死抵抗的满族人同样残忍——洪秀全喜欢说一句话，所有抵抗他的士兵的人都是“恶魔，格杀勿论”。<sup>[11]</sup>在建立必要的商业与贸易基础方面，也证明了太平天国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帝国。他们拥有大量的茶叶，却对于如何销售一无所知，只能任由上百万吨的茶叶腐烂。容闳亲自去协商买下了这些无人照料的作物，把他们包装之后、用船运输到沿海港口，准备在那里再次登船，运往英格兰。在这次贸易结束的时候，他想起了早先对于太平军的同情，更加理解了他们起势的原因，也正是太平天国运动让他的经商获得了丰厚收益。

然而，容闳的注意力很快被太平天国吸引，却主要是因为另一些原因。1856年，一个小的海上争端，迅速引发了武装冲突，并演变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场新的战争中，英国人进攻了广东，接着英法联军又包围了位于北京东面的天津，挫败清军防线之后，长驱直入北京。皇帝逃到了他的狩猎场——长城外的热河避难。留下八万既无军饷又无军纪的强壮士兵，盲目地漫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没有明确的命令，没有人指挥。当英国军队来到距离紫禁城五英里远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之后，他们接到了纵火的命令。其中的一位士兵，查尔斯·戈登——他后来成了帝国的一个重要伙伴，在圆明园的灰烬中，写信给他的妈妈说：“你很难想象被我们烧掉的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美丽而辉煌，烧掉它们真是令人痛心。事实上，这座园林实在太大了，而我们的时间紧迫，无法仔细地去抢夺。……对于一个军队来说，这真是一件卑劣的、败德的事。”<sup>[12]</sup>

在这兵临城下、清室降服的情况下，英国人本可以轻易向中国提出它们曾向印度提出的要求，但是他们意识到，这个“中国”(Middle Kingdom)太辽阔，难以驾驭，也易被其他的殖民者所渴求。于是英国军队奉命留在了紫禁城外，咸丰皇帝恳求重返王位，并与英国人签订了又一个屈辱的条约。咸丰帝年仅三十岁，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在1861年，他就得了重病。他只有一个儿子，年方五岁，为一个下等妃嫔所生。在咸丰垂危之际，这个妃嫔急忙让小孩奔到皇帝病床前，在那里，垂死的统治者保佑了这个孩子，并指定他继承王位。很快，咸丰帝就驾崩了，将权力转交给了同治。

对于许多中国人，甚至那些一贯不关心北京的政治花样的中国人来说，从战争爆发到皇帝逝世的五年，都是一段严酷的时光。激进的思想再度流行。此时已成为一个富有而闻名的商人的容闳，也不能不被日渐高涨的激励他所属阶层与教育背景的革命话语所感染。帝国秩序正在瓦解，容闳想，该是重新思考太平天国的时候了。

1859年秋天，容闳在几个西方人和一些中国朋友的陪同下，启程造访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沿途的水域中潜伏着炮艇，有关暴行的传闻让一行人胆战心惊。有一两天时间，容闳和他的朋友都警觉地坐在甲板上度过，彻夜无眠。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条条船从他们身旁驶过，一些载着零散的叛军，另一些载着装备略好的清军，显然，无论是否有战斗，他们的旅行并不会受到干扰。容闳的宽慰很快变成了苦笑——在中国，即使战争也是无能的。恐怕受到威胁的烦恼消散之后，容闳可以自在地观察乡村了。在一路的河岸上，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荒草丛生，空气中弥漫着作物腐烂后的气味。没有青年人在田地里劳作，只有老人和弯着腰的农民，挎着篮子，叫卖鸡蛋、橘子、糕饼、一些不新鲜的蔬菜和一点点肉。他们面容衰老，刻着战争、绝望和时间的痕迹。这些村民们，像活着的死人，甚至比容闳在广东见到的那些无首的尸身，更令他感到恐惧。

经过了两个星期的航行，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不断地请求冷漠的军官放行，容闳和随行人员终于来到了南京。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洪仁玕——洪秀全的侄子、太平天国最有影响力的官员之一。几年前容闳曾在香港见过他，在那时他们都是为了前程而奋斗的青年。再次相见时，容闳发现，洪仁玕风采依然，只是脱下朴素的西装，换上了贵族的长袍，这并非矫揉造作，因为天王曾赐予他“干王”的称号。当然，这一新封的贵族头衔并未束缚洪仁玕天性活泼的举止风度。他热情地接待了容闳，热切地希望能赶上他的老朋友。他饶有兴致地倾听容闳的起起落落、他的探索 and 成功。他们聊了很长时间，分享各自的愉悦和逸事，交换关于香港熟人的信息。然后，干王严肃起来。他仔细地盯着容闳，平静而直接地问道，他是忠于太平天国，还是忠于清朝？

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容闳环视了一下房间，沉吟了片刻。如果他站在太平天国一边，会取悦于干王，但却将自己抛在了危险当中。与他同行之人会轻而易举地回到上海并公之于众——容闳在内心里是

个叛贼，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反过来，如果宣布对清政府效忠，无疑将会使这位保护他的亲王硬起心肠，不再理他。容闳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他说了实话。他告诉干王，他不会无条件地站在任何一边，尽管如此，他仍然由衷的尊敬太平天国，并希望在南京有所作为。干王很钦佩朋友的直率，也坦率地问他，你认为，太平天国怎样才能强盛并推翻清朝？

容闳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了。他对这个问题早已深思熟虑，提出了七点复兴太平军的计划，现在他从口袋里掏出计划，原封不动地大声逐条读道：

- 1.按照科学的原理组建一支军队；
- 2.建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有能力的军官；
- 3.为海军建立一所海军学校；
- 4.组织一个文官政府，聘用富有能力和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
- 5.建立银行系统，厘定度量衡标准；
- 6.建立各级学校完备的教育体系，将《圣经》作为教材之一。
- 7.建立实业学校体系。<sup>[13]</sup>

换句话说，容闳想让南京变成纽黑文。他告诉干王，如果义军欣然接受他的计划，那么他将放弃商人的这一获利丰厚的职位，加入太平天国，亲自监督改革的实施。干王郑重地点了点头，说他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容闳的计划。

两天以后，他们又见了一次面。这一次无须再寒暄或是试探忠诚，干王高度认可容闳所提计划的价值。因为他自己也曾在香港居住，深知外国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他全心全意地同意容闳的观点——中国打败殖民者的唯一方式，就是以技术教育中国人，让他们能在一个组织完善的有规则的市场上施展才智。容闳的计划，正是太平天国和整个中国所需要的，但是，干王补充说，他自己缺乏权威去独自批准这样一些意义深远的措施。太平天国其他的几位王正在外出与清军作战，等他们一回来，他就向他们提出容闳的计划，并尽力促使他们

批准。为了保证他的朋友安全回到上海，干王又赠给容闳一幅丝制文书和一张太平天国的官方通行证。承诺要保持联络。

容闳回家之后等待着，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南京传来的消息。那张丝质的通行证却帮了他大忙，使他可以更深入地进入太平军占领区，获取更多的茶叶，赚了更多的钱，进一步助长了他的声誉。他的重大转机终将会到来的，他告诉自己，在它到来之前，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和等待。

[1]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20.

[2] 引自 Peter Parker, in *Quarterly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1838, 29.

[3]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23.

[4]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23.

[5]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25.

[6] 指对苏格兰人进行还击，译者注。

[7]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8]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9]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26—27.

[10]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26—27.

[11] 引自 Herbert Allen Giles, *ChinaandtheManchus*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 83.

[12] 引自 Godfrey Elton, *Gordon ofKhartoum:The Life of General Charles George Gordon* (New York:Knopf, 1955), 31.

[13]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37.

## 4 自强

容闳的日常生活很快被一封来信扰乱了，这封来信使他既恐慌，又好奇。1863年，一位老朋友联系容闳并告诉他，曾国藩要立即召见他。在容闳看来，这也许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曾国藩时任湖广总督，是朝廷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容闳后来写道：“我收到来信，便开始左右为难起来，我疑惑重重：为什么如此显赫的人物要见我？莫非他听到风声，知道我最近去了（南京），并在太平军的占领区经营绿茶生意？……他会不会是表面恭敬，却暗藏杀机？”<sup>[1]</sup>容闳用尽可能恭敬的语气写了封回信说，他盛情感谢曾国藩的邀请，但此时正是茶叶封装的高峰期，他恐怕不能丢下业务去拜访总督大人。两个月后，容闳收到另一封来信，这次写信的是曾国藩的另一位下属，也是容闳的老相识。他理解容闳的忧虑，告诉他说，曾国藩知道他受过美国教育，又忠于祖国，期盼着祖国的繁荣。曾国藩对机械很感兴趣，希望容闳能帮助他获取和操作生产设备。

来信减轻了容闳的焦虑，但他仍不能完全确定曾国藩的意图。他在回信中再次礼貌地感谢了曾国藩，并再次许诺，茶叶收获季节一结束，他就亲自去拜见曾国藩，并尽全力协助他。

很快，容闳那两位为曾国藩工作的朋友就再次写信给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曾国藩并非请求他帮助，而是命令他合作，希望他停下手中的事务，立即投入政府的工作。容闳别无选择。除此之外，朋友的口气也令他想到：也许曾国藩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赞助人，这个赞助人是一位地位显赫、具有智慧的高官，他能够赏识容闳的才华，并且愿意利用这种才华为他的改革服务。



在动身去见曾国藩之前，容闳有充足的时间来加深对这位总督的了解。在年仅二十七岁的时候，曾国藩就通过了国家最高等级的科举考试，并作为中国最有才能的官员崭露头角。在朝廷任职不久，他就上奏皇帝，指出这套让他得以晋升的体制在根本上存在缺陷。他写道，官员得到任用，靠的是“举止圆滑和巧言令色”<sup>[2]</sup>，而非在市场上或战场上的实际能力。面对太平军的巨大威胁，他继续写道，很多朝廷官员除了固守儒家经典之外，别无他法。曾国藩总结道：“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sup>[3]</sup>

但是，曾国藩对实际行动的热情并未损害他对儒教教义的信奉，这使他不那么像一个“满大人”。当他的大部分同人都在忙于竞逐财富和逃避责任时，他却对下属提出了不同的忠告：“如果自己打了胜仗，将荣誉让给他人。如果他人打了败仗，你要求去帮助他们。”<sup>[4]</sup>这反映出他自己不同于传统的信念。曾国藩反复说道：战争胜利的秘密，“在于头脑而非武器”。<sup>[5][6]</sup>

曾国藩是一位古典的学者，但同时也是一位娴熟的军事指挥家。他喜欢用钳形攻势，这正符合儒家的理念，他遵循“仁”的理念，以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对待他的士兵，慷慨赞扬，关怀备至，也要求下属回报以子女般的恭顺和忠诚。他不用阿谀粗鄙之人，他的幕僚中汇聚了众多谋臣，以高度的谋略和分析来应对战争。曾国藩的献身精神和高超智慧反驳了太平天国关于清朝违背中国人利益的宣传。基于上述原因，曾国藩很快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他利用这个职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熟人和下级网络，这些人将继续占据中国的一些高层职位。<sup>[7]</sup>

容闳来到安庆——安徽的一个市镇，曾国藩在这里建立了军事基地。两位老朋友，曾写信敦促他来见曾国藩的那两位曾经的下属，去迎接了他。他们热情地告诉容闳，曾国藩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在过去六个月中一再说要见他。

这使容闳感到不安。他自忖是否曾国藩只是想满足他的好奇心，正如容闳多年后所写的，“想看看一个变成了真正西方人的中国人”？<sup>[8]</sup>他是否仅仅是个猎奇的对象，很快就会被搁置一旁或被抛弃？熟悉的恐惧感渐渐侵入容闳。但他意识到，现在做什么都为时已晚了。他已经来到了曾国藩的大营，至少在见到曾国藩本人之前，他最好赶走这些令人烦恼的念头。



到达安庆后的第二天，容闳去拜见了曾国藩。他向守卫递交了名片，不一会儿，有人带领他穿过前厅，径直来到了这位大人物的会客室。两人互致礼节性的问候之后，曾国藩在他的大桌子旁坐了下来，静静地看着容闳，微笑着。容闳能感觉到总督的眼睛全身上下扫视他，他局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想着是否自己的穿着打扮有哪里让总督觉得奇怪或者不快。终于，曾国藩用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容闳，开始提问了。

“你在国外待了多久？”

“我离开中国去西方求学八年了，”容闳郑重地坚定地答道。

“做一名军人，掌管一个连，你意下如何？”

容闳想，对于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才好呢？他说：“如果我适合，我是很高兴这么做的。但是我从没有学习过军事。”

“我从你的相貌可以判断，”曾国藩说，“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从你的眼中我看出你是个勇敢而富有指挥才能的人。”

“感谢您的夸奖。也许我拥有军人的勇气，但我确实缺少军事训练和经验，因此我也许不能满足您的期望。”<sup>[9]</sup>

总督还问到了容闳的年纪、结婚与否。然后曾国藩啜了一小口茶，通常这表示，谈话结束，客人可以走了。容闳也端起自己的茶杯，抿了几口茶，接着站起身来向曾国藩道别。在出来的路上，容闳从这次会面的压力中解脱出来，有时间来想想曾国藩的容貌了。大约五英尺九英寸的身材，体格健壮，肩膀宽阔，他已年过六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有活力得多。他下巴上留着浓密的胡须，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容闳回到自己的房间，不知道自己是让曾国藩印象深刻还是感到失望。

很快，容闳的老友就来拜访他，让他描述与曾国藩见面的情形。容闳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总督的问题和他自己的回答。他的朋友听后笑了起来，告诉他这次见面似乎进展很顺利；他们告诉容闳，曾国藩问他是否对军事感兴趣，只是试探他对当官有多大兴趣。容闳的回

答表现出自己忠诚于国家，将国家需要置于个人抱负之上。他们让容闳放心，像他这样的人，曾国藩是尤其尊重的。

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曾国藩却沉默了。容闳从他的朋友那里获悉，曾国藩最感兴趣的是在中国建造机器工厂，这些工厂制造出的武器能与外国武器相匹敌，甚至超过外国制造的武器。但是至于要建造什么样的机器工厂，曾国藩的手下却没人知道。他们先是含蓄地，后来干脆直接地问容闳他对建造机械工厂有什么想法？

在自己回忆录中，容闳记录了接下来发生的情景：

我说，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的建议也许没什么价值……我告诉他们，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需要很多基础性的机器工厂，一旦拥有了这样一座工厂（一流的工厂）之后，就能将其作为机器母厂，建造其他更好或者更先进的工厂。如果能有一批这样的工厂，他们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相互合作。复制或增加这样的工厂成本会比较低，我说，因为在中国劳动力和原料比在欧洲和美国要廉价。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粗浅观点。<sup>[10]</sup>

容闳的朋友将他的回答报告给了曾国藩，很快曾国藩就再次召见了。他们同样进行了礼节性问候，但这次，曾国藩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尖锐而意味深长：在容闳看来，眼下中国当务之急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容闳的朋友没有让他事先做好准备，他也许会提出一个类似于他曾向太平天国提出的计划。但容闳知道，总督的心思在机器工厂上，因此他谈到机器工厂。

“好的，”曾国藩说，“这件事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你和你的朋友一起讨论会更合适，你们比我更懂，然后我们再决定应该怎么做。”<sup>[11]</sup>

又是两周过去了，在此期间，曾国藩召见了容闳的两位朋友去商谈。最后，其中一位名叫“华”的朋友<sup>[12]</sup>，来告诉容闳，总督已经准许了计划，并且将整个计划的执行权交给了他。

容闳没有浪费时间，很快就选定了距离上海西北四英里远的高昌庙为新厂厂址。他作为品衔较低的官员接受了这一任务，接下来就要去办购大量的必需品。对容闳来说，是回美国的时候了。

1864年春，容闳到达纽约，回想十年前的那次越洋之旅，一路上任由狂风和疯狂的船长摆布。如今，他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轻松地坐在舒适的汽船上。更为不同的是，他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了一项重大的事业，一旦成功，将会使整个中国受益。从这位中国官员凭栏远眺的从容自信的风度中，可以想见，在这一瞬间，容闳踌躇满志。

在离开上海前，容闳已经选好了一家机械工厂：位于马萨诸塞州菲奇堡的普特南机器公司。他原本以为自己只会在那里稍作停留，安排款项，然后等待复杂的大型机器进行装配即可。但是，却发生了更为重大的事。普特南公司的经理深表歉意地说，通常情况下，像容闳这样的订单是简单而容易完成的，但是由于美国内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工厂工人和生产线都要全力支援联邦军队。

战争促使容闳深思了一个他已久忘却的事实：在耶鲁的时候，他是一名加入美国籍的美国公民。那时，关于这点他并没有想太多。毕竟，中国从来没有视自己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公民身份只是为了方便与官僚交涉而已。在中国，美国身份对他无关紧要，但是容闳认为，在战时的菲奇堡，这一身份却意味着一系列的义务。但责任并不是他唯一的动机。在那些南方人身上，他见到了那种他在上海和香港曾猛烈攻击过的同样狭隘的排外主义。经过几天的思考，容闳决定，如果战争是为了自由，那么他必须为支持自由而战。

一到纽约，容闳就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十周年同学会。在聚会上，他重逢了老朋友威廉·巴恩斯，一个同样热衷于沉浸在图书馆和文学当中的人。他获悉，巴恩斯的父亲——詹姆斯·巴恩斯是联军的准将。因此他决定找他帮助自己服役。在等待为中国订购的军事机械到货期间，容闳决定要为美国而战了。他前往华盛顿去找巴恩斯将军，要求参军。

“我年轻的朋友，”巴恩斯对容闳说，“非常感谢你来参军，但是，因为你肩负中国政府交付的重任，所以你最好还是返回菲奇堡去

处理这些事情吧。不论是送信还是上前线打仗，我们都有足够的士兵。” [13]

一位将军竟然拒绝多招募一名士兵，这真是咄咄怪事。容闳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就回到了马萨诸塞。1865年春，就在内战结束前的几个星期，机器造好了。容闳带着这些器械装置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轮船。

然而，容闳再次登陆时看到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他离开时的中国了。在此期间，曾国藩全力以赴地剿灭太平军。他由另一个高官——李鸿章协助。李鸿章是个敦实的、热爱战争的人。在墨守成规的中国官场，李鸿章是不同寻常的，是一个精明而又务实的人。

1861年，起义军包围了上海，李鸿章没有动用手下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而是找了一个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 [14]，来援助上海的防御。华尔招来所有他能找到的健壮的西方人，组建了一支军队。许多人和他一样是雇佣兵，将中国视为一个广阔的战场，一个可以轻易赚到硬通货的地方。华尔骑马上战场时还叼着雪茄，手中仅拿一支短马鞭，他用李鸿章的钱给自己的士兵都配上了绿色的头巾，又用了几周时间训练自己的射击术。华尔的军队连连获胜，很快就被称为“常胜军”。每次新的胜利之后，都会吸引大批的冒险家和中国游民加入其中。

李鸿章在一旁敬畏地看着，在争夺上海的战斗胜利后不久，他给曾国藩写信说：“数千外国军队的洋枪大炮一齐开火，任何所遇之物都于顷刻间摧毁。炮弹在落地（前）就能爆炸，简直是神造之物！” [15]他意识到，这样的武器同样可以用来镇压中国。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神造之物。中国需要变得强大。

在这种观点下，产生了自强运动，这股潮流起起落落，横扫中国上上下下、大江南北，使中国摆脱闭关自守的状态，向着不断全球化的世界靠近。一种新的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想象出现了，此即“体用论”，它是“本体”和“实用”这两个词的巧妙结合。李鸿章是“体用论”的新哲学最热情的倡导者，主张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实现现代化，既吸收西方的创造性和科学技术，又保持自己文化的敏感性，靠

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他写信给曾国藩说，中国人“必须奋发自强，不能与外国人混在一起”。<sup>[16]</sup>

几个月后，李鸿章听说宁波的中国商团向英法军队寻求保护、抵挡太平天国，勃然大怒。他请曾国藩向宁波调遣了清士保卫治安，这样当地人就不用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外国人。“如果中国的自强运动失败，”他提醒他年长的老师，“未来的不幸将是无法想象的。”<sup>[17]</sup>

在这样的忧患意识下，李鸿章开始加倍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一年之内，他就设法聚集了一支四万人的军队，一万架步枪和大量装备36磅炮弹的大炮。李鸿章的新军开始取胜。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既管理不善又精疲力竭，连连退败。到了1864年6月，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已陷入长期的围困之中，遍地饥荒，连洪秀全都要挖掘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和腐烂的蔬菜充饥。他饥饿的眼睛发现了这样的垃圾，并吃了下去，接着他生病了，三周之后死于食物中毒。尽管身经百战，最终却不是广大敌军，而是小小的豆荚，夺去了这位太平天国领袖的生命。洪秀全死后几天，清军攻克了南京城。在曾国藩的命令下，他们掘出洪秀全的尸体，焚烧后用大炮将骨灰射出抛散，以这种不光彩的形式向这场持续了十四年，夺去了两千五百万人生命的战争，做了最后的告别。几十年后，太平天国的社会革命精神将再度出现，激励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革命领导集团；虽然到那时，革命仍然会受到压制。

容闳在回国后不久，就听到了太平天国败亡的消息。他会为有着平等精神的叛军的灭亡而哀悼，还是会为他的新资助者曾国藩的伟大胜利而欢呼，我们无从得知，在他的日记和通信中也无迹可寻。容闳去见曾国藩，受到了这位总督的热情欢迎，曾国藩赞扬他出色完成了工作，又询问了一些采办机器的事宜。然后，曾国藩宣布，他要把容闳出使马萨诸塞购置机器一事，写专折向皇帝呈奏。

容闳吃了一惊。对清朝官员而言，没有什么比呈给皇帝的奏折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地位。这些往来书信常常是穿过华丽而与世隔绝的宫廷的唯一信息来源。在奏折上提起某人的姓名，可以获得清朝最高统治者直接认可，而这往往会转化为显赫的政治地位。当着容闳的面，曾国藩就向幕僚口述了奏折的内容：



容闳是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人，精通英文。在这次历程万里、远赴重洋、完成我托付其使命的旅途中，他历经险阻，备尝艰辛，在这方面甚至古代的使者也无人能及。因此，特奏请授以容闳江苏省候补同知一职，尽先补用，以示认可他优秀的贡献。<sup>[18]</sup>

幕僚起草完奏折并誊录之后，交给容闳。容闳接过奏折，紧张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感谢的话，离开了曾国藩的房间。

容闳回到上海几周后，收到了曾国藩的来信，告知他的官职已得到任命，并给予了他极为丰厚的俸禄。1867年，随着曾国藩在清廷势力逐渐强大，这位年老的总督决定巡视他的辖区，并去看望他一手提拔的容闳。他和容闳一起去了军工厂，在那里，容闳从美国购置的机器正在为实现中国的自强而运转，生产着枪支和大炮。在参观工厂时，曾国藩“站在一旁，注视着机器的自动运转，露出欣悦。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机器，以及它们是如何工作的。”<sup>[19]</sup>曾国藩被它们深深地吸引了，问容闳改进工厂还需要做些什么。这正是容闳十几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和叛军、和总督们都讨论过的问题。他用平静而动人的语气告诉总督，购置西方的技术是一回事，懂得如何复制，甚至如何改进技术是却另一回事。解决之道就在于，在军工厂附近开设一座军工学堂，这样，中国自己的学生就可以学习设计、制造和操作这些在曾国藩惊叹的目光下飞转的机器了。

容闳不知道，他的教育中国青年的答案正与李鸿章早已得出的一个结论不谋而合。当容闳赴美购办机器时，欣喜若狂的李鸿章就曾写信给曾国藩，称容闳购办机器将标志着“中国自强运动的开端”。<sup>[20]</sup>然而不久之后，李鸿章具体表明了其热情所在，他写信给曾国藩说，如果没有懂得如何使用武器的人，武器是没有用的。他建议设立一系列的英语学堂，教授青年人“如何师夷长技，如数学、科学原理、制造技艺、天文学……难道中国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劣于西方人吗？如果我们有很多精通西方语言的人，又能相互传授，所有关于汽船和枪炮的技术，我们都能逐渐掌握”。<sup>[21]</sup>李鸿章反复重申的新格言“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意图。<sup>[22]</sup>

因此，当容闳建议培养本国的军工人才时，话音未落，曾国藩就同意了。曾国藩意识到，容闳正是他要寻找的充满热情又富有能力的



管理者，一个能够把他和李鸿章的现代中国梦想变成现实的人。他于是邀请容闳开办学堂。

容闳的学校就设在军械厂附近，规模很小，开设科目也有限。几个月来，军械厂的雇员们在学习物理、数学和战争理论的理念之下接受了训练。受到这次成功的激励，容闳继续向前推进了他的教育实验计划。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教育框架，能够使更多的青年和人才变得视野开阔，思维敏捷。

当容闳正在玩味这个想法时，他又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好友——丁日昌，那时丁日昌刚被任命为江苏巡抚，正准备离开上海。他是个热情的自强运动的信奉者，也是个有才干的官员，但却并非有远见之人。他向容闳寻求计划，并告诉容闳，如果他有任何明确的建议，他可以上奏朝廷，并为容闳力争。容闳接受了丁日昌的慷慨邀请，起草了包括四条核心理念的计划。

第一，组建一所中国独资的汽船公司，使之能够有效地将稻米运输到全国，遏制由清政府低效的农业政策所导致的饥荒。第二，政府要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第三，针对天主教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要求朝廷“禁止任何教派的传教士对中国教徒行使审判权，无论是在民事诉讼还是刑事案件中”。<sup>[23]</sup>所有这些理念都是合理的。但是，最后一条才真正表达了容闳内心最深的愿望。

他写道：为了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国家应选派学生去美国留学，并支付他们进入全美最好学校的教育费用。换句话说，容闳的提议，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容闳”，让适龄儿童在新英格兰的大学教室里读书，在操场上玩耍，能够让他们从陈腐的思想和迷信当中解放出来，为未来的中国打造出一个核心的领导集团。容闳尽力设计了许多明确的细节，来使他的计划更加的具体：留学生的年龄应在12~14岁之间，共计120名，在四年中分四批派往美国，每年派遣30人。他们需要在美国本土学习十五年。如果这些人归国后确实成了领导，那么这个计划应被极大扩展，在政府可负担的范围内，让尽可能多的青年出国留学。<sup>[24]</sup>

容闳将他的奏议密封好，交给了丁日昌，后者全力支持他的计划。丁日昌在朝廷中的保护人是文祥——皇帝身旁位高权重的内阁成

员。有了文祥的认可，容闳的教育计划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实施了。

正当丁日昌准备将奏议上报给朝廷时，文祥的母亲去世了，按照儒家的惯例，文祥必须辞职回乡，服丧二十七个月，完全不过问政事。容闳深感这些荒谬的官僚制度和风俗习惯致使他的教育计划搁浅。但除了等待他别无选择，直到另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将这个大胆的计划上奏朝廷。

这个人就是曾国藩。

在天津发生了一起涉及英法两国的国际案件<sup>[25]</sup>之后，一个由高层清朝高官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曾国藩和丁日昌，受朝廷派遣，去谈判解决方案。由于代表团需要高水平的翻译，丁日昌让容闳立即随同前往。

容闳跟着两位最可能给他帮助的官员去了天津，他再次向丁日昌申明了自己的主张，丁日昌许诺在离开天津之前一定会向曾国藩提出这一提案。丁日昌离开后，容闳就去睡了。

刚睡到半夜，容闳就被一位仆人唤醒了，说是丁日昌要立即见他。他冲进会客室，他的朋友丁日昌正笑容满面地坐在那儿。那天夜里，丁日昌告诉容闳，他已经与曾国藩和其他几位钦差大臣讨论了容闳的提议，大家都认为这些提议非常好。曾国藩表示愿意上奏朝廷。有了曾国藩的支持，皇上很可能会准奏。

容闳后来写道：“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高兴得夜不能寐，整夜都像夜鹰一样睁着双眼，觉得身体轻飘飘的，如同在云间散步一样。”<sup>[26]</sup>

两天后，曾国藩、丁日昌和另外几位钦差大臣将容闳的四点建议上奏了朝廷，并推举容闳负责中国教育计划。不久，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并提出了两点说明：第一，此项计划所需经费由上海道拨出部分税收来承担；第二，指派另一位官员——陈兰彬为留学监督，与容闳一同负责此事。容闳看到陈兰彬的名字，立刻明白了朝廷的用意。在容闳所认识的人当中，陈兰彬是儒家教义最为严格的遵守者，朝廷任命他，显然是要寻找一个人不断地提醒那些走出国门的中国留学

生，确保他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传统和义务，以此来平衡容闳热切追求改革的创新精神。

但是，即便是必须要与陈兰彬共事，也没有打击容闳的热情。作为一名耶鲁的学生，他曾欣悦的畅想过一百名中国学生在纽黑文愉快生活的场景。现在，他就要将这个想法变成现实了。

签订于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sup>[27]</sup>，在中美之间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使容闳的计划变得容易了一些。它的第七条规定：“美国公民将享有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一切公立教育机构的特权，相应的，中国公民也将享有美国政府控制下的一切公立教育机构的特权。”<sup>[28]</sup>容闳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宣布这一创举，并在无疑会有数千名的申请者当中，选拔最好的人。

然而，招募的过程却比容闳最初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李鸿章代表朝廷负责监督此项计划，他给容闳提出了一系列这些预期中的学生必须满足的条件。这些幼童必须能在国外接受完整的教育，并承诺毕业后回国服务。由于这些学生在美国代表着整个清朝，因此他们必须“不得有碍观瞻”，“姓名粗鄙者，也要责令家长尽快更换”。<sup>[29]</sup>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全国性的报纸，也没有大众传媒来宣传官方的决定，这更增加了容闳工作的复杂性。因此，当容闳的代表在地方宣传这个由朝廷发起并承担全部费用的、为时十五年的教育计划时，他们遇到的是怀疑和经常是果断的拒绝。那些冷漠的父母怀疑此说的真实性。而且，有一点是十分不利的，这项计划要求孩子在整个童年时期都与父母分离，这似乎有违儒家的一个关键伦理——孝道。最后，由于大多数的中国人从未遇到过外国人，或是仅仅通过鸦片战争的屈辱才知道了西方，因此，对于侵略者的怀疑是根深蒂固的。一位最终加入留学计划的幼童几十年后回忆当时人们劝说他不要与容闳签订协议时的巨大压力，说：当地的老者讲述了美国人可怕的行径，“那些野蛮人会把我们的皮活剥了，再把狗的皮接种到我们身上，然后当作一种奇怪的动物去展览”。<sup>[30]</sup>

容闳并没有灰心，他开始集中在自己的故乡广东寻找。他知道广东有很多有影响的人士，他们有足够的名望去克服偏见、驱除流言。从广东贸易制度建立的那天起，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与外国商人接触，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西方人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数月以

来，容闳奔走于城市乡间，介绍他的计划。他设法找到了120个愿意加入计划的候选人，其中超过70%的人来自广东，超过1/3的人来自他的故乡——香山。

这并不是容闳期望中的多样化组合，容闳担心这项旨在点燃中国星星之火的计划被看成仅仅是一种南方人的装腔作势。但是，容闳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他建立起一所预备学校，聘请了教师和翻译，准备将这些年轻学生送上自己多年前曾走过的道路。第一批幼童，按容闳的计划，将于1872年的夏天赴美，他自己则要提前几个月到达康涅狄格州，安排领养幼童的家庭和接受他们的学校。

正当容闳准备启航时，曾国藩的死讯传来。容闳后来写到他的这位赞助人时说：“如果他的生命能再延长一年，他将会看到第一批的30个学生启程赴美，这是他自己的计划的第一个成果。可惜开创伟大事业的人，往往不为造化所青睐，使其超越天定的寿命，目睹其首创事业的成功发展。但是，其人虽逝，他所创造的功业和人格，却将百世流芳。” [\[31\]](#)

[\[1\]](#) 引自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1909), 48.

[\[2\]](#) 引自 Han-Yin Chen Shen, “Tseng Kuo-fan in Peking, 1840—1852: His Ideas on Statecraft and Refor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 no. 1 (1967): 72.

[\[3\]](#) 此句出自咸丰四年(1954年)农历正月曾国藩所做的《讨粤匪檄》，译者注。

[\[4\]](#) 引自 Stanley Spector, *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14.

[\[5\]](#) 引自 Kwang-Ching Liu, “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 Li Hung-chang’s Formative Years, 1823—1866,”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 (1970): 19.

[\[6\]](#) 引自 Franz Michael, “State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World Politics* 7 (1954): 425.

[\[7\]](#) 引自 Jonathan Fenby, *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Ecco, 2008). 22.

[8]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1909), 50.

[9]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1909).

[10]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1909), 51—52.

[11]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1909), 52.

[12] 华蘅芳(1833—1902年), 字若汀, 数学家, 为曾国藩所器重, 一生与洋务运动关系密切, 译者注。

[13]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1909), 55.

[14] 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 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勒姆城。早年受过基础军事训练, 长期在海上及中美洲从事冒险活动, 27岁到上海, 在航行长江的汽船上工作, 后来在清军水师炮船上当大副,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被招募为洋枪队队长, 1861年7月进犯松江时受重伤赴法国医治, 1862年加入中国籍, 改洋枪队为“常胜军”, 任副将。1862年9月在浙江慈溪与太平军作战中重伤身亡, 葬于松江城内玉皇阁北。译者注。

[15] 引自 Kwang-Ching Liu, “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 15.

[16] 引自 Samuel C.Chu and Kwang-Ching Liu, eds., LiHung-changandChina's EarlyModernization(Armonk, N.Y.:M.E.Sharpe, 1994), 23.

[17] 引自 Kwang-Ching Liu, “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 19.

[18]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1909), 57—58.

[19]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1909), 58.

[20] 引自 Kwang-Ching Liu, “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 32.

[21]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1909), 33—34.



[22]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33–34.

[23]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60.

[24] 在容闳的回忆录中，作者所说的“最后一条”被列在第二条，译者注。

[25] 指1870年天津民众攻击法国教会机构而造成数十人被杀的案件，史称“天津教案”，译者注。

[26]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63.

[27] 《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又称《1868年蒲安臣—西华德条约》(Burlingame—Seward Treaty of 1868)，是中美之间对于1858年《天津条约》的修订，条约建立了正常、友好的两国关系，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该条约1868年签订于华盛顿，1869年在北京被批准。译者注，译自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Burlingame\\_\\_Treaty](http://en.wikipedia.org/wiki/Burlingame__Treaty)。

[28] 引自 William Speer, *The Oldest and the Newest Empire: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ittsburgh:Robert S.Davis, 1877), 681.

[29] 引自 Hu Jincao, *Boy Students*,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Beijing, China, CCTV, 2004.

[30] 引自 Thomas E.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States, 1872–1881* (Pullman: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6.

[31]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65.



## 第二部分

## 5 到达

经过了二十五天的旅行，“北京精神”号终于结束了她穿越太平洋的航程，在1872年9月的一天，缓缓驶入了工业化的多山城市圣佛朗西斯科的港口，将容闳中国教育计划的第一批学生送到了大洋彼岸。

当这些幼童们走下船，走上城市繁华的大街时，立即被眼前展现出来的城市景象惊呆了，这一切与他们在家乡的所见大不相同。圣佛朗西斯科不是耕畜遍地，稻田广阔的僻静乡村，而是一座大都市，有着六层楼高的建筑、坚固的轮船，到处涌动着白人的面孔。人们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在铺筑过的大道上，在发出嘀嗒声响的、沿街穿梭的电车上跳上跳下。对幼童而言，没有人能弄懂这一切。他们所看到的只是涌动的人群；他们所听到的，是无法理解的属于一个现代城市的喧闹。

一会儿之后，当幼童到达他们居住的旅馆门口时，这种惊奇更加剧了。在中国，大多数孩子习惯了纸糊窗户的泥房子。而这里是一座五层的建筑，既奢华又奇特，装饰着带有凹槽的圆柱和华丽的拱门。旅馆里的设施捉住了孩子们的想象力，热气从圆圈的暖气片散发，水从金属的管子里流出，没有看到任何一盏灯笼在眼前，却有明亮的灯光在闪耀。此前，一些幼童曾对这些现代技术的标志略见一斑，但是对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贫穷家庭的孩子而言，这所旅馆是一次启蒙。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闲暇时间都在探索中度过，他们好像永远也按不够电子门铃，在门铃发出金属声响时咯咯地笑着，或者打开水龙头，着迷地盯着永不停止的洁净水流。他们一次又一次乘坐电梯上上下下。

最后，容闳的学生们安顿了下来，开始关注周围的事物。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旧金山人奇怪的穿着。这些戴着短帽，穿着红色长袍，蓝色缎袄的幼童们不能理解西方时尚。他们透过旅馆的窗户向外望去，看到人们穿着紧身裤子和粗布的合体的外套。在中国，人们都穿着宽松、垂褶的衣服，而这里，似乎所有衣服都紧紧地裹着身体。在中国，只有女人才裹脚，而在美国，连男人也穿着系带的鞋子和靴子，这种鞋子对于穿惯了平底厚垫拖鞋的幼童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约束。这里的性别角色也与中国不同：女人不是温存而驯服的，而是看起来不受任何拘束地和男人们在一起，好像男女之间没有什么差别。这一切使幼童们深深地感到困惑。

进一步的探索产生了更为惊人的发现。幼童们注意到，中国人已经出现在旧金山。这些满手老茧、晒得黝黑，像幽灵一样在城市中飘荡的中国人，从未在故乡和它的现代奇迹中出现过。尽管旧金山人满怀兴奋地去了解容闳的学生，但他们对那些已在加利福尼亚定居的中国人的生活却没什么兴趣。《纽约时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差别。报道称，“昨天到达美国的30名中国学生非常年轻，他们聪明……有绅士风度，而且比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他们的同胞肤色都要好看得多。”<sup>[1]</sup>

当然，那时幼童们既没有手段也没有空闲去了解这些情况。那些早在旧金山生活的中国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有着与他们不同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进入美国最好的学校。自从1848年萨特的磨坊从萨克拉门托河中筛出第一桶金子之后，数以万计雄心勃勃的中国移民潮水般涌向加利福尼亚海岸，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就是旧金山。这个因金山而出名的城市，在中国南部赤贫乡村的农民中间，焕发着神话般的色彩。对于这些贫苦农民而言，旧金山的诱惑足以让他们变卖财产，聚集起大量钱财，以换得一个在矿场劳作和在遍布赌徒盗贼的危险环境下生活的权利。这些人被称作“苦力”，是专门出卖力气的中国人。对这些苦力来说，——当这些中国工人在美国出名以后，金山保证了他们物质富足、财运兴旺，这是在中国农耕社会里严格的等级制度下所不能得到的。

当中国工人到达旧金山时，他们发现了一座完全如他们所愿的生机勃勃的城市。到1872年幼童们到达时，旧金山已经从三十年前的一个仅有500户居民的满是灰尘的军事据点，变成了一座拥有大约二十万

人口的大城市。<sup>[2]</sup>同样快速增长的还有旧金山的中国人口。在加利福尼亚有黄金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前，只有50个中国人在美国生活，其中有7人在加利福尼亚。随着黄金的出现，更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一个香港的捐客，为了说服大陆同胞移民，在一则广告中发誓说，美国这个国家没有清朝官僚和四处劫掠的士兵，是个人人平等的避难所，所有愿意努力工作的人都会兴旺发达。<sup>[3]</sup>仅1852年一年，响应号召前来的中国人就有两万多人。

当大多数工人迂回穿越大山，奔向这片区域周围的各个矿场时，那些选择留在旧金山的人则以杜邦和萨克拉门托街为中心，建立了一座欣欣向荣的中国城。那些出城的人，第一步就是要脱下棉鞋，换上皮靴，并将他们的辫子塞进牛仔帽里。矿场的生活是艰难而危险的，从那时给中国矿工的一本英语常用语手册上，可以看出他们所面临的焦虑和风险：

他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袭击了我。

他要占据我的矿。

他试图敲诈我的钱。

他被强盗用绳索勒得窒息而死。

她是个毫无用处的贱妇。<sup>[4]</sup>

马克·吐温，描写了这些在一个陌生国度不宽容的氛围中斗争的人们，让人印象深刻：“他们是安静、平和、温顺的，也不酗酒。无法无天的中国佬是不存在的，懒惰的也很少。只要一个中国佬能自食其力，他就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他总会找到事做。”<sup>[5]</sup>

在旧金山，人们最初定居的中国城最终发展成拥有十个街区的充满生气的居住区。在当地的杂货店里，墨鱼、鲍鱼、水果和燕窝琳琅满目，有的堆放在悬挂在竹竿上的草篮里，有的摊放在摆在繁忙人行道边的垫子上。最早的中国自助餐厅都以悬挂黄色丝制的三角旗为标志。在这些餐厅里，满地扔着碎骨头，顾客们尽情地大快朵颐。后来它们变成了富丽堂皇的亚洲美食殿堂，华丽的大厅里装饰着红色的骑楼，还有进口的木格子屏风。当地中国人和爱冒险的美国食客都可以在挂着灯笼和煤气吊灯的天花板下，享受鱼翅汤这样的异国佳肴。<sup>[6]</sup>

监督所有这些发展的是中国慈善协会，它控制着社区的社会与商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慈善协会下属的六家公司为只身来到异国他乡的中国工人提供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家和社区的感觉，以及必要的儒家礼仪和宗教元素。当然，要在美国成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几乎没有合意的中国女人能够或者愿意跋山涉水来到美国，而且那些来美国的人通常也只一心想着赚钱，然后衣锦还乡。但这些慈善协会至少可以为新来者提供一间住的房子，一个收信的地方，还有一个社交网络。

一些中国移民者没有选择进入这六家公司，而是选择加入帮会，这些秘密会社是中国城的毒瘤。帮会从事非法的生意，受雇于不正当的商人，并控制着利润丰厚且分布广泛的卖淫集团。他们于光天化日之下在码头上将女孩卖给妓院，因此臭名昭著；当不断积累的民愤迫使警察行动时，他们只是将行动地点转移到了城里的中国戏院和庙宇所辖的隐秘地方。

关于邪恶帮会的耸人听闻的故事让中国社区失掉了不少光彩，但真正破坏其整合的威胁却来自于经济和产业的转换潮。尽管1869年竣工的穿越大陆的铁路使旧金山的一些项目负责人成了百万富翁，但整个城市却一片萧条。大量商品从全国各地涌向加利福尼亚北部，更为完备的东部工厂削减了本地制造业，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旧金山众多的中国人口导致城市里每三个求职者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这个数据无疑加剧了日渐紧张的种族矛盾。在许多旨在限制中国社区影响的法律中，第一部——1852年惩罚外国矿工税法——早在二十年前就通过了。从那以后，反华言论在美国的街头、报纸和政界的大厅里，都已畅行无阻。

来到这里的幼童们，还太年轻，不能理解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趋向。他们天真地相信，旧金山是中国人的天堂，是一座闪光的城市，自我流放的移民们都可以随时享受机械电梯和电子门铃。这种想法是可以原谅的。虽然中国城距离幼童们住的旅馆不远，但他们并没有热情去思考苦力们的真实处境。在旧金山短暂停留期间，最让幼童们感兴趣的是火车站。他们曾见过一次火车，那是他们的船在日本停靠的时候。但这里的火车站完全是不同规模。许许多多的人匆匆上车，几乎与冲下车的人撞个正着。不是一两辆火车，而是许多火车驶进又驶

出。当幼童的监护人想要带着他们看看这个城市时，所有孩子们都想去看看火车，他们称之为“火车路”（fire-car roads）。

他们最终都将乘上一列火车。在旧金山停了几天之后，他们踏上了开往萨克拉门托的专列，开启了非凡的铁路旅行，沿着横跨大陆的铁路，穿越美国的高山、深谷和广袤草原，向着他们在新英格兰的目的地进发。

他们乘坐的火车，行走在一条三年前刚刚竣工的道路上。这条铁路横贯美国，将新开发的西部各州和发达的东部沿海连接起来，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巩固了这个国家。在建造铁路的过程中，轨道沿线也架起了电报杆。广阔的边疆，通过快速又轻易穿越它的旅客、商品和信息，最终被接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驯服了。在修建铁路之前，一个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旅行者，要经过四个月的艰辛跋涉，翻越落基山脉荒凉的道路，经历围绕麦哲伦海峡的漫长航行；或者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西南部科曼切人和阿帕切人的领地。修建铁路对于美国自身的命运具有史诗般的意义，以至于西方诗人杰奎因·米勒说：“突击完成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比火烧特洛伊城中所有的血腥故事都更有诗情。” [7]

对幼童们而言，创建铁路的故事应该包含着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关于中华帝国和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的朝廷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现代化及新技术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美国人却乐于为了推动进步而实施庞大的计划。即使正在进行的内战也不能阻止美国人对英雄式扩张的渴望：正是在1862年，林肯总统和美国国会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案。根据法案，美国政府将修建一条穿越一千英里荒原的铁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从萨克拉门托开始向东铺设，缓缓穿过内华达州和犹他州，朝着联合太平洋公司方向延伸，后者修建从奥马哈向中西部延伸穿过大平原的铁路。

数年来，成千上万的人在美国西部辛苦工作，夜以继日地将道钉敲进铁轨，躲避着贫穷和疾病，有时每分钟要铺设四条铁轨，丝毫也没有享受到安全和文明的愉悦。对铁路修建成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还有中央太平洋公司的一万多名中国工人。他们和幼童在旧金山看到的工人属于同一阶层。他们装卸货车，洗大包的衣物，他们是绝望的人，干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工作，他们是苦力，并及时地获得了刻苦耐



劳和善制炸药的传奇声望。他们用成桶的火药炸断世界上最大的树，用手钻和铁铲凿穿花岗岩。他们用硝化甘油和炸药开山，在山崩和滚落的巨石中求生。若以每天七英尺的恼人的速度开凿崎岖的内华达山脉，每前进一英里，都要花费一百万美元。在1866年的冬天里，——这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一个冬天，因其严酷的程度而被称作“荷马式”的冬天。他们在道路积雪四十英尺厚的暴风雪中战斗，依靠隧道里的提灯、梯子和在巨大雪堆下挖出的作业空间继续工作。有一次，一场雪崩袭击了中国工人的营地，遇难者的遗体直到春天的第一次融雪之后才显露出来，他们保持着直立的姿势，手中还握着工具。[8]

尽管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随着铁路的修建，中国工人仍然面临着歧视和怨恨。在工程的早期，美国白人相信自己的种族至高无上，对平均身高只有4英尺10英寸的中国工人嗤之以鼻，不相信他们能胜任这项工作。[9]尽管这些疑问被查尔斯·克罗克，中央太平洋公司的董事之一，以敏锐的观察给出了答案，他说，“修筑了长城的人民，也能够修筑我们的铁路”，[10]但是营地里种族仇视依然盛行。有一次，一群爱尔兰工人在中国人的帐篷附近引爆了矿用炸药，激怒了中国人，用自制炸弹回敬了他们一场轰炸。虽然中国人不仅受到同事的虐待，还受到监工的虐待，时常遭受鞭笞，但是他们仍然勉力维持着生存，就像他们一直以来一样，依靠团结一心并坚守着他们的礼仪。至少中国人坚持用开水喝茶的习惯，使他们没有染上在其他营地蔓延的痢疾。

容闳的学生们安坐在隆隆行驶的列车里，他们的旅程一路顺风。列车向着犹他州疾驰，他们除了眺望窗外无事可做。这些孩子们也许很难想象在修建这条横贯大陆的铁路过程中所包含的斗争，但他们也许注意到了，仍有三三两两的中国工人庄重地在内华达山脉挖掘，尽管修建铁路的工作早就结束了。在这里，艰苦的工程夺走了如此多的生命，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如朝圣般地回此地寻找同伴的墓地。简陋的木桩下埋葬着死者的尸体，用蜡密封的瓶子里装着衣服的碎片，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字和家乡。被找到的遗体将会被掘出，用船运回中国。共有两万磅尸骨踏上了这最后的旅程。[11]

当这条总长1776英里的铁路在1869年完工时，美国人将那天定为全国性的节庆日之一。这个国家仍处在内战带来的毁灭性伤痛中，却能抓住它们的天命，征服广阔的平原，为横亘于两大海岸之间的荒

原，带来井井有条的现代技术体系。1869年5月10日，500人情绪高涨地站在犹他州潮湿肮脏的普罗蒙特里角，注视着最后一枚道钉被敲进横贯大陆铁路的最后一处连接。<sup>[12]</sup>铁路部门的领导和高级官员都出席了庆典，第21步兵营被联邦政府派来装点军事色彩，怀俄明的道格拉斯堡的军乐团和盐湖城的第十区乐队负责演奏音乐。杨百翰<sup>[13]</sup>也派了一名主教代表摩门教参加。前来采访和报道的记者围在现场。摄影师获准可以随心所欲地拍摄，于是在泥泞的土地上你争我抢，争夺着最佳的拍摄地点。

中午时分，中央太平洋公司的“朱庇特”号与联合太平洋公司的“119”号列车隔着狭窄的间隙在几近完工的铁路上相遇了。步兵团排列在铁路的西侧等候着。二十分钟后，由磨光的月桂木制成的最后一根枕木安放到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的牧师约翰·托德博士，用两分钟的祈祷纪念这一时刻。然后，牛顿·沃森·谢林用电报将消息由缅因发往加利福尼亚：“我们已经完成了祈祷。道钉即将被敲入。”<sup>[14]</sup>第一个被放进事先钻好的神圣小洞的，是由内华达和亚利桑那州捐赠的仪式用钉。接着，有如将一个圣者的遗物安放在神坛上一般，最后一颗金道钉被毕恭毕敬地安放到位。道钉用电线系在电报机上，这样整个国家都能分享道钉被钉入那一刻的胜利的声音。铁路工人一再打击不中，但是没关系。12点47分，谢林在电报机上轻叩了三下，这是献礼的仪式。

整个国家都轰动了。自由钟在费城的上空敲响。旧金山海角堡220门礼炮齐声鸣响，华盛顿是100门。据说仅1869年5月10日这一天使用的大炮数量就超过了整个葛底斯堡战役。礼花在城市天空绽放，小镇上的人们齐聚在教堂祈祷。“朱庇特”号和“119”号都与车身脱钩，朝着对方缓慢移动，距离之近以至于两个庞然大物几乎要亲吻在一起。然后“朱庇特”号优雅的后退，让“119”号前进，第一个使用这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的最后几英寸。随后“朱庇特”号也同样穿过了磨光的月桂木制成的枕木。在芝加哥，庆祝游行的队伍绵延了七英里；在战败的南部联邦城市，走到街上就可以感觉到一股重新点燃的爱国热情。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甚至是在弗吉尼亚的盟军首都里士满，都在庆祝节日。随着横跨大陆铁路的贯通，美国人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但是对于被中央太平洋公司雇用的中国人而言，没有什么可庆祝的。随着修建工作接近尾声，大多数工人都被解雇了，送他们回中国

的诺言也没有兑现，而是用船运回到加利福尼亚。他们与内战退伍军人以及其他移民者争抢着越来越难找的工作，这些移民正是沿着中国人帮他们修建的铁路干线进入美国西部的。紧接着一系列歧视性法案又出台了：1870年，旧金山禁止在街上用扁担挑篮子，这正是中国人运送货物和商品的传统方式，并对中国人的洗衣业征收重税。该城市还通过了《立方空气法》，规定每间出租住房必须提供每人500立方尺的空间。该项法律直接针对中国城里的拥挤住所，那些不能提供法定空间的人必须接受市里的“辫子条例”，根据条例，每个不能或不愿上缴市政府罚金的男性囚犯，必须将头发剪至一英寸长。这些惩罚对于白人居民毫无意义，但是却破坏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他们留辫子是在美国西部这个荒蛮之地效忠清王朝的标志。

激烈的民族矛盾持续升温，经常爆发为直接的暴力冲突。1871年10月，两名警察在洛杉矶处理帮会暴力活动时被射杀。为了寻求报复，一群愤怒的暴徒将很多中国居民从家中拖出，在晚上杀害了其中的十九名。一位目击者叙述了一个不幸被暴徒抓走的中国男孩的遭遇：“那个孩子不超过十二岁，可能来美国只有一个月，不懂一点儿英文。他看起来被吓瘫了——目光呆滞、脸色煞白、表情痴呆。他是被吊死的。”<sup>[15]</sup>

虽然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社区生活越来越艰难，但是在美国富饶的中心平原地区——幼童们乘坐的火车飞驰而过的地方，其发展已经在19世纪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神话和使命感。当火车穿过大草原时，幼童们从车厢座位上目睹到了那些即将消失的传奇西部画面，包括成群的野马和缓缓移动的野牛。

李恩富是次年第二批到达美国的一名幼童，他同样乘着横贯大陆的铁路展开去新英格兰的旅程。在火车上，他被美洲印第安人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了。他们黑油油的头发上插着老鹰的羽毛，背着弓箭跨马在野外驰骋，这幅景象让他想到了画着脸谱的传统中国演员。

更加为这次东行之旅增加了浪漫和惊险色彩的，是目睹火车被劫。这是众多杂货店里出售的西部小说和后来演绎的牛仔电影中源源不断产生影响的情节。李恩富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这次事件：



突然，火车剧烈地向后摇晃，又猛地向前冲了几英尺，然后遇到阻碍又开始向后退车厢里一，。片混乱和恐慌，旅客惊恐的哭喊声中传出了枪声。女人们尖叫着，小孩子在哭喊，我们的这群人，老师和同学们，都惊慌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向窗外张望，想搞清楚状况。然而看到的一切却足以使我们毛骨悚然。两个凶神恶煞的人，人手一把左轮手枪，似乎正在向我们瞄准……这个时候大家肯定都在祈祷神的保佑，我们的老师一定从未这般虔诚地祷告，有人还听到一位老师祈求中国所有的神都显灵来救他。<sup>[16]</sup>

在经历了一阵遭打劫的恐慌和行动之后，车厢内重新平静下来。受到破坏的车头被换成了新的，幼童们再次上路了。

当然，西部正随着移民的到来在逐渐变得文明，他们将大陆上大量开阔的山脉变成了农场、城镇和区域中心。与美国其他区域一样，正是现代技术引领了中西部地区的进步。在美国中部的广阔地区，农业的巨大潜力一直受限于难以耕种的土地。传统铁犁的耕作往往徒劳无功，刚被挖出的泥土又落回到沟壑中，拒绝人们享受它的肥沃。大草原上厚厚的草皮会附着在犁的底部，每走几步就必须清理犁的刀口，使得有益的农耕活动变得枯燥乏味。

这些简单的事实一直阻碍着西部地区的发展，直到1837年之后的几十年，一个生活在伊利诺伊州大迂回(Grand Detour)的名叫约翰·迪尔的佛蒙特州移民，设计了一种改进的犁，才最终使得大草原上的大规模耕作成为现实。约翰·迪尔是个铁匠，他分析了客户送来修理的各种工具的缺点，并设计出一种远比堆满他工作间的那些既易坏又笨重的犁更为先进的犁。他设计的犁用钢制成，带有圆形锯齿状的耙，可以把草原上的草锯短，使农夫能轻易耕出又深又连续不断的犁沟。迪尔发明的犁还足够轻，马就能拉动，农夫们无须再用牛来拉笨重的铁犁。1848年，迪尔在伊利诺伊州的莫林(Moline)开办了工厂，工厂运行的十年间，年产钢犁13000个。到内战时，已有150多种犁得到了推广，蒸汽驱动犁的研制正在进行当中，这种犁有望实现同时耕种六道沟。

对于中西部地区农业王国的繁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小麦。它的收获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在迪尔发明了他的犁的几年前，弗吉尼亚州的塞勒斯·霍尔·麦考密克和俄亥俄州的赫西(Obed Hussey)都在分别研

制钢齿收割机，革命性的工具，改变了美国平原的风景。麦考密克是一位农民兼技工的儿子，一个天生的修理师，幼年在摆弄农具与观察农业生产中度过。他意识到限制小麦收割的因素是时间，因为小麦几乎一成熟就必须收割下来。用手持工具劳动，一个农民收益的增长只能取决于他用手收获的数量，计为一天一英亩左右。但是，麦考密克发明了一种机器，一天可以处理八英亩，收获小麦量相当于用镰刀工作的一个小组。他的发明为中西部平原地区大规模种植小麦开辟了道路：在1839年，有80蒲式耳<sup>[17]</sup>的小麦经过芝加哥，十年后这一数字激增到了2000万蒲式耳。在零件可以互换的“美国制度”帮助下，麦考密克月产500台收割机，勉强能跟上市场需求。1851年，他在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伦敦大博览会上展示了他的收割机。起初，《伦敦时报》轻蔑地认为此收割机是“一个过分美国式的机器装置，体积巨大、不易操作、外观丑陋、难以理解”。<sup>[18]</sup>但是在一片英国麦地里演示之后，报纸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论断，宣称：“来自美国的收割机是来自国外的对我们原有知识储备最有价值的贡献。……它抵得上整个博览会的价值。”<sup>[19]</sup>像麦考密克和迪尔这样的人发明的技术，加上内战后农业大学的增加和1862年《宅地法》的出台，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农业产量的最大发展。

幼童们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他们相互嬉戏，以消磨乏味的旅途时光，或在不同的车厢之间跑来跑去。当火车经过奥尔巴尼，正迅速驶向马萨诸塞州的春田市时，一名幼童从专供中国教育计划使用的车厢中走出来，走进另一节乌烟瘴气的车厢，在那里，习惯于用没精打采的棋牌娱乐打发漫长旅行时光的人们，正坐在桌前，凝神盯着手中的纸牌。当他们看到一个穿着蓬松的丝绸袍子的中国小孩，悄悄地加入了他们的牌局时，感到有点儿不知所措了。用他们后来的话说，或许是他以一个“天真无邪”<sup>[20]</sup>的笑容，赢得了这群人的好感，美国人让这个年轻的学生加入了他们的游戏。他们用礼貌而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孩子，想着王牌会被他藏在什么地方——也许是他那丝袍的宽大袖子里。但是他一把接一把的输牌，显然，这个青年学生对打牌一窍不通。很快，这位年轻学生就要走下火车，开启他在美国的求学生涯了。

<sup>[1]</sup> 引自“Progress of the Fair Trial-Arrival of Chinese Students”，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5，1872.

[2] 引自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A History of USCF,” [http://history.library.ucsf.edu/1868\\_\\_goldrush.html](http://history.library.ucsf.edu/1868__goldrush.html).

[3] 引自 Iris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3), 29.

[4] 引自 Iris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3), 41.

[5] Mark Twain, *Roughing It*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820. 如今中国佬 (Chinaman) 这个词已经沾染了种族主义的色彩, 但从马克·吐温的上下文看, 他并没有在任何否定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6] 关于中国城的讨论来自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46–50.

[7] 引自 John Steele Gordon, *An Empire of Wealth: The Epic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we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4), 218.

[8] 关于中央太平洋公司华工的讨论, 来自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57–63.

[9] 引自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56.

[10] 引自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56.

[11] 引自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64.

[12] 有关横贯大陆的铁路的讨论, 引自 Stephen E. Ambrose, *Nothing Like It in the World: The Men Who Built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National Park Service, “Golden Spike”, [http://www.nps.gov/history/history/online\\_books/hh/40/hh40q.htm](http://www.nps.gov/history/history/online_books/hh/40/hh40q.htm); and PBS, “American Experienc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http://www.nps.gov/history/history/online\\_books/hh/40/hh40q.htm](http://www.nps.gov/history/history/online_books/hh/40/hh40q.htm).

[13] 杨百翰 (Brigham Young, 1801–1877), 摩门教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首领, 在该教派创始人小约瑟夫·史密斯去世后, 担任教会首领, 他曾率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徒众长途跋涉来到盐湖城并定居下来。

[14] 引自 Ambrose, *Nothing Like It in the World*, 366.

[15] 引自 P. S. Dorney, “A Prophecy Partly Verified,” in *The Overland Monthly*, vol. 7, no. 39 (March 1886): 233.

[16] 引自 Yan Phou Lee,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Boston: D. Lothrop, 1887), 33.



[17] 蒲式耳(bushel)，一种是英制的容量及重量单位，于英国及美国通用，主要用于量度干货，尤其是农产品的重量。一蒲式耳在英国等于八加仑，相当于36.268公升，在美国相当于35.238公升，根据油料或谷物的不同品种或产地，实际换算会有差别。译者注。

[18] 引自Gordon, AnEmpireofWealth, 175—176. png

[19] 引自Gordon, AnEmpireofWealth, 175—176. png

[20] “Our Celestial Visitors，” Hartford Evening Post，September 25, 1872.

## 6 威拉德街上的紫禁城

在新英格兰，幼童们知道了美国太平洋海岸与大西洋海岸的文化差异之深刻，就如同它们迥异的风景一样。当列车驶入马萨诸塞州时，幼童们看到了殖民地的房屋和尖顶教堂，穿着打扮整洁的人们，举止得体、神情自若。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同胞。与加利福尼亚不同，在美国东部定居的中国人很少，以至于到1880年时，已经拥有120万人口的纽约，仅有不足800名中国居民。比起美国人的奇装异服和旧金山的所有让他们开心的技术，在新英格兰，真正让幼童们感到迷惑的是它的城镇和学校。在香港时，容闳也曾努力地告诉这些受他照顾的年轻人在美国生活的基本要素，从英语的语法基础到复杂的社会交往，事无巨细。但是，当列车在春田市缓缓停下时，很多幼童盯着窗外，才意识到他们对于接下来的要发生的事情似乎毫无准备。在火车站里聚集着外表奇特的人，男的戴着高帽，穿着立领衣服，女的戴着系带的软帽，紧裹在用撑架支起来的裙子里。显然，这里看不到穿着肮脏工靴的加利福尼亚采矿者。他们是美国的“满大人”。

幼童还没来得及体面地下车，这些“满大人”就一起走了过来，围着他们，小声嘀咕着，凝视着他们，轻声打着招呼。和在西部一样，当地的媒体也把这些新来的人当作真正的名人。很少有人去费心提问或撰文准确描述这项留学计划；相反，地方报纸随意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报道称，这些幼童是上海富商的孩子，是有特权的年轻人，可以轻易带着中国人的矜持与美国最上流的人士周旋。一家报纸解释说，这些来访者向美国学习，是为了将来“在人才济济的中国人当中大放异彩？”<sup>[1]</sup>幼童们只懂得最基本的英语，无法品味出这位美国记者所使用的优美辞藻中所蕴含的讽刺。

在一边观看这个场面的还有容闳，他在几周前到达春田市，为幼童们的到来做准备。当看到他的学生们即将踏上自己多年前走过的相同的道路时，是否有所感动，这些都未见于他的日记。日记中所记载的只是一个人面临体制的复杂运作时的感触。毕竟，这项计划是由容闳负责的；他的冷漠的同僚——陈兰彬，既不懂英文，也不认识任何美国人，容闳只能独自去联系抚养幼童的家庭，安排学校，努力结识当地的政客和牧师，并准备建立一处永久机构，幼童们可以常常聚集在那里，学习儒家学说。尽管如此，容闳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忘记，年幼的自己来到这个陌生的新地方时所感受到的焦虑和迷茫。他记得被人群围观时自己感到多么难过，多么厌恶那些关注。为了让幼童们尽快适应，容闳组织了一个游览美国东北部的简单旅行，他带着这批所有的幼童参观了当地名胜，比如哈特福德兵工厂和市政厅。

但是，无论幼童们走到哪儿，都会引起美国当地人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简直难以遏制。对于新英格兰的小城镇居民而言，这群穿着丝制长袍、辫子飞舞的孩子们太引人注目了，很难被忽视。例如，当幼童们在春田当地旅馆用晚餐时，就被邻桌的一个美国女人打断了，她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走向这些中国孩子，然后开始神情恍惚地抚摸他们的辫子。她被服务员领了出去，留下幼童们对整个事情一笑置之。几天后在游览哈特福德时发生的事情就没那么好笑了，美国儿童沿街追着他们，互相推推搡搡，以便把来到他们这儿的这些奇怪的新人种看得更清楚。这种瞩目超出了幼童能承受的范围。其中更为恐惧的一些人还想起了在家乡流传的关于美国人的恐怖故事，和他们把中国孩子变成怪物来展出的愿望。一些幼童不知该如何赶走聚集围观的美国儿童，另一些则不然，他们搜遍自己的口袋寻找硬币，然后扔向那些美国人。当地儿童被天上掉下的馅饼弄得眼花缭乱，蜂拥上前去收集扔向他们的零钱。这一幕让哈特福德的上流人士觉得非常有趣。

《哈特福德晚报》说：“想想看！‘野蛮的中国人’正把铜钱丢向那些清教徒和开化的新英格兰人的孩子们！”<sup>[2]</sup>

在幼童们到达后不久，容闳就将教育计划的总部由春田迁到了哈特福德。可能是因为哈特福德让容闳想到了上海，这个地处康涅狄格河沿岸的城市是商人的天堂，那些像容闳自己那样的人，依靠与全球市场交易商品发了大财。哈特福德还是美国保险业的中心，号称全美人均最富有的城市。同样引起共鸣的还有哈特福德对于人们追求变革与发展的保障。正是在这里，1639年，一群英国殖民者在征得人民同

意之后建立了第一个政府；在这里，1814年，来自新英格兰的代表为了抗议与英国的战争而集会商讨脱离联邦的可能性；也是在这里，1844年，全美最古老的公共艺术博物馆，沃兹沃斯博物馆(Wadsworth Athenaeum)，举行了开幕典礼。这里还是废奴主义者和艺术家们的家园。哈丽叶·伊丽莎白·比彻尔在完成《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不久就搬到了庇护山(Asylum Hill)上的一间宽敞的小屋里，与马克·吐温为邻。马克·吐温初到该城一文不名、穷困潦倒，二十年后他成了受人尊敬的作家，写下了《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等众多美国经典作品。马克·吐温在写到哈特福德时说：“在我有幸见过的所有美丽城市之中，她排在首位。” [3]

但最为重要的是，在哈特福德有一群支持容闳的人。其中一些是故旧，例如尤妮斯·凯普伦，这个女孩，二十年前容闳曾带着她出席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舞会。另一些是新交，例如康涅狄格州的教育负责人B. G. 诺斯罗普。还有很多像约瑟夫·特威切尔牧师这样的人，他们对于不用远渡太平洋就可以将基督福音传播给中国人而感到兴奋。特威切尔写道：“看吧，上帝已将工作送到了我的门口。” [4]容闳的朋友们富有、有影响力，醉心于他的使命的目标。所有人都表示要尽其所能地帮助他。

幼童们一到康涅狄格州，收养他们的家庭就行动起来，为每对中国孩子腾出房间，费时费力地教导新来者学习美国语言和风俗。然而，尽管一片好心，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习俗的懵懂无知，正如幼童对于美国文化一样。因此，主人常要为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却出了岔子而感到困惑。

李恩富——曾详细记录火车被劫事件的幼童，曾写道：他第一次被介绍给负责照顾他的女主人时，她立刻弯下腰亲了他一下。这一令他异常尴尬的西方人表达爱意的动作，与他和其他幼童在中国严厉的家庭关系中的习惯完全不同。在中国，一位幼童向母亲告别时，磕了四个响头，这四个响头被认为是对于十五年的远行恰当的告别方式。看到李恩富从陌生女人那里得到一个亲吻，让他的朋友们忍俊不禁，咯咯笑着，还有一些幼童大笑起来。李恩富写到，这是他有生以来得到的第一个亲吻。



但是，有一些误解却难以一笑了之。在春田居住的第一个星期天，李恩富和他这组的同伴被告知，为上主日学校<sup>[5]</sup>做准备。两个孩子很兴奋，因为他们来到美国就是为了接受教育，热切地希望尽快开始学习。他们包好书本，穿上最好的衣服，兴高采烈地闲聊着，跟随家人走向他们认为的新学校。渐渐地，他们觉得有些不对劲了。那栋建筑有塔尖和十字架。他们走进去，发现那是一座教堂，摆放着长椅，教堂里的人们正站起来盯着他们。原来主日学校根本不是一所学校。他们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在中国，他们的亲戚、朋友以及容闳共同负责的留学督导陈兰彬，都曾警告过他们，一些美国人可能会试图让他们信仰基督教。他们想着，现在发生的是不是正是这件事呢？那些美国人是不是要强迫他们信仰新的宗教呢？因为语言不通，加之对教堂在虔诚的英格兰人群体生活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一无所知，幼童们紧张地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们毫不迟疑地撒腿就跑，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教堂，沿着街道跑回他们的房间，蜷缩着藏在房间里。直到抚养他们的美国家长回家，告诉他们没有人试图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去教堂只是每周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

精神上的恐慌减轻了，随之而来的是衣着问题。当幼童们进入当地的学校后，他们鲜艳的长袍和长长的辫子招来了美国同学的嘲笑，在恶意玩笑已成悠久传统的美国校园里，称他们为“中国女孩”。这自然让幼童很苦恼，他们去找容闳寻求安慰，希望容闳能理解他们，他在美国上学时无疑也遇到过同样的烦恼。容闳深表同情。几乎在听到第一声抱怨之后，他就想允许孩子们放弃传统服装而改穿西装，也许甚至可以在留美期间剪掉辫子。但是容闳的同伴，此项计划的另一位负责人陈兰彬——被官方派来保证幼童对儒家传统的忠诚的，听闻此言，大吃一惊。对他而言，衣着造就人。如果脱掉长袍这个典型的中国学者的服装，这些幼童就会变成一群美国人。作为曾在刑部任职二十多年的官员，陈兰彬理所当然不理睬幼童们的请求，幼童必须穿他们应该穿的服装。容闳解释说，如果幼童们要最大程度地接受美国教育，那么就有必要穿着与中国不同的服装。如果幼童们为保护自己免遭嘲笑而花费时间，他们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投入到数学和科学中。虽然很不满，陈兰彬终于还是同意折中解决，允许幼童们穿套装，但必须留辫子。他们可以把辫子塞到外套下面，但是绝对不能剪掉。陈兰彬警告说，辫子是忠诚的象征，没有一个本分的天朝子民会考虑剪掉辫子。

穿上新制服之后，幼童们看起来越来越不像外国人了。他们还迅速地掌握了英语，以至连乐观的容闳都为此感到惊喜。容闳认为，这既与幼童们的天赋有关，也与收容他们的主人锲而不舍的教育有关。寄养家庭的主人大都是严谨的、敬畏上帝之人，相信努力工作会得到上帝的奖励。为了让受他们照顾的孩子们尽快掌握新的语言，寄养家庭经常使用严厉的方法。“我们用实物教育(object-lessons)的方法来学习英语，”李恩富回忆说，“在餐桌前，我们被告知某盘食物的名字，如果记不住，就不能分享这份食物，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进步神速。” [6]

吴仰曾，一位与巴特利特家一起生活在哈特福德的幼童，记得自己在新英格兰接受了同样的教导。“女主人是一个严格的人，如果我们进餐时持刀叉过低，她会纠正我们。如果晚上九点或十点以后她听到我们在阁楼上自己房间里说话的声音，就会在下面喊道：‘孩子们，别说话了，该睡觉了。’” [7]

当容闳教育计划的四批120名幼童已分批从中国到达美国，并且习惯了新英格兰的生活，他们真实的个性就开始显露出来。经过了在香港一起学习和乘着轮船、火车穿越世界的旅行之后，幼童们终于互相了解了。

在这群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唐绍仪。在学校学习希腊语时，幼童们读了《伊利亚特》，知道该把哪个绰号送给这位朋友，他们称他“埃贾克斯”，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唐绍仪在这群人中，既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最高大的，但他正像他的亚加亚同名之人一样，健壮而勇敢。最重要的是，他与传说中的埃贾克斯有一个共同点：与生俱来的领导能力。幼童们愿意寻求他的建议，渴望得到他的赞成。他来自一个富有的家族，这一点对他有所帮助。唐氏家族在中国经营虾酱生意，得到了突如其来的名声、财富和影响。但是他的领袖气质几乎与家族无关，而是与生俱来的。希腊的埃贾克斯是史诗中唯一没有上帝的帮助而胜利的主角；中国的埃贾克斯似乎得到了同样的保佑，没有任何成人的帮助就在赛场上和教室里获得成功。

在哈特福德与唐绍仪一同住在加德纳家的是他的表兄梁如浩。梁如浩与他这个受欢迎的亲戚完全不同。唐绍仪举止大方、能言善辩，而梁如浩的性格比较内向，与朋友们交往时爱挑他们的毛病。因此，



幼童们对梁如浩远不如对他表兄慷慨，给这个可怜的孩子起绰号叫“冷血查理”(Cold Fish Charlie)。

每当唐绍仪厌烦了梁如浩的陪伴时，就像其他幼童一样，跑去找容良。容良是容闳的侄子，却一点儿不像他那位不凡的叔叔。他随时都有俏皮话，喜欢开玩笑，因此很快就以“胡闹的强尼”(By-jinks Johnnie)而闻名。容良的胡闹能力只有蔡廷干能与之相比。他短小精悍、面带微笑，但是只要遇到轻微的挑衅就会勃然大怒。他似乎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打斗的机会，并以出拳打击比他更加高大强壮的孩子胸口为乐。蔡廷干好斗的态度为他赢得了“中国斗士”(Fighting Chinese)的绰号。

在这一小群出类拔萃的幼童中，还有两个一本正经的年轻人，詹天佑和梁敦彦。詹天佑，他很快改名为吉米，也许是留学幼童中最聪颖的学生。虽然所有幼童都迅速学会了外语，大多数在学校也表现出色，但詹天佑更加优异，尤其是在数学方面显示出敏锐的头脑。他出身贫寒，谦和可人，这让他的天赋更加炫目。最后，说说梁敦彦。学生们稚气的童心热切希望相互融合，以不断给彼此起英文绰号来取乐，但梁敦彦却是少数几个不容易亲近的孩子之一。他更喜欢独处，似乎总是沉浸在认真的自我改进之中。他是左撇子，通过孜孜不倦的练习，成了球技高超的棒球队员，对方的击球手几乎不可能击中他投过来的球。他对思想的训练也同样严格；来到美国十八个月后，他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同学的年册上用英文写诗了：

我是一只小花猫，  
名字叫作灰虎斑，  
我居住在乡村里，  
二十里外的乡村里，  
我的眼睛黑中夹着淡褐色，  
我的皮毛软如丝，  
每天的清晨和夜晚，  
我都喝下一整碟牛奶。<sup>[8]</sup>

这些幼童们有着自己的领袖、跟班和丑角，他们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结交新的美国朋友。和容闳在耶鲁时一样，幼童们也很快发现他们的美国同学看重的是力量、速度和技巧，在中国的观念里，这些品质与严肃读书人都是不相称的。但是这些幼童比容闳入学时的年龄要小，他们很高兴抓住每次乱跑的机会。学生们尤其迷上了棒球场，不久后他们就穿上了裁剪好的制服，把辫子塞到帽子里，在球场上连跑带颠地跑垒了。当没有时间安排比赛的时候，他们就在附近的农场上追着猪跑。

强健的锻炼、丰富的食谱，让幼童们茁壮成长着。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出身寒微，在中国时只能靠一点大米果腹，如果运气好，也许还能吃到一些鸡肉或一个橙子。但是在新英格兰，他们却吃得丰富而富有营养，肉类、土豆、面包、黄油、大量的奶油。即便是幼童中最体弱多病的孩子现在也非常健康。在幼童们到来两年后，《哈特福德晚报》报道说：他们为年轻的客人在这座城市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而感到自豪，并称所有幼童的生病时间都没超出过两周，花费的医疗费用也不足五十美元。<sup>[9]</sup>

幼童们优异的学习成绩也为这幸福的画面锦上添花。虽然脱掉了传统的长袍，但是幼童们本质上仍是旧式的中国书生。按照古老而至上的名言，他们都相信如果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寒窗苦读。尽管他们的美国同学欣赏强健的体魄，并用领袖气质和魅力来衡量人，但幼童们仍然将学业看作至高无上的责任。在到来后不久，几乎所有幼童都在班上名列前茅了。

只有一个幼童并没有很好地适应美国的教育——蔡廷干，绰号“中国斗士”。他非常好斗，在新英格兰安静的教室里被认为太难以管教。他的老师说，他不够聪明，也缺少克服自身缺点的自律能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美国为他找到了一席之地。他在到达后不久，不是被送去学校而是被送去一家机械厂。为了不使他的辫子不小心被笨重的机器夹住，他被特准剪掉发辫，这让他与他的朋友们更不一样了。没过多久，蔡廷干就能在嘈杂喧闹的齿轮声响中找到了快乐。

住在哈特福德，看到幼童们的身心茁壮成长，容闳满心欢喜。在私下造访和谈话中，容闳鼓励幼童更多地观察环境，像他以前那样，用下午的时间去图书馆，去跳舞和参加体育运动。另一方面，陈兰彬

仍然带着不满的和始终怀疑的态度。在他眼里，幼童们向学术和运动的卓越方向每迈进一小步，就是向脱离帝国的控制范围迈出一大步。他怀着与日俱增的恐惧看着那些他护送来时穿着长袍的中国孩子在几个月内变成了穿着蓝色法兰绒西装和干净的白衬衫的美国青年。陈兰彬并没有隐藏他的沮丧之情：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成为清廷中教育计划的赞助者，陈兰彬向李鸿章发表了长篇大论，抱怨幼童们的放肆行为，希望就此终止教育计划。但是李鸿章另有打算。就他而言，派遣幼童去美国是为了让他们成为机械和军事人才，衣着失范的问题不会令他改变主意。他需要现代武器和操作武器的人，他命令陈兰彬按指示将计划进行下去。

陈兰彬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但他仍然不喜欢美国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地过着他这种地位的人在国内所过的生活。他带着幼童们的两位老师，搬到了哈特福德的一所大房子里，还雇了一个厨子，一个洗衣工，一个杂工和一个裁缝。当他负责下的幼童正竭力进入他们的新环境时，陈兰彬却极力地与之分离，将他的家变成了中国在美国境内享有治外法权的一块小领土，一座威拉德街上的紫禁城。

临近社区的美国孩子们被陈兰彬的房子深深吸引着。在这栋住宅里，他们发现了所有的异国魅力和神秘色彩。而随着中国幼童们有了美国绰号，英语水平逐渐提高，更加热爱棒球运动，这里已经不能再给他们任何东西了。哈特福德最好的家庭里的孩子们接二连三地溜到陈宅的前门去按门铃，等着身穿奇异长袍的沉默寡言的仆人来开门。然后他们就伸长脖子向屋里张望。这栋房子从外面看与社区内其他房子没什么两样，但里面的布置却很符合陈的传统情怀。在门厅里没有摆放椅子，只有几张大的挂毯悬挂在墙上。在门厅的东北角，供奉着孔子。

如果说房子简单的装饰风格让当地的年轻人喜爱的话，那么陈兰彬始终如一的殷勤好客则赢得了更多的赞许。克莱尔·凯普伦，住在陈隔壁的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回忆了这位外国邻居慷慨好客的习惯：

楼梯的上方是一个门厅柜橱。在我们家里一般都用它来放衣帽，但这个中国人把那里放满了盒子，一个又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坚果和蜜饯。我们一个一个被带上楼去，分赠到蜜饯。蜜饯非常好吃，因此我们经常去。我们一直受到礼貌的接待，从未觉得自己让人厌烦。<sup>[10]</sup>

除了源源不断的零食外，凯普伦还喜欢坐在自己的围墙上，向陈家院子里的洗衣工人喊话。虽然他们之间距离触手可及，但是她还是尽可能大喊着说出每一个字，以便他能感觉到英语的力量。洗衣工永远笑着纵容她，跟着她重复每个一字。当他碰到字母R时，总是出错，惹得他的小邻居哈哈大笑。幼童们可不像那位好脾气的洗衣工，当他们在课堂上因为外来口音而被取笑时便会怒不可遏。当地一家报纸在报道此事时伸出了援手，一片好心，但犯了地理上的错误：

对于这所中学里的以取笑日本学生不完美发音为乐的年轻学生来说，应该一提的是，这些学生对于此事非常敏感，他们向校外的朋友表达了在背书时受到同学嘲笑的伤心感受。这些哈特福德的中学生无疑会来自太阳旗下的孩子那里得到一些好的教益。<sup>[11]</sup>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于公众体面言行的热切呼吁体现了新英格兰人对于中国客人的态度：虽然极为礼貌和友好，当地人对于这些新来者的历史、风俗和传统，却没有多少好奇心。当中国人努力去融入当地文化时就受到鼓励并被欣然接受，反之便受到温和的督促。所谓的“天定命运”并没有给跨文化交流留出空间，它奖励服从，要求效仿，而忽略其他。

哈特福德的当地要人对于中国幼童的适应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儿童具有愿意融入和适应迥异环境的天性，而将幼童快速掌握英语和受到其他同化的事实解释为对于强有力的美国精神的认同，以为美国精神战胜了停滞不前的、无力的中国传统。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正在变得文明。B. G. 诺斯罗普牧师是康涅狄格州的教育负责人，也是容闳的朋友，他在一封写给全体寄养幼童的家庭的信中，列出了此次教育计划的主要原则及政府对于幼童教育的期望。诺斯罗普说，中国学生欣然服从的精神当然很好，但他们也有必要及早学会“自立、克己、自制、充满活力和坚持不懈，以及其他典型的清教徒美德”。幼童们将被教导“热爱国家，有志成为美国科学和文化的倡导者，并以此来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美国就是如此，幼童们的进步并不是没有人来衡量：在诺斯罗普的坚持下，幼童的日常活动和分数都被记录下来，任何人学习或精神上的落后都会被迅速报告给计划负责人。诺斯罗普尤其重视的是英语、地理、算术和这几门功课的融会贯通。<sup>[12]</sup>



但是，陈兰彬要确保的是让幼童们不断受到中国人的教育，以避免日益深刻的美国化。他给幼童的教师们分别写信，告知由其负责看管的幼童每天必须用一小时来学习中文。他还要求，每三个月幼童都要被送到留学计划总部，接受两个星期的母语和中国文学教育。容闳并没有反对这些保守的做法，回想起自己从耶鲁回国后重学母语所付出的努力，他希望幼童们在回国之后能够尽可能流利地运用中文，至少这一次陈兰彬提出的是一个明智而超前的政策。

但是，幼童们却把学习中文视为不必要的负担。大部分幼童还能勉强忍受每天一小时的中文课，但他们烦透了暑假期间的集中学习。他们的美国同龄人能够享受三个月的假期——在小河里游泳，打球，追着猪跑，或闲逛——而教育计划的学生们却只能愠怒地在陈兰彬的监管下度过整个夏天，忍受让人精疲力竭的课程。有六周的时间，他们必须在早晨八点钟起床，然后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再从下午两点到四点，晚上七点到九点，一直学习中文。除此之外，在皇历上记载的黄道吉日里，幼童们还会被召集到教育总部，听陈兰彬诵读《圣喻广训》，然后向皇帝行礼表示臣服。陈兰彬相信这些仪式能够满足朝廷的要求，让幼童们没有“沉浸于外国学问之中”<sup>[13]</sup>，并对中国传统保持适当的尊重。

当然，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在许多幼童的脑海里，在圣坛前向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下跪是一个愚蠢的姿态。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数学、科学、航海，甚至拉丁语和英文写作。这些学科的内容有立竿见影的实际功效，能培养出工程师和演说家、律师和将军。《圣喻广训》中的十六条道德箴言，收集了儒教关于理想生活的思考，但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幼童而言，它们唤起了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很遥远的世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的美国人日趋相同。使陈兰彬大为惊恐的是，古代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日益变得不可理解和不相关了。

按照他们新的美国习性，幼童们很快成立了自己的棒球队。幽默而调侃地称自己的球队为“东方人棒球队”。他们也喜欢打橄榄球。每当球队在橄榄球场上打成平局时，邓世聪常常成为首选，一位美国同学描述他“跑动起来像只小猎犬，躲闪的功夫像只猫”。<sup>[14]</sup>

幼童们的学业一直很优秀。克莱尔·凯普伦，两年前曾教邻居的洗衣工改善英语发音的那个女孩，今年已经十岁了，在哈特福德西部公立中学接受精心的教导。她与蔡绍基同窗。起初，克莱尔在班上名列前茅，获得了8.5分的学业分数，而比她年长五岁的蔡绍基只得了7.9分。但是一年后，蔡以8.8分的成绩超过了克莱尔和其他所有美国学生，紧随其后的是黄开甲，8.5分。幼童们也适应了社交生活，越来越轻松地习惯了美国学校由来已久的传统。哈特福德公立高中的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让人羡慕的是：“在舞会和招待会上，最漂亮和最吸引人的女孩总是会选择这些来自东方的小伙子。”<sup>[15]</sup>

留学生们的成绩受到了新闻界的关注，新英格兰的地方报纸经常兴高采烈地报道幼童们所取得的进步。例如，《春田联合报》就曾满腔热情地写道：

所有的幼童们都适合上更高的年级，一旦他们准备好，就会进入我们的科学学院和大学。中国教育计划的译员曾兰生的儿子艾里加[·曾]<sup>[16]</sup>，将会进入谢菲尔德科学学院，勒缪尔·龙<sup>[17]</sup>今年将进入特洛伊理工学院(Troy Polytechnic)。对于来到美国仅两年的幼童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成就。负责留美学生的饱学之士对于美国的教育体制完全认同，对他们照顾下的幼童的进步十分满意。<sup>[18]</sup>

1874年陈兰彬被召回国，加封晋爵，这让容闳松了一口气。接替陈兰彬的是一位温和的儒者，他尊重自己的传统责任，但是尽量不去干涉那些他不懂的事情，例如西装和棒球。由于陈兰彬的去职，使容闳以为无须再去与一位颀颀的满大人周旋以继续开展教育计划。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容闳就收到了李鸿章的来信，告知明年陈兰彬将返回美国，担任新任中国驻美特使及全权大使。容闳十分明白李鸿章的意图。在《蒲安臣条件》生效后，这位精明的高官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而向美国首都派遣一名高级官员是确保清廷能充分表达意见的最佳途径。如果这名官员还有一些在美国的经历，那就更好了。容闳知道，李鸿章对陈兰彬十分同情；虽然他不像陈兰彬那样坚持严格的儒家仪式，但李鸿章认为陈兰彬忠诚而值得信赖，这对一个尽责的官僚来说，是压倒一切的优点。

容闳忧心如焚，陈兰彬很快就会回到他的世界中来，而且职权在他之上，可以干预幼童的教育。陈兰彬成为在美国的中国最高长官，



意味着学生们也许要开始打包行李，准备回家了。容闳写信给李鸿章，恭敬但愤怒地催促他重新考虑任命。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容闳意识到。李鸿章对西方的教育机制不甚了解，他曾写信给留学委员会，要求在美国公立学校读书的幼童不能由女教师教导；放三个月暑假这个闻所未闻的事情也使他大为震惊。容闳在写给他的信中着重重申了教育计划的目的和意义。李鸿章看到容闳的决心和不愿受制于陈兰彬，不得不谨慎行事。他信任陈兰彬，但却不能因此去疏远有着人脉广泛而又富有的容闳。此外，他也同意容闳对陈兰彬意图的判断，意识到这位新特使一到任就将终止被他视为有伤风化和恶劣的中国教育计划。如果这项计划在开始不到三年就结束，那么不仅自己显得很愚蠢，而且所有曾向朝廷许诺的成果——受过教育的人、西方的技术、武器、与美国的密切关系等等——都将成为泡影。但足智多谋的李鸿章很快找到了解决之道。他写信给容闳，感谢他有价值的进言，并任命容闳为陈兰彬在哈特福德的助手。这样一来，两个对手就都成了中国驻美的官方代表，一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在康涅狄格州，可以相互制衡。通过这个计划，李鸿章既安抚了下属，又满足了他内在对于儒家和谐的渴望。他希望在美國能和在中国一样，维持体制的平衡，避免混乱。

容闳很高兴，他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如果他也将成为一名特使，如果他想将教育计划永久植根于美国，他就需要为自己和教育计划建立一个固定的总部。他在哈特福德的科林斯街买了一块地方，计划火速修建一座房屋。房屋为三层结构，由蒸汽管道供暖，配有现代的燃气和排水系统，可以满足所有教育计划机构官员和幼童使用。目前大部分幼童分散于新英格兰的学校中，当他们按规定回到哈特福德接受必修的中文课程时，可以住在这里。

但是容闳最重要的“植根”行动却不在于大兴土木。当幼童抵达后的混乱渐渐平静之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联络故友和结识新交，其中最让他关注的是玛丽·L. 凯洛格——他大学时代一位朋友的熟人。从耶鲁毕业一回國，容闳就在思考婚姻的问题。他明白自己不会娶中国女人，因为任何受人尊敬的中国女子都必须恪守儒家的三从四德。容闳需要的是一位平等的伴侣，意志坚定，愿意为丈夫和家庭分担生活的重担。

坐在特威切尔牧师家的壁炉旁，容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他说，没有他愿意娶的中国女人，也没有美国女人愿意嫁给他。特威切尔狡黠地笑了笑，对容闳说，他的前半句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后半句话肯定不对。接着他热情洋溢地谈到了玛丽·凯洛格。特威切尔最亲密的朋友马克·吐温遇到他的妻子，就是在他家的炉火旁，这一次，炉火再次发挥了他的魔力——容闳很快就订婚了。

这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容闳知道，那些满腹狐疑的清廷官员对他娶一个基督教女子是多么不能接受。但事情往往就是如此，感情战胜了一切。1872年3月2日，容闳与玛丽·凯洛格结婚了。

这桩不寻常的跨国婚姻成了全国的新闻。《纽约时报》以一篇题为“容闳娶了一名康涅狄格州女士”的文章报道此事说：

容闳先生，中国广东人，现任中国驻哈特福德教育委员会学生监督，周三与玛丽·L.凯洛格小姐成婚。婚礼在埃文市的凯洛格父亲B.S.凯洛格家中举行，由庇护所山公理会教堂的J.H.特威切尔牧师主持，他是新郎的挚友。新娘身着的白色婚纱，是由特意从中国进口的丝绸制作的，有精心制作的丝绸刺绣做装饰。新娘的弟弟和妹妹担任伴郎和伴娘。仪式完毕后，呈上了中式佳肴和美式风味大餐。哈特福德市留学计划经理叶绪东(YohShuTung)先生和在中国驻哈特福德留学委员会任教的容运福(YungYunFoo)先生穿着中式服装出席，但早已就接受了美国时尚的新郎则身着西式晚礼服。新婚礼物数量众多且价值不菲。之后容闳夫妇乘坐当晚的火车前往纽约进行短暂的新婚旅行。<sup>[19]</sup>

不出所料，陈兰彬反对这桩婚事。

容闳过上了安定幸福的婚姻生活。然而，一个月后却突然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一个学生感染了猩红热，不治而死。曹家爵死时还差三个月才满十三岁。他的葬礼于4月20日在哈特福德的中国教育计划临时总部内举行。由于曹家爵的家人远在万里之外，因此安排葬礼、安抚死者灵魂的任务就落到了中国教育计划成员及其支持者身上，他们怀着庄严和善意完成了这项神圣的义务。下午一点钟，在萨姆纳(Sumner)街上的房屋内，哀悼的人们缓缓经过悬挂着黑色绸带的入口走向前厅。死去的幼童安睡在镶着银饰的棺材里供大家凭吊。他身穿传统的丝质长袍，头枕白色花床。棺材顶上面摆放着花圈，里面

镶嵌着中式的礼仪用品。哈特福德居民送来的花篮摆满了房间，这是这座城市与她的外国客人之间亲密联系的见证。特威切尔牧师，一个月前刚刚主持过容闳婚礼，现在又应邀来主持葬礼。容闳将特威切尔的悼词译成中文。曹家爵的同伴将朋友的棺材抬上等候的马车，将这个年轻的孩子葬在小春林(Spring Grove)墓地。

在美国度过的短暂时光里，中国教育计划的成员们接受了东道国的文化习俗，分享了运动休闲的乐趣，庆祝了幸福的婚礼，也在美国的土地上安葬了自己的同胞。尽管他们不可能全盘美国化，尽管有顾虑重重、顽固不化的陈兰彬对他们施以严格管教，但他们仍然对西方生活方式应对自如。容闳和他们的老师一直在提醒他们说：他们是未来中国的领袖，要将技术和秩序带回矛盾重重、千疮百孔而又受到保守主义束缚的国家。不过，这都是将来的事。现在，他们可以先忽略那些未来的艰苦工作，而一心准备着前往费城的旅行。在那里，他们将作为嘉宾出席即将召开的1876年百年博览会。

[1] “The Chinese Students”，Hartford Courant，October 11，1872.

[2] “Our Celestial Visitors”，Hartford Evening Post，September 25，1872.

[3] 引自Witold Rybczynski, A Clearing in the Distance: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Scribner，1999)，32—33.

[4] 引自Steve Courtney, Joseph Hopkins Twichell:The Life and Times of Mark Twain's Closest Friend(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8)，146.

[5] Sunday school，星期日对儿童进行基督教教育的场所，译者注。

[6] 引自Yan Phou Lee，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Boston:D.Lothrop，1887)，34.

[7] 引自Thomas E.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872—1881(Pullman: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35.

[8] Edward Hart Fenn，Friendship Albums，1874，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 Archives，Hartford，Conn.

[9] “The Chinese Students”，Hartford Evening Post，June 4，1874.

[10] 引自 Chris Robyn, “Building the Bridge:A Sino—American Historico—Cultural Synthesis, 1872—1881” (M.A.thes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25.

[11] “The Celestials, ” Hartford Union Post, September 26, 1872.

[12] “The Chinese Students” , Hartford Evening Post, August 20, 1873.

[13] 引自 Anita Marchant, “Yung Wing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t Hartford” (M.A.thesis, Trinity College, Hartford, 1999), 16.

[14] William Lyon Phelps , Autobiography , with Letter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83—86.png

[15] William Lyon Phelps , Autobiography , with Letter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83—86.png

[16] 曾笃恭(1856—1916年), 1875年进入耶鲁大学, 1877年被提前召回, 回国后曾任上海《北华日报》《字林西报》编辑, 并先后在南京政府外事局和铁路总局工作, 译者注。

[17] 应为龙夷, 生平不详, 译者注。

[18] 引自 “The Chinese Students” , Hartford Evening Post, June 4, 1874.

[19] “Yung Wing Marries a Connecticut Lady, ”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875.

## 7 归国

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百年博览会是为各种形式的发明创造举行的庆典活动。<sup>[1]</sup>官方称之为“艺术品、制造品、土地及采矿产品国际博览会”。5月初，格兰特总统宣布博览会开幕，他欢迎世界各国人民来费城的费尔蒙特公园参观，在285英亩的土地上考查来自37个国家的丰富多样的产品，从刺绣到园艺工具，从蒸汽机到土耳其地毯。在美国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独立百年纪念展览会——是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突出地位的认可，也是对其巨大经济潜力的肯定。在美国独立的一百年中，这个国家孕育出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技术和发明似乎没有界限：仅19世纪70年代就目睹了电话、电报和电灯的发明。在由玻璃和钢铁建造的临时场馆内，美国人带着惊奇参观了这些机械和工具，他们希望能用此为全人类建造一个工业的未来。

此后的六个月中，共有900万人来到费城，对于当时仅有4600万人口的美国而言，参观者数量巨大。<sup>[2]</sup>6万件展品放在为博览会修建的250个建筑里，参展国精心制作了反映自己历史文化的展品。英国在展览场地上建造了一座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半木质亭阁；而日本木匠建造的亚洲“房屋”，其木工之无与伦比，让人印象深刻。埃及政府在百年展会的主场馆内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古金字塔模型，上面刻着愉快的致敬词：“世界最古老的民族向最年轻的国家致以清晨的问候。”<sup>[3]</sup>

美国的许多州也参加了博览会。堪萨斯州的代表用玉米搭建了两层国会大厦的模型，顶部是胜利的罗马美神(Pomona)的雕像，十分引人注目。展会弥漫着镀金时代(Gilded Age)迷人的气息，还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如利比亚咖啡，德国克虏伯机枪，加拿大木屋，突尼斯贝都因人的帐篷，埃及的棉花，一块来自墨西哥的重达4000磅的白银，



以及秘鲁印加人的文物。在展会场地上，人们站在当时仅有一只手臂的自由女神像面前，试图想象着她完成后的壮观景象。费尔蒙特公园里修建了一条窄轨铁路，以便参观者能够游览整个博览会，园区内还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单轨铁路，把农业馆和园艺馆连接起来。专为展会安装了一套与市政用水分开的过滤水系统，并且建立了内部通信网络，以便游客能在想要离开时通知到马车夫。

作为博览会热烈气氛的清醒剂，“美国天主教完全戒酒联合会”建造了一个35英尺高的软饮料贮藏器，造型是一个巨大的摩西像，以方便那些不愿在现场的9个全职服务餐馆中喝酒的人。纪念宫的艺术馆内展出的现代雕塑、绘画、雕刻和摄影作品则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参观者。特别受观众喜爱的是欧洲作品，这些作品坚持的道德标准与美国清教徒所熟悉的不同，激情和赤裸的展露让观众感到震惊和刺激。与费城百年博览会所表现的现代精神相符，连色情展品都是自动化的，威廉·迪安·豪厄尔看了用机械控制的克里奥帕特拉（古埃及艳后）蜡像后不无困惑地写道，“一只令人厌烦的鹦鹉站在她的手上，一张一合地扇动着翅膀，她迷人地左右转头，无力地将手臂抬起放下——如此这般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sup>[4]</sup>

尽管如此，最具有吸引力的还是机械宫。最新的工业和机械发明都集中在这座14英亩的建筑里展示，人们心怀敬畏地站在发动机和发电机前，这些机器最终推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杰出的地位。虽然其他国家的实用工艺和精致的手工制品也给参观者留下了印象，但是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机械宫里的科技奇迹。机械宫最显眼的位置上矗立着巨大的科利斯百年纪念蒸汽机，它重达56吨的飞轮以每分钟36转的速度无声无息地旋转。这台巨大的机器由外部锅炉驱动，能产生1400马力的能量，其转矩足以驱动整个展厅一英里内的连杆，为其他展出者提供免费的动力，如正在展示其电梯升起装置的奥的斯兄弟公司（Otis Brothers & Co.）。乔治·H. 科利斯的蒸汽机每天为翘首企盼的游客启动两次，出于对发明者宗教信仰的尊重，蒸汽机礼拜日停止工作。当科利斯的发动机虔诚地过安息日时，水力附加装置就随时用来提供动力，它的动力来自于巨大的水泵系统，而游客们也可以同时看到内燃机原型布雷顿便捷发动机的潜力。沿着通道往远处走是线狼牌氨压缩机，一种冷冻设备；闪电牌滚筒印刷机；华莱士法莫电磁发生器；贝尔的电话电报接收机也在展会上展出，将神秘的声音传递给兴奋的观众。《伦敦时报》简明扼要地评价了机械宫展出的技



术发明，“美国的发明正如希腊的雕刻和意大利的绘画一样，简直是天才之作”。<sup>[5]</sup>

容闳的学生们在夏末时到达独立百年展览会，他们先去参观了主展厅的中国展区。在热闹的博览会中，可见装饰华美的古塔，入口处的牌楼上用中国书法自豪地写着“大清国。”走过装饰牌楼，学生们得到李圭的迎接，李圭是一名海关官员，奉命监管展会中的帝国建筑。他的任务是照管象牙雕、瓷花瓶、丝绸屏风等运到费城来展示的中国艺术品。李圭在闲暇之余曾去百年展览会的各处参观，他后来写道，在他看来似乎中国以外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厂。他对西方人用机械设备改进人们福祉的能力感到震惊，而清朝仅仅能给出精美的和装饰用的东西。“自古以来，中国就将机器制造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只会产生阴谋诡计，但是如果用这些技巧来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那么有何狡诈可言呢？”<sup>[6]</sup>

与这些从康涅狄格州来拜访他的幼童相见，对李圭而言是一个新发现。他以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群勇敢的中国人。他们在美国人中间轻松自如、不拘礼节，“言行不受拘束”。<sup>[7]</sup>李圭连珠炮般地向学生们提问。“何物最佳？”“想家否？”学生们发现这个清朝官员认识到了教育计划的长远性，《费城时报》这样描述他们之间的谈话：学生们谦恭且详细地“与那些留着辫子的人交谈”，<sup>[8]</sup>他们告诉李圭，最喜欢“外国印字法，中国雕牙器”；“想也无益，唯有一意攻书，回家终有日耳”。当李圭和幼童互相道别时，这位帝国的官员已经深信这些年轻学生将大有前途，他写道：“西学所造，正未可限量。”<sup>[9]</sup>

在美式餐馆用餐后，幼童们来到了机械宫，他们被这个巨大建筑里轰轰作响的设备迷住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还有更吸引人的东西，即使是最先进的工厂也生产不出比这更迷人的东西了。在缝纫机和其他有女服务员操作的展品面前，幼童们用少年好奇的目光盯着在小房间里工作的漂亮女生，每个人都试图用他们剪裁得体的法兰绒套装和醒目的辫子来吸引女孩们的注意力。但是，比女孩更让幼童们印象深刻的是教育计划的管理人安排的会晤。经过联络，幼童们被介绍给格兰特总统，在简短的引见之后，格兰特总统与幼童们一一握手。

康涅狄格州的展品中还包括了学生们的英语作文和试卷。这对幼童们而言是极大的荣誉，证明了他们的成就不仅让老师和负责人感到自豪，也让全州感到自豪。来自伦敦的查尔斯·里德爵士是教育展品评判机构的领导，他为幼童们颁奖，以表彰他们各方面的优异表现。从各方面看来，幼童们都不虚此行，在展会上他们既接触了名人和发明家，又了解了外国文化和新技术。他们绝对不会缺乏素材去完成之前布置的作业题目“我的博览会见闻”。这些目睹了现代世界之发明的学生们，乘上了返回康涅狄格州的火车，他们满怀自信，准备进入即将到来的新学年。

幼童们意识到，他们行将从中学毕业，进入耶鲁或者其他闻名已久的大学。他们相信大学将是他们大放光彩的地方。在那里，唐绍仪将更具魅力，容良将更幽默，梁敦彦的投球将更准确。中学已经使他们美国化，大学将让他们长大成人。

但是，对于容闳而言，1876年秋天却面临着一连串的问题，尽管很多问题都由来已久。一直在找麻烦的陈兰彬，由于华盛顿的外交任务，无暇顾及幼童方面的事宜，因此他找了一个人来代替他阻挠容闳——吴子登。吴子登是一个坚定的儒生，彻底地反对一切改革理念，陈兰彬认为他是接任哈特福德教育计划共同负责人的最佳人选，这个继任者是可信的，能够监视幼童免受野蛮人文化和容闳的美国化方式的影响。陈兰彬任命吴子登的消息在秋季学期开学时传来。容闳得知这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后气愤不已。容闳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时就知道此人，在他记忆里这个人从来没在朝廷里担任过一官半职。陈兰彬选择这个毫无才干的人来决定整个教育计划的方向，这让容闳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他意识到吴子登的任命是清廷仇外势力的“杰作”。难道费城博览会的盛况还不足让满大人们明白世界在前进而中国停滞不前吗？容闳日后写道，“极其顽固之旧学派，挥拳捋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sup>[10]</sup>陈兰彬再度证明了自己不过是一个迂腐的官僚，因循守旧，没有一点眼光和想象力。

确实，陈兰彬对美国的厌恶之情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他处处不遗余力地破坏教育计划，即使是在华盛顿时也是如此。他反对教育计划主要不是因为厌恶西方的衣着和行为，而是因为他性格中固有的专制倾向。考虑到陈兰彬坚持反对教育计划的原因，容闳意识到即使是对棒球运动的质疑，也是源于他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他认为学

生们本应该不求甚解地背诵《论语》(Analects)和其他古书，但他们却脸颊通红地在棒球场上跑来跑去，这使他感到不安。容闳写道，陈兰彬是这样一个人：“他毕生都习惯于看到生命的活力、力量、独立之精神，热情、诚恳和开放的心态处于专制压力之下，决不能自由发挥出来。”<sup>[11]</sup>而幼童与陈兰彬恰好相反，他们心态开放，充分利用在美国的一切机会。容闳写道，幼童“既至新英国省，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排空飞去。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踉驰骋”。<sup>[12]</sup>无怪乎陈感到需要一个吴这样的人来监视教育计划的发展。

吴子登像陈兰彬一样，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这些学生。他们远非中国学者的典范。在康涅狄格州，幼童们敢于直言自己的想法，在觉得恰当的时候不怕质疑权威。容揆——容闳的另一个侄子，抱怨说“吴子登对幼童们的行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竟敢直视他，对他说的话也不唯命是从。”<sup>[13]</sup>吴子登在《哈特福德新闻》上发表了长篇大论，批评幼童这种美国式的无礼行为：

你们应该明白，朝廷为了培养人才，不惜重金将你们送到最好的学府学习。你们固然要用功读书，但也不可疏忽礼节。如果你们现在不好好用功，如何应付将来所需？如何才能不低人一等？如果你们故意不顾母国之礼法，将来回国后如何能与同胞和睦相处？希望此信能让你们思考过去与现在，明了你们在此地时间短暂，而回国来日方长，因此不应根深蒂固地感染外国的习惯，以免积习难改。中西学习应并重，以便今后学以致用。如不如此，你们来此何用？<sup>[14]</sup>

吴子登公开批评幼童，但却小心翼翼瞒着容闳向北京报告教育计划的情况。在康涅狄格州时陈兰彬至少还就礼节和规范问题与容闳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而吴子登却将他严厉的评论直接禀告北京，绕过正常的渠道而在暗地里攻击容闳。他写信给李鸿章，禀报臆测的和不完全真实的消息。他报告说，幼童正在变成基督徒，上教堂做礼拜，并且喜好运动游戏之事，忽略中国学问，对孔子毫无兴趣。吴子登故意吓唬清朝官员，声称学生们正在形成秘密社团，注定将一事无成地返回中国，甚至连个小人物都不如。他们不顾学业，并且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多年后，李鸿章让容闳就这些指责做出正式回复时，容闳大吃一惊。他对这些控告毫不知情。在试图与吴子登共事的时间里，容闳并没有怀疑过他的共同监督人一直在不断地向清廷诋毁教育计划。如果在冷静的时候，容闳也许会用教育计划的功绩来捍卫这一计划，但他此刻没有这样做，他迫切感到要反击吴子登和他的告密行为。容闳说：“造此言者，性情乖张，举止谬妄……极力破坏从前曾文正所创之事业。夫文正之创此教育计划事务所，其意固将为国家谋极大幸福也。”<sup>[15]</sup>容闳一直用温和的言辞劝说人们相信他的观点，以此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现在他忍不住怒斥吴子登“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

尽管在美国的两位下属之间发生了口角，但一言九鼎、决定中国教育计划存亡的李鸿章，仍然支持容闳。更准确地说，李鸿章支持的是容闳的事业将输送给他的勇猛将领和海员。李鸿章推论，只要幼童学业进步、表现优异，就没必要只因不听吴子登那些关于尊敬长辈和背诵《易经》的长篇大论而召他们回国。对李鸿章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这些幼童有一天能拿着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的学位回到中国，用关于如何在战斗中击败欧洲人的知识武装自己，为中国重新找回失去的荣光。在李鸿章的想象中，这些学生最终会向整个清廷表明，作为他们的赞助人，他是所有官员中最聪明的人。

随着学年将尽，容闳和邻居们一起以盛大的方式庆祝农历新年，以缓和这几个月来刻薄严厉的气氛。与旧金山唐人街刺耳的节日庆典不同——在那里第二天早上齐脚踝深的鞭炮灰烬布满了整条街道，中国教育计划在哈特福德举行的宴会克制而优雅的。1877年的2月，容闳和员工们在总部大楼欢迎他们的朋友、支持者以及康涅狄格州州长的到来。除了容闳像往常一样穿着西装之外，教育计划的其他官员都穿着隆重的中式礼服。这些慷慨的主人身穿絮了棉花的夹里灰色丝绸面料长袍，让客人们目眩神迷。客人们也都穿着自己最好的晚礼服，进入装饰着常春藤和挂着中国字画的房间。食物是当地人所熟悉的——生蚝、冰淇淋、奶油蛋糕、糖果点心以及水果——但茶是以中式茶杯奉上的，这让客人们花了一段时间去适应。中国茶杯没有把手可以保护他们的手掌离开滚烫的茶水，这些美国人小心翼翼地端着自己的热茶穿梭在宴会中，希望在融入这个夜晚的时候，不要把茶泼在别人身上。

在所有参加晚宴的人中，大概没有人比吴子登更冷淡和疏远的了。尽管教育计划有很多社交需求，吴子登的职位也需要与美国人多交流，但是他和在当地人在一起时却显得非常笨拙，忽视人家的礼仪而且经常被他们的习惯搞晕。在六月间，尽管这时他已来到美国半年多了，这位不老练的吴先生有一次乘公交车的时候，愤愤不平地拒绝把座位让给几位女性。以一种嘲讽的、带着优越感的语调，《哈特福德日报》报道了这位中国官员古怪的行为。这些行为与其他中国官员相比也极为不同，其他人一直都是体贴而且随和的：

上周的某一天，一辆救济院大街的车子正缓缓地向外行驶，载满了绅士淑女。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但是当女士们接连上车时，男士都会邀请她们入座，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有礼貌地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女士就座。直到终于，唯一还坐着的男子是一位魁梧的中国官员。他的表情中传达着对这些美国人傻里傻气的绅士风度的深深蔑视。很快，车子又停了下来，这位东方人似乎感到了公众态度的压力，这巨大的压力让他无法再继续抵抗，终于站了起来，将他的座位让给了一个正在傻笑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就像座位一直属于她那样坐了下来。中国官员的脸色更阴暗了，他用力地紧握皮带，直到到达目的地——萨姆纳街口。他刚走上人行道遇到一位熟人，就爆发了——“太过分了她！”<sup>[16]</sup>

尽管吴子登没有在美国平和安静生活的能力，并要求幼童在教育计划总部——孩子们口中的“地狱屋”——参加僵化而重复的中国研究课程，但这些学生在他们自己的正式课程中却都能获得成功。正如众人所预料，詹天佑，这位“杰出的杰米”，1877年进入了耶鲁大学。他只有17岁而且只在美国待了五年，但是他的才智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在大学的第一年，他的数学成绩就拿到了第一名奖学金，能到耶鲁大学工程学院学习，詹天佑十分激动。他对从萨克拉门托到春田市的火车之旅仍然记忆犹新，立志要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

到1878年春天，另外三名幼童也都顺利完成了学业，在四月份从哈特福德高中毕业了。<sup>[17]</sup>毕业典礼安排在18日，那天早上刮起了强烈的风暴，让大家很难去参加典礼。可是对于那些冒着恶劣天气前来参加幼童的毕业典礼的老师和朋友们来说——这其中也包括特威切尔和诺斯罗普，这是一个庆祝和骄傲的日子，充满了真正的成就感。当

年初到美国的小男孩、不懂英语、害怕教堂、离家万里，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完全能适应环境，具备实践知识，带着使命感和自豪感。在观众的注目之下，他们带着灿烂的微笑从北边通道走进大厅，走向中央的舞台，在哈特福德中学校乐团演奏的“牧羊女”音乐声中坐下来。在中央讲台上，在身穿淡色礼服的女孩和质朴西装的男孩们中间，坐着三名中国教育计划的代表，穿着精心制作的丝绸长袍。一个幼童的长袍绣着中式花纹，另一个装饰着珠灰色的带子，第三个人穿着黄色缎子的紧身裤，拿着相配的扇子，戴着镶嵌红色扣子的官帽。在其他任何时候，幼童们都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美国人。但是今天，在他们最精彩的时刻，他们却自觉地在提醒友人，他们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很自豪。通过他们的刻苦和投入，这些幼童们为自己赢得了如此殊荣。这三名中国学生——蔡绍基、黄开甲和梁敦彦——被安排发表关于历史和当前时局的毕业讲话。当他们在等候轮到自己的时候，一定很难忽视所有人对他们的注视。

终于轮到自己发表讲话了。黄开甲，这位因个性随和而得到“轻快的杰克”绰号的学生，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发表了一篇关于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法国人让-巴普蒂斯特-柯尔伯特的致辞。柯尔伯特深思熟虑和大规模的改革，推动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强权。黄开甲自由地使用手势来强调重点，在致辞完毕时得到了听众的鲜花和掌声。黄开甲在法国历史的遮盖之下隐晦地提到了自己的祖国需要改革，蔡绍基则直接抓住了中国的困境。在他题为“鸦片贸易”的演讲中，蔡绍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谈到了鸦片这种毒品的毁灭性作用。他解释说，在他的祖国中国，鸦片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打着“有魔力的抚慰品”或者“无价药物”的广告。如果人们知道真相，则会称鸦片为“邪恶的烟土”。蔡绍基讲述了父亲如何为支付抽鸦片开销而卖掉自己的孩子，并向听众保证，吸食鸦片是一种比用刀杀人更可怕的行为。他谴责了毁灭性的鸦片战争和通商口岸的耻辱，为中国所处的悲惨地位而叹息。在将要结束的时候，他的语调达到了高潮。他带着激情说：“中国并没有死去，只是昏睡着。有一天中国会觉醒，达到上天注定要她达到的令人自豪的地位。”此刻，已经习惯于“天定命运”这一概念的听众，热烈地鼓起掌来。但是梁敦彦的演讲才是三个人中最精彩的。他的创作能力只能写出像小猫舔牛奶这样漂亮小曲的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到达美国六年之后，训练严格而人又聪明的梁敦彦，已经成了一位逻辑性很强的辩论大师。尽管他讨厌社交，但却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在聚会上他沉默寡言，而在讲



台上，他却如鱼得水。他开始演讲，选择了另外一个时事问题，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最近爆发的战争。他谴责公众关于俄国是无辜受害者、土耳其是嗜血掠夺者的想象，强调俄国是“穿着警察制服的贼”，是谋求从土耳其那里抢占富有的君士坦丁堡的侵略国家，而土耳其唯一的罪过就是它是一个地处欧洲大陆的亚洲强国。他重复道：“俄国是盗贼！”梁敦彦对于“亚洲的”土耳其衷心的辩护，让《哈特福德日报》写下这样的句子：“从来没有演说得到过这么多的掌声，也从来没有演说传达过如此强的志气，这位成功的‘竞选者’的即兴演说成了标志，他把听众吸引到了他积极和横扫一切的风格之中。”梁敦彦在结束演讲之后，又被请到台上再次鞠躬致谢。

在度过了一个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中文和背诵儒家经典的暑假之后，这三名毕业生前往耶鲁。他们很快意识到这里并非如想象中神奇。度过了大一新生的几个月之后，梁敦彦、蔡绍基和黄开甲感觉自己似乎没什么变化。梁敦彦仍旧是聪慧而拘谨的，他是耶鲁大学棒球队的一名好投手，但是并没有交到可以持续一生的好友。在班级年鉴上，对梁敦彦的描述是实事求是的，不像对他的大多数伙伴的描述那样既热情又亲切。这三人在成绩上都非常优秀，而且一同被吸纳进了一个叫Kappa Sigma Epsilon的秘密社团，在此他们交到了新的朋友，但是自身都没有太多改变。

但是，钟文耀的经历则与众不同。他在晚一年的1879年进入耶鲁。这个短小英俊的男孩开始成长起来。他因为名字发音接近而得到“Money”的绰号。在哈特福德中学时，是个有能力且很有人缘的学生，在高年级时甚至因朗诵得到5美元的奖金。但他并不是梁敦彦，不是超凡的运动员和天才的演说家。在中学时，钟文耀只不过是个性情温和的小伙子，在他的社交圈中处于友善的中等地位。大学改变了这一切。在耶鲁，他被招进了赛艇队。显然他矮小的身材可以让他成为最好的舵手，但是也很显然，他缺乏作为舵手的必不可少的粗俗。他的朋友们向他解释，舵手要为所有船员找到节奏，因此必须要采用丰富多样的语言。钟文耀的一个同学还记得他调整到世俗所面对困难：

他被告知他必须要对桨手说脏话，这样才能让他们划得最好，因为他通常都不出声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骂脏话对他来说是不习惯的，因为他是严肃而冷漠的人。但是有人告诉必须要咒骂桨手，到最

后他也能做到，他在最预料不到的时候，没用任何强调的语气，呆板地说成“该死”。整个船队都笑得停不下来，求他不要再说了。<sup>[18]</sup>

但是，钟文耀的聪明不但弥补了他的羞怯，还有别的。1880年秋天，在一场与哈佛大学的重要比赛即将举行之前几天，钟文耀悄悄地出去了。开赛之前他回来了，向队友解释说，他去了剑桥搜集情报。队友们逼迫他说得更详细些。他说，他在查尔斯河边沿着河岸行走，观察掉落的树叶被河底的暗流推着漂流的路线。他计算了查尔斯河涟漪的频率和长度，这些数据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他能够精确计算出对方河流的性质，他们就能够赢得这场重要的胜利。当他们的赛艇队在这一年和下一年接连两次胜利之后，没人再怀疑钟文耀的功劳。

很多年后，钟文耀作为中国派驻美国的外交官，参加了一个鸡尾酒会，很随意地提到他曾当过耶鲁大学的舵手。身旁的一位男士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了一番穿着优雅的钟文耀，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并自我介绍说，他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非常怀疑钟文耀是否看过大学船赛。钟文耀平静地转过身对这个人说：“我确实从来没见过哈佛大学的船队，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我身后。”<sup>[19]</sup>

无论这些学生对大学生活感到失望还是被它改变，在新英格兰大学中的这些学生都非常清楚，他们首要的任务是掌握中国所需的实用科学。他们学习工程或者采矿，选学数学和物理学课程，并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家乡，报效祖国。

但是，在北京的李鸿章渐渐失去了耐心。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看到这些学生进入美国有名的军事学校。火车和矿山都不错，但战舰和步兵团才是赢得战争的武器。幼童们能否进入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批准。而忙于处理学生们递交到华盛顿国务院的申请的容闳，则对这两所学校的接收概率持有更加现实的估计。美国正酝酿着排华情绪，尽管新英格兰对中国教育计划表示了热情的欢迎，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却冷却了下来。容闳代表李鸿章，耐心地等待着国务院的回应，希望这些将要毕业的学生们的刻苦努力和优秀成绩能够打动美国官员，说服他们接受幼童进入美国的军事院校，并抚慰他远在祖国的上级——李鸿章。

但是，排华运动的力量让容闳忧心忡忡。这一波新的仇外心理，源于西部的经济危机，比以前的历次都要活跃。当黄开甲、蔡绍基、梁敦彦和很多进入其他学校的学生准备毕业时，一场大旱席卷了美国大草原上的麦田，内华达州康斯托克矿的银产量缩减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在旧金山，淘金热带来的暴发户心理产生了畸形的、不顾风险的投资热潮，经济颠覆和反映在股票市场上的大破坏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焦躁不安、倾家荡产的人们聚集在市政厅的空地里，全神贯注地听着那些激烈的长篇演说，那些演说家们将金融衰退归结到除了他们自己的拙劣赌博游戏之外的任何人头上：这是铁路的过错，是银行的过错，而且最重要的，这是中国人的过错。

在这些演说家当中，丹尼斯·卡尼，一位在矿业股票大跌之后失去了一切的爱尔兰水手，拥有的追随者最多。每个晚上，在一个被篝火照亮的空地里，他号召全旧金山的人们去反击那些束缚他们的权贵势力。他发誓说：“在我饿死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之前，我要割断一个人的喉咙，抢走他所有的东西。”他咒骂“好色的债券所有者，政治盗贼和铁路强盗”，但他最恶毒的话留给了中国人。卡尼用戏剧化的语言描述着把装满炸药的气球送到唐人街上空的情景，并用挑衅的结尾总结每夜的长篇演说：“中国人必须消失！”<sup>[20]</sup>

一位旁观者描述了这一幕经常在旧金山的码头上演的丑剧，从码头上来到美国的中国劳工得到了恶毒的欢迎：“他们跟在中国人身后走过街道，在他身后咆哮尖叫吓唬他，他们抓住中国人的辫子把他拖下火车，朝中国人扔砖块和各种东西。这些可怜的异教徒，通常在神圣的贸易契约下来到这片基督的土地上，却要带着一身的伤口、瘀青和血污，到达他们在基督之城的住处。”<sup>[21]</sup>那些已在唐人街安顿下来的移民也没好到哪去。在唐人街，就算周围都是同乡，中国人晚上也要待在室内，用厚厚的木头栅栏挡住商店的窗户，以预防那些无法无天的蓄意破坏。年轻人会称中国人为“耗子”，并用石头砸他们。

1877年7月，整个城市爆发了一次疯狂的暴动。大约一万名群众聚集在城市中，表达对全国范围内的劳工叛乱的支持，一些反对移民的组织抓住这个机会，将这些暴徒的愤怒引到中国人身上，煽动这群人“去唐人街！”在此命令之下，一群人来到中国人聚居的地区，破坏洗衣房，纵火焚烧其他商业机构。在他们前往太平洋邮政蒸汽船公司的造船厂的路上，中国旁观者被枪击身亡。在造船厂，这些人把受蔑

视的中国移民驱赶到美国的海边。赶到现场扑灭火灾的消防员也受到攻击，海岸警卫队都无法控制暴力。最终，经过三天的街头斗殴和美国海军的出动，才平息了动荡。卡尼的追随者们没有气馁，将重心由流氓行径转向了政治煽动。在这一年的年终，他们成立了由卡尼领导的加州工党，致力于反对移民政策。他们的排华对整个美国国家的政治论调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西部那些想要利用群众愤怒情绪而连任的议员，很快就学会了用最刻毒和种族仇视的词语谴责中国人。

到这个时候，种族攻击的政治已经扩展到了东部。当1878年容闳收到了国务院的回复时，并不为他们简洁的回答而感到意外：在军事院校里面没有中国学生的位置。容闳苦闷地意识到，这个决定带有卡尼主义和广场演说的味道。美国人遮遮掩掩地说，军事院校在1868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赞助范围之外，因此不包含在这个协议所担保的教育互惠项目之中。尽管这些中国幼童们可以进入任何愿意接收他们的私立院校，正如教育计划的明星唐绍仪刚刚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其他几个幼童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但容闳知道，接下来教育计划的价值在清廷官员们眼中会急剧下降。进入容闳母校和其他地方的哈特福德中国毕业生们的成功并不能满足李鸿章的需要。毕竟，李鸿章想要的是职业军人，而不是耶鲁大学的学究。

让容闳的处境更恶化的是，到了1880年末，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忽视《蒲安臣条约》精神的美国人，逼迫清廷允许其修改条约内容，增加了一项允许美国政府“管理、限制或暂停”中国移民的内容。这一外交上的倒退，在清廷的逻辑里，是粗鲁而且可悲的，但起码还不是以武装力量开进紫禁城。无论如何，无力反抗的清朝皇帝还是同意了这一新的屈辱条款。

美国的政治家们急切地想要喂饱他们的选民，因此不再受国际公约允许中国人在美定居的束缚，排华法案不久也问世了。1881年，美国上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禁止所有中国人移民美国。提出这项议案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约翰·F. 米勒宣称，中国人是“另外一个星球的居民”，以其“东方文明的坏疽”毒害了一个曾经“响彻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儿童的甜美声音”的国家。<sup>[22]</sup>他的提案在1882年作为法律获得通过，标志着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因国籍而拒人于这个国家的大门之外。



当《蒲安臣条约》在1880年被修改的时候，容闳和陈兰彬又一次团结起来，在作为外交官的能力许可之内提出了官方抗议，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这股逆风实在太强了。到了这一年12月，情况已经恶化到陈兰彬必须要向美国政府恳求动用军队来保护中国居民。对于李鸿章来说，两年前眼睁睁地看着国务院拒绝幼童进入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以使他建立现代军队的梦想被摧毁，而现在连他的职位也岌岌可危。一直尽力迎合朝廷的李鸿章明白，美国这个曾被当成是唯一愿意与中国平起平坐交往的西方国家，其实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阴险。他们无视中国人的权利，像欧洲人一样无情地破坏了条约，而且对保护在其国土上的中国人的生命安全毫无兴趣。美国不再是朝廷所偏爱的国家，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教育计划对他来说也日渐成了负担，朝廷里怀疑美国意图的官员日增，指责他的无能，教育计划费用昂贵，最近开始迫使他从珍贵的海军军费中拨款来支付幼童的学费。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做了唯一可以拯救他事业的事情：一步一步结束教育计划。他想，可以分几个步骤来推进这件事。也许还可以再做最后一搏，在朝廷上为教育计划辩护，在立即召回那些中学生的同时，至少保证那五十名即将在美国上大学的学生，能在美国拿到学位，之后再召他们回国。举棋不定之际，李鸿章写信给吴子登和陈兰彬，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二人都认为教育计划应立即终止。毫不奇怪，容闳被排斥在这个小圈子之外。

除了狭隘的朝廷政治，还有其他一些国内因素影响李鸿章的决定。曾国藩从确立整个教育计划之初，就视其为在中国建立强固现代军事基础的方法，包括训练有能力的士兵武装他们的兵工厂。这也是曾国藩在19世纪60年代派容闳去马萨诸塞州获取兵工厂建设所需配备的真正原因。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而这座在1868年生产了中国第一艘现代战舰“天祺”号的兵工厂，在规模和功绩上都有所增强，最终变成了福州造船厂。还有太平矿务局，大沽鱼雷学校，天津海军学堂。李鸿章明白这些国内设施可以帮助他抵抗朝中的保守派对他的批评，而这是留学生们做不到的。在这些地方，正如中国其他处于萌芽中的国防工业一样，外国专家把最先进的技术传授给中国工人和学生，而这些工人和学生们在技术课程之外，还接受了彻底的儒家教育。现在李鸿章可以看到，他的最终目标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召回所有这些留美幼童，派到中国本土的兵工厂和造船厂去充当顾问。这样他既可以获得武器，同时又可以摆脱外国势力的侵蚀。

当容闳得知李鸿章的意图的时候，他崩溃了。他相信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的现代化，还需要那些催生出伟大革新的思想方法，而这是李鸿章的计划所不允许的。李鸿章想要的是苹果，容闳却想为他种一颗苹果树。在费城的百年博览会上，幼童们看到了现代科技中最先进的部分。不仅如此，他们亲近了这种诞生了电梯、蒸汽发动机和电话的文化。中国需要的不是简简单单地复制格特林机枪和炮舰。中国需要通过一种根本不同的视角来理解世界，一种美国的学校打造出来的观念。如果李鸿章放弃中国教育计划，把孩子们召回中国派到兵工厂的话，容闳担心中国恐怕要永远和西方世界玩捉迷藏的游戏，永远沉溺在令人窒息和固定不变的儒家历史中，铸造西方武器的二流产品，而不是培养自己的发明家和伟大的思想家。

预感到即将临近的战斗，容闳在1880年的10月寻找到特威切尔的支持，请特威切尔联合那些友好的美国精英一起保卫中国教育计划。特威切尔热切希望帮助这一他深信的事业，因此起草了一封恳请中国政府支持教育计划的信，罗列了许多幼童应该留在美国的理由。这封信由多位新英格兰著名院校的校长署名，寄给了美国驻北京的代表。美国代表将信毕恭毕敬地呈给了李鸿章。但即便有这么多人支持容闳和幼童，也不能削弱李鸿章的决心。到了12月，容闳写信给特威切尔说：“吴子登对幼童的描述，以及关于中国移民的新条约，加上太平洋海岸反对中国的咆哮，都让李鸿章感到不快。他最终决定放弃这个计划，我感到非常难过。” [23]

特威切尔和容闳求诸李鸿章的理解力不果，转而诉诸他的虚荣心。李鸿章一直自诩是个钢铁般的战士，天降大任要建设他的国家。于是容闳要寻找一位与他同样杰出而强大的人物来说服李鸿章教育计划的价值。尤利西斯·S. 格兰特的名字作为最佳人选浮现出来。李鸿章将格兰特称为“美国的俾斯麦”，他曾经在天津见过这位前总统，并走上前宣称“格兰特将军，你和我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24] 容闳得知格兰特12月17日会到纽约，于是请特威切尔到前总统下榻的第五大道宾馆去，为教育计划说情，并在交给特威切尔的信封里放了二十美元的旅费。特威切尔在脑海中想象着他在旅馆中与格兰特进行长时间对话以完成使命的场景，但是想不出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军中曾在格兰特将军麾下服役，但是他并不怎么知道我这个人。我怎么敢？” [25]



最后，特威切尔请他的朋友马克·吐温出面相助。他和这位作家非常亲密，马克·吐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毕竟他为格兰特写的传记马上就要出版了。他告诉特威切尔，12月21日星期二他们一同去纽约见格兰特。在宾馆里，格兰特给特威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谈话是我听过的最无拘束和流畅的，有广阔、睿智和仁慈的观点，谈话围绕着中国，它的需要，它的不利条件等等。他时不时提出一个问题，但是仍旧主导着谈话。最后他主动提出由他写一封信给李鸿章，建议继续派遣留学生，只要求我为他准备一些笔记，提供一些要点。” [26]

容闳意识到这是教育计划存活的最后机会。他已经决定，如果这最后一搏也失败了，他将教育计划连同中国一起放弃。在一封感谢特威切尔的信中，容闳悲伤地写道：“如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将军，和整个美国的学术和基督教品德的重量，都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那么就让中国自生自灭好了。” [27]

到了三月，容闳得知格兰特的信事实上说服了李鸿章继续教育计划。但是，在解释为何终止对教育计划的扼杀时，李鸿章也明确表示，他希望以后由吴子登而不是容闳来管理幼童。他写道：“容先生应该知道，以后不可能公开执拗，而吴先生当然也会加以合作。” [28]

李鸿章决心的改变并非因为欣赏学生在美国的优异成绩。相反，他将容闳和特威切尔促成的美国方面对教育计划的支持，视为一种预兆，预示着把幼童召回中国，对美国是一种严重侮辱。

他不想为错误的行为负责或者甚至是制造外交事件。但是他也不想显得对美国特别同情，或者是与吴子登及陈兰彬产生冲突。作为小心谨慎的政治家，他寻求从这一计划中抽身的方法。到了三月底——尽管几天前他才写信给容闳告知教育计划暂时安全了——他又写了一封信，这次是写给他在朝廷里的上级，承认大部分学生在美国都被西方影响所腐蚀，而且教育计划的开销也太大。他请求朝廷指示下一步的行动，但也清楚地表明了他个人对此事的立场。

6月8日，李鸿章的上级给皇帝呈上了奏折：因为幼童“在一个容易受到外国影响的年纪出国，逐渐习染了当地习俗，在文化上已被西

方取代和重新塑造。在他们能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前，就已先浸染了美国文化。政府深为失望。目前所有部门都急需人才，应该立即召他们回国。” [29]

皇帝在次日批准了这份奏折。教育计划正式结束了。

7月9日，特威切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昨天从中国又收到一封快信，驱散了所有的怀疑，教育计划已经终结。经过了那么多拯救它的努力，它最终还是终结了，所有光辉的希望都破灭了。唉，唉。支持教育计划的人都非常失望。可怜的容闳在所有人中受的打击最大。愿上帝保佑他。很显然，或者据我判断，这是 he 被迫离开教育计划的结果。他的离开给了反对派一次机会，这个机会被充分利用了。天意真是难测。” [30]

在教育计划终结的时候，有超过60名学生正在美国的高等学院就读。其中22人在耶鲁大学，8人在麻省理工学院，3人在哥伦比亚大学，1人在哈佛大学，其余的分散在东北部的不同学院和技术学院中。如果再有五年，所有教育计划的学生就都能根据容闳原定计划毕业了。而现在只有两名学生——欧阳庚和聪明的詹天佑有机会毕业，在教育计划被召回的几个月前拿到了学位。

当皇帝的圣旨送到容闳手上的时候，学生们刚刚结束一学年的学习，正在康涅狄格州的班腾湖上享受应得的暑假。容闳严肃地来到湖边，告诉了他们这个不幸的消息。这些正在准备庆祝野餐的学生都惊呆了。他们慢慢地走回帐篷，收拾行李。

但是，有些幼童在一年前就决定，再也不返回中国了。谭耀勋和容揆这两位有胆量挑战吴子登权威的幼童，在美期间皈依了天主教，为此愤怒的吴子登命令他们在1880年秋天返回故乡。在他们乘坐火车前往太平洋海岸，准备搭船回国接受朝廷的惩罚，中途路过马萨诸塞州的春田市时，两名幼童决定冒险一试，跳下了火车，最终回到了哈特福德。在那里，特威切尔描述说，他们“藏匿了起来，而且一直躲在幕后”。 [31]

容揆在美国时，尽管一直得到叔叔容闳的大力支持，但仍保留着对于求学期间教育计划经营不善的痛苦记忆。他责骂吴子登处处与他

为难，他制定的每一个政策其目的都在于扼杀独立自主的思考。他言辞夸张地描述这位叔叔的同事说：“对于一个活着只为了对任何非中国式的东西都闭上眼，因为害怕自己对于儒家经典干枯的空壳的喜爱会因此被破坏的人，还能指望什么呢？”<sup>[32]</sup>他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解释了他留在美国的决定：“一只诞生在笼中的小鸟不会懂得欣赏树林中甜美的香味，但只要这只小鸟能到自由的天空飞翔，就会飞往它的天性所指引的方向。”<sup>[33]</sup>在他跳下火车并找到避难所之后，他的天性和他的智慧就引领他来到了耶鲁大学，然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矿业研究生。

与此同时，谭耀勋则回到了他的寄宿家庭，康涅狄格州科尔布鲁克的卡林顿一家。在这里他像一个羽翼丰满的孩子重回家庭一样受到了欢迎，这包括在房屋和谷仓周围做一些零星的家务活。卡林顿太太在南北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她慷慨地给予了谭耀勋像亲生子女一样的情感和关爱。1880年8月24日星期二，她简单地在日记里写下“谭剪掉了他的长辫子”。<sup>[34]</sup>通过这一举动，谭耀勋斩断了他与大清帝国最后的联系。三年之后，他死于肺炎，被安葬在科尔布鲁克的卡林顿家族墓地。

1881年夏天，幼童们准备离开美国了，他们与自己的朋友和熟人做最后的告别。一个习惯了每周六与一个美国朋友一起射击的幼童，悲伤地把他一直使用的枪送给了他的伙伴，作为“友谊永存的誓言”<sup>[35]</sup>。另外一个幼童梁晟是菲利普斯学院的棒球队队长，前去拜访亨利·费林，一位马萨诸塞州商人，同时也是教育计划强有力的支持者。梁晟向费林保证，他们的分别只是暂时的，有一天他会作为中国大使回到阿莫斯特。

他信守了诺言。1903年，梁晟先生，作为中国驻美国、古巴、墨西哥和秘鲁的全权代表，和他的老朋友再次团聚。与他同行的还有七名他带来的准备进入当地学校中国幼童。他们送给费林一个银色的纪念杯，上面印着一个未受教育的中国幼童羞涩地从马车上下来的照片，另一边则印着同一个幼童在接受教育之后骄傲地站着的图像。

1905年，费林在家中欢迎四十名随后将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学生。他家中特意悬挂了清朝的黄色龙旗。在这里，作为对容闳的教育计划精神继承者的招待，梁先生对这些男孩讲述了自己二十多年之前在美

国求学的经历。在这个晚上，尽管不在现场，但他的名字却频频被提起的，就是容揆。这时的容揆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焦躁不安，成就了一份舒服而有威望的事业，他成了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的一名秘书翻译官。

不过在1881年的八月，超过一百名的容闳的学生仍旧在美国等待着归国的最后行程。特威切尔的庇护山集会教堂的家庭，在巴特利特家为幼童举办了一个告别仪式。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吴仰曾，收到在巴特利特太太请他转交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他美国期间曾在巴特利特太太家住了许多年。信中写道：

亲爱的吴太太：

我确信，你会非常高兴看到，你的小男孩已经成长为一个男子汉，并为他感到骄傲。他在美国的整个期间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非常依恋他。他在学习以及他的性格中追求的是一条正直、坚定的道路。我们感觉到他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为国家服务，并为自己和他的父母赢得尊重。我们会想念他和其他明天就将离开我们的人，并且祝福他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成功。我希望将来还能见到他，但如果不能，我们会一直为他祝福。

真诚的尊敬和祝愿，

玛格丽特·L.巴特利特

哈特福德，1881<sup>[36]</sup>

8月8日，一个在中国日历上很吉利的日子，40件行李在哈特福德庇护院街停车场外堆成一堆。在这些黑色皮革旅行箱和盒子的一侧用英文写着的“中国教育计划”的字样，以及各种用中文写的各种文字和地址。第一批长途跋涉回国的22名幼童穿着西式服装站在夏天的滚滚热浪中，等待着他们的火车，思考着不可预知的未来。一群悲伤的教育计划支持者们来送别友人，包括老同事和幼童们的同班同学们，他们都劝慰幼童们，分开只是暂时的。一手制造出这个场景的神经质的吴子登，现在彻底地被所有人所鄙视。他即将随着幼童们一起返回中国，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所有幼童们在上火车之前都被检查是否携带了武器。女士们挥舞着手绢，骄傲的清教徒绅士们尽了最大努力不表现出伤感，火车缓缓驶离了车站，载着学生们驶向尼亚加拉



瀑布，驶向旧金山。9月27日，最后一批学生们踏上了同样的西去的火车旅程，他们在上衣的纽扣孔里别着黑白相间的装饰，哀悼中国教育计划的凋亡。

幼童们在旧金山集合，当他们初到美国时，这座城市让他们如此敬畏。这些曾经对美国的文化和历史一无所知的幼童，用一场快速的比赛向当地棒球队发出了挑战。在一群习惯了种族主义者谩骂和排华立法的旁观者面前，“东方人队”在场上收获了最后一次欢呼声。梁敦彦走上投手位，左手持球，随即，“身体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扭曲，辫子在空中划出很多数学曲线”，投出很多令美国击球手不知所措的投球。<sup>[37]</sup>“东方人队”赢得了他们的最后一场比赛，随之精神也振奋了少许。容闳的学生们踏上了归国的客船。

[1] 关于百年博览会的讨论主要引自费城和百年博览会1876年5月10日至11月10日的参观手册(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1876)

[2] Centennial Exhibition Digital collection, Exhibition Facts, <http://libwww.libraryphil.a.gov/CenCol/exhibitionfax.htm>.

[3] Centennial Exhibition Digital collection, Exhibition Facts, <http://libwww.libraryphil.a.gov/CenCol/exhibitionfax.htm>.

[4] William Dean Howells, “A Sennight of the Centennial,” Atlantic Monthly 38(1876):93.

[5] Centennial Exhibition Digital collection, Machinery Hall, <http://libwww.freelibrary.org/CenCol/tours—machineryhall.htm>.

[6] 引自 Hu Jincao, Boy Students,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Beijing, China, CCTV, 2004.

[7] 引自 Hu Jincao, Boy Students, Documentary Television Series, Beijing, China, CCTV, 2004.

[8] 引自 “Young John at the Centennial,” Hartford Evening Post, August 24, 1876.

[9] 引自 Hu Jincao, Boy Students.

[10] 引自 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1909), 70.

- [11] 引自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1909), 70.
- [12] 引自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1909), 70.
- [13] Hu Jinciao, *Boy Students*.
- [14]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Introductions to the Chinese Students by the Commissioner”, *Hartford Daily Courant*, April 27, 1880.
- [15] 引自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1909), 71.
- [16] “Too Muchee She”, *Hartford Daily Times*, June 11, 1877.
- [17] 关于幼童毕业典礼及其演讲, 引自 “Hartford Public High School,” *Hartford Daily Times*, 4月18日, 1878; 以及 “The High School,” 同上, 4月20日, 1878.
- [18] 引自 William Lyon Phelps, *Autobiography, with Let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125–126. <
- [19] 引自 William Lyon Phelps, *Autobiography, with Let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125–126. <
- [20] 引自 Iris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3), 125.
- [21] 引自 Iris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3), 126.
- [22] 引自 Iris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3), 130.
- [23] 引自 Steve Courtney,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The Life and Times of Mark Twain's Closest Friend*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8), 205.
- [24] 引自 William S. McFeely, *Grant: A Biography* (New York: Norton, 1982), 474.
- [25] 引自 Courtney,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205.
- [26] 引自 Courtney,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205–206.



- [27]. 引自Courtney,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206.
- [28]. 引自Courtney,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206.
- [29]. 引自胡劲草, 《幼童》。
- [30]. 引自Courtney,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207.
- [31]. 引自Courtney,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205.
- [32]. 引自Courtney,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205.
- [33]. 引自Courtney,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148.
- [34]. Carrington Diaries, Colebrook Historical Society, Colebrook, Conn.
- [35]. 引自 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10.
- [36]. 胡劲草, 《幼童》。
- [37]. 引自 Thomas E.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United States, 1872—1881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4.

## 第三部分

## 8 狱徒

当1881年秋，载着幼童的轮船离开旧金山海湾，驶入太平洋时，他们站在甲板上，看着船的一侧缓缓消失在天际的旧金山，和另一侧翻涌的海浪与空旷的地平线。终于，距离和黄昏的阴霾笼罩了他们的视野，他们这才退回船舱休息。

尽管依旧焦虑未来，有人担心未完成的学位，有人担忧受到阔别考验的友情，但他们开始缓和下来，彼此告诉对方，他们是作为祖国最需要的人才回国的，他们是年轻聪颖的士大夫，热切愿意掌舵朝政，而且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一位幼童在写给他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校长的信中说：“我感到很宽慰，当回到祖国时，我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高贵、体面的男人。”<sup>[1]</sup>

但经过巨浪中的数天旅程，即使有这些希望，也不能使孩子们平静下来。一个不太乐观的想法涌上心头。这些有着共同奋斗经历、共同命运的孩子，从他们一到上海时起，就渐渐意识到，中国教育计划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可能会有权力、有影响，中国也可能会展开双臂欢迎他们归来。但无论他们的未来会走上哪条道路，他们都不会再聚在哈特福德一起打球、聊天，互相拍拍肩膀，以温暖的字句或一个微笑，安慰彼此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同舟共济。

而对于其中的一些人而言，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徘徊在甲板上的容良自有其悲观的理由。在康州时他正如自己的绰号“胡闹的强尼”所描述的那样，喜欢吵吵嚷嚷，又有冲劲，不太花时间去考虑自己的未来。而现在，在轮船上，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来思考他在中国的生活将会怎样了。他同容揆一样，也是容闳的侄子。他多次听到过叔叔的故事，也了解上一辈人三十年前从纽黑文回国后努力重修中文的事

迹。容良还知道叔叔在香港的英国律师那里受辱，花费多年时间努力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故事。叔叔还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而他在被帝国命令召回之时才刚刚开始他在耶鲁的学习。所有的准备都白费了——学习英语的那些年，还有求学所花的时间。他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回家能做什么？只要他从耶鲁毕业，像他的朋友詹天佑那样，他也有希望在上海或香港谋到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位。詹天佑已成了工程师，曾经从容坚定地说，他相信一回到中国就会有国外公司争着来聘他。而容良只有一张高中文凭。如果他跟朋友唐绍仪一样出生在富裕名门，那也够了。如果是这样，他就可以指望一些现成的舒适安排，找到一份即便不能充实心灵，也可以让他的钱包鼓起来的工作。但容良出身寒微，除了他有钱的叔叔；一如从前的容闳，他只能走自己的路。

至少此时在甲板上的他可以沉浸在怀旧的沉思中。在哈特福德，他作为任何聚会中的中心人物而广为人知，他也未曾落下学校功课。高中毕业时，还在著名的辩论比赛上发表获胜感言，赢得了一捧鲜花和同龄人的赞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的朋友们觉得他爱开玩笑，搞小恶作剧。他在船上还是“胡闹的强尼”，理应给大家逗乐。他们靠谈话消磨时间，他仍然是一群人注意的中心。

船在日本的横滨稍作停留。几天后，有人喊道，已经可以远远地看到上海了。容良冲到甲板上，他看到了中国——他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离开了祖国，他的父母兄弟一定还在那里盼着他回来。他一时间忘记了忧愁，他要让家人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受过教育的、有责任感的、成熟的人。其他的学生也都从船舱跑到甲板上。这是幼童们第一次回家。

船穿过港口的浅水带时，孩子们的笑声消失了。很明显，迎接他们的不是他们的家人，而是密集的警察方阵。他们要求学生下船后快速去取他们的行李。幼童们才踏上中国的土地十几、二十步，就有一群清兵过来包围了他们。这位“阴郁的回家宴会”的队长平静、简单地告诉他们，全都列队去附近的一个地方，他指的是“问讯处”。

事实上，这个机构是当地的警察局，一座白色的、狭窄的、光线暗淡的建筑，它的装饰会让人觉得，每一栋建筑唯一的目的是阻碍毗邻建筑的发展。孩子们后来才知道，这栋楼已经关了十年，腐烂的

海腥味冲击着他们的鼻孔。队长指示他的手下把这些客人——用这一词以示他们不是囚犯——分成几个小组，每一组住进一个刚刚能容下他们的小房间。

孩子们在惊愕的沉寂中服从了指示。尽管他们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时间练习中文，但没有几个人有足够的信心与能力用母语去跟这些士兵理论。一两个人去试了试，但是很快意识到，在新英格兰待了近十年之后，即便说出的中文句子语法都没错，但听上去仍然是洋人强调，不自然、不恰当。他们只好互相轻轻用英语交谈，既紧张又疑惑，努力想弄清楚他们为何被监禁。容良对自己的发音有所自觉。正如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注意到他的英语单词发音与他在耶鲁的朋友和老师如此地相似，带着平静而抑扬顿挫的感觉(weathered and pitted texture)，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蹦出来，不断地卷舌头发出“er”的音。他们谈的更多是监狱，多是猜测。几个小时之后，话少了。夜晚降临，孩子们在疲倦中进入沉寂，努力睡着。但这可不容易，因为他们的床只是搭在摇摇晃晃的凳子上的木板。

第二天早晨，他们回到中国的第二天，容良和他的朋友们被狱卒的高叫声吵醒了，这些人敲着狱房的栏杆，让孩子们准备接受审讯。他们三四个人一群，出了牢房，被带到了一个小小的发了霉的办公室，在这里，队长和几个其他的官员开始问他们问题。他们问，为何在美国待这么长的时间？为何没有早点儿回来？他们是不是还忠于皇上？

这些孩子们在震惊之下给出了近乎一致的解释。他们告诉这些冷峻的审判官，他们是被官方派出，去向西方学习的，是为了学习西方的知识为中国所用。他们的督导是清廷派驻美国的特使。他们越来越沮丧，反复发誓他们除了皇上之外没有任何效忠的对象。但是无论他们说什么，似乎都无法让这些官员相信，甚至容良也无法说服这些官员。作为一个老练的演说者，他想象着自己是在与哈特福德中学的朋友们辩论，发表简短而雄辩的陈词，尽力使其听起来既有道理又尊敬对方。他也被无理地打断了，让他坐下，继续回答那些同样毫无意义的问题。尽管容良和他的朋友都努力去配合、适应，但是谁都不能说出处在他们那个位置上最希望说出的流利的中文。相反，他们结结巴巴，时不时停下来，为自己没有交流能力而感到沮丧，要不就是突然脱口说出整句的英文，这些审问人都听不懂。意识到自己的回答不能

产生期待的效果，他们倍感泄气。容良后来给美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感到“难过而又困惑。从未想到会遭受如此的屈辱，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2]

这些官员不停地问，而孩子们也越来越生气。容良发怒了，他很快进入了熟悉的“胡闹的强尼”的角色。他满口英文，不再努力让那些逮捕他们的人理解究竟什么意思。审判官惊呆了，心想他大概是个疯子，要不就是桀骜不逊，或者两者兼有。他们茫然地看着他，不再重复那些问题了。眼前这个人，也许是个傻瓜，脑子不够用，没有能力为他这种放肆的行为负责。片刻之后，审判官莫名其妙地跟容良说谢谢，然后命令狱卒把他带回房间。

困惑、愤怒和恐惧中，几位幼童开始给美国的友人写信，以此获得安慰。“轻快的杰克”黄开甲给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家庭写信说：“这座监狱里充斥着污秽与57种不同的臭味，你们西方人的想象太过美好，很难想象这所谓的‘机构’是个怎样恶劣的地方。你们或许读到过土耳其的监狱或是者安德森维尔的恐怖(Andersonville horrors)，但与这里相比，那也一定是令人羡慕的地方。”[3]

容良被监狱的腐败所震惊。他在给美国朋友写信中痛苦地抱怨：“我们的食物太差了，给猪吃都不配。我们抓住了那个负责食物的人，因为得知他从我们的食物补贴里抽走了50%，厨师又拿走了剩余的一半，所以事实上用于我们食物的只有25%，相当于一天5美分，既包括食物还包括烹饪所需的燃料。”[4]幼童们能做的只有闭上眼睛想象康涅狄格州的丰富食物。一个学生闷闷不乐地写道：“我们像得了怀乡病一样止不住地想念美国。”[5]

这些信件寄回到新英格兰的幼童朋友们手中时，幼童遭受虐待的原因很快引起了热衷于夸张叙事的媒体的注意。1882年1月9日，《哈特福德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霍普金斯文法学校的毕业生周传谏因与他的康涅狄格州情人玛丽·舍曼鱼雁传情，在香港被砍头处决。兴奋的媒体并不去管，香港是由英国统治的，而这样的处决又是多么难以令人置信。[6]

经过几天无聊的审讯之后，他们终于放过了这些幼童，不过在释放他们之前，那个带他们去问讯处的队长又在士兵的簇拥下，把他们



带到了当地的一个衙门，让他们在那里行跪拜礼，以示对清王朝的效忠。在这个简短而含有屈辱意味的仪式过后，让他们各自回家。在将近十年稳定、亲密的陪伴之后，这个群体被迫解散了。士兵们不耐烦地看着他们，他们甚至来不及进行体面的告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曾经紧密团结的群体，被分成一个个独立的个人，每个人都垂着头，回到自己的村庄。“轻快的杰克”黄开甲给一位美国朋友写信说：“唉，我跟这么长久的朋友分开，甚至没有机会话别，我们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再相见。”<sup>[7]</sup>比起在港口所受的羞辱，比起在警察局所受的折磨和官府里的跪拜，这一突如其来的分离更加让容良难过。看着朋友们各奔东西，他感到一种被剥夺了所有精力和希望的疲惫，那天他的日记写得很简单：“孤单。”

终于回到家中之后，他受到了很多兴奋的亲戚的迎接，不断地问他在国外的经历，主要是日常生活的琐事。一位亲戚问，美国人吃什么？另一位则问，他们一般几点起床？他们为何穿着如此奇怪的衣服？容良耐心地回答了他们所有问题，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康涅狄格州的故事，也不回避添枝加叶让他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他说，美国人都是饕餮之徒。如果每顿饭不吃上几品脱冰淇淋和十几个水果馅饼，再喝点琥珀色的麦芽酒，喝得胃里咕咕叫、脑袋也晕乎乎，一顿饭就不算吃完。当然，所有的这些食物都需要完全消化，因此美国人睡得很多，有时甚至要到晌午才起来。他由此总结说，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何如此穿着，如果一个人需要快速起床冲向田地、工厂或办公室的话，谁有时间去整理丝质长袍和精致的浅底鞋呢？容良的亲戚们惊讶又赞叹，不断给他倒茶添菜。

回家的欢迎场景持续了几天，然后亲戚们各自回家了，父母也去工作了，年幼的兄弟姐妹回到学校上学，留下他一人在家里，没什么方向。几天后，他得知将会收到当地官府的通知，告知新的职务和进一步指示。他于是坐在屋外，日复一日地盼着信来。

当信终于到来之后，容良吃了一惊。他奉命立刻去福州的船政学堂报到，接受海员训练。他垂头丧气。在海军里他只能听到上级不耐烦地用中文冲着他喊各种他听不懂的口令。最糟的是，他是“胡闹的强尼”，蔑视权威，对纪律严格的军旅生活毫无准备。

当天晚上，他尽量掩饰着他的失望，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父母。第二天一大早，他启程前往福州。容良感觉他很不适应中国的生活，这一点并非他一人如此。几年后一位参与中国教育计划的学生以第三人称回忆道：“一天，作者穿着地道的中式服装走过一个村庄，没跟任何人说话。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很多男孩在身后盯着他，喊着‘番鬼’。他很疑惑，后来问他的朋友为什么是这样。那位朋友大笑着回答‘因为你男子气的装束与走路的风格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8]

容良到了船政学堂，他发觉那里的恐怖情形果然不出所料，一排排数不尽的平房，空旷、泥泞、破败的训练场，砖砌的低矮岗楼受到风雨和苔藓的侵蚀。那里跟耶鲁完全不一样。

容良一开始很厌恶新的环境。他在日记中写道，船政学堂“黑暗而又无趣”。他一说中文，就觉得他的中文听起来残缺而生硬，所以大都一个人待着，成为其他人眼中的怪人。然而不久，其他留美幼童也一个接一个地来到福州：邝咏钟、薛有福、杨兆楠，还有矮胖的黄季良。这五个年轻人在一起利用闲暇时间在福州创造了一种与哈特福德相似的生活。他们在远处官员视线外的空地建了一个代用的棒球场，将竹片扎在一起当作临时的垒，砍下一块朽烂的大厚板削成仿制的棒球拍，又把粗绳子紧紧扎在一起——这是孩子们能做到的最接近棒球的东西了。这五个人赤裸上身，光着脚，晕头转向地，把时间花在投球、击球和全速奔跑上，他们用英文聊天，彼此称呼对方的绰号。在艰难的时候，他们会用以前高兴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来相互安慰：“很好，老兄，放松点儿！”

他们身在船政学堂，每天必须接受几个小时的海事训练，主要包括登上当地海军支队的11艘船舶，平安地出航。让他们烦闷的是，他们被分到了不同的船上。上级已经开始注意他们，带着不信任，盯着他们的外国习惯和奇怪的对话，心想最好把他们分开。容良并不太在意这些。与他回国时乘坐的大商船不同，他现在服役的这艘木船既小又亲切，他喜欢爬到甲板上一连几小时在晨曦中眺望福州的海岸线。那景色美极了：小小的破旧舰队停靠在“宝塔地”(Pagoda Anchorage)，面对一座陡峭的梯形小山，山上种着几棵橡胶树。山脚下是一座石头砌成的二层楼房，那是福州机器制造局，是几十年前一位法国工程师为了向当地总督表明法国对中国的善意而修建的。

与中国人分享这一水域的，还有一支由八艘军舰构成的法国海军分遣队，他们已经在福州港口停留了几个月。容良的同事呆呆地看着这些全副武装的欧洲军舰，这些钢铁的大毒蛇戒备森严，行动异常迅速。中国帆船在海湾游弋一周的时间，这些法国军舰可以走三次。

看着这些法国船只轻快地驶过，容良深感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从未想过攻击福州的中国舰队，如果他们真想这样做的话，他们应该早就找到了合适的时机。然而那些法国大炮仍是个可怕的预兆。他沮丧地把视线移开。

1884年8月23日的清晨，容良在“建胜”号(Chien Sheng)上装载弹药。这支小船有它的魅力，它轻便快捷，可以自如地进出于海湾的各个港口，让船员们饱览了壮丽的景色。这艘船上只配备了来复枪供船员做防卫之用，在福州海军队伍里算不上起眼。而它的双胞胎“福胜”号(Fu Sheng)则从不会离开基地太远，其他的船只出海进行漫长而艰险的巡逻任务，它的船员常常只能看着。人们觉得其他船上的船员更能干和可靠，而“福胜”号和“建胜”号的船员则迟钝而不称职，配不上他们的制服。不过容良依然不在乎。他在哈特福德时别人总把他看成一个没心没肺的喜欢逗乐的小丑。在福州他意识到，没有威信转换成了简单、平静的生活。他从未想象过在海军有什么严肃的未来，对他的现在再满意不过了。他给一位美国朋友写信，谈到“海水让我觉得舒缓，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很满意。”

早晨八点多钟，船出海了。容良想着，这个下午又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在将就着用的球场上打棒球了。他心不在焉地跑到甲板下面去处理琐事，干了不到一个小时后，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撕裂了轮船，将他震到地板上。

容良跳起来爬上楼梯，冲上甲板。海湾对面，八艘法国军舰迅速地向海湾驶来。远处，舰队里仅有的两艘武装船只——“扬武”号与“福星”号都着火了，船体被炮火轰开，船员站在船边上，他们远离陆地，不得不在着火的船与海水之间选择。

容良不知能做什么，只好大喊：“我们被袭击了！”他拼命地大喊：“我们被袭击了！”

下一艘遭到袭击的船是与“建胜”号并排的“福波”号。法国的火力网把它炸成了碎片，燃起大火。透过硝烟和浓雾，容良清楚地看到他那位不会犯错的矮胖的老朋友黄季良的身影，他的后背和头发都已经烧着了，正在拼命地灭火。容良试图大叫，但发不出声音。黄季良痛苦地挣扎了一会儿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跳入海中。容良仍旧说不出话。他跑到船的围栏处，忘记了身边的战斗。他的眼睛搜寻着两艘船之间的小片海面，希望看到他的朋友重新露面。可他什么也没看到。黄季良离开了。

容良发出一声悲惨的吼叫。他跑到甲板下方，拿起一支枪，把枪架在围栏上，向法国船只徒劳地射击。这些外国的入侵者将落后的中国船只炸成一堆碎片，在水面上无助地漂泊。容良神情恍惚，黄季良在最后时刻备受折磨的身影反复出现在他脑海中，遥远而又痛苦。他想哭、想吐。但更重要的是，在多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写道，他要报仇。

一颗炮弹打到了容良这条船的火药仓，那里离他平时的岗位只有几英尺远，几分钟前他还站在那里执行任务。船的中间部位爆炸了，烧焦的木头与人肉迸向四方。“建胜”号身受重创，开始下沉。

容良看看周围，想在破碎的船身中稳住自己，再次拿起枪，愤怒地冲着盛气凌人的法国人开枪，直到脚下的木板完全浸入水中，爆炸激起的海浪冲向他，卷走了他的枪。容良的肺中全是海水。他挥舞着双臂，在水中挣扎，猛烈地咳嗽，尽力让自己浮起来。爆炸在继续，散落的碎片洒在海面上。他的周围满是燃烧的木板、碎枪管、扯开的帆布，更不用说各种残肢断腿的士兵。他们被炮弹震到空中，又落到水里，海面上布满了可怕的船只残骸和海员的尸体。他发现自己正在流血，盛怒中的他忘记自己受了伤。如果他不赶快上岸，他就会死。

他竭尽全力向岸边游去，现在他可以看到福州的情形并没有比这些保护它的船只好到哪儿去：只要有军火库的地方就是一片瓦砾。小山上的橡胶树在缓缓燃烧，冒出一柱柱黑烟。他所能看到的福州内陆则处在一片火海之中。

大约十五分钟以后，容良游到了岸边。他一上岸就平躺在地上，用冰凉的泥土舒缓他的伤口。然后很快察看了一下全身，发现自己已

经遍体鳞伤。这幅情景让他觉得恶心。他闭上双眼，按住伤口，做了一个深呼吸。他告诉自己状况没那么糟。他没有像黄季良那样死去。他到了岸边，现在所能做的只是躺在泥里，等待着一切结束。

然而很快，两枚炮弹飕飕地从他头上掠过，把他右边十或十五尺开外的一块岩石炸得粉碎。碎石像冰雹一样从天而降，有一些嵌入了他的右臂，还有一块击痛了他的脸颊。又来了一次爆炸，将容良裹在一层厚厚的烂泥中。他又需要赶快离开了。

但是挪动并不容易。他光着脚，地上满是瓦砾碎石。他试着跑，但每一步都在脚上留下深深的划痕。他尽全力快走，但他很快开始觉得头晕目眩。他看看脚下，发现左脚上有一道深长的切口。他留了很多血。在远处他看到一个小房子，那是船政学堂主要用作士兵们巡查时作短暂休息的，于是他用尽全身力气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那个小小的、空着的房子。他撕下一小块上衣，紧紧地包住左脚。接下来没有仗要他打了，他已经精疲力竭，沉沉地睡去了。

在此后的一生中，他在采访时，都将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早晨他被饿醒了，他的小腹刺痛。他慢慢坐起来，仍然很痛，但好像不再流血了。他也没找到其他致命的伤口。他往手里吐口唾沫，往脸上擦了擦，抹去脸上的泥土、灰烟和血污。他拿地上的一根木头当作拐杖，缓缓站起身来，困难地呼吸着，咒骂着。他首先要做的是找些吃的。

容良离开小房子，沿着闽江江畔缓缓行走。他闻到一股烧焦的恶臭，比他之前闻到过的所有气味都更难闻。到处都是尸体，曝晒在夏日的阳光下，到处都在燃烧，能烧的都烧了。他在近旁的一棵树根处——那里竟没有着火——发现三个士兵搭了炉灶正在做饭。他走过去，没问是不是允许，就把他肮脏的手指伸到锅里，抓了一把滚烫的半生不熟的米饭，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然后，又昏倒了。

待他再次恢复意识时，天已经黑了。兵也不见了，米也不见了。他靠在树上，全身疼痛，头也很痛。他再次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早晨，太阳高高升起时，他醒来了，满身是汗，但感觉比前一天好多了。他可以自己站起来，走路也容易多了。他继续沿着江畔走，发现四分之一里开外有一群穿着制服的人站在路上，急忙赶过



去看他们在做什么。他很快意识到，这群人是从城里出来寻找宝塔地之役幸存者的。一个男孩把他扶上停泊在附近的小船，他躺在船底，周围都是伤患，彼此互相诉说着在法国轰炸时他们在哪儿，从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在船上，很多事情清晰起来。身材魁梧的船长告诉容良和其他人，这次袭击是法国水师提督孤拔 (Admiral Courbet) 为几天前在越南中法军队的一次混战所采取的报复行动。船长把头沉得低低地，说所有在福州的中国船只都被毁了，有796名中国船员丧生，数百人受伤。而法国伤亡人数不超过一打，没有船只损失。

容良再次怒火中烧，和他在目睹黄季良的痛苦阵亡时同样的愤怒。然而他若想为朋友报仇，就要有一个具体、可行的计划。他忘了在得知被分配到船政学堂时的疑虑，所有其他的追求也都烟消云散。他要报仇！小船沿着海湾驶向城里，他开始策划。他会先到海军总部稍作停留，领回欠下的薪饷，补充生活必需品，然后回到学堂，重新加入战斗。他不再会去打棒球，四处开玩笑，而要把所有时间用在训练上，期待着与侵略者面对面较量的机会。

小船在福州的民用港口停了下来，受伤的人们很不情愿地、步履蹒跚地走上岸。容良发现，这些当地人既疑惑而又恐惧。地方官员因为失败害怕朝廷恼怒降罪，已经逃离了城市。容良从商店里的男人和田间妇女的脸上看到了焦虑和恐惧。他从未见过这种情景，种种失败和逆来顺受的沮丧景象让他深感羞耻。

尽管他努力尝试不去比较——相反，尽力把愤怒集中到法国人身上，但还是很自然地去想象，倘若哈特福德或纽黑文遭遇如此袭击，他的美国朋友会怎么做。他的教授曾经讲过美国内战中的这类故事，一些战役摧毁了整个城镇，但是无法挫伤居民的精神。为何福州人不能这样？为什么他们没有表现出决心、坚毅与自尊？然而事实在于，那些人是残暴攻击的受害者。想象他们在同样的条件下与别人的异同，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容良走过海军指挥中心的大门，他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不是美国人，他要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海军总部里面比大街上更加嘈杂。一些官员坐在桌旁，神色紧张，还有一些人在走廊里跑上跑下，无的放矢地咆哮。地板脏兮兮

的，主楼角落的废纸篓里压着几张皱皱巴巴的地图。容良走过混乱的人群，来到一张有两个人小桌前，这里是福州海军的财务处。容良恭敬地为在这样的时候来要钱这么俗的事表示歉意，但又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所有财物也都在攻击中被毁了，接连的火灾烧毁了多数兵营。他最后说，他被欠了三个月的薪饷，共33元。

其中一位叹了口气说，“我们没钱”。

容良勃然大怒。他愤怒地站在那里，盯着那个财务人员，那人也盯着他。然后，那个人打开一个抽屉，拿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大概有3元，和缓地推到容良面前。

他声音小小的，小到几乎听不到：“我们现在只有这么多。”

此人端庄的态度打动了容良，他意识到这个人并不是中饱私囊的腐败官吏，而是一位恐惧地面对他无法控制的危机的无力官员。那三元也确实是这个曾经强大的军库所能拿出的仅有资金。他拿了钱，走到街上，一贫如洗。

没有钱，他就必须得尽早回营地去，因为他在福州不认识任何人，也只能养活自己几天。在回到船政学堂报到之前，他应该先花这三块钱买点吃的、茶，还有其他必需品。不过在他去杂货铺的路上，他看到了一家裁缝铺。容良走了进去。这是回到中国以后，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必须要做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穿着崭新的蓝色衣服，跟他作为一名新生进入耶鲁时所穿的那件很像。裁缝还卖给他一双便宜的棕色皮鞋，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这套衣裳只给他留下15分钱。但是当他再次回到街上时，感觉自己强壮而有尊严，一如教授讲过的不屈服的美国精神和战火下的优雅。也许正是同样的精神，曾引领中国传奇的帝王以智取胜打败他们的敌人，争得荣誉。容良现在穿着新衣，带着从美国学到的勤勉精神，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再上战场了。他想，有着这样的精神财富的人，没有什么能阻挡他。

带着超凡的自信，容良走进了海军大楼，找到一个很高层的官员。他告诉那个人，他是福州战役的幸存者，他愿意回到基地去指挥。那位将领耸了耸肩。他告诉容良那场战争中死了很多人，拥有如

此坚定信念的人都值得被信赖。他随便说了几句，将容良提拔为舰长，冷静地叫他回到福州船政学堂，指挥他的新部下，包括其他的幸存者和新兵，因为新兵入伍不久，法国人炮击时还没有出海。

黄昏时分，容良回到了船政学堂。他没有在意学堂的破败，而是要求手下的人——二三十个疲劳、饥饿、忧心忡忡的船员跟他一起，来到他认为最舒服的地方——临时棒球场。他在那里做了一个讲演。他讲到了骄傲与责任，荣誉与国家，男子汉与他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他告诉这些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他们保护这片海域的能力，以及向西方国家展示，任何入侵或征服的尝试都会面临水深火热的命运。如果他们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抛弃积习、恐惧、消极和过时的战术。他们必须像一个现代人一样去战斗。

[1] 匿名，康涅狄格历史社会档案，康州，哈特福德。

[2] 容良，日期和接收者不明，康涅狄格历史社会档案，康州，哈特福德。

[3] 黄开甲写给Fannie Bartlett的信，康涅狄格历史社会档案，康州，哈特福德。

[4] 容良，日期和接收者不明，康涅狄格历史社会档案，康州，哈特福德。

[5] 匿名，康涅狄格历史社会档案，康州，哈特福德。

[6] “Chinese Custom”，Hartford Evening Post, January 9, 1882.

[7] 黄开甲写给Fannie Bartlett的信，1882年1月28日，康涅狄格历史社会档案，康州，哈特福德。

[8] 引自George Rogers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Excursions to China in U.S.Culture , 1776—187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302.

## 9 一只大水母<sup>[1]</sup>

如果能目睹自己的朋友容良从有趣的“胡闹的强尼”变成坚定的海军司令官，唐绍仪很可能会笑出来。这二人在哈特福德时像国王与小丑一样形影不离，在时间安排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待在一起。他们都精力充沛，并且完全赞同美国理想，而运动场正是建立这种理想认同的最佳场所。为了证明自己是男子汉，他们除了打棒球外，还一起打拳击、在附近的郊外骑马，用来复枪对着瓶子和树木射击。如今，容良可以将所有这些训练都用到自己军旅生涯中，而唐绍仪的命运则截然不同。

教育计划终止后，唐绍仪回到了家里，烦闷不安，他意识到自己天之骄子的梦想也许永远无法实现了。更糟糕的是，在康涅狄格州时， he 可以与任何令人愉快的朋友在一起，但是现在 he 只有表兄梁如浩，就是讨厌的“冷血查理”陪伴。和大多数同伴不同，这两个男孩得益于其富有的家族而免于遭受被归到卑贱者行列的羞辱。他们在父亲家中百无聊赖地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一面打发日子，一面等待着朝廷的指示。

意识到保守的清廷不会容忍幼童们美国化的行为方式，唐氏家族立刻对唐绍仪和梁如浩展开了中国传统的再教育。他们的逻辑是，如果这些男孩不能成为他们原本想成为的受过西方教育的改革家，那么就要让他们接受儒家传统。回家后不久，唐绍仪就迎娶了邻近家族的女儿。没过多久，他和梁如浩都被派到了首尔，这个中国新任外交官的检验场。

当时的首尔，在中日争端中占有突出地位。数百年来中国一直将朝鲜<sup>[2]</sup>视为近乎自己帝国的一部分，尽管这一看法并不为朝鲜人所认

可，但是在明朝统治初期朝鲜人也没有对此表示过抗议。自清朝以来，大清宣称自己是“天朝上国”，而朝鲜却斥其为“野蛮的满洲”，中国和朝鲜就渐行渐远。朝鲜宣布成为独立帝国，实行自治，成了“隐士王国”，不对一切阴谋家开放。但是，乘着西方坚船利炮而来的不友好的访客成功地说服朝鲜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并且不情愿地向中国寻求保护。这让清朝很是高兴：虽然海岸屡次遭受猛攻，被迫签订了割地条约，但中国仍然可以宣称朝鲜在其势力和影响的庇护之下，中国仍旧是这座东方半岛上毫无阻拦的最高统治者。另外，在朝鲜展现中国的实力可以给日本传递强有力的信息。中国存在着普遍的仇日情绪，日本人被称为“倭人”或者矮子。中国认为朝鲜是大清帝国可以彻底击败倭人的战场。李鸿章曾捕捉到中国对朝政策的主导情绪，他在日记里写道：“这几百年来朝鲜几乎没有过像样的贡品，一直处于独立状态，并且憎恨大清的势力或利益。但一旦本国或者外来的危险浮现出来，朝鲜都会向我们乞求帮助。这些请求从未被拒绝过，因为朝鲜的人民就是我们的子民，他们和我们一样，对矮小的日本人怀着永恒的厌恶，厌恶那些趾高气扬、胆大妄为的日本人。” [3]

唐绍仪坐上开往朝鲜的船，准备开启他仕途的新生活，正当他在船上漫步时，身旁帆布下面发出的沙沙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敏捷地一把扯下帆布，发现了一名衣衫褴褛的年轻偷渡者。这个失去了藏身之地的战战兢兢的人向唐绍仪恳求道：“从你的衣着可以看出你是一名清朝官员，我求你帮助我登上任何驶向美国的船。”他吸了一口气，准备继续说下去。但是在他开口之前，唐绍仪打断了他，并且友好地伸出了手。即便对方穿着破烂的衣衫，唐绍仪也能认出这个人是与一起毕业的中国教育计划的幼童之一郑廷襄。

郑廷襄半晌才明白过来这位对他如此亲切的满大人是谁。这位大人正是在新英格兰时与自己一样酷爱打网球的唐绍仪。他不禁满心欢喜，告诉唐绍仪他希望能航行至苏门答腊岛，从那里再设法去哈特福德。他原已被分配到一所海军学校，不能再忍受做一名鱼雷手。他满脑子想的全是耶鲁，在教育计划撤销之前他正要进入耶鲁就读。他告诉唐，无论如何他必须回美国。尽管唐绍仪已经效忠朝廷，但他也不能对同窗想要回到自由舒适的康涅狄格州的愿望加以指责。怀着同情心，唐绍仪答应帮忙。轮船一抵达汉城（现更名为首尔，下文同）的码头，唐绍仪就立刻为他的朋友安排了去美国的行程，并在送别时祝



他成功。但他并没有表达自己是否想要与郑廷襄一道回到康涅狄格州。

唐绍仪、梁如浩以及其他同人在朝鲜又遇到了另一种异国风俗。在美国，他们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从格兰特总统到约瑟夫·特威切尔。这些人都是决意在自己领域有所成就、努力工作并培养自己能力的人。但是在汉城，幼童们面对的是由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塑造出来的人。从到达朝鲜首都的第一天起，唐绍仪和他的伙伴们就开始观察清朝的官僚体系以及该体系下所产生的人。在汉城与在中国一样，决心、苦干和能力受制于僵化的规则、繁文缛节以及死板的仪式。他们的上级，哪怕看上去是聪明能干的人，也经常给北京朝廷上书，并且互相保持警惕，他们已经习惯于朝廷的变幻莫测以及官场中的暗箭伤人。在美国，幼童们曾与总统交谈。而在汉城，他们对芝麻官也要毕恭毕敬。

为了将思绪从新环境中解脱出来，这些幼童们大部分闲暇时间都一起度过。蔡绍基也是身在朝鲜的中国教育计划的幼童之一，他在中学毕业时做的关于鸦片贸易的演讲曾语惊四座。还有吴仲贤，因鼻子大而起绰号为“大鼻子”。在康涅狄格州时，吴和蔡都是“东方棒球队”的活跃分子。但是在这里，他们奉命在上级宅邸的接待室中等候传唤，还要向上级鞠躬施礼。

唐绍仪的表兄梁如浩无法适应在朝鲜的生活。他仍旧是学校里的那个脾气不好的男孩，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新环境中焦躁不安。他写信给在哈特福德时一起生活的加德纳一家，表达自己的沮丧心情：

对拜访的每个高官，我们必须下跪以示尊敬……归国学生们现在要拼命工作来谋生，不得不听从上级专横的命令，为赚取微薄的酬劳而工作……最糟糕的是，官员们并没有意识到归国学生所受的压抑，仍旧坚持认为他们并没有比未出国的学生情况要好。这也许是对的，但是要知道他们的知识积累比其他学生要高得多。这些官员绝不能忍受争论，他们太愚蠢以致无法听进合理建议，太顽固不会保持公正……一个官员死后，另一个同样顽固保守的人就会上台，而且从他上任那一刻起，他就具有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合法权威了。<sup>[4]</sup>

在朝鲜的几个月中，梁如浩都非常苦闷。他的性格曾为他赢得“冷血查理”的称号，现在这种性格更为鲜明了。他追求高效率和专业精神，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放弃他对公平正义的坚持。只要看到有人得到或给予了些许特殊优待，他就会猛烈抨击。自然，这样的行为将他排除在受欢迎和有魅力的男孩圈之外，但是却为他赢得了一些老师和成年监护人的尊敬。他们惊讶于这么年轻的人能如此严肃地对待生活。

在汉城，梁如浩奉命任职于关税局，这里的贪污受贿之风由来已久。正如几十年前的容闳一样，梁如浩拒绝了同事们要求他一同收受贿赂的请求。容闳能够沉着机智地走进上级的办公室，辞去自己的职务。梁如浩与老师不同，他不想逃避困难，而是想留下并发出控诉。他极少隐瞒对同事的轻蔑。他用大量的时间狂热地给加德纳一家写信，他感到这是与充满希望的文明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他写道，“身边被丧尽道德的人包围着”，这让他感到恶心。最让他厌恶的是富有和野心勃勃的清朝官吏可以从上级那里买官加爵。对梁如浩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龌龊的勾当更能显示清朝的统治体系的堕落了。

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连连溃败，清朝统治体系内的其他人也开始有像梁如浩那样的感受。虽然梁如浩无从得知，但事实上皇帝与他的观点是相同的。天子看清了腐败的毒害之深阻碍中国的发展，使得在朝鲜或其他地方的各个职位上尽是昏聩无能的官僚。自从二十年前的自强运动开展以来，紫禁城内就有悄悄议论改革的声音。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因为政权斗争而举步维艰，政权斗争阻碍着朝廷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到19世纪90年代，清王朝已面临着无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19世纪60年代间，自强运动中改革的推动者们已经发现了帝国统治运作的症结所在。恭亲王是那些希望改革的人中最位高权重的一位。这位王爷是年仅六岁的同治皇帝的叔叔，也是他的母亲慈禧太后的的心腹。自从儿子在1861年登基之后，慈禧就一直垂帘听政，治理帝国。恭亲王是皇亲国戚，身世显赫，但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在中国传统上无法想象的位置来效忠国家。他成了总理衙门的掌权者，管理所有涉外事务。这是有史以来皇室成员第一次用传统和仪式以外的方式，为规范和促进对外贸易而工作。成立于1861年的总理衙门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外交事务局，而且恭亲王热切地从事着将国际法典

翻译成中文，以及为清朝舰船设计悬挂的旗帜等事务：旗帜的设计是黄色的旗面上有一只蜿蜒的龙，角上有一轮红色的太阳。尽管年轻时是仇外政策的支持者，但现在恭亲王却希望引导中国适当参与外部事务。在恭亲王的领导下，中国不再通过乌七八糟的地方军阀或礼部与外国人交涉，而是开始朝着中央统一的外交方式迈进。因此，当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十八岁驾崩的消息传开后，外国的外交官和商人都感到高兴，因为按照惯例恭亲王的儿子可能继位，这标志着改革派将登上帝国统治的最高峰。

皇太后则另有安排。她不会允许任何人，包括皇帝或者摄政王，代替她掌权。她开始对所有意欲夺权的家族成员展开行动。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恭亲王：他的目光瞄准了皇位，而且过去十年来一直图谋着篡位。为了威胁慈禧，他联合了想法相近的贵族，用统治着紫禁城生活的刻板仪式法典来攻击效忠慈禧的人。比如，慈禧最喜欢的太监忽视了宫廷中微不足道的细小礼仪，恭亲王就将他处决。但是边缘政策基本没人能玩得过慈禧：当恭亲王自己犯了一个违反礼仪的小错时，慈禧便说服了她在朝中庞大的阿谀奉承势力，剥夺了恭亲王的一切权力，仅允许他保留亲王头衔，但使亲王和他的家族完全丧失了权力。

解决掉恭亲王之后，慈禧转向了另一个心腹大患——她的儿媳。这个年轻的女子来自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族，而且当时正怀有上一代皇帝同治的遗腹子。如果这个胎儿是男孩，那么他就是接任皇帝的最合理人选。如果这成了真，慈禧自己的地位就会被大大削弱：她的儿媳就会取代她成为皇太后，而她则会被驱逐到颐和园去，在那里过一种奢侈但没有实权的生活。到了春天，这位年轻女子和她未出世的孩子都死了。朝廷中的一些人怀疑她是被慈禧太后本人逼迫自杀的。

等到慈禧一系列行动结束时，只剩下一个皇位的人选，这就是死去的皇帝四岁的表弟光绪。他再一次需要这位皇太后、也就是他姨母的帮助，以他的名义执政直到他成年。这个男孩的父母——也就是慈禧的妹妹和其丈夫，完全屈从于皇太后，因此慈禧这位在中国政治占有重要地位的老妇人再一次大权在握。慈禧的全部衣服放在三千个樟木箱子里，她擅长绘画、爱好文学，出于礼仪在听取男性大臣的报告时要坐在帘子后面，也就是垂帘听政。慈禧作为清朝唯一的女性统治者，要继续领导中国。

1875年光绪皇帝的登基遭到了几乎全世界的唾骂。西方人认为继续先皇坚定的仇外观点说明了皇室的人心惶惶。尽管原因与外国人大不相同，但清廷中狂热的儒教徒也对光绪登基表示不满。根据古代皇家的礼仪，皇帝最神圣的职责之一就是先皇尽孝。这就意味着，新皇帝即便不是上一代统治者的儿子，至少也要属于先皇的下一代人。但是光绪的情况并非如此：他是先皇同治的表亲，尽管年轻很多但无论如何还是属于同辈人，这就是说，他无法恰当地完成祭拜先皇的礼仪。这种对传统的侮辱是紫禁城内的许多人所无法容忍的。有一名官员在举行登基典礼的大殿外面自焚以抗议年幼的光绪加冕，还有许多满族亲王付钱给西部来的穆斯林骑手，让他们在北京的大街上骑行示威以暗示内战即将来临。在华丽的幕帘之后，慈禧正在策划她下一步的行动。

她请求有权势的朋党帮助平息酝酿中的叛乱，深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她抵御攻击，此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欣赏皇太后的野心和政见——这和他本人很相像。他是慈禧的紧密同盟，为了抗击慈禧的反对者雇用的穆斯林骑手，他派出四千名精兵保卫宫殿。很快秩序就恢复了，光绪皇帝仍然在位。

随着这个小皇帝逐渐长大成人，他证明了自己和放荡的先帝截然不同。先帝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妓院里和男人以及女人们为伴。在忠诚且有能力的学者翁同龢的指导之下，光绪成了一个严肃和有好奇心的青年，越来越对自己职位的空虚、仪式性的姿态感到焦躁。随着他越来越接近十七岁的生日，也就是他从慈禧的摄政之下独立出来的日子，他开始沉思自己对统治和改革的主张。在1889年，光绪成年，结了婚，准备取代他的姨母。为了对退位的皇太后表示尊敬，皇宫里举行了一个聚会。皇太后现在毫无选择，只能接受搬到不远的颐和园的命运。在那里的乐寿堂中，为她一日三餐的每一餐都有超过一百种不同的菜肴被烹制出来。而在此，慈禧正密谋着夺回权力。

现在专横的姨母离开了，光绪热切地开始了他的统治。但是他并不能适应一个统治者的压力。在幼年时期，他更多被看作是皇权游戏的人质而不是一个需要温暖和爱的真正的孩子，他几乎是被他的生母和姨母都抛弃的。他被那些嫉妒他和虐待他的太监们抚养长大，以至身体虚弱，精神也受到创伤，因此看起来并不健康。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加冕前不久，见到了美国驻清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并没有给

后者留下什么好的印象。田贝写道，光绪是“一个纤弱的青年……又小又瘦，看上去不会拥有强健的体魄”。据他观察，这位皇帝有黑色的大眼睛，光滑无毛的脸庞，以及“像蚊子一样细小微弱”的声音。<sup>[5]</sup>

无论他有多少弱点，光绪发誓要革除中国的种种陋习。在他将要结婚的时候，他颁布了一道旨意给中国的省级官员，警告他们如果为了筹备大婚礼物而向人民强行征赋的话，将“立即惩处”。<sup>[6]</sup>他下令将自己的日常开支减掉三分之一，但是很聪明地没有对他姨母的奢侈生活进行谴责。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从奸诈和阿谀奉承的官僚口中获取信息，而是从法文和英文书籍及报纸中获知国家的现状。

从这些渠道得到的信息让他大为吃惊：叛乱和土匪的新闻，水灾和旱灾的消息，一个又一个灾难折磨着中国，却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负起责任并以果断的行动阻止她的衰败。在此之前，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孤立于他的国家。在愤怒和慌乱之中，这位皇帝打算立刻行动。但是，他并不知道应该从哪里着手。几经考虑之后，他选定了同样也困扰着身在汉城的梁如浩的问题：废除卖官鬻爵的传统。这位皇帝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病态体制的一个症状，这就是症结之所在。它使不能胜任的候补官员被提拔，造成国家的慢性自杀。皇帝在一条圣喻中写道：官员的轮替中“挤满了平庸而又对公共服务有害的卑贱之人”。针对这一问题，光绪命令户部——朝廷的国库，立刻停止出售官衔和职位。此外，他希望大臣们通过“经常斥责无能和贪财的督抚、知州、各部官员和地方官吏”，来裁减官制中的下级官衔。<sup>[7]</sup>

人们大概会认为，这样的法令对于梁如浩、唐绍仪和其他在朝鲜效力的教育计划毕业生们很有吸引力，表达了他们对公平和秩序的渴求。但是，这条朝廷法令，并未能到达汉城。根据所有可见的记录，它甚至都没有在国内造成什么影响。因为急需钱财，又无法想到除此之外的其他财源，大臣们发现，相比于放弃卖官鬻爵所得的收入，无视君主要求更为简单一些。废除贿赂这个悠久的传统，无疑会激怒相当数量的权贵阶层。

因此，在朝鲜的梁如浩仍旧生着闷气。出于百科全书编纂者似的偏执，他开始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中国的病症。“我们没有法庭，所有事务的解决都必须求助于地方官员，”他给美国的朋友这样写道，



“在我贫穷的村子旁边，住着一个人，据说他身价150万元。这是我们一个学生的父亲……这笔巨款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一场诉讼上。最后他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因为他的对手仍旧受到地方官的庇护，他只有自杀才能躲过惩罚。” [8]

梁如浩的堂弟唐绍仪，则生活得不那么苦闷。和梁如浩不同，唐绍仪一点儿也不冷冰冰的。他一直是好学生，运动健将，一个天生的领袖。在朝鲜，他也一样处于各种事务的中心。他被分配到莫伦道夫(Möllendorff)手下任职，这是一位普鲁士贵族，因曾为李鸿章供给德国武器而得到嘉奖，获得了监督中国在朝利益的高位。唐绍仪因此过着奢侈的生活，得到上级和同僚们的尊敬，并且被委以建立朝鲜的对外事务部门的微妙工作。

但事情很快就一目了然，莫伦道夫的忠诚并不是指向李鸿章的，而是指向公平和发展的原则。在朝鲜，李鸿章希望莫伦道夫能够消灭任何地方独立的萌芽。根据李鸿章的典型逻辑，如果朝鲜建立起自己的海关系统，就会很快成为西方商人们掠夺的猎物，正如他们掠夺中国一样，而这将意味着中国影响力的终结。因此李鸿章希望，他的普鲁士部下能够将朝鲜的贸易政策严格控制在中国的框架之内。但是，莫伦道夫是哈雷大学的毕业生，那里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他坚定地信仰每个国家都有权自己做出决定，因而对李鸿章的指示越来越感到不悦。为了寻求对自己立场的支持，他与朝鲜的国王高宗走得越来越近，很快就转向了朝鲜的民族主义事业，还为自己起了个朝鲜名字——穆麟德。

盛怒之下，李鸿章命令莫伦道夫返回中国。出于服从命令的天性，莫伦道夫返回了中国大陆，在南方的港口城市宁波安顿了下来，此后余生都在中国海关机构工作，还撰写了中国历史。但是，他的离去并没能给中国在朝鲜的地位带来任何改善：日本正在竭力发展它在朝鲜半岛的商业贸易，并于1882年经过交涉，派驻了一小支军队进入朝鲜，保护日本在当地的利益。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对于日本人进驻其势力范围感到十分不安，急需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来确保朝鲜仍旧臣服于北京的控制之下。李鸿章遍搜朝廷官员的名单寻找可以取代莫伦道夫的人选，他看到了袁世凯的名字。

袁世凯的履历毋庸置疑地表明他注定要成为名将。他的家乡在河南农村，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举家迁到了山中的军营居住。他们把那个地方叫作“袁寨”。在袁寨，学习是次要的，每天的生活就在骑马、打拳和与朋友玩乐当中度过。当然，这样的追求是上流社会那些衣冠楚楚的学者和富商们所鄙视的，而且袁世凯很快也发现，军营以外的生活对他来说既没有希望也不愉快。他参加过两次科考，都失败了。仔细思考了自己的未来之后，他发现对他来说，唯一明智的选择是过穿制服的生活。军队和袁寨并没有太大不同，他毫不费力地就胜过了别人。尽管袁世凯当时只有二十五岁上下，李鸿章仍旧选择了他去钳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扩张，而这位年轻的将军果然不负众望。

1884年，袁世凯带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小型军队，轻易扑灭了一次日本人所支持的政变，将日本在汉城的公使馆烧成废墟，杀死了40名日本兵。袁世凯的行动完美地展现了他的技巧和能力。当时的美国公使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和袁世凯相识，他表达了对这位骁勇的中国将军的钦佩之情。格里菲斯写道：“他的样子十分高傲，外表给人印象深刻，行为举止非常专横。”<sup>[9]</sup>

唐绍仪同样对袁世凯充满敬畏：他以前从未见过一位具有如此非凡的军事才能而又充满自信的中国官员。他在康涅狄格州的时候，清朝的代表都是像吴子登那样肥胖或者是陈兰彬那样愚钝的人，言辞闪烁、行动猥琐，与强健的美国人相形见绌。但是他可以看出，袁世凯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一个像唐绍仪自己一样会在新英格兰的橄榄球场上如鱼得水的人。令人格外难忘的是，有着“无与伦比的埃贾克斯”之称的唐绍仪，对袁世凯怀着非凡的敬重之情。尽管这位军事将领只比他大三岁，唐绍仪却视其如父亲一般，将自己的友谊、忠诚和才能奉献给他。而袁世凯也认为他和唐绍仪可以成为绝佳的组合。唐绍仪性格温婉而袁世凯十分刚烈。唐绍仪非常雄辩，而袁世凯只擅于下达简短的军事命令。所有人都喜爱唐绍仪，而袁世凯则让众人畏惧。但最打动袁世凯的是，唐绍仪和他那些畏缩、无能的同僚不同，唐绍仪能在强压之下保持平静，渴望战斗，而且语言与行动同样敏捷。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袁世凯推荐唐绍仪作为领事人选，并在自己任职汉城期间担任他的首席顾问。

无法拒绝这位在朝鲜的英雄，李鸿章同意了，唐绍仪得到了他的第一次擢升和第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唐绍仪在袁世凯手下效力，被委以监视日本野心和保证中国在朝鲜最大利益的重任。他替袁世凯执笔写下优雅的奏折，得到了中国和朝鲜双方官员的信赖与赞同，他尽可能多地陪同袁世凯骑马出行。最后，他将自己抑郁的表兄梁如浩也从凄凉的海关办事处拯救出来，让他一起在袁世凯手下服务。但是这份委任并没有缓和梁如浩的烦闷心情，他给康涅狄格州的朋友写信说，朝鲜人对外国人十分敌视，而且既“懒惰”又“拖沓”。[\[10\]](#)

但是，朝鲜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在海的另一边，日本已经磨刀霍霍准备一战。在其策动朝鲜政变而被袁世凯镇压之后，日本要求对袁世凯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为了避免任何挑衅，清廷同意讨论这一问题，并派李鸿章前往协商。

在谈判桌的另一边，李鸿章遇到了伊藤博文。这位温和的农夫之子在日本的政治生涯开始于追随新儒家的“尊王攘夷”运动，翻译过来就是“尊敬天皇、驱逐蛮夷”。但在1863年，他成为日本天皇派去伦敦大学学院学习的五位学生之一。正如十年前的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日本的最高官员也意识到，应对外国的挑战的唯一方法就是向这些外国人学习。伊藤博文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已不再相信外国人是蛮夷，而将他们看作是聪明的种族，能给内向的日本人传授很多知识。这种信念和经验使他成了明治维新的中心人物。这是一段激进的改革时期，在短短五十年内，这个小岛国就从与世隔绝的王国变成了世界强国。出于尽快改革自己国家的渴望，伊藤博文被上级派往美国学习西方货币制度。他还在欧洲停留了至少十八个月，调查欧洲大陆的宪法体制，以便为日本自己拟定宪法提供基础文献。在1885年12月，伊藤博文将会成为他的国家的第一任首相。但是，在此前八个月，他正长途跋涉到天津，去与李鸿章见面。

中日之间的协议非常简单，两国都将在四个月内从朝鲜撤出各自的远征军。允许朝鲜国王保留第三国的军事顾问，中日两国都不会在不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向朝鲜派兵。尽管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互相都怀有敬意，但他们都明白这份其所签署的协议其实是废纸一张。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答案很快就有了。李鸿章决心要捍卫中国在朝鲜的首要地位，允许袁世凯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控制事态。袁世凯像统治自己儿时的家园袁寨一样统治着这个王国，常常违背具有改革思想的副手唐绍仪的建议。1894年，袁世凯有很多的机会动用军队镇压东学党，一个信仰太平盛世、迅速吸引了大量追随者的宗教团体。因为需要更多人手，袁世凯给在北京的官员写信要求支援。而这些官员则按照协定，将派兵的消息报告给了东京。不久，一个与日本有联系的年轻的朝鲜改革派在上海使馆区的一家日本人经营的青年旅馆里被杀。这两件事之间毫无关联，但对于日本天皇朝中的高层官员来说，却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声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也许就是李鸿章安排的，正是这个李鸿章，目前正在向汉城派兵。日本人继续宣传说，中国正在准备以武力夺取朝鲜。

东学党又一次成了完美的借口。在被袁世凯和他率领的军队镇压三个月之后，东学党又一次叛乱了。这一次，已被削弱并分裂成了民族主义、中国追随者和日本支持者这三大阵营的朝鲜政府，转而向日本求助。日本大喜过望，立即派出军队到朝鲜，不费吹灰之力就粉碎了叛乱，而后和清廷联系，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中日双方共同宣布支持朝鲜改革。

这是一个中国决不会接受的折中方案。如果朝鲜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统治体系、金融系统和军队，中国对其产生影响的时代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拒绝日本的提议，中国就会遭到穷兵黩武的指责。1894年7月12日，急切地要将其购买的欧洲舰船和枪炮投入实战的日本，指示其在汉城的公使“用一切借口”挑起事端。<sup>[11]</sup>11天之后，日本进兵汉城，抓住了朝鲜国王高宗，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后者立即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在北京，清廷发布了战争宣言：“朝鲜在过去两百多年里一直是我们的属国，一直向我们朝贡，这是全世界所熟知的……但这些倭人没有任何理由地把军队派到朝鲜而且进入了汉城……”这份声明总结道，“是将这些矮人从其藏身之地根除”的时候了。<sup>[12]</sup>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是不会输掉这场战争的。清朝有将近一百万做好准备的战士，相比于日本的二十七万人来说占有巨大优势。但是在战场上，中国军队却缺乏统一的效忠，是各路军事将领的大杂烩。而日本军队则训练得当，作战目标明确，命令传达畅通。而且，他们

大部分接受过西方顾问的训练，装备精良，为现代战争做好了准备。反观中国这一方，很多士兵在冲上战场时配备的还是弓箭。这些差异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在汉城，唐绍仪、梁如浩、蔡绍基和吴仲贤都为战斗做好了准备。他们都年轻气盛，讨厌日本人，他们在美国听着南北战争中惊心动魄的故事长大，还有勇敢的人们如何为了国家未来而放弃自己一切的故事。但是，最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有袁世凯在他们身后。他们确信，这位将军很快就会冲入战场，给日本人一点结结实实的教训。

但是战争爆发的时候，袁世凯消失了。有些人说他生病了需要治疗，还有人说他被召回北京参与磋商。唐绍仪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但是这不重要。在他最需要这位英雄的时候，他却不在场。在得不到朝廷任何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唐绍仪尽了一切可能保持冷静。他很快就明白过来，没有出色的将军领导，在朝鲜的中国军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但唐绍仪只是个文职官员，不是个战士，在前方并无他和同僚们的用武之地，于是他与他的表兄及朋友们一起，匆忙地撤退回了中国。

唐绍仪离去的时机刚刚合适。1894年9月14日，在战争刚开始不久，扎营在朝鲜北部城市平壤的中国军队得到了一条错误的情报，以为日军在一周之内都不会到。放松警惕的中国军队举行了一场传统的宴饮，整晚都在吃喝。埋伏在群山之中的日军耐心地等待着。等到清军士兵跌跌撞撞地爬上床入睡的时候，他们突然出现并发起了攻击。一个战争中幸存的中国士兵说，“我们的伙伴就像被割的野草一样一片一片地倒下了”。<sup>[13]</sup>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超过两千名中国士兵阵亡，六千余人被俘。而日本军队，只损失了189人。

海上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在这里，中国方面也有理论的优势。他们配备的是李鸿章几十年前从德国购买的现代舰船，载满了福州船政学堂和其他地方的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但是，现实再一次证明，日本的军队更有组织、更加适应现代战争。中国军队虽然拥有先进舰船，但不知道如何在战斗中正确使用它。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清朝舰队中最先进的一艘舰船“广甲”号——指挥是中国幼童吴敬荣，据说在战争爆发前几天，它不是在备战，而是在执行为慈禧太后运送新鲜荔枝的任务。9月17日，在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上进行的战斗



中，日本摧毁了中国五艘舰艇，杀死了至少八百名中国士兵。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日军横扫朝鲜并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又占领了重要的战略港口旅顺港。在那里目睹了被割掉耳鼻的同伙尸体后，日军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不论是中国士兵还是平民，日本人一律用刺刀刺穿腹部然后砍下头颅，不分性别地将男女一样赶到湖中淹死，或把他们绑在一起用枪扫射，用刺刀刺杀，并挖出他们的眼睛，残暴之极。

《纽约世界报》的通讯记者写道：“手无寸铁、无力抵抗的居民们在自己的家中被屠杀，他们的尸体支离破碎，惨状无以言表。”

“毫无节制的屠杀持续了三天，整个城市被令人震惊的残暴掠夺。”日本人平静地回应这篇报道说，尽管杀害平民并非日本的目的，但军人们“怀着对于敌人杀害自己伙伴的怒火”，因此激发了“不带任何偏见的报复”。<sup>[14]</sup>

到了1895年年初，日本的胜利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了。1月20日那天，气温降到了华氏零下14度，两支敌对的军队在山东威海卫相遇了。中国海军指挥官蔡廷干带领着一支由鱼雷艇组成的小舰队在海上提供支援。蔡廷干正是二十多年前新英格兰那位“中国斗士”，曾被他的美国老师认为不守规矩、不胜任任何严肃的岗位，而派去新英格兰的机械商店工作。但是，这位美国老师看错了。虽然蔡廷干不能像他安静的伙伴们一样，坐在桌前没完没了地用功，但他既有才华又有纪律。他需要的只是用一种方法将其精力和好斗天性引向一个有建设性的目标而已。海军正好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不像他的朋友“胡闹的强尼”，蔡廷干一开始就在海军服务。到了1884年，也就是回国的三年后，他已经被提升为海军上尉。鱼雷艇，最适合他的性格。就像蔡廷干本人一样，鱼雷艇貌不惊人，却能够击毁比它大得多的船只。冒着严寒，蔡廷干已经准备好战斗了。

这一天率领中国海军的是舰队司令丁汝昌，日本舰队的司令是伊东佑亨。虽然自信会取得胜利，但伊东佑亨并不盼望开战：中国对手是他的一个老朋友。在一封写给丁汝昌的充满感情的信中，伊东佑亨对双方必须要在如此难堪的情境下再次相见感到十分抱歉，接下来他向老朋友游说道，清朝的政治大逆不道，从长远上来说，中国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改变方向。伊东佑亨写道，没有必要流血牺牲，只要丁汝昌投降，日本会善待他和他的人，将他们护送到日本，

作为受尊敬的客人，直到战争结束。丁汝昌当然必须拒绝伊东佑亨。他不可能把整个舰队都带到异国他乡安居。

在一旁注视着即将爆发的战争的是容良。这位“胡闹的强尼”已经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舰长，统帅自己的军舰。想到日渐迫近的战败，他和同僚们一样感到心烦意乱。带着忧虑，他观察着丁汝昌的一举一动。这位舰队司令起草了一份投降的文件，要求所有中国军人获准不受到伤害地撤离。接着，丁汝昌确定了他给伊东佑亨的回信。“我非常感谢司令的友谊，”他写道，“但是我不能放弃我对国家的职责。现在唯一需要我做的就是去死。”<sup>[15]</sup>接下来，他叫来6个木匠，命令他们为自己打一口棺材。棺材在第二天早上就造好了，丁汝昌爬进棺材，左右翻身以确保它适合他的身材。然后，他给了每个木匠两个银元的小费，与容良和他率领的其他官员告别，然后退到自己的内室，在那里服下了致命剂量的毒药。<sup>[16]</sup>容良、蔡廷干和丁的其他部下都不知如何反应是好。一方面来说，这位司令的死，以其传统的殉职的光荣，对他们是一种鼓舞。另一方面，这样的做法于事无补，只是对尊严的无用的追逐，相反，如果能冷静、理智地去思考策略，也许会对战局产生更有利的效果。但是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场战争必败无疑。伊东佑亨司令抓获了所有的中国舰船，但是允许战败的对手保留一只小舢板，将丁汝昌的尸体运送回北京。当舢板驶过时，伊东佑亨命令自己的部下对这位陨落的敌人致敬。<sup>[17]</sup>

北京方面最初极力掩饰失败的程度，甚至在战斗刚开始时宣称取得了胜利。但是很快清朝就别无选择，只能承认失败。按照传统，皇帝不能承担失败的责任，必须要找到一位替罪羊。没有人比李鸿章更适合扮演这个令人遗憾的角色了，正是他一手缔造了如今已经一败涂地的中国海军。李鸿章被剥夺了所有的官衔，罢黜了所有的职位，在一个又一个的纪念仪式上遭到痛骂。一个当时的官员写道：“他的名字在中国已经臭名昭著。”<sup>[18]</sup>

但是当日军节节胜利，夺取了一个又一个前沿阵地的时候，清廷大概又想起了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时期的英勇，恢复了这位受侮辱的官员的职位，命令他去与日本人谈判，结束这场战争。根据统治着中国的这种令人费解的逻辑，这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位屈辱的政治家能够成功地结束冲突，那么皇帝宽恕他的罪责则是有远见卓识的明君。如果李鸿章失败了，那么这只是他一个人的失败。

又一次，李鸿章启程去见伊藤博文。这一次是在东京。伊藤用英语讲话，李鸿章则需要翻译。李鸿章用尽一切努力挽回面子，提出了一个中日联合对抗西方国家的建议，伊藤博文拒绝了。李鸿章又提出休战，但是，在伊藤博文回答之前，一个精神错乱的年轻人突然闯进房间，拔出一支左轮手枪，射中了李鸿章。一颗子弹嵌入李的鼻子下面，这位年长的中国领袖晕倒了。日本天皇尴尬地为这起暴力袭击事件道歉，并派出御医来照料受伤的李鸿章。李鸿章活了下来，但他过于虚弱，无法再继续谈判，于是他的儿子接替了他在谈判桌上的位置。1895年4月1日，中国接受了日本的条件，战争结束了。

但是，和平并没有带来喜悦。清廷为休战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同意不再进入朝鲜，放弃辽东半岛和澎湖列岛，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而且还要支付数额相当于朝廷一年预算的赔款。但是，比起财产和领土的损失，遭受最大打击的则是中国的尊严。光绪皇帝为此发布了一道诏书，解释中国的失败，他说：“我们对于休战条约的反复思虑，无以言表，上天已经显示征兆，海洋泛滥溢出海岸，淹没军营。我们为制定或攻或防的战略而饱受折磨，白天苦思冥想，夜晚战栗不能安眠。久经考虑之后，我们决定了这样的道路，希望文武百官和百姓们能体恤我们的难处。”《纽约时报》完整地刊载了这位皇帝的话，题为“一份悲惨的昭告”。<sup>[19]</sup>参与了这场战争的中国教育计划毕业生们对光绪的诏书可谓感同身受。容良辞去了舰长职务，尽管他的仕途正在发展而且很快就会升为司令，但是蹒跚的海军没有能力给他一个光明的未来。在法国袭击福州的时候他满怀爱国热情，而今这场劫难之后，他已经心灰意冷。凭借着流利的英语技能，他先是在广东的美国领事馆做翻译官，之后又接受了一份更赚钱的工作，在女子学校里教英语。

与此同时，蔡廷干和他的整支舰队都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直到战争结束一年之后才返回故乡。回来之后又受到指控，说他被捕是一场骗局，他是自愿投降的，将自己的技能和舰队都出卖给了敌人。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叛国，但仍然被判为行为不检，蔡廷干被降职了。与他的美国绰号“中国斗士”相符，他发誓要斗争到底，直到他的军衔和名誉都被恢复。

比中国的战败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日本的胜利了。尽管日本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归还了一部分所得——俄国人尤其对日本的疾速发



展感到担忧，并且想方设法限制其扩张——但太阳旗之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强权在世界崭露头角。而中国则被上海的英国报纸描述为仅仅是一只大水母（直译为“一只大水母”<sup>[20]</sup>）。

这样的措辞刺痛了唐绍仪。他回到中国之后，既无官位，又无权势可以倚仗，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疾病和痛苦让他转向了毒品。他从前就尝试过鸦片，现在更加频繁地吸食起来。

当这次失败打击了“胡闹的强尼”和曾经英勇的“埃贾克斯”时，却鼓舞了从前消沉抑郁的“冷血查理”。在和平时期，梁如浩只看到了中国的无能和腐败，而战争却给他带来了新的自豪感，激励着他全心全意地报效祖国。他奉命到东北地区担任铁路运输主管。尽管这基本上是个象征性的职位——东北地区和中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在当时几乎没有铁路的基础设施，但是梁如浩却像变了个人一样急切地上任了。在被召回中国之前，他在哈特福德的斯蒂文森技术学校学习了一年。在那里，他对横贯大陆的铁路旅行仍旧记忆犹新，尽可能多地选择工程学课程，致力于学习有关火车的一切知识。这耗去了他十多年的时间，但梁如浩已开始感觉到，他儿时的梦想——将来作为一名改革者，以西方的技术服务于中国的发展——也许终将会成为现实。

回到天津之后，梁如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投入了工作之中。有一次，一家法国公司赠送给中国政府六列火车，希望以此引诱中国朝廷与他们签订一份赚钱的合同。这些火车都富丽堂皇，装饰着黄色、绿色和蓝色的绸缎，配备了当时所有的奢侈品。梁如浩被委派在码头迎接慷慨的法国公司代表。但是，在到达码头之后，梁如浩注意到，被派来运送火车的法国人正在一筹莫展，因为他明显地看到，天津没有装卸这些贵重货物所需的起重吊车。他告诉梁如浩，绝对无法将这些火车搬到驳船上，再用驳船将它们运到北京。如果是在战争爆发之前，梁如浩大概会同意法国人的看法，然后给自己在哈特福德的朋友写一封长信，抱怨中国港口的低效或海关官员的愚蠢。但是现在站在天津码头上的，是一个浴火重生的梁如浩，决心要尽他的一切所能去改变现状。他笑了笑，承认这里是没有吊车，但是这里有许多中国工人，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和坚强决心，他们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法国人不肯相信他，说人是绝对不可能搬动火车的。梁如浩让他

放心，他告诉这个工程师，到我的家里来做客吧，到明天早上一切就都妥当了。

第二天一早，这个法国人看到，所有的火车整齐地排列着，已经放在驳船顶上等着护送的人了，他吃惊不已。法国人和梁如浩一起出发，护送火车前往目的地。当遇到地势陡峭而无法通过时，尽管梁如浩在美国学院里学到的现代技术比法国人更加丰富，他却运用中国古代教科书中现成的老办法，让手下工人在地上铺上很多长长的杆子，建起了一系列临时的滚轴。工人们就用这位国家工程师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毫不费力地把火车拖到了北京。

法国人向清廷赠送火车的慷慨之举，并不代表欧洲对于因惨败给日本而觉醒的中国的态度。看到清朝正处于最衰弱的时期，迄今为止一直在中国周围盘旋的西方列强现在都猛扑了过来，争夺在中国的特权。它们的逻辑是，如果中国天子既然无计击退日本人，那么他面对英、法、德、俄就更加没有胜算了。使中国更加无力抵抗的是她向列强所借的沉重债务：因为要负担巨额赔款和其他猛增的花销，清政府仅在1894年到1896年间就向外国银行借了3.5亿元。

在中和殿里的光绪皇帝拒绝屈服。1895年7月，他发布了一份谕旨，号召大家武装起来。他用皇帝的朱笔写道：

以往，善政都在于因地制宜，也就是找到适合于当时情况的方法。方今举国危难，更需如此。必须举国上下一心一德，谋求自强，拔本塞源。朕夙兴夜寐，终日辛劳，借鉴以往之失，以避免未来的错误，只为设法缓和朝廷压迫，解决民生疾苦，并及早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措施。<sup>[21]</sup>

接下来便是一系列合乎实际的措施：改革货币制度；建设铁路设施；对士兵、邮递员和矿工进行培训；重建海军；建立各种现代学校。在北京，50名翰林院学者们开办了一个巨大的书库，拥有40个房间，以出版思想性的杂志、翻译西方书籍，并举办关于国际事务的讲座。同样的活动也在中国各地开展起来。<sup>[22]</sup>但是，对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军队。因为，正是军队而非书籍，是中国如何抵抗外侮所必需的。



因为装病，袁世凯没有因巨大的军事失败受到影响，此时他又重返政坛，支持自强运动，并对一位英国的男爵说：“除非中国采取措施以自保，否则没有什么能挽救她的土崩瓦解。”袁世凯令人敬畏的外表发挥了魔力，这位受人尊敬的男爵写道：“如果中国所有的将军都像袁将军一样，中国的军队和财政就不会沦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了。”但他没有提及袁世凯从汉城适时地消失了这件事。<sup>[23]</sup>

改革的精神虽然真诚而强健，但是却没有立刻产生成效。中国还是中国，她的官僚体制依旧拖沓，传统依旧为人们奉行，对现代的怀疑依旧持续盛行，皇帝不满意忽冷忽热的现代化，要求立即转型。他希望中国能参照日本的模式，在一夜之间建立起一套新的政府体制、新的公民文化和新的经济。简言之，他需要的不是改良，而是一场革命。

<sup>[1]</sup> 原文 “One Vast Jellyfish”，直译为：“一只大水母”，有特定的隐喻。译者注。

<sup>[2]</sup> 原文为 “Korea”，韩国，此处译为朝鲜，下同，译者注。

<sup>[3]</sup> Memoirs of the Viceroy Li Hung Chang(London:Constable, 1913), 256—57.

<sup>[4]</sup> 引自David G.Hinners, Tong Shao-Yi and His Family:A Saga of Two Countries and ThreeGenerations(Lanham , 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9), 8—9.

<sup>[5]</sup> 引自Ann Paludan, Chronicle ofthe Chinese Emperors:The Reign—by—Record ofthe Rulers ofImperialChinad(London:Thames & Hudson , 2009), 213.

<sup>[6]</sup> 引自Jonathan Fenby,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New York:Ecco, 2008), 46.

<sup>[7]</sup> 引自Jonathan Fenby,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New York:Ecco, 2008), 47.

<sup>[8]</sup> 引自Hinners, Tong Shao-Yi and His Family, 9.

<sup>[9]</sup> 引自 William Elliot Griffis , “The Statesmanship of Yuan ShiKai,” North American Review 204(July 1916):70.

<sup>[10]</sup> 引自 William Elliot Griffis , “The Statesmanship of Yuan ShiKai,” North American Review 204(July 1916), 10.

[11] 引自 Marius B. Jansen ,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64.

[12] 引自 James Martin Miller , 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Los Angeles: Sanderson—Whitten, 1900), 288—89.

[13] 引自 Vladimir , The China—Japan War: Compiled from Japanese , Chinese , and Foreign Sources (Whitefish , Mont.: Kessinger Publications, 2009), 161—162.

[14] 引自 S. C. M. Paine ,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Perceptions, Power, and Prim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4.

[15] 引自 Henry Cabot Lodge , ed. , The History of Nations: Japan (New York: P. E. Collier and Son, 1913), 271.

[16] 关于丁汝昌的自杀有好几种相互矛盾的记录, 这里引用的是容良在他晚年的描述, 引自 Thomas E. Lafargue ,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United States , 1872—1881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87.

[17] 引自 David C. Evans and Mark R. Peattie , Kaigun: Strategy , Tactics ,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 1887—1941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524—25.

[18] 引自 J. O. P. Bland , Li Hung—chang (New York: Henry Holt, 1917), 174.

[19] “A Pathetic Proclamation: Chinese Emperor's Autograph Explanation of Japan's Victory, ” New York Times, May 24, 1895.

[20] 引自 Fenby , Modern China, 55.

[21] 引自 Zhongguo jindai Shi , “China 1895—1912: State—Sponsored Reforms and China's Late—Qing Revolution , ”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8 (Spring—Summer 1995): 50—51.

[22] 引自 Luke S. Kwong ,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the Ideas of 189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78.

[23] 引自 Charles Beresford , The Break—up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99), 272.

## 10 百日维新

1898年的夏天非常闷热，唐绍仪却生活得十分惬意。清政府在对日战争中惨败，丢失朝鲜<sup>[1]</sup>，想努力寻求一位有能力的官员作为在汉城的代表，以便监督当地的发展，谋求时机重新统治该地区。唐绍仪是个理想的人选。他熟知朝鲜政治，也深得朝鲜上层人士的喜爱。唐绍仪在袁世凯手下任职时，许多人认为他是个聪明而文质彬彬的人。当飞扬跋扈的袁将军表现得粗暴无礼时，唐绍仪能向他提出建议，并把事情解决好。现在唐绍仪已经摆脱了袁世凯的阴影，友善地返回了朝鲜的首都。清朝驻朝鲜代表已不如战前那般的有威望和风光——不顾日本屡次试图向本国扩张势力，朝鲜宣布自己为独立国家，并寻求俄国的保护——但唐仍可以在这里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他养了不少好马，每天骑上几个小时，还不断收集瓷器和火器。

与此同时，唐绍仪的一些老朋友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些老朋友在康涅狄格州读书时就很欣赏他，也曾与他在朝鲜共事。他的表兄梁如浩是一位铁路局长，事业正蒸蒸日上，对工作充满责任感，经常计划扩张和改进他所管辖下的铁路。外号“大鼻子”的吴仲贤也开始引人注目。1880年他在朝鲜时只是一名低级的海关官员。战后袁世凯奉命来重振清朝腐朽的军队，任命了这个他在朝鲜时就已认识和喜欢的人作为新的军需总长。从此，吴仲贤摇身一变成为袁世凯的外交官员，该职务给这位曾经的耶鲁学生带来很多的权利和尊敬。

蔡绍基的发展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运动健将。他和唐绍仪、梁如浩、吴仲贤一起到达朝鲜，同样，他也很快被袁世凯看上了。在为袁世凯效力后不久，他就被擢升为地方行政长官，通过一些有利可图的贸易和采矿生意，挣了点儿小钱。尽管蔡绍基是一位很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但他真正热衷的是教育事业。在

耶鲁学习的两年中，他曾经进入过一个叫Kappa Sigma Epsilon的秘密社团。他一贯认为教育是使人获得有意义的人生的基础。在日本入侵朝鲜之后，蔡绍基离开朝鲜，开始在中国内陆筹款，预备建立一所美式学校。他的努力引起了一位清朝高官盛宣怀的注意并得到了盛宣怀的资助。多年来盛宣怀一直是自强运动的支持者：他在鸦片战争中目睹了西方武器的威力之后，成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忠实信徒，因此一直关注着中国教育计划的进展。他是蔡绍基的坚实盟友，蔡绍基向他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美式学校的想法。于是盛宣怀开始利用自己的官衔和在清廷的影响力，为蔡绍基的计划寻求支持，共同筹备建校运动。终于在1895年在天津成功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

当蔡绍基要为北洋大学选择一个座右铭时，他想起过去在纽黑文求学时，耶鲁大学的校训：“光明和真理”，因此北洋大学的校训被定为“实事求是”。校训雕刻在一个徽章上，周围是三个形似堡垒的图案，很像一所美国大学的校徽。所教授的课程参考新英格兰最好的学校，课程安排超过了一页纸。蔡绍基还成立了不同的学院来教授法律、工程、机械、采矿、冶金工程，为每一位学员提供从美国订购的教材和实验室设备。

到19世纪末期，中国教育计划的毕业生开始逐渐遍布整个中华帝国。梁敦彦，当年“东方人队”的投手，一个冷静而聪明的人，后来在张之洞手下任职。张之洞是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大员，当时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敦彦保守的行为举止和谨慎的做事风格很对张之洞的脾气，因此步步升迁。到朝鲜战争结束，他不但获得了能干和忠诚的美誉，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赐予了他像母亲一般的赞赏和礼物。

对于吴、蔡、梁、唐和其他教育计划的毕业生而言，他们大部分已经在清廷严密的等级制度下获得了稳定的中等职位。庄严的生活似乎姗姗来迟，这时距离他们回国并进入清政府的咨询机关已16年，距离把他们的事业弄得一团糟的中日战争也已4年。到1898年夏天，这些毕业生广泛地就业于政府部门，海军、煤矿、铁路等行业，看起来这个教育计划的目标终于要实现了。这些接受过美式教育的孩子们终于艰难而又勤奋地引导着这个国家走上了前进的道路。

他们在朝中有一个天然的盟友皇帝。光绪帝不满足于渐进的改变，力求立竿见影。像着魔的人一样，他一道又一道地颁布诏令，三个月内共颁布了四十道诏令，宣告臣民，变法来了。这些法令非常让人震惊，批评说很多流行的传统是毫无用处的，并贬斥许多满大人是没用的废物。一道典型的诏书里曾这样说：“一半的官员仍习惯于遵循一些老旧过时的传统，在当前的危机下，我们曾经试图揭露朝廷中的这些毫无用处的做法。国家不幸的祸根就在于已根深蒂固的毫无生气的体制和因循守旧的做法。”<sup>[2]</sup>亲手书写诏令的天子摒弃了自己本应维系和代表的那套体制。他写道，帝国的考试制度，重于孔孟之道，是“空洞、无用和不切实际的”，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sup>[3]</sup>他说，应该要求学生不拘于古文，针对时政叙事撰文。过去非常重视的书法艺术，仅仅是“没有意义的才艺”<sup>[4]</sup>。在北京要建立一所大学，这所大学若有教授不了的课程，则可以送中国学生出国学习。朝廷的官员也可以长期派往海外，学习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庙堂要改建成学校，无一例外。他说：“这个诏令颁布后，谁也别再说，我没警告过他。”<sup>[5]</sup>

那些“满大人”们满腹经纶和顶礼膜拜的东西，都被这些诏令抨击得一无是处，他们被吓呆了，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诉诸他们的看家本领，向皇帝上书，请求皇帝明鉴。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朝廷的秘书已经誊写了660份奏折。<sup>[6]</sup>为了拖延时间，很多官员声称，皇帝的诏书是通过新近安装的电报传送的，在他们看来是没有约束力的，只有皇帝朱砂御批发布并由侍卫跑腿传递的诏书才是真实可信的。光绪恼怒不已，他要求的是服从。

光绪也意识到，如此大规模的变革，仅靠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成功的。他需要心腹之人，因此他将两位新的顾问——康有为和梁启超招入麾下。这两个人既是学者又是作家，能将孔孟之道和激进的平等理想相融合。譬如，康有为就认为，应该把改革精神延伸到每个家庭内部，男女之间用一年延续一次的契约来代替婚姻制度，把孩子委托给公共团体来抚养，而不是由父母抚养。虽然康梁的理论对于皇帝到底有多少影响，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相互矛盾的历史记录提供了不尽相同的说法。但是两位与年轻皇帝最亲近的人都很清楚，他这场引领中国走进新时代的改革，才刚刚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光绪皇帝身边的人，包括慈禧太后，都以冷眼旁观的姿态看着这些改革。那些“满大人”谨慎的本性已经让他们的阶级延续了几百年，在选择站在哪一边之前，他们都要先看看皇帝所下的那些诏书的效果。但1898年九月，皇帝的一个举动让这些人与他永远地疏远了：由于急需借鉴日本经验，光绪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会见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中日战争中的战胜国——日本的首相，这次到中国来，是视察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所获得的收益。不得不承认，如果谈及改革，伊藤博文确实是最佳人选。与大多数的日本政客不同，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他生动地证明了，一个人可以通过勤奋和才智游历西方，并把西方最好的品德和理想带回亚洲。放下骄傲和愤恨的阴影，光绪皇帝把伊藤博文请到紫禁城里，向他询问现代政府的运行机制。与此同时，康有为建议，建立中日同盟，光绪的另一个亲信也与日本军方进行了会晤。

对日本人如此毕恭毕敬，甚至卑躬屈膝，这让大部分朝廷官员无法忍受。过去他们认为皇帝误入了歧途，天真幼稚，但现在看来，皇帝简直像疯子一样，甚至像是个卖国贼。朝廷的高官传言说，皇帝不是要改革中国，而是要毁了这个国家。

光绪自己并非没有察觉到这些传言。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和改革派日益陷入猜忌和慌张。当他和他的姨母慈禧太后一起按照预定计划巡幸天津时，他的顾问们竟然神经过敏地认为，慈禧会借机扣押他的侄子，结束他的统治，而保护皇帝的唯一方式，就是使皇帝能拥有自己的武装。完成这个任务，没有比袁世凯更合适的人选了。袁世凯当时领兵驻扎在天津，时年39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积累着财富和声望，等待着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袁世凯奉旨入京，对皇帝和他的改革表现出了足够的忠诚，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听候差遣。

与此同时，朝廷官员们对于光绪皇帝的这些举措也越来越担忧。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官员代表团，在颐和园觐见了慈禧太后。他们认为光绪帝和他的顾问是日本征服中国的巨大阴谋的一部分。双方剑拔弩张，彼此的猜疑越来越深。

皇帝的顾问团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因为深知光绪皇帝对于慈禧一直毕恭毕敬，不会采取措施去反对慈禧及其左右，因此决定先斩后奏。谭嗣同，光绪皇帝的亲信之一，秘密召见了袁世凯，递交给袁世凯一份计划，称此计划已经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谭嗣同说，皇上给袁的旨意是，杀掉荣禄，把慈禧太后囚禁在颐和园。荣禄掌管军权，是慈禧太后的旧情人和心腹之人。

袁世凯很怀疑眼前这道圣旨的真实性。因为圣旨一般都用朱砂书写，而这份文件是用黑墨水书写的。他告诉谭嗣同，他不愿意做一个叛徒，匆忙行礼后，袁世凯迅速赶回天津，找到荣禄，告诉他北京正在有人密谋反对他，荣禄立刻禀告了慈禧。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离开了颐和园，驱车回到紫禁城。在一个灯笼的光亮闪烁不定的大厅里面，慈禧与她的外甥当面对质。她指责光绪皇帝背叛她，告诉光绪，满族的王公大臣们认为皇帝不再适合掌权了，她本人将垂帘听政。

尽管热衷于要改革，光绪本质上还是一名儒生，仍然坚守孝道。他拜倒在姨母面前，据说他一边哭一边说，“请依法惩罚我吧，我罪有应得，我不配当皇帝”。<sup>[7]</sup>慈禧太后咆哮着发号施令，荣禄和袁世凯被带了进来，袁世凯不敢直视光绪。太监奉命拿来笔墨纸砚。光绪坐下来按照慈禧的口授写下一道圣旨。光绪写道，他“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sup>[8]</sup>

这一段昙花一现的改革就这样结束了，史称“百日维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家报纸这样说道，“中国的朋友，以及追求人类进步的朋友，一起为这位勇于革新的皇帝的陨落哀悼吧”。<sup>[9]</sup>慈禧太后掌权后，光绪被囚禁在颐和园<sup>[10]</sup>里，虚度光阴。跟随他的改革派，特别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通缉犯。为了逃离中国，他们需要同情改革的人保护，直到逃离计划安排妥当。有人告诉他们，北京有一位老人，他是改革者的朋友。传言说，多年前他曾经是一名美国留学生，后来倾其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国教育计划，但是失败了。去找他吧，这个人一定会帮助他们的。这个人叫容闳。

在教育计划的幼童被撤回后，容闳便跟随这些孩子们一起回到中国。当时他自己有两个孩子，但他把孩子和妻子一起留在了美国。这

个教育计划是他的至爱，他感到迫切需要给终止这项计划的官员上书。就算这样做并不能让他们回心转意，至少他也要让这项费尽自己毕生心血的教育计划得到历史的认可。

容闳一回到中国，就去拜访了李鸿章。当李鸿章忽然问起容闳“何亦任学生归国乎？”容闳大惊。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答道：“此事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容闳问道：“若违抗谕旨，则人且视为叛逆，捕而戮之？”李鸿章不承认容闳的指责，反驳说：“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容闳激动地说：“身居四万五千里外，安能遥度总督心事？设总督能以一函示予，令勿解散，自当谨遵意旨。”<sup>[11]</sup>李鸿章是一个善于推卸责任的老手，说过错全在吴子登。<sup>[12]</sup>几天后，容闳出于礼貌，接受了吴子登的邀请，拜访了他的老对头。与李鸿章的腔调一样，吴子登声称，教育计划的流产不应归咎于他，回国以来，他自己也遭了不少骂名。带着嫌恶之心，容闳离开了中国，回到了哈特福德家中，却发现他的妻子玛丽得了严重的肝功能衰竭，生命垂危。1886年，他的妻子病逝了。容闳回到中国，用继续深化改革来抚慰自己的伤痛。他试图建立一家国家银行，并推动国家铁路系统的建设。但所到之处，无处不是低效的官僚主义，无处不是谄媚逢迎，无处不是因循守旧。他对祖国的热情变得越来越淡漠。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来他写道：“我同情中国，不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居于有道理的一方。”<sup>[13]</sup>

百日维新给容闳带来新的希望，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他对中国的未来也失去了信心。当康有为和梁启超叩门求助的时候，他遇到了意气相投之人，帮助安排他们偷渡日本。容闳知道他这么做犯了叛国罪，也不得不迁徙逃亡了。他先逃到北京的外国友人那里，后来又在友人的安排下去了英属香港。

虽然清廷仍在查办甚至处决支持光绪的改革派人士，但慈禧太后和大臣们也深知，不能完全抛弃改革成果。海军、电报和铁路等一些被视为国家要务的行业被谨慎地保留下来。尤甚的是，北京急需各类人才，这些人能将西方的科技和东方的哲学融为一体，而且跟光绪热衷的改革没有任何关联。受过美式教育的学生正是最合适的人选：至1898年时，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牵扯进任何政治风云和思潮，没有自己的朋党，是既忠诚又勤奋的人。

这些人中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唐绍仪。在担任中国驻朝鲜总领事近三年后，他被召回北京，见到了他过去的支持者和落难的偶像——袁世凯。与袁世凯的重逢，是否使他感到紧张，或者仍然为袁世凯曾将他抛弃在朝鲜而感到痛心？他只字未提。相反，他对袁世凯毕恭毕敬，并且再次站到了袁世凯这一边。

袁将军的角色并没有很清晰的界定，他奉命治理国家的军队，但他的威望和天性总是驱使他去干预一些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唐绍仪的角色也不那么明确。他的职务之一是北方铁路局的局长，负责六百里铁路，比他的表兄梁如浩负责的规模大得多。虽然这个职位看起来很风光，但其实没有什么重要性。从19世纪中期起，中国想建立大规模铁路网的计划一直徘徊不前，大部分无果而终。譬如在1875年，上海的外国商人想在繁华的上海市区与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村庄吴淞之间修建一条铁路。这是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展示：上海和吴淞相距十二里，是人口密集的区域，这些西方人认为，让中国的老百姓一睹现代交通的奇迹，他们就会要求修建更多铁路了。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本地人都被吓坏了。铺设铁轨会破坏村庄的风水，打破天地之间的微妙平衡。为了阻止这个项目，吴淞的地主们给每块土地都开出了非常高的价格，但是这些富有的外国人仍然愿意接受高价。经过数月的法律纠纷后，铁路最终还是建成了。虽然这个过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注定是短命的：在铁路营运几个月后，“上海—吴淞”线上的一辆列车撞上了一个无意中在铁路上散步的中国农民。农民被撞死的事激起了村民的骚动。当地政府介入此事，赔偿了外国投资者的损失，拆除了铁轨，连铁轨同机车和车厢，都一起卖给了台湾<sup>[14]</sup>的一个买家。火车站也改建成了孔夫子庙。

另外一条铁路的修建要成功得多。这条铁路连接着开平煤矿和与其相邻的位于海河口的小镇北塘。尽管煤矿公司的中国股东极力反对，但当地一位英国工程师C. W. 金德，决意要建设一条铁路。他用散落在矿区周围的废弃金属和各种材料，组装了一辆小型机车，取名为“中国火箭”。清政府发现未经政府许可居然铺设了一条铁路以后大为恼火。清政府禁止金德进行进一步实验。但后来李鸿章为之说情，金德才被允许继续修建铁路。不久，他修建的铁路连接了北京、天津和满洲边界的山海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真正的铁路。



这个金属怪兽在山野大地穿行的消息迅速传开了。大部分的满大人对此持反对意见。陕西省的巡抚向他的一位美国客人表达了对火车的厌恶之情，这代表了当时普遍的对火车的抵制态度。他说：“火车把洋人带进来了，我不喜欢洋人，火车还让很多的中国人失业。”  
[15]

洞悉到中国人对铁路的极度不信任，西方的公司用尽浑身解数来安抚那些满大人。或许认为紫禁城的王公大臣像好奇的孩子一样，可以被小玩意儿打动，因此一家又一家的公司给北京送来各种各样的玩具。譬如在1885年，一家美国公司送给慈禧太后一辆完整可活动的袖珍火车模型。它包括一千英尺带有转轨器的轨道、一个转车台、一节客运车厢、一节邮件和包裹车厢、一节货车车厢、一节卧铺车，每节车厢五英尺长，均有配套齐全的座椅和铺位。这个模型是一列美国火车的精确复制品，虽然很能博得慈禧太后的欢心，但仍然没有说服她让外国铁路遍布她自己的国家。

唐绍仪走马上任担任铁路官员后，很快就意识到，要想成功，必须格外小心行事。他不去推行遥不可及、雄心勃勃的计划，而是谨言慎行，将自己的精力放在管辖范围内的铁路上面，使其能够有效运转，并不费力去说服清廷修建更多铁路。

虽然唐的这个职务没有权威，但却给他提供了与当时在中国运营的外国知名公司联系的机会：在这方面，他可是游刃有余。他有美国人的行为举止，完美无瑕的英语水平，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西方人。厌恶愚钝的满大人及其高深莫测的办事方式的洋人们，都非常欢迎唐绍仪，认为他是一个能给当时中国死气沉沉的商业带来一丝现代气息的人。

有一位洋人还特意拜访了唐绍仪。那是一位年轻的美国人，被一家中欧煤矿公司派遣到中国北方，名叫赫伯特·胡佛。在访问唐的办公室后不久，胡佛就失望地认识到中国人有他们自己做生意的方式。胡佛希望到一位名叫张燁茂的矿业公司总经理辖区去工作，但这位总经理只对开采金矿有兴趣，因为他认为这能让他发财。胡佛认为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依赖煤、金属和其他工业矿产，然而张燁茂根本不去考虑这些具有实际意义的担忧和劝告。他只坚信一点：他需要金子。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虽然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去挖金子了。在



一个火车站，胡佛结识了唐绍仪，唐绍仪邀请这位美国人乘坐他的私人包厢。

胡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唐绍仪很礼貌地邀请我们跟他共乘一辆车，这是我们牢固友谊的开始，这段友谊在后来的很多年中经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不卑不亢，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抱负。唐绍仪充分表达了对张燁茂的敌意，他说张燁茂以前不过是个马夫，完全是凭着贿赂公行才谋得了这一官半职。”  
[16]

有胡佛这样的人站在他这一边，唐绍仪的工作就更加得心应手了。这位美式教育下的官员和他的洋人同事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体育、骑马，讨论中国和她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将出现的突然和血腥的转折，是他们都不曾料到的。

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义和团运动源于几个农民和年轻人，他们饥肠辘辘，前景无光，仓皇地向那些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的人寻仇，而外国人很容易就成了他们的目标。这些外国人要么戴着传教士的十字架，要么穿着商人的衣服，或者穿着雇佣兵的靴子。穷苦的老百姓非常讨厌这些外国的侵略者。他们奇风异俗，他们占领土地，他们不停地谈论像魔鬼般的宗教，历史学家乔纳森·芬比记录说：“一本广泛传播的小册子声称，基督教徒信奉一个大恶魔，这个恶魔太坏了，最后被处决了。” [17] 这些洋人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尊重。更严重的是，洋人的到来触发了中国灾难的开始。没有官方报纸来通知消息，没有学术来教育他们，也没有什么公民组织来代表民意，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衰退的深层原因。没有什么渠道来发泄他们的愤怒和无助，所以洋人就成了他们的目标。

刚开始，针对洋人的进攻只是零星的行动，没有什么凝聚力。后来，全国上下都出现了很多地方性的小册子，煽动本来已经情绪激烈的百姓来反对洋人，特别是反对传教士。有一条义和团的揭帖说，“天不雨，地发干，只因教堂挡住天”。 [18] 光是山东一省，就爆发了约一千多次的示威游行。不久，各地的示威者们开始统一喉舌，一致喊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标语中所宣誓的对于朝廷的忠诚，让清廷非常高兴。不像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次，这帮气急败坏的农民不是把责任归咎于清朝政府，相反，他们归咎于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的西方人。最初，政府为了约束反洋暴动，还采取了一些微弱的手段，例如直隶总督就处决了一百个参与攻击英国传教士的犯人，称这些犯人是“强盗和暴徒”。但是后来清廷意识到，这些示威者是一股巨大的还没有被利用的势力。一直就具有政治头脑的慈禧，热情地关注着这股冉冉兴起的反抗势力。很多的示威者都来自于一个叫作义和团的组织，因为洋人注意到他们都热衷于武术，所以称他们为“拳民”。他们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举行神秘的仪式以祈求刀枪不入。慈禧盘算着，这些纪律严明、强壮而又热情的人们，正是她所需要的将洋人赶出中国的力量。尽管义和团今天在中国广受尊敬，很多当代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它虽然有瑕疵，却不失为一场让人敬佩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但是在当时，大部分中国教育计划的毕业生们都将它视为一种威胁。对于容闳的学生们而言，义和团是一种原始但却拥有潜在破坏性的集团，代表了造成中国几百年来停滞不前的所有因素。但是“拳民”的人数越来越多，并且都全力以赴，这股力量是不能忽视的。

慈禧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清廷所能做的就是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于是义和团以惊人的速度蔓延起来，席卷北方，直逼京城。“拳民”中的大部分人是没有知识的农民，他们杀害洋人，拔电报线，煽动当地老百姓加入他们的暴动。他们拆除铁轨，暗杀日本公使，焚毁教堂，攻击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

尽管面对如此暴乱，清朝政府还是泰然处之。一个中国官员告诉英国驻天津领事，这些“拳民”“是好老百姓，只是不喜欢基督教”。<sup>[19]</sup>欧洲各国的驻华代表们被激怒了，要求立刻制止暴乱，并且马上付诸了行动。那位驻守天津的英国领事，因为气愤当局无能力应对这帮暴民，要求英方出动军队来保护女王陛下的臣民在天津的生命和财产。清政府闻风，马上给天津的地方官员发布了一道指令，要求他以武力抵抗洋人。义和团带着真正的革命者的狂暴激情，攻打英国军队，杀死了六十二人。

发生在天津和其他地方的暴动，让西方国家下决心解决事端。欧洲各国要求清政府立即采取果断措施终止暴乱。1900年6月16日，慈禧

太后召集她的亲信们一起商议。有人说应该解散义和团，他们不过是一些江湖骗子，自称神灵附体，刀枪不入，不过是自欺欺人。但慈禧太后听不进去这些。她说：“他们的神功可能是不可靠的，但我们就不能依靠这些人的精神和勇气吗？现在中国已经虚弱到极点，我们只能依靠人们的精神和勇气。如果我们把这些丢弃在一边，失去了民心，我们这个国家将何以为继？” [20]

这次会议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与会官员约定第二天继续讨论。在他们开会的时候，清朝的外务大臣，总理衙门总管端亲王拿出来一份文件，声称这份文件可能会改变一切。从端亲王手中接过文件，慈禧大声朗读起来。她说，这是西方列强下发的最后通牒。他们要求皇帝移驾他处，中国的财政收入由洋人掌管，中国的军队由洋人来指挥。这些野蛮的声明显然是伪造的，事实上，它们就是端亲王一个人的杰作。然而这种洋人的傲慢言辞正是慈禧和她的人所需要的。慈禧太后站着说道：

“今天，他们已经公然与我们为敌，国家的存亡就在眼前。我等若俯首称臣，死后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战死沙场！” [21]

一位官员轻声反对道，过去中国从没有战胜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反而连续受到英国、法国甚至日本的羞辱。现在与不只一个国家，而是所有的国家作战，胜利的可能微乎其微。但同僚们忽视他的建议。他们别无选择，慈禧将眼前的形势与荣誉和孝道联系在一起，使冲突已不可避免。6月20日，中国对外国宣战。

不知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如此奇怪地突然好战起来。欧洲公使们发誓他们根本不知道端亲王所谓的通牒。当看到所言对清廷毫无影响时，他们也开始备战了。那些将毕生精力致力于将西方精神引入中国的人，激烈反对慈禧的决定。李鸿章这时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甚至需要仆人的搀扶才能走到书桌旁，他尽了最大努力去阻止这个疯狂的决定。写信给他的老朋友慈禧，以前所未有的坦诚态度，开诚布公地说：“一想到这些事情，我的血液都凝固了。在任何开明的统治下，这些荒谬的声称神功盖世的“拳民”都罪该万死，而两位陛下，

却被叛徒所左右，将这些“拳民”当作忠诚的子民，以至动荡蔓延，举世震惊。”<sup>[22]</sup>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在天津的唐绍仪也倍感震惊。尽管他是一名清廷官员，但他代理的铁路事业，在“拳民”眼中却是洋人全部邪恶的标志。他也受过美式教育，大部分时间都说英语，跟这个城市的外国居民也有很多的交往。考虑到家庭的安全，他向友人胡佛求助，胡佛安排唐绍仪及其家人住到了天津的国际公使馆区。

对唐绍仪而言幸运的是，胡佛不仅是一个好朋友，还是一位聪明的工程师。在慈禧向西方列强宣战之前，他就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攻击，于是设计了一道跨越五英里范围的防御工事。他利用在附近的仓库里找到的大麻袋的谷物，在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地段修筑路障，挖设壕沟，这证明他是一个技艺超群的工程师。妇女和儿童都聚集到市政厅的地下室里。国际公使馆的男子共有2400人，开始准备作战了。

6月17日，一万名“拳民”和清兵，带着至少六十门大炮，向这座城市冲来，他们高喊着“杀，杀”，向遇到的每一栋洋人房屋开火。因为电报线被切断了，守卫使馆区的士兵们无法求援。一个英国人和三名俄国哥萨克骑兵冒着生命危险，骑马冲出炮火，将困境报告给西方联军总部。同时，守卫们藏身在胡佛构筑的麻袋路障后面，拼命还击。

六天之后，战斗结束了。西方联军既认识到天津作为通往北京的战略要地的潜在意义，同时也回应特使的紧急要求，派遣了一支八千人的分队，在天津战斗打响几天后就赶到了。由于装备精良又训练有素，这些士兵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义和团和清军。这个城市很快就解围了，外国的居民们欢天喜地。但是唐绍仪无法分享这个节日。等他匆匆赶回家中，才发现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已经被杀害了。

唐绍仪为此悲痛欲绝。他深爱他的妻子，沉痛哀悼她。当他还沉浸在悲伤中时，天津的守卫部队和其他联军部队已开始向北京进攻了。这支军队报仇心切，在通往紫禁城的路上，烧掉了他们经过的所有村庄。他们也经过了梁敦彦管辖的地区。如果说梁敦彦在哈特福德中学所做的关于沙俄熊的强有力的毕业演说，是批评西方对亚洲国家



的不信任的话，那么现在他对这些西方国家则深表同情了。他意识到，这次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灾难，是不合常理的和有害的。尽管他和慈禧太后走得很近，很佩服她的政治能力，但他认为慈禧的宣战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他在迎接这些军队的时候，使出全部的演说才能，来确保他的辖区内没有暴力和恶意的破坏。

但是这样的限制只是暂时的。很快洋人就会到达北京，开始报复。像前一次一样，慈禧和她的奴仆们准备逃离宫廷，把不能随身携带的宝藏都埋起来，以备日后回来。有一位嫔妃认为，逃跑将有损皇家的尊严，结果她被两个太监抓起来扔到了一口井里。尽管慈禧改换了朴素的服装，吃的也不再是一百道菜的大餐，而是简单的鸡蛋面条，但太后仍是引人注目的。在经过某地时，一个气愤的中国士兵向她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这位士兵被抓住砍了头。但这个老妇人仍被这种背叛所惊吓。她后来回想起来说：“我就像一块纯净的美玉，但现在这块美玉已经有了瑕疵，而这个瑕疵将会伴随我的余生。”  
[23]

慈禧的心情也因为她在逃亡过程中目睹的一切变得更加沉重了。她久居深宫，高高的宫墙将她与民生疾苦隔离开来，但现在她亲眼看见了她的政权所造就的惨状。弗朗西斯·H. 尼科尔斯，一位美国作家，大约在同一时期经过了慈禧太后所到之处，描绘了一幅饥荒折磨下的城市和乡村的灰暗图景，此情此景慈禧是第一次目睹：

受灾的老百姓不得不在郊区的田野中谋生。为了遮风挡雨，他们在道路两旁的土堤上挖洞，经常以吃粗草和树根为生，直到饿死。我在西安所见，遍地都是这种恐怖的漆黑的洞穴。它们大部分都是空的。曾经住在这些洞穴里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死掉了。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仅一个郊区就饿死了130,000人。

食物变得越来越稀少。不久之后在西安郊区就有了人肉买卖。刚开始人肉交易是秘密进行的，但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恐怖的食物，利用死人的尸体制作的肉丸子，逐渐变成了一种日常食品，价格大约为四美分一磅。  
[24]

疲惫、惊恐和茫然无措的慈禧太后希望这场她刚刚发动的战争赶快结束。就像过去很多次一样，清廷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谈判投



降条件。然而这一次，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因为大多数清廷高官当初都踊跃支持慈禧那不祥的宣战，既有谈判技巧又能诚实与西方人和谈的没有剩下几个。无计可施之时，慈禧再一次想到了李鸿章。

李鸿章此时已是古稀之人，身体非常虚弱，十年前在日本谈判时遇刺削弱了他的身体，以致现在行走都感到困难。但是，他不能拒绝他的君王。在极度艰难之中，他与西方代表进行了和谈，协商并在1901年9月7号签订了“拳民条约”<sup>[25]</sup>。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被迫签订的最为沉重的条约。除了高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偿之外——因为数额太大，条约允许中国分39年还清，李鸿章还不得不接受其他一系列屈辱的条款。他尽力维护他的老朋友和君主，坚持从战犯名单里去掉慈禧的名字，但却不得不屈从另一个条件：要求慈禧立即停止处理一切国家事务，以庶民，或者说好听点儿，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度过余生。允许外国军队进驻北京，领土上的让步也继续增加。

清廷不知该如何重建它的威信和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于是求助于古老的传统手段——立即处决、流放或赐死那些必须为这次羞耻的战败承担责任的官员。随着强硬派的倒台，是考虑中国的未来的时候了。皇家发布的一道旨意很清楚地暗示：改革精神在中国又复活了。

这道圣旨说：“如果不培养人才，就不能拥有人才。如果不发展教育，就不能培养人才。如果不改革文武官员考试机制，就不能发展教育。如果我们不向外国学习，我们就不能弥补国内教育的缺陷。”<sup>[26]</sup>自从1882年的反华法案出台后，美国的大门就对中国人关闭了，派遣学生到欧洲学习，成本又太高，因此朝廷开始利用国内的能量和资源，成立了超过100,000所现代学校，教育了超过290万学生。蔡绍基的北洋大学就是效法的典型。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北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就已经毕业了。在富有改革思想的官员眼里，北洋大学是全中国都要学习的优秀榜样。蔡绍基受宠若惊。义和团运动已使他一贫如洗，对于教育的热忱成了促使他前进的首要动力。战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北洋大学的校长。借此机会，他很乐意向其他建立类似学校的官员提供建议。他的建议好像雪中送炭一般：急于见到成效的清廷发布了一道又一道旨意，力求彻底改革全国的教育制度。开始朝廷宣布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不久之后干脆废除了这个考试。朱笔一挥，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支撑中国帝制的科举考试就彻底寿终正寝了。

然而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者，也走不了多远。来自中国教育计划的学生们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天津的梁如浩，与他的表弟唐绍仪一起获得了晋升，负责经营至关重要的北京—山海关铁路线。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这条铁路被外国联军控制了，然而1902年秋天，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联军又把它交还给了中国。梁如浩被告知，这条线路费用高昂，每年运营需要150万墨西哥元的补贴。梁如浩发挥他在哈特福德中学时备受称赞的经济天赋，意识到稳妥的经营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想要公司繁荣发展，就必须增加收入和扩充顾客。他知道，苦力是一个还没有被开发的市场。对于中国传统的上层阶级而言，这些可怜的劳动者只是卖力气的人，跟牛马没什么区别。对梁如浩而言，这些劳动力却是潜在的顾客，是一个庞大的有需求的、有意义的人群。梁如浩获悉，每年的收获季节，都有40万劳工踏上从中国北部前往满洲的历时一个月的旅程，梁如浩便给他们提供了非常优惠的票价，只需1.5美金。因为坐火车能让他们弥补一个月的工作量，所以许多人愿意花这个钱。他们增加了铁路的收入，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不到两年，梁如浩运营的铁路就开始盈利了，每年获利超过三十万美元。

梁如浩将铁路扭亏为盈的能力给清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廷奖励这位年轻的经理高达2000墨西哥元的月薪。对比一下，当地行政长官的月薪才140元。梁如浩现在功成名就，有权有势，可以担当更多的风险了。没有什么比铺设铁路更让他高兴的事了。对他而言，铺设铁路的意义已不再限于争取更多旅客和挣更多的钱。他对于孩童时代在美国乘坐横贯大陆的铁路的经历一直记忆犹新，很明显，如果中国不追随美国建设更多的铁路将乘客和货物运输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她就不可能变成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国家。

未经深思熟虑，梁如浩就找到了延伸铁路的方向。从紫禁城往西大约27英里就是皇家陵园所在地。每年整个朝廷的人都会到祖先的陵前祭拜，举行一些仪式，以示孝心。梁如浩上奏当朝，建议将已经铺好的京津铁路向西延伸到皇家陵园。他的建议马上就获得了批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梁如浩是在1906年的深秋提出的延伸铁路建议，而祭拜仪式是在每年的三月份，无论谁来接手这个项目，都必须在不到六个月时间内完工。梁如浩咨询了几家外国公司，都当即

遭到回绝。为不能完工的项目负责，没人来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梁如浩没有被难倒，他知道，有一个人能承担这项工作。

詹天佑，这个当年的教育计划中最才华横溢的学生，以前被称之为“杰米”，离开美国前已经在耶鲁大学取得了学位。在回国后最初的一段日子里，他的才华并未像在康涅狄格州时那样受到重视。他应征加入了海军，职业生涯一直默默无闻。他在几所海军学校教工程学，只有到1888年才被他的上司相信他在美国所学的铁路知识让他足以胜任中国新兴的铁路事业。但是詹天佑为人谦逊善良，即使在担任朝廷的初级铁路工程师时，也是默默无闻，看起来他似乎要永远从事一些低微的秘书工作了。当老朋友梁如浩写信给他，请他来负责这个项目时，他十分激动。在他目前的职位上，詹天佑一直置身于外国工程师的阴影之下，因为官僚更尊敬和喜欢他们。而现在梁如浩就是一位官员，詹天佑的机会来了，他接下了这份工作。

詹天佑善于设计精致高效的铁路，也善于管理手下的工人。他所展现出来的对于细节的关注和设计之精确，即使跟欧洲的最好的工程师相比也毫不逊色。他在皇帝祭祖之前如期完工，这给梁如浩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梁如浩并不惊讶，他跟詹天佑一起留学多年，深知这位幼时好友的杰出才华。不久这位雄心勃勃的铁路经理想到了一个更艰巨、更大胆的工程——连通北京向西北大约百里之外的内蒙古张家口的一条铁路。张家口作为一个战略重镇，交通不便，因为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崖。但梁如浩决定尝试一下。

关于该项目的消息一经传出，英国代表就立即致函清廷，声称中国以前的很多铁路一直都是英国贷款修筑的，因此这条铁路也理应由女王陛下的工程师们来修筑，长城以内的任何一条铁路都应该由英国人来决定是否修建。俄国外交官一听大为不满，提出抗议说，这条铁路起于北京，但终于张家口，其位置在长城之外，接近于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理应由俄国工程师来建设。而这又激怒了日本，因为日本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应该享有俄国人在该地区的一切权益。三个列强争执不休，于是清政府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建议由詹天佑来勘测铁路所经地段并尽力为之。若他无能为力，到那时再来商讨谁来筑路的问题。

考虑到詹天佑是个不合格的新手，日、俄、英三国都同意了清政府的主张。让中国工程师先试一试，这很合逻辑，如果他失败了，清朝政府就无法再阻碍列强介入了。但是詹天佑创造了好几项先进技术，又发明了提高工作效率的机器，最终取得了成功。短短几个月内，一条堪称现代工程史上之奇迹的铁路，蜿蜒曲折地穿过险峻的山峰，通到了张家口。洋人都为之叹服，中国人为之欣悦。即使那些先前辱骂火车为怪兽的人，现在也为詹天佑的成就感到骄傲。毕竟这是一条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下修建的铁路，一条由心灵手巧的中国之子修建的铁路，这是这个国家光明前景的象征。

詹天佑成了民族英雄，但享受这一荣耀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全国上下的官员们都迅速认识到了，教育计划的毕业生们是有卓异才能的人，他们锐意进取，技艺精良，又不墨守成规。在战舰上、在矿山里、在铁路交通或外交部门，这些归国留学生都被委以重任，当他们成功的时候，赞誉声一片。这个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如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詹天佑，还有其他几个人，逐渐被他们的同事和上级称为“广东帮”，俨然是帝国最高官僚职位的继承人。当其中一个毕业生获得高升时，他一定会提拔童年的伙伴，他们在一起还是用英语交谈，彼此称呼三十年前在新英格兰校园中的昵称，在帝国的朝廷中，一代又一代的官僚都只知毕恭毕敬地背诵圣典，而这些人见面时仍用他们喜欢的短语打招呼：“很好，老兄，放松点儿。”

教育计划的毕业生们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超出了一般的友谊。其家庭联姻的情况也很普遍。譬如詹天佑和钟文耀，这两位耶鲁大学时期著名的舵手，都娶了谭耀勋的妹妹。谭耀勋是他们的朋友，他选择留在了康涅狄格州，后因肺结核病逝在科尔布鲁克。当这些毕业生的孩子们到了婚嫁年龄，他们的父母也会让他们跟这个群体内的人通婚：梁如浩的儿子彼得就娶了唐绍仪的女儿梅布尔，梁敦彦的女儿嫁给了詹天佑的儿子。

以广东派为核心，这些毕业生很快就主导了全国的各种重要产业。他们一起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工作。这一次，他们又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了支持。

[1] 原文为“Korea”，韩国，此处译为朝鲜，下同，译者注。

[2] 引自 “The Reforms in China:Epitome and Discussion of the Emperor’s Dress, ” Meriden Daily Republican, November 2, 1898.

[3] 引自Fortnightly Review(London)72(1899):45.

[4] 引自Fortnightly Review(London)72(1899):45.

[5] “The Reforms in China.”

[6] 引自Luke S.K.Kwong,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the Ideas of 1898(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78.

[7] 引自 Charlotte Frankenhaldane , TheLastGreatEmpressofChina(London:Constable, 1965), 145—146.

[8] 引自 Charlotte Frankenhaldane , TheLastGreatEmpressofChina(London:Constable, 1965), 145—146.

[9] “The Reforms in China.”

[10] 光绪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译者注。

[11] 上述译文引自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0页，译者注。

[12] 引自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75、78.

[13] 引自Yung Wing, MyLifeinChinaandAmerica, New York:Henry Holt, 1909, 75、78.

[14] 原文为福尔摩沙(Formosa)，葡萄牙语，“美丽”之意，相传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初到宝岛台湾，被其美景震撼，高呼“福尔摩沙”，意为“美丽的岛屿”。

[15] Francis H.Nichols , Through Hidden Shensi(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2), 193.

[16] 引自David G.Hinners, Tong Shao—Yi and His Family:A Saga of Two Countries and ThreeGenerations(Lanham , 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9), 11—12.

[17] 引自Jonathan Fenby,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New York:Ecco, 2008), 80.



[18] 引自 Jonathan D. Spence ,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232.

[19] 引自 Fenby, Modern China, 第86页。

[20] 引自 Joseph Esherick , The Origin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89.

[21] 引自 Joseph Esherick , The Origin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302.

[22] 引自 William Francis Mannix , ed. , Memoirs of Li Hung Cha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3), 244.

[23] 引自 Der Ling,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New York: Moffat, Yard and Co., 1917), 362.

[24] 引自 Nichols, Through Hidden Shensi, 230—31.

[25] 中国历史上称为“辛丑条约”，译者按。

[26] 引自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8.

## 11 日落

20世纪的前十年，袁世凯正春风得意。他从义和团运动的骚乱和屈辱中崛起，名声毫发无损，广受国人的爱戴。大部分官员相信，袁世凯的士兵是国内最训练有素的，继承了李鸿章“常胜军”之风，那些戴着头巾的强壮士兵，曾平定过太平天国运动。袁世凯与李鸿章相比：两人都自信满满，精通兵法，野心勃勃。李鸿章在1901年11月以七十八岁高龄逝世，逝世前这位不可战胜的领袖身体已变得非常虚弱，要由仆人从椅子抬到床上，气若游丝，说不出话来。袁世凯被任命接替李鸿章原来的职位——直隶总督，掌管首都北京。

自然，袁世凯是他的同僚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历史上一般都由品德高尚之人担任此职。刚走马上任，袁世凯就立即把教育计划的学生召集到身边，并将曾在朝鲜和其他地方跟随过他的人纳入麾下。首先要召回的就是唐绍仪，他在袁世凯的提拔下担任过很多职务，包括天津海关道、北洋大学堂督办，以及处理外交事务的特派员。随后袁世凯撤掉了蔡绍基的北洋大学堂督办一职，任命他为外务部首席顾问。谁来接替蔡绍基掌管这所重要的大学呢？袁世凯想到了梁敦彦，他也曾担任过天津海关道台，并兼任京奉铁路总办。甚至容良，曾在十多年前中国舰队的惨败后便退出了公众视线，也被召回为国家效力。当这位“胡闹的强尼”收到袁世凯的任命函时，立即欣然辞去女子学堂的英语教职，走马上任，在梁敦彦所负责的铁路段担任交通经理。

当然，袁世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军人，因此他需要一位军事专家，让他的军队训练有素。袁世凯问唐绍仪，他是否认识智勇双全、经验丰富，能够胜任此要职的人。唐绍仪说他恰好认

识这样一个人——蔡廷干，儿时的伙伴都称他为“中国斗士”。袁世凯面见了蔡廷干，认为此人可用，便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

不难看出是什么让这位袁寨里长大的将军看上广东帮和教育计划的毕业生们。这些学生在清教徒传统的新英格兰的清苦生活中成长起来。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体格健壮，富有责任感。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知道他们懂得怎样跟洋人打交道。

在义和团运动和随后的灾难性战争之后，洋人对中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70年的军事失利让中国变得虚弱不堪。进入20世纪的中国，军事装备极差，不足以抵御外敌威胁和入侵。英国觊觎西藏，法国登陆海南，日本和俄国蚕食满洲。袁世凯意识到，如果对这些列强吞并中国的企图不加以抑制，中国就会被瓜分。这点他非常清楚，因此他要求他的官员为一个目标努力：对洋人施以管束。

1904年唐绍仪奉命处理针对英国的外交问题。袁世凯授意唐绍仪，决不允许英国像殖民印度那样殖民西藏。因为忌惮俄国入侵喜马拉雅的这个小王国，英国在年初入侵了西藏，并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保护国。北京将此举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一次粗野侵犯。清朝官员声称，19世纪中英共签订了四个条约，在每个条约中他们都声明，关于英国人进入西藏的所有问题，都需要中方允许。鉴于近期的事态发展而必须提醒英国人遵守条约，一个由唐绍仪率领的代表团开赴西藏拉萨，跟英国侵略者谈判。

一见到这些英国官员，唐绍仪就对柯曾(Curzon)勋爵心生厌恶，这位印度总督一直对中国人表示轻蔑，并拒绝妥协。因为柯曾拒绝让步，代表团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希望渺茫，但唐绍仪不这么认为。他在美国的时候已经知道：在民主国家，即使最专横的人也要受制于广大民众的意愿。他知道英国入侵西藏是不受英国选民欢迎的。他告诉他的朋友，时机对中国有利。这时唐绍仪也获悉，英国拉萨代表团里面有一位高级官员，基奇纳(Lord Kitchener)勋爵，是英国驻印度军队的指挥官，在殖民地的官阶仅次于柯曾。他一直强烈反对这次侵略，宁愿中国统治西藏。利用他的美式英语，唐绍仪抓住机会向基奇纳介绍自己。基奇纳很喜欢这位国际化的清朝官员，他们都是狂热的马术爱好者，也都喜欢中国瓷器。回到家后，唐绍仪收集了一批令人叹为

观止的古代花瓶，他在跟基奇纳讨论过各个朝代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之后，从中精选了几件，送给了这位新朋友。

来自英国国内的压力和基奇纳对这次入侵的不断反对最终让柯曾败下阵来。1906年中英签订协议，英国同意中国收回对西藏的主权。这是一次少有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胜利。唐绍仪回到北京受到袁世凯的热情接待。袁将军高兴地说，唐绍仪的成就证明了如果中国能够强硬、灵活、坚决，就能屹立于最强大的西方列强之上。

但不是所有民族尊严的新表现形式都以这么大的规模呈现出来。这些毕业生中的有些人，如梁敦彦，反抗外国压迫的斗争就很微妙。一些中国官员毫不犹豫地向欧洲人行叩拜之礼，并屈服于他们的命令，而梁敦彦却表现得非常严厉和不卑不亢。有一次，一位英国高官的儿子被怀疑利用火车走私炸药，运给当地的革命者，梁敦彦行使他作为铁路局长的职权，在火车站立即逮捕并拘留了这些人。英国领事对此提出抗议，梁敦彦的上司连连道歉，最后这些年轻人还是被释放了。但还很清楚地说明了一点：此后在梁敦彦所管辖的区域，再未出现过走私行为。

袁世凯很佩服梁敦彦这一点，梁敦彦是一个思想坚定，并知道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他召见了梁敦彦，想让他担任中国的外务部部长。让袁感到意外的是，梁敦彦竟然拒绝接受这一职务。

他告诉袁世凯，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不擅长与人交际、周旋，因此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另外他认为国内事务比国际问题更为紧迫。如果袁世凯真的赏识他，那希望袁世凯能让他担任一个省级官员，在国内实施改革。

但袁世凯并不是能够接受拒绝的人。他简单地告诉梁敦彦，无论他情愿与否都必须担任此职。梁敦彦为此感到沮丧，但为时不长。上任后不久，他就遇到了一个国际问题，这个问题很切合他对国内发展的敏锐思考。自从20年前回国后，他从未停止回想在哈特福德的时光，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和最有意义的光，赐予了他才干、技巧和魄力。就像之前的容闳，他相信中国需要把更多的人送到国外去，特别是去美国的学校。他以前负责采矿工作时，无处施展实现他的教育理想。但是在外务部，他或许能够发起一些有意义的项目。

梁敦彦在美国驻华大使里面找到了有合作意愿的人。他们认为可以使用一部分庚子赔款——中国被迫要支付给美国的赔款，派遣一些中国学生到美国的大学去学习。在起草这个新的教育计划时，梁敦彦建议在北京建立一所预备学校，在新一代的学生远渡重洋之前，培训他们的英语，以避免当年他和其他幼童初到新英格兰时、每当读错单词或者忘记端上的食物名称时所遭遇的尴尬和嘲笑。后来，梁敦彦建议成立的这所学校日后成了中国最负盛名的学府——清华大学。学校建成之初，第一任校长也是容闳教育计划的幼童——唐国安。

梁敦彦与美国人的商谈进展顺利，他准备前往厦门，代表政府迎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白色大舰队”，这支舰队正在环球航行，展示美国海军的力量。梁敦彦临行前，去紫禁城拜见了慈禧太后。他与太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慈禧也特别喜欢严肃而能干的梁敦彦。她问梁敦彦跟舰队会晤后有何安排？梁敦彦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他要回广东给祖先扫墓，履行一年一度的尽孝仪式，然后再去看看他的老母亲。慈禧问道：“你母亲高寿？”年近半百的梁敦彦回答说，他母亲七十三了。慈禧笑着说：“那跟我岁数一样啊。”这个曾经冷酷地杀害了自己不少家人的女人，温柔地拔出玉簪，递给梁敦彦，说：“代我把这个送给你的母亲。”梁敦彦深受感动，叩谢后离开了慈禧的房间。出发前，他还要做一件事。梁敦彦虽崇尚现代但仍尊重传统。他查看了《易经》，《易经》是一部玄学。预卜的结果是“临卦”，解释是“你会回到一个空巢”。这让梁敦彦大吃一惊。一路上他都在想这个卦的含义。<sup>[1]</sup>

当梁敦彦忙于公务时，光绪皇帝竟然意外身亡。他还差两年才满四十岁。清廷匆忙宣布光绪帝死于一种慢性病，一名太医诊断后说他是自然死亡。但是一些清廷官员，精于小道消息并热衷于猜疑，衍生出了别样的故事。有些人说，光绪帝是被慈禧毒死的。他们说，太后老了，她担心如果自己死在她侄子的前头，那她死后就没人能够阻止他的改革了。有些人则说，光绪帝是被袁世凯杀害的。袁世凯意识到慈禧太后命不久矣，如果她和光绪帝都不在了，他自己就是这个帝国最位高权重之人，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一个世纪以后，2008年，中国的科学家从光绪帝尸体上取得的头发中检测到，他血液中的砷含量是正常人的两百倍。<sup>[2]</sup>现在已经真相大白，光绪帝是被人谋害的，可凶手是谁，已无从知晓。



第二天北京天方破晓，慈禧太后就在军机处召开了会议，商讨由谁来继承皇位。因为已故的皇帝没有子嗣，慈禧便从最高等的满人家族中挑选皇位继承人。她选定了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是她从前的情人荣禄的孙子，并将这个差两个月才满三岁的孩子取名为溥仪。溥仪的父亲将成为摄政王，慈禧将保留太皇太后这个名誉头衔。皇室继位的问题顺利解决，让慈禧很高兴，午餐吃了些梨之后便晕倒了。恢复知觉后，她宣告自己“身染重病，治愈无望”。她下诏总结了自己辉煌的一生，里面写满了“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这样的话。<sup>[3]</sup>

弥留之际，慈禧发布了最后一道谕旨：“此后中国决不允许女人与闻国政。”<sup>[4]</sup>然后便去世了。

获悉慈禧的死讯，梁敦彦很难过，但并不感到惊讶。《易经》的预言是对的：他真的要回到一个空巢了。

当整个帝国都在哀悼光绪和慈禧时，唐绍仪已经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因西藏谈判有功，他再次被分派了一个重要的外交使命，这次任命可谓深获其心。随着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持续扩张，中国试图阻止两国的侵略，于是袁世凯委派唐绍仪出访华盛顿。按照官方的说法，此次访问的目的，是感谢美国慷慨解囊，允许用庚子赔款来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然而唐绍仪的真正使命却是促使美国签署支持中国在满洲主权的声明，并投资满洲的发展。袁世凯希望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积极影响可以阻止其他列强来干涉这块清朝的龙兴之地。

唐绍仪满心希望奔赴美国。按照计划他要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国务卿伊莱休·鲁特。除此以外，他还想看一看他孩童时代所熟悉的美国风光。这是一次胜利归来：这位曾经忠于职守的学生，成为了自豪而有成就的炎黄子孙，重返美国。

然而，他刚一靠岸，坏消息就传到了码头。他得知当天早晨，鲁特已与日本大使高平小五郎签署协议，确认了日本在满洲南部地区的管辖权。唐绍仪忧心如焚。他急忙去见鲁特，后者却试图美化其让渡中国满洲领土的负面评价，声称那份协议特别确认了中国对其所辖领土的主权。唐绍仪回答说，这当然是真的，但言外之意似乎也暗示日本可以自由争夺在满洲的利益。这次会见未达成共识。唐绍仪感到，美国牺牲中国的利益来取悦日本人，这让唐绍仪感到失望。他决定缩

短行程。他不再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了。他乘船回国，途中在德国停靠，试图寻求德国的支持，但也是事与愿违，这让他更加沮丧。

唐绍仪回到祖国，发现中国已经改变了。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皇室的高层贵族们登堂入室，筹划着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溥仪和他的父亲根本没有实权，也缺乏保护者。一个足够强大的人若想攫取国家权力，简直易如反掌。很多人担心这个人就是袁世凯。朝廷里光绪帝的支持者不信任袁世凯。毕竟百日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他难辞其咎。如果当时这位袁将军能站在皇帝而不是慈禧那边，那么中国这几十年所遭受的灾难就能避免了。对慈禧的效忠者而言，袁世凯野心勃勃又粗鄙无礼，正是那种会把妨碍他的人置于死地之人，哪怕是皇帝也会被他下毒致死。虽然这些官员们一向分歧很大，但一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威胁。他被召到紫禁城，仓促宣布解除一切职务。朝廷的正式理由是他患有足疾。袁世凯回到了位于河南省南部的家乡。他精通一点：中国的历史总是轮回的，他只是要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袁世凯的亲信随他一起走下了历史舞台。教育计划的毕业生们，除了极少数以外，一个接一个被朝廷革职罢免，发配还乡。自从外交任务失败以后，唐绍仪就知道自己不会再有一官半职了。他回到了南方的家乡，这些年身为高官，他积累了一笔财富，给自己置办了一份家产，有网球场和观象台。他并没有计划在这里久居。现在还不到告老还乡的年龄，他才47岁，大部分时间都去做运动，整理瓷器，或在院子里散步。跟大多数官员不同，他们用栅栏把自己的住所围起来，不让农民邻居进入，而唐绍仪的院子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同时，他跟袁世凯一样等待着时来运转。

唐绍仪和袁世凯都没有等太久，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了。像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一样，起义最初在一些零零星星的地方开始，而后很快席卷全国。起义的起因很偶然：1911年10月9日，在长江沿岸的南方城市武昌，有人在一个秘密社团的办公室里引爆了一颗炸弹。赶到现场进行调查的警察发现了这个地下组织的成员名册，上面列出了一些军官的名字，这些人想组织斗争来反对当前猖獗的腐败现象；这些人知道将面临拘捕或处决，于是随即起义。几天之内他们便召集了3600人。朝廷官兵试图驱散起义者，但失败了。朝廷官员仓皇逃离出城。武昌便丢失在小皇帝的手里。遍布湖北全省的很多地方强人纷纷

效仿，驱赶清廷的代表，杀戮满人。不到两周之后，起义席卷到了南部的湖南省。到月底，已有七个省份发动了反对朝廷的起义。

孙中山，这位被驱逐的改革家，当他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馆里获悉这些形势发展时，他意识到他的历史机遇到来了。跟容闳一样，孙中山出生于广东一个小县城，也在少年时就离开了中国。他渐渐地着迷于美国的政治——特别是葛底斯堡演说，每每让他感动，他还喜欢洋人的很多其他品味。例如，孙先生终其一生都有朋友说他不喜欢吃米饭，喜欢牛肉汤。孙中山去了香港，皈依了基督教，以革命为己任。孙先生外表潇洒、气度宽广，是女人的理想伴侣和男人的天然领袖，不久后他就开始投身革命事业。因为缺乏武器和谋略，他在1895年发动的一次起义遭遇惨败，被迫逃离中国。在国外他的主要工作是筹募资金，他得到了欧美爱国侨胞的广泛支持，因为他们觉得孙中山正是中国需要的人。1911年的起义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承认说，“这一次，我没有费吹灰之力”。<sup>[5]</sup>形势的发展让孙中山激动不已，他告别了洛基山脉，踏上了回国之路。

在中国，事态一发不可收拾。眼看起义军控制了一省又一省的武装，军机处不得不承认现在能够控制事态的只有袁世凯一人了。一个官员代表团去袁世凯的家乡看望他，袁世凯此时正在十个姨太太的温柔怀里享受，他说自己现在很享受这种退休后的生活，已经无意再披上戎装了。经过官员们的一再恳求，袁世凯才答应下来，但有两个条件：他要对中国军队有绝对控制权，另外还能有权根据需要改革立法。官员们急于镇压起义，只得答应了。

袁世凯的军队向武昌发起猛攻，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很快就镇压了反清廷的武装。但是袁世凯看到了一条可以不战而胜的路。他与一名起义军的头领签订了秘密协议，袁世凯承诺饶过起义军，但起义军必须要在政治上与他合作。11月14日，袁世凯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运用自己新获得的权力，他宣布成立了一个政府，自任首相。他声称中国要想生存下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立宪制。恭顺的摄政王无力反抗，只能宣布退位。

但是起义风起云涌，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南部的南京。袁世凯号召革命党的领袖一起建立一个联合共和国。但孙中山却无动于衷。他在圣诞节到达上海，很快就从革命党中脱颖而出，成为最能干和最有名

望的人。除了那些在经历过屡次革命失败仍追随孙中山的人以外，他还用领袖魅力和决心赢得了不少新支持者。有一名革命者说，袁世凯的提议有可取之处，中国也许可以由议会和首相来治理，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孙中山听了大怒：“如果有人要毁掉我们伟大的革命计划，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sup>[6]</sup>他的反对者一个接一个地退回。孙中山变成了毫无争议的革命领袖。

12月29日，新成立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投票选举中国的新总统。国名大会包括870名参议员，这些人代表各式各样的政治信念，他们是通过一个漫长的地区选举筛选出来的。这个中国历史上与议会最相近的政治组织，以压倒性的票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1912年元旦夜幕降临时，在一个被电灯而不是灯笼照得通亮的大厅里，孙中山作为新政府的元首就职，立誓“推翻暴虐的清朝政府，统一中华民国，谋求广大人民的利益”。<sup>[7]</sup>

然而孙中山的权力是很脆弱的。他没有武装力量能够打败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军队。孙中山很清楚，如果袁世凯的胜利不可避免，那这些参议员们很可能会转而效忠袁世凯。孙中山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明白除了跟袁世凯妥协以外别无选择。就职当天，孙中山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虽然自己接受了总统之职，“但其实是在等你，我会向全世界表明这个承诺，我希望你能尽快接受”。<sup>[8]</sup>

这正中袁世凯下怀。他去紫禁城告诉清廷，孙中山已经同意把大总统之职移交给给他，既然共和国的权力都已经集于他一身，清朝统治要结束了。现在是这位六岁小皇帝退位的时候了。尽管皇权的效忠者们发誓反抗，但他们的话已经无足轻重了。1912年2月12日，清廷发布了最后一道诏书，由隆裕皇太后颁布。

显然成立共和体制的政府已是民心所向，广大苍生的愿望代表了上天的旨意，朕等不会因为一己之私来违背民意，而招致成千上万百姓的责难……太后和皇帝将退位，去过轻松的生活，不再承担任何公职，愉快度日，享受子民给予的恩赐，满足地注视着美好政府的建立和实现。<sup>[9]</sup>

随着这道诏书，中国将近两千年的皇家统治寿终正寝。



次月，国民大会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烟火照亮了天空。孙中山发表演说，称他的继任者是“共和国的朋友，革命事业难能可贵的奉献者和公仆”。<sup>[10]</sup>此后不久政府便草拟了一份新宪法，保证中国公民人人平等，享受法律的保护。国民大会决定，十个月之内重新选举总统。这些现代的进步似乎姗姗来到了。

教育计划的学子们在卸任后不到三年，又重新得到任命，在袁世凯的新政府内大显身手：唐绍仪被任命为首相，梁敦彦被任命为外务部部长，蔡绍基和梁如浩任外务部副部长。深得袁世凯信任的军事专员蔡廷干，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级顾问。

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蔡廷干私下拜访了这位新总统。他过来执行一个象征性的仪式。当房间里只剩他们两人时，这个当年在新英格兰的机械厂特准剪掉辫子的男孩，拿出一把刀，把袁世凯的辫子剪掉了，这位骁勇的军人从清朝最后一点遗迹里面解放出来了。现在他不再听从任何人的命令了。

当容闳的学生们引导着中国走向未来时，容闳却没有机会目睹他们的成功了。十年前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他逃离了中国，随之惊恐地发现他持有长达50年的美国公民权被撤销了。通过他的美国朋友的影响力，容闳提出了上诉。国务卿约翰·舍曼回复他说：“鉴于容闳已获准入美国籍，现在却拒绝承认他已享有多年的公民权利，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公平和不恰当的。但是根据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的入籍法，国务院认为他不再享有美国公民权了。”<sup>[11]</sup>五十年前容闳来到美国求学，三十年前返回美国安排120名幼童的留学事宜。而现在他只能乘坐一艘开往圣弗朗西斯科的小船，像小偷一样非法潜入这个国家，正好赶上他的小儿子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没有美国公民权，也没有中国正式的官衔，因此他别无选择。早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已经用尽，他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住在公寓里。其他房客受那个年代仇外风气的影响，都不愿意与他同桌用餐。当年他谆谆教诲的学生已在中国第一个共和国中身居高位。那几个月之后的1912年5月29日，容闳在穷困和孤独中死去。

如果容闳的学生能听闻到老师的噩耗，也没有时间来哀悼。监管铁路、煤矿和战舰的运行是一方面。引导整个国家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则需要更多责任心和智慧。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准备好了。虽然



他们初到哈特福德时，就确信将前程似锦，但没有几个人能想到有朝一日“埃贾克斯”唐绍仪，这位中国教育计划的明星人物，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或者梁敦彦，这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能够掌握国家的外交政策。当然，他们一直都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即使在时局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也全心全意地相信，总有一天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报效祖国。但帝国的衰落却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现在他们握有权力，热切地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像他们少年时代所崇拜的美国那样民主、完美、富有革新精神的共和国。

然而，无论实行封建帝制还是共和制，中国十分抵制留学生们所期望引入的各种变革。唐绍仪发现在北京政府高层的工作是很繁重的。作为首相，他负责组建内阁，并认为内阁应该由代表各种政治信仰的人组成。为了成立一个公正持久的政府，他绞尽脑汁，运用非凡的领导才能，恳求、承诺、劝诱。但是袁世凯的自负要比唐绍仪的能力更胜一筹。袁世凯不能很好地接纳不同的政见。不久唐绍仪就发现自己总是跟这位曾经的恩人意见相左。

袁世凯就职总统后不久，就变得越来越专制了。他不惜采用暗杀手段来对付政治对手。孙中山的一些追随者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国民党，并誓言如果袁世凯不信守承诺依照民主宪法统治共和国，他们就会诉诸武力。袁世凯骨子里其实是一名战士，把所有批评都理解成不顺从。

到了6月，也就是上任后3个月，唐绍仪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处境了。他已无意再成为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执行人，因此辞去了职务。虽然袁世凯三番五次劝说他回京继续任职，他都拒绝了。唐绍仪的表兄，梁如浩也紧随其后。此后不久，孙中山和年轻有为的领导人蒋介石等国民党人逃到了日本。中国的新政府举步维艰，中国又回到了司空见惯的混乱状态。

很多年后，唐绍仪告诉一位英国记者：“我们错误在于给予总统过多的权力……至少理论上，我们赋予了议会和代表人民的政府所有由下至上的权力，但是这个总统是一个比皇帝更大的暴君。大权集于一人之手，从而导致了共和国的弊端比清朝政府的更多。”<sup>[12]</sup>

袁世凯安排了一些阿谀奉承之人来填补内阁空缺。在为袁世凯效力时，梁敦彦很快就对这位旧军阀失去了信心。袁世凯一直蔑视儒家经典，这让梁敦彦越来越失望。在美国求学期间，梁敦彦跟其他幼童一样，不喜欢在放暑假时在哈特福德“地狱屋”里读《论语》、背古文。但随着年龄增长，梁敦彦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如果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国。他恳请袁世凯重新考虑他的立场，但袁世凯正急于消灭儒学，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没过多久梁敦彦也辞职了，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家乡，袁世凯再也没能挽留住他。

当形势分崩离析的时候，袁世凯越来越心神不宁了。他现在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一个无价值的总统，终日与傲慢的部长们争论，或者说服议会议员采纳他的意见。而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带领中国走向强盛。中国需要另一个皇帝。

1915年秋天，袁世凯组建了一个朝廷：6位公爵、11位侯爵、12位伯爵、4位子爵、16位男爵，这些人都是从他最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中选出来的。12月23日，他驱车进入紫禁城大门，朝天坛驶去。到了天坛后，他从车里出来，脱掉制服，换上了一件丝制龙袍。在简短的仪式后，加冕为皇帝，年号“洪宪”。<sup>[13]</sup>

袁世凯以前的手下如梁敦彦、唐绍仪等对袁世凯称帝提出了无情的批评。一向稳重的梁敦彦对一位外国大使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让他“大为不悦”。<sup>[14]</sup>唐绍仪的反对尤甚，他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包括中外新闻界人士，袁世凯“让这个国家蒙羞”，他“在六个臭味相投的鸦片瘾君子的怂恿下”，决定恢复帝制。<sup>[15]</sup>他说袁世凯是一个暴君，四处抓捕诋毁他的人。这些留学生们以前就尝过失望的滋味，对于财富的得失也已见怪不怪了。但这次不仅是另一次倒退。袁世凯以牺牲共和国理想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推翻了一切教育计划的学生们认为合理的东西。这些留学生忠于传统，因此尽管他们在自由的美国接受教育，相信西方进步理念和科学技术，但这120名幼童中，仅有一人投身于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尽管传统是沉重的，留学生们仍然心怀崇敬。因此当天命攥在一个利欲熏心的军人手中时，容闳的学生们不顾一切地表达自己的愤怒。

日本人感觉到袁世凯越来越孤立了，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逼迫这位新皇帝割让大片土地给日本——包括山东、满洲和福建。这位

传奇的将军当时正全神贯注的将兵力用于镇压国内的骚乱，缺乏有力的武力抵抗和有效的外交斡旋，因此日本人要什么，袁世凯就给什么。起义不断爆发，中国似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袁世凯也因为常年征战和酗酒，病倒了。

1916年3月18日，袁世凯的一名澳大利亚顾问W. H. 唐纳德，来看望这位皇帝。他告诉袁世凯说：“您必须退位，不能再自欺欺人了。”袁世凯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累了。”<sup>[16]</sup>然后就离开了房间。三天后，他通令全国，他不再是皇帝，而是总统了。但此举并没有让骚乱平息下来，袁世凯准备逃出中国，唐纳德帮他安排出国事宜。在孙中山的帮助下，达成一项协议：把袁世凯东渡到日本。但为时已晚：6月6日，袁世凯死于肾衰竭。

袁世凯死后，为了争夺政权，各方派系又扭打起来。7月1日，溥仪被扶植重新登基，试图复辟清朝帝制。慈禧太后以前很喜爱的梁敦彦，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保皇党。他公开支持溥仪，并担任交通部部长一职。外国人认为梁敦彦是留美的国际法和铁路管理方面的专家，因此对他效忠这位困境中的小皇帝深感困惑。没有几个人相信受过西式教育的梁敦彦，竟然会与倒行逆施的保皇党为伍，尤其是这种复辟行动基本上没有胜算。

1917年7月5日《伦敦时报》的记者G. E. 莫里森，写信给梁敦彦，对这位他自以为了解的人表示友好的关心：“没有哪个中国人像您一样得到外国人的广泛尊重。正是因为这样，我痛苦地获悉，您加入到了复辟帝制的疯狂行动中去……您支持的朝廷是绝对不会持久的。”<sup>[17]</sup>莫里森催促梁敦彦在政权垮台前离开北京。

两天后，莫里森又给梁敦彦写了一封信，因为梁敦彦拒绝任何让他退出保皇党的建议。莫里森还得知，梁敦彦强迫他从前的同班同学蔡廷干加入了溥仪新成立的朝廷。他只能想到一种可能的解释，他错误的指责梁敦彦吸毒：<sup>[18]</sup>

因为常年吸食鸦片，你已经神志不清了。但也不至于如此糊涂，让朝廷任命蔡廷干为海关总署副署长，还意识不到这种行为是多么不光彩。你们一起在美国读书时，蔡廷干就一直是你的挚友。而现在看

来就像是蔡廷干心甘情愿为这个荒唐的朝廷效力，你也知道这并不属实。我今天会发电报制止你对自己的朋友做出的荒诞行为。

但蔡廷干和梁敦彦一样，看到中国古代传统的价值，心甘情愿地为皇帝效力。7月12日，复辟后仅十一天，溥仪就被一个争权夺利的军阀推翻了。

溥仪成为庶民后，于1922年迎娶了一位满族公主。为庆祝新婚，在北京举行一场正式的宴会，接待外国官员。<sup>[19]</sup>虽然不再是皇帝，溥仪仍住在紫禁城内。将近两百位客人来到乾清宫，逐一向退位的皇帝和皇后鞠躬并握手。陪同客人的官员中就有梁敦彦和蔡廷干，两人现在对在康涅狄格州时困惑不解的儒家思想都怀着无限忠诚。

溥仪退位以后，中国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1917年孙中山回国后，号召国民党在他的领导下为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而奋斗。他1925年死于癌症，蒋介石继承他的衣钵。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与羽翼渐丰的另一个党派——中国共产党合作。1927年蒋介石背信弃义，共产党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历时1年，行程长达8000英里，目的地是荒芜的中国大西北。在这里共产党继续与他的前盟友展开战斗。长征期间，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一位年轻有为的人——毛泽东，接掌了共产党的领导大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抗一直继续。1931年，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扶植二十五岁的溥仪上台。

除了极少数例外的情形，这些动荡的岁月没有在容闳的学生心里留下什么痕迹。他们倾其毕生心血，在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这条缓慢而曲折的道路上前行。他们不得不与思想狭隘的清朝官吏或腐败的办事员一起共事；在最无回报的职位上长期供职；在复杂诡秘的清廷中因为成功而遭受猜忌和怀疑。他们已经亲眼看见了那些标榜自由、民主和自主的西方列强，毫不留情地榨取中国的财富，阻碍中国独立。他们虽然一直热衷于在美国目睹的崇高理想，但从来没有对中国的传统和习俗失去热情。他们想要变革，而不是革命。他们想要进步，但在每个转折点上，进步都受到排斥。20世纪20年代，他们大多已步入花甲之年，没有精力继续争斗了。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前途可言，剩下的只有过去。



蔡廷干整日在他的花园里思考，写古诗或翻译诗词。梁敦彦则沉浸在古代帝王传记和《论语》之中。

晚年的唐绍仪大部分时间都在追忆中国过去的荣耀。回到中国南海上的故乡之后，他把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瓷器收藏上。一位西方评论家写道：

这可能是中国最珍贵的私人收藏了。宋明时期的瓷器，月白瓷、宝石红、紫红、青花，都排列在墙上的架子上。每件都有黑色柚木雕出来的基座和绸缎垫衬的盒子。唐绍仪用他鉴赏家的手指轻轻爱抚每一件宝贝。他拿下来一件冷绿色的大瓷瓶，上面是五爪抱珠蟠龙图，龙的神态怡然自得。唐绍仪称：“这件是我最喜欢的一件，是稀世珍宝。我让人在国内找了5年，想找到与之配对的瓷瓶。J.P.摩根是不是很想找到它？”<sup>[20]</sup>

但像唐绍仪这样才思敏捷的人，鉴赏古玩不足以填补他思维空白。他时常想拯救国家于危亡。有传言说他与日本侵略者为伍，他曾公开承认他很欣赏日本人实现现代化的才能。有人觉得唐绍仪是个很大的威胁，虽然不清楚这个“有人”到底是谁，猜测很有可能是蒋介石。

深知这位前国务总理酷爱瓷器，1938年9月30日下午，三位乔装打扮成古董商的人来到唐绍仪的府邸。他们随身携带了数十件瓷器，此时76岁高龄的唐绍仪，本该忙着准备女儿在当天晚上的婚礼，却无法抗拒瓷器的诱惑。当他欣赏这些古董时，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地把会客室中的火柴全部拿走了，然后拿出一根雪茄向唐绍仪借火。唐绍仪四处看了看，但没有找到火柴。他吩咐下人去厨房拿一盒新的火柴。刺客们等待的时机来了。其中一人把手伸进一个大玛瑙瓶子里面，拿出一把斧头，朝着唐绍仪的脑袋狠狠地砍去。唐绍仪倒在地上，血流不止，发不出声音。这三个人收起带来的古董，逃出门，钻进一辆早上偷来的小轿车里，驾车逃走了。<sup>[21]</sup>

唐绍仪躺在会客室的地板上，血流如注。下人拿火柴回来，冲过来救他的主人。当天下午，唐绍仪就与世长辞了。



- [1] 梁敦彦在线档案，人民大学，<http://www.daxtx.cn/liangdunyan/index.htm>.
- [2] “Arsenic Killed Chinese Emperor , Reports Say , ” CNN , [http://www.cnn.com/2008/WORLD/asiapcf/11/04/china.emperor/index.htm?eref=rss\\_\\_world](http://www.cnn.com/2008/WORLD/asiapcf/11/04/china.emperor/index.htm?eref=rss__world), retrieved April 2, 2010.
- [3] 引自 J. O. P. Bland and E. Backhouse ,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292.
- [4] 引自 Frank Dor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Biography of a Palace (New York: Scribner, 1970), 292.
- [5] 引自 Joseph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Calif.: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8), 225.
- [6] 引自 Shinkichi Eto ,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2.
- [7] 引自 Jerome Ch'en , Yuan Shih-k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23.
- [8] 引自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267.
- [9] 引自 Elsie F. Weil, “The Boy Emperor of China, ”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17 (March–December 1917): 448.
- [10] Marie-Claire Bergere , Sun Yat-se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20.
- [11] John Sherman 给 Charles Kenby 的信，1898 年 4 月 14 日，no. 1567，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77.
- [12] 引自 David G. Hinners, Tong Shao-Yi and His Family: A Saga of Two Countries and Three Generation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9), 38.
- [13] Jonathan Fenby , 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Ecco, 2008), 136.
- [14] 梁敦彦在线档案，人民大学，<http://www.daxtx.cn/liangdunyan/index.htm>.
- [15] 引自 Hinners, Tong Shao-Yi and His Family, 41.

[16] 引自 Earl Albert Selle , Donald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179.

[17] 引自 Lo Hui—Min, ed. , 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 , vol.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607.

[18] 引自 Peter Thompson and Robert Macklin,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orrison of China (Sydney: Allen & Unwin, 2008), 403.

[19] 引自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Vancouver , b.c.: Soul Care Publishing , 2008), 297.

[20] 引自 David G. Hinnners, Tong Shao—Yi and His Family, 41—42.

[21] 引自 David G. Hinnners, Tong Shao—Yi and His Family, 49.

## 后记

2009年冬天，我们去中国旅行，实地走访了很多本书故事的发生地。我们走过容闳曾经的故乡，坐在唐绍仪用过的桌子旁，也到过袁世凯称帝的地点。当我们对中国教育计划的毕业生了解得越多，就越被一个简单的问题所困扰：他们的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

任何一个结论都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持。一方面，在离开中国去新英格兰留学的120名幼童中，大多数人后来都获得了有权力和影响力的地位。为了行文的简洁和连贯，我们选择了教育计划中最突出的一些学生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但是其他很多人也同样杰出。周长龄成为第一位进入香港立法委员会的中国人，并被大英帝国封为爵士。周万鹏，作为电报局局长，曾致力于连接中国分崩离析的各省和改革中国落后的通讯体系。吴仰曾在新英格兰时绰号是“短吻鳄”，他曾担任中国几家最大的煤矿的负责人，并引进了新技术，推动采矿业进入一个高效率和高利润的时代。还有很多人像他们一样，他们是用自己所学的西方知识服务于国家的先驱者，是现代中国应该深深感激的人。

但是，一些毕业生虽然在美国度过了青春时期，后来却发现自己并不能取得成功。譬如，李恩富，1884年他返回美国并根据自己留美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因此小有名气。他娶了一位美国太太，成了家，但是因为他对美国的反华情绪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要接受这样一个外国人的批评是很困难的。他的妻子和他离婚了。他的余生从事过各种临时性的工作，一度曾经营过一个家禽市场。陆永泉也返回了美国，在耶鲁大学取得了学位，随后任中国驻纽约副领事。1909年，一个精神失常的、失业的中国人误入领事馆，给了他致命的一枪。即使是许多似乎一度被赐予幸运生活的人，也在孤独痛苦中死去。梁敦彦，1924年患上了肺炎，在66岁时病故了。容

良，那个曾经欢蹦乱跳的“胡闹的强尼”，1931年日本人的炮弹击毁了他的房子，使他变得一无所有。但容良至少还幸福地生活了23年多，身边有儿孙陪伴。另一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蔡廷干，绰号“中国斗士”，死于1935年，享年74岁，死时身边除了留有自己诗词外一无所有。

比个人成败更重要的是，这个教育计划的故事正是中国向现代化前进的故事。在美国，毕业生们已经看到了民主的好处和发展的可能，但是在他们回国之后很快就发现古老的帝国浸淫在传统中，受到自身规则的支配。如果想要前进，必须走自己的道路，符合自己的节奏。留美幼童们不知疲倦的工作，给予中国发展所需的工具方法，他们也同样竭尽全力地保护着国家主权免受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的侵占。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要断定中国教育计划故事的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中国继续面临教育计划毕业生们所面临过的同样的挑战 and 关切，那么故事就将一直继续下去。

## 译文说明

对于地名、任务和关键的中国术语，我们试图尽可能地使用拼音拼写系统，该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成为国际标准，现在几乎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我们希望这样能对那些好奇的读者有所帮助，他们也许想要在地图上跟随我们的人物，在百科全书里面找到他们，或者在其他地方引用他们的事迹。

但是，我们仍需在达成这种愿望的同时考虑其他因素。我们的大多数英文第一手资料都追溯到了拼写标准尚未存在的年代，那时将中文名字转成英文多少有点乱糟糟的。让情况变得更为混乱的是：在我们的资料里个人事迹和地名使用的都是广东话的发音，而不是普通话的发音，广东话是我们故事涉及的大部分人的家乡话，普通话则是基于拼音系统的语言。因此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不能找到这些名称所对应的普通话；另一方面，将我们的主人公所熟悉的广东话地名或者人名用普通话或者过时但常用的英文拼写代替，看起来也是不恰当的。毕竟，我们的主人公是用英文读写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在书中忠实地保留他们表现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

为了达到这种平衡，我们利用一些可行的标准构建了自己的翻译体系。当一个人物或者地点的特定拼写是广为人知时，我们就保留这种拼写：比如，在英语里提到容闳时，很少——即使有的话——提到他的普通话拼音Rong Hong。同样，当主人公知道某个特定的地名或人名，而这个名称的拼音并非广为人知时，为了传达人物的主观情感，有时为了保留地方特色，我们就使用这个非标准的拼写。有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在本书所展现的事件发生的时代里，讲英语的人熟知的常见名称是什么。比如广州市，中国人从来不称之为



“Canton”，但19世纪时讲英语的人都称之“Canton”，因此这个名称表达了汉语拼音Guangzhou所不能表达的地方性和时代感。

因此，我们偶尔会为了保留特色而放弃一致性。我们希望那些注重细节的读者能够原谅我们，建议他们必要的时候查阅尾注中标准汉语名称和拼音拼写。

## 资料来源

在讲述中国教育计划故事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和最要感谢的是该计划的委员、毕业生和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留下了传记、日记和其他极为宝贵的一手资料。特别有帮助的是：容闳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和李恩富的*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以及Dr.Joseph Twichell的书信，收录在Steve Courtney的*Joseph Hopkins Twichell:The Life and Times of Mark Twain's Closest Friend*一书中。还有两篇未出版的关于留学计划的论文:Chris Roby的“Building the Bridge: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A Sino—American Historico—Cultural Synthesis, 1872—1881”和Anita Marchant “Yung Wing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t Hartford.”

许多在美国和中国的档案资料都是以信件、日记和照片的形式保存的，归我们的主人公所有。包括康涅狄格历史协会；科尔布鲁克历史协会；容闳在耶鲁大学的论文；梁敦彦在人民大学的论文；珠海国际文化交流档案。

胡劲草——央视的制片人和留美幼童系列纪录片的创作者——很友好地与我们分享了她的影片、评注以及见解。Jimmy Tong，唐绍仪的外甥，邀请我们去他家，并与我们分享了他的亲戚的一些往事与文件。

我们也十分感谢Thomas E.LaFargue的杰作，他与留美幼童的相遇使他写下了*China's First Hundred: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我们还要感谢David G.Hinners，他的家庭与教育计划的联系形成了他的作品:*Tong Shao—Yi and His Family:A Saga*

of Two Countries and Three Generations, 还有Stacey Bieler的 “Patriots” or “Traitors” ? :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通过努力地全面看待中国历史的广阔景象, 我们发现自己很幸运地从所学中得到了特别的收获。我们特别感谢Jonathan Fenby, 他的作品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扣人心弦并令人大开眼界。感谢史景迁, 他的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是同类题材中公认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 感谢William T.Rowe, 他的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细腻又广阔的框架, 对我们了解清朝衰落时期的政治经济具有启发性。

关于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生平及思想, 有很多来源于Samuel C.Chu和Kwang—Ching Liu的Li Hung—chang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以及Kwang—Ching Liu的 “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Li Hung—chang’ Formative Years, 1823—1866”, 发表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

关于早期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的好奇和恐惧, 我们参考了Peter Kwong和Dusanka Miscevic的Chinese America: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以及Iris Chang既精彩又悲伤的故事The Chinese in America:A Narrative History。

最后, 这本书讲述的既是中国的故事也是美国的故事, 因此我们对美国19世纪经济状况的见解很多来自John Steele Gordon的An Empire of Wealth:The Epic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wer和Stephen E.Ambrose的Nothing Like It in the World:The Men Who Built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正如他们所记录历史的国家一样, 他们的作品也是勤奋和勇气创造出的奇迹。

## 致谢

我们能够追随中国教育计划的毕业生在中国和美国的足迹完成本书，必须要深深感激以下为我们指点迷津的人们：

在香港，钱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建议和指点，为引导我们的研究贡献良多。而热情的Anna Bisazza则让我们领略了香港的大都市魅力和体验了山谷中的美好。

在珠海，杨毅（留美幼童研究会秘书长）和Donald Tan帮我们探索教育计划的缘起。对我们而言，他们既是慷慨热情的主人，又是知识渊博的向导。我们还有幸见到唐绍仪的曾侄孙Jimmy Tong，他与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他那著名先人的故事。

在北京，胡劲草与我们分享了她对中国教育计划及其毕业生的广泛研究成果。她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解帮助我们吧120名幼童迥然不同的经历整合成为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

在康涅狄格州，我们得到康涅狄格州历史协会的慷慨相助，并得到了科尔布鲁克历史协会的历史学家和游吟诗人Bob Grigg极大的帮助。

在纽约，一些才华横溢的朋友也给予了我们不少帮助、宽慰和启发。Austin Woerner——我们杰出的翻译者，以他诗人的触觉和学者的洞见，帮助我们捕捉清朝那艰深的美丽。Lisa Ann Sandell一直是最敏锐的优秀读者，她的评论帮助我们吧从烦杂蔓延的故事厘清了脉络。Krisa Ingebretson耐心地容忍我们的愚见，并与我们分享她绝妙的洞见。Anne Edelstein——我们无与伦比的代理人，她拥有无限的智慧，给予了我们不懈的支持和宝贵的友谊。最后，能够与美国诺顿图书出

版公司(W.W.Norton)的同人共事让我们感到万分荣幸：人品高洁的 Laura Romain，她勤勉而熟练地处理我们的书稿，直至交付印刷；神采奕奕的 Winfrida Mbewe，她熟练地将我们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超过了我们所能自我呈现的。Amy Cherry，我们的编辑，她敏锐的头脑和宽阔的胸怀难以用言语表达，感谢她为我们做的一切。



## 索引

(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

### A

agricultural colleges, U.S. 农业大学, 美国 109

agriculture 农业 36, 85, 107—9

Analects(Confucius) 《论语》 (孔子) 251, 271, 277

Anqing, China 安庆, 中国 74

Anstey, Thomas Chisholm 托马斯·奇泽姆·安斯蒂 58

Asylum Hill 庇护山 114

Asylum Hill Congregational Church FE 护山集会教堂 1667

athletics, in U.S. educational system 体育, 在美国教育制度中 16, 25

avoidance, as governing principle 回避, 作为制度 39—40

### B

Barnes, James 姆斯·巴恩斯 78—79

Barnes, William 威廉·巴恩斯 78

Bartlett family 巴特利特一家 118, 167

baseball棒球120, 121, 128, 141, 168, 180—81, 183, 192, 196, 225

Beijing, China北京, 中国246

Beijing—Fengtien railway line北京—奉天铁路254

Beijing—Kalgan railway line北京—张家口铁路250—51

Beijing—Shanhaiguan railway line北京—山海关铁路247—48

Beijing—Tianjin railway line京津铁路248—49

Beitang, China北塘, 中国235

Bell, Alexander Graham贝尔138

Board of Revenue户部204

Bolivarian revolutions玻利瓦尔革命44

Book of Changes 《易经》259, 261

Boston Tea Party波士顿倾茶事件44

Boxer Revolution义和团运动237—46, 253, 255

Brown, Samuel塞缪尔·布朗20, 28

Burlingame Treaty(1868)《蒲安臣条约》(1868年)87, 129, 156, 157—58

## C

Cai Shaoji蔡绍基128, 148—51, 196, 211, 224—26, 246—47, 251, 254, 268

cai(talent)才(才能)21, 26, 55, 56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95—99, 105—6, 154—56

calligraphy书法227

Canton, China广东, 中国35, 45—46, 50—53, 55—56, 65

Cantonese Clique广东帮251—52, 254—55, 272—73

Canton Province广东省88—89

Canton system广州体制43—44, 47

Cao Jiajue曹家爵133—34

Capron, Clara克莱尔·凯普伦124, 128

Capron, Eunice尤妮斯·凯普伦115

Carrington family卡林顿一家165

Catholic Total Abstinence Union of America美国天主教完全戒酒联合会137

Centennial Exhibition(1876)百年博览会(1876年)134—142, 160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中央太平洋铁路100, 102—104

Chang Yen—mao张烨茂236—37

Chen lan pin陈兰彬87, 112, 116—117, 122—24, 126—28, 129—31, 133, 141—42, 157—58, 162, 232

Chiang Kai—shek蒋介石276

Chien Sheng “建胜”号182—84

China中国9—10, 21, 35—43, 45—48, 54, 65—67, 76—77, 80—81, 83—85, 87, 100, 123, 129, 134, 145—46, 156—60, 193—

94, 198—99, 203—18, 220—23, 225—33, 235, 237—38, 244—45, 247, 251—52, 255—56, 261—68, 276—77, 280—81, 292n

China Republic of(ROC)民国 (简称ROC)266—68, 270, 273

China Mail 《中国日报》31, 57

Chinese benevolent associations中国慈善协会97—98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CEM)中国教育计划 (简称CEM)9—10, 87—89, 111—14, 116—18, 122—24, 126—27, 129—31, 141—47, 153—54, 156—63, 168, 172, 231—32, 258, 279—81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Students of大清留美幼童10—11, 93—95, 99, 102, 106—7, 109—10, 111—18, 120—22, 125—28, 134, 138—41, 147—51, 156—57, 163—64, 167—68, 171—87, 192, 195—98, 204—5, 207—8, 211, 219, 225—26, 239, 247, 251—52, 254—55, 263, 268, 272—73, 276—77, 281

Chinese Exclusion Act(1882)排华法案(1882年)157, 246

Chinese immigrants in U.S.中国移民95—99, 101—5, 157, 153—58, 160, 246

Chinese language中文31, 34, 545, 127—28, 147

Chinese New Year农历新年146

Chow Chang Ling周长龄279

Chow Wan Pung周万鹏279—80

Christians, Christianity基督, 基督教55—56, 116, 164, 237—39

Chung Mun Yew钟文耀151—53, 252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科举考试22—24, 54, 227, 247

Civil War, U.S.内战，美国78, 100, 103, 108, 188, 211

Cixi,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慈禧太后199—202, 213, 226, 228—31, 233, 235—36, 238—39, 240—41, 243—46, 259—62, 274

Cohong公行44, 47

colleges and university, U.S.学院和大学，美国109

Columbia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156, 163, 165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共产党276

compradors买力63—64

Confucius, Confucianism孔子，儒家21, 23—24, 36, 55, 73, 87, 98, 127—28, 142, 160, 193, 201, 228, 271, 277

Connecticut River康涅狄格河114

coolies(k'u—li)苦力95—96, 99, 247—48

copper shortages铜短缺40

Corliss, George H.乔治·H.科利斯138

Corliss centennial steam engine科利斯百年纪念蒸汽机138

corruption腐败39—40

cotton, Chinese imports of棉花，中国进口44

Courbet, Admiral孤拔187

Crocker, Charles查尔斯·克罗克102

Cubic air law, San francisco《立方空气法》，旧金山105

Curzon, Lord洛德·柯曾255—56



## D

Daoguang, Emperor of China道光皇帝46, 49

Deere, John约翰·迪尔107—09

Denby, Charles田贝203

Deng Shicong邓世昌128

Ding Richang丁日昌84—87

district magistrates府县级行政官员39—40

Donald, W.H.W.H.唐纳德273

Donghak东学党210

Dorman, L.M.L.M.多尔曼17—18

Douglas, William威廉姆·道格拉斯42—43

dysentery痢疾102

## E

East India Company东印度公司44

economic liberalism经济自由主义42

educational system, China教育制度, 中国21—25, 33, 83—85,  
122, 246—47

educational system, U.S.教育制度, 美国16, 20—21, 25, 33, 109

Elliot, Charles查尔斯·埃利奥特46

English language英语118, 120—21

Eureka “尤里卡”号27—31

Europe, expansionism in 欧洲主义41—42

Ever Victorious Army 常胜军79—80, 253

## F

famine 饥荒244—45

Fearing, Henry 亨利·费林166

Fenby, Jonathan 乔纳森·芬比237

fiefdom 地方权力39

First Opium War(1839—1842) 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46—47, 54, 150, 225

First Sino—Japanese War(1894—1895)45 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年)210—17, 226, 232—33

Foochow, China 福州, 中国183—89

Foochow naval academy 福州船政学堂179—87, 212

football 美式足球, 橄榄球15—19, 128

Forbidden City 紫禁城37, 65—66

Foreign Office(Zongli Yamen) 外交事务局 (总理衙门)199, 240

free trade 自由贸易42

Fu Hsing “福星”号183

Fujian Province 福建省273

Pupo “福波”号183

Fu Sheng “福胜” 号182

## G

Gardner family加德纳家11, 19, 198

Germany德国262

globalization全球化10, 80

Gojong, King of Korea高宗, 朝鲜国王205—6, 209, 211

Gold Mountain金山95—96

gold rush, California淘金热, 加利福尼亚95—97, 154

Gong, Prince恭亲王198—200

Gordon, Charles查尔斯·戈登65—66

govenors, autonomy of总督, 自治权39

Grand Canal大运河40

Grand Council军机处37, 265

Grand Secretariat内阁37

Grant, Ulysses S.尤利西斯·S.格兰特135, 140, 161—62, 195

Great Britain英国44—47, 54, 65—67, 255—56

Great Exposition of London(1851) 伦敦大博览会(1851年)109

Great White Fleet白色大舰队258—59

Griffis, William Elliot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207

Guangxu, Emperor of China 光绪，中国皇帝 163, 198, 201—4, 217, 221—22, 226—31, 233, 259—60, 262

## H

Hai river 海河 235

Haka 客家 49

Hallock, Charles 哈洛克·查尔斯 18

Han chinese 汉族 48—49

Hanlin Academy 翰林院 221

Hartford, Conn. 哈特福德，康涅狄格 113—15, 122—24, 131, 146, 172, 192, 258

Hartford Daily Courant 《哈特福德新闻》 143—44

Hartford Daily Times 《哈特福德日报》 147, 150

Hartford Evening Post 《哈特福德晚报》 114, 121, 177

Hartford High School 哈特福德中学 128, 148—51, 243

Harvard College 哈佛大学 152—53, 163

Heavenly Kingdom of Great Peace 太平天国

Hegel, Georg W.F. 黑格尔 42

Homestead act (1862) 《宅地法》 (1862年) 109

Hong Kong 香港 30—31, 46—47, 57—59, 233, 279

Hong Kong Supreme Court 香港高等审判庭 57

Hong Rengan 洪仁玕 67—70

Hong Xiuquan 洪秀全 48—50, 53, 64—65, 81

Hoover, Herbert 赫伯特·胡佛 236—37, 242—43

Howells, William Dean 威廉迪安·豪厄尔 137

Huang Kaijia “Breezy Jack” “轻快的杰克” 黄开甲 128, 148—49, 151, 176—78

Hubei Province 湖北省 264

Hunan Province 湖南省 71, 73, 264

Hundred Day's Refor 百日维新 226—31, 233, 262, 268

Hussey, Obed 赫西 108

I

Iliad(Homer) 《伊利亚特》 (荷马) 118—19

Imperial Customs Translating Department 中国海关翻译处 59—60

Imperial Telegraph Administration 中国电报局 280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36

inflation 通货膨胀 41

Innovation 发明 10, 36, 235, 292

Ito Hirobumi 伊藤博文 208—9, 214—16, 228—29

J

Jang Ting Shan 郑廷襄 194—95

Japan 日本 193—94, 206, 208—18, 222, 226, 228, 232—33, 261—62, 273, 276



Jeme Tien-yau “Jimmy” “杰米” 詹天佑120, 148, 164, 172—73, 249—52

Jesus Christ耶稣48—49

Jung-lu荣禄230

Jupiter(Central Pacific engine) “朱庇特” 号 (中央太平洋公司)103—4

## K

Kaiping mines开平煤矿235

Kalgan, China张家口, 中国250

Kangxi, Emperor of China康熙, 中国皇帝127

Kang Youwei康有为227—28, 231, 233

Kearny, Dennis丹尼斯·卡尼154—56

Kellogg, Mary L.玛丽·L.凯洛格, 见Yung, Mary Kellogg

Kinder, C.W.C.W.金德235

Kitchener, Lord洛德·基齐纳256

Korea朝鲜193—94, 205—10, 211—13, 217, 223

Kow Chang Meu, China高昌庙中国77

kowtow磕头41

Kuang Chia “广甲” 号213

Kuomintang国民党270, 275—76

Kwong Wing-chung邝咏钟180

## L

Lay, H.N.H.N. 莱60

Lhasa, Tibet 拉萨255—56

li(ritual) 礼24, 36—37

Liang, Mabel 梅布尔252

Liang, Pete 彼得252

Liang Cheng 梁晟165—66

Liang Bunyan 梁敦彦120—21, 141, 148—51, 168, 225—26, 243, 251—52, 254, 257—59, 261, 270—72, 274—75, 277, 280

Liang Ju—hao, “Gold Fish Chalie” “冷血查理” 梁如浩119, 193, 195—98, 203—5, 208, 211, 218—20, 224, 234, 247—52, 268

Liang Qichao 梁启超227—28, 231, 233

Liaodong Peninsula 辽东半岛217

liberalism, economic 自由主义, 经济42

Li En Fu 李恩富106—7, 115—16, 118, 280

LiGu 李圭139

Li Hongzhang 李鸿章79—81, 83—84, 87—88, 123, 129—31, 144—46, 153, 156—63, 194, 202, 205—7, 209—10, 212, 216—17, 229, 232, 235, 241, 245—46, 253

Lincoln, Abraham 亚伯拉罕, 林肯100

Lin Zexu 林则徐45—46

Long March 长征 276

Los Angeles, Calif. 洛杉矶, 加利福尼亚 105

Luan(chaos) 乱 38

Luk Wing Chun 陆永泉 280

Lung, Lemuel 勒缪尔·龙 (龙夷) 129

Lung Yu 隆裕 267

## M

Macao 澳门 32

McCormick, Cyrus Hal 塞勒斯·霍尔·麦考密克 108—9

Machinery Hal 机械官 137—38, 140

Macy, William Allen 威廉·艾伦·梅西 27—31, 34

Mahler, Gustav 古斯塔夫·马勒 22

Manchuria 伪满洲国 261—62, 273, 276

Manchus, Qing dynasty as 清朝 48—49, 193

mandarin 满大人, 官僚 22—24, 39, 43, 53—54, 59—60, 82—84, 196, 198, 204, 222, 227—28, 235, 237, 251—52, 259—60, 262, 276

manifest destiny 天定命运 16, 125

Mann, Horace 贺拉斯·曼恩 20

Mao Zedong 毛泽东 81, 276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 111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麻省理工学院156, 163

Meiji restoration明治维新209, 228

Mercantilism重商主义42

military军事10, 76—77, 80, 81, 123, 145—46, 159

Military Academy, U.S.(West Point) 美国西点军校153, 156, 158

Mile, Joaquin杰奎因·米勒100

Milr, John F.约翰·F.米勒157

Ming dynasty明朝48, 193

mining采矿85, 235, 280

Ministry of Ritual礼部41, 44, 199

Min river闽江186

Mollendorf, Paul Georg von莫伦道夫205—6

Morrison, G.E.G.E.莫里森274

## N

Nam Ping, China南屏, 中国20, 23

Nanjing, China南京, 中国50, 65—67, 70, 81, 219—20, 225, 240, 242—43, 254, 265

Nanjing, Treaty of南京条约47

Napoleonic Wars拿破仑战争41

National Assembly国民大会266—67

Nationalist Party 国民党 270, 275—76

Native Americans 美国当地人 106

Naval Academy, U.S.(Annapolis) 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 153, 156,  
158

navy 海军 181—87, 212—16, 258—59

Needham, Joseph 李约瑟 292n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111, 125—26

New York 纽约 111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95, 132—33, 217

New York World 《纽约世界报》 213

Nichols, Francis H. · 弗朗西斯 H. 尼科尔斯 24—45

Ningbo, China 宁波, 中国 80

Northrop, B.G.B.G. 诺斯罗普 115, 126, 148

119(Union Pacific engine) 联合太平洋公司的 “119” 号 103—4  
0

opium trade 鸦片贸易 45—46, 196

Oriental(CEM baseball team) “东方人队” (留美幼童的棒球  
队) 128, 168, 196, 225

O’ Sullivan, John L. 约翰 · L. 欧沙利文 16

Otis brothers & Co. 奥的斯兄弟公司 138

Ouyang King 欧阳庚 164



## P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 太平洋邮政蒸汽船公司 155

Pacific Railway Act(1862) 太平洋铁路法案(1862年) 100

Pagoda Anchorage 宝塔地，见 Foochow, China  
Parker, Peter 彼得·派克 55—56

Parson, Mr. 帕森斯 57—58

Pearl River 珠江 35

Peiyang University 北洋大学 224—25, 254

Penghu islands 澎湖列岛 217

Philadelphia, Pa. 费城 134—42, 160

Philadelphia Times 《费城时报》 139

Phillips Academy 菲利普斯学院 166

Pierce, Franklin 富兰克林·皮尔斯 56

Port Arthur, Manchuria 旅顺港，满洲 213

Progress 进步 10, 100

Promontory Point, Utah 普罗蒙特里角，犹他州 103—4

prostitution 卖淫 98

Putnam Machine Company 普特南机器公司 77—78

Puyi, Emperor of China 溥仪，中国皇帝 260, 262, 267, 274—76

Pyongyang, Korea 平壤，朝鲜 212

## Q

Qing court清廷36—37, 82, 84, 100, 196, 235—36, 292n

Qing dynasty清朝10, 35—37, 40, 48—49, 193, 203, 244

queues辫子19, 48, 105, 117, 165, 268

## R

railroads铁路218—20, 224, 234—37, 242, 247—51

reapers, mechanical收割机108—9

Reed, Charles查尔斯·里德141

reform改革10—11, 83—85, 198, 203—4, 221—22, 226—31, 233, 246—47, 262

ren(moral obligation)仁124

Renzong, Emperor of China仁宗, 中国皇帝23, 25

Righteous harmony Society义和团, 见Boxer Rebellion

Rocky Mountains落基山脉100

Roosevelt, Theodore西奥多·罗斯福258, 261

Root, Elihu伊莱休·鲁特261—62

Russia俄国218, 261

Russo—Turkish War(1877—1878)

俄土战争(1877—1878年)150

## S

Sacred Edict(Kangxi emperor)《圣喻广训》(康熙皇帝)127—28

San Francisco, Calif.旧金山, 加利福尼亚93—99, 105, 154—56, 168, 171

Second Opium War(1856—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65—67, 150, 225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自强运动80—81, 83—84, 198—99, 222, 225

Seoul, Korea汉城, 朝鲜193—98, 204—5, 211, 223—24, 233

Seropyan(Yale student)赛罗皮恩(耶鲁的学生)18—19

Shandong Province山东省238, 273

Shanghai, China上海, 中国59—64, 79—80, 82, 173, 210, 234

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谢菲尔德科学学院16, 26, 129

Sheng Xuanhuai盛宣怀224—25

Sherman, John约翰·舍曼268—69

Sherman, Mary玛丽·舍曼177

Shilling, Newton Watson牛顿·沃森·谢林103—4

Shortrede, Andrew萧德锐31, 57

Sierra nevada内华达山脉101

silver白银44

Sit yau—fu薛有福181

Smith, Adam亚当·斯密42

Song of the earth, The(Mahler) 《大地之歌》 (马勒)22

Sonno joi movement “尊王攘夷” 运动208

South America南美44

Springfield, Mass.春田市, 马萨诸塞111—13

Springfield Union 《春田联合报》 129

State Department, U.S.国务院, 美国153, 156, 158, 268—69

steamship company汽船公司84—85

Stevens School of Technology斯蒂文森技术学校219

Stowe, Harrie beecher哈丽叶·伊丽莎白·比彻尔114

Summer Palace颐和园65, 200, 202, 229—31

Sunday school主日学校116

Sun Yat—sen孙中山264—68, 270, 273—76

## T

Taiping rebellion太平天国运动48—54, 64—71, 79—81, 238, 253

Taiwan台湾217

Takahira Kogoro高平小五郎261—62

Tan Sitong谭嗣同230

Tan Yew Fun谭耀勋164—65, 252

tea trade茶叶贸易44—45

technology技术10, 35—37, 83—84, 107—9, 135—38, 235, 292n

Tianjing天京，见Nanjing, China

Tangi “天祺”号19

Tibet西藏255—56

Times(London)《伦敦时报》109, 138

Ting Ju—cha'ng丁汝昌214—16

ti—yong “体用”80

Todd, John约翰·托德103

Tong clan唐氏家族193

Tong Kwo On唐国安258

tongs帮会98, 105

Tong Shao—yi “Ajax” “” 埃贾克斯唐绍仪118—19, 141, 156, 173, 192—96, 204—5, 207—12, 218, 223—24, 226, 233—34, 236—37, 242—43, 251—52, 254—562, 261—63, 268—72, 277—79

Tongzhi, Emperor of China同治，中国皇帝37, 66, 199

tradition传统10—11, 196, 222, 228, 276—77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U.S.横贯大陆的铁路98—104, 106—7, 109—10, 219

Troy Polytechnic特洛伊理工学院129

Tsai Ting Kan “Fighting Chinese” “中国斗士”蔡廷干119—20, 12, 214—15, 218, 254, 268, 274—75, 277, 281

Tsinghua University清华大学258



Tuan, Prince端王240—41

Twain, Mark马克·吐温97, 114—15, 132, 161

Twitchell, Joseph约瑟夫·特威切尔115, 132, 134, 148, 160—63, 165, 195

## U

Union Pacific Railroad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100, 103

United States美国9, 11, 16, 21, 87, 99, 102, 105, 107—9, 125, 129, 135—38, 153—58, 160, 261—62

## V

Vietnam越南187

Vrooman, Daniel丹尼尔·弗鲁曼35, 51

## W

Wadsworth Athenaeum沃兹华斯博物馆114

Wang Wei王维21—22

Ward, Frederick Townsend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78—80

Weihaiwei, Battle of威海卫战役214

Weng Tonghe翁同龢202

Wen Xiang文祥85—86

West西方107

Westerners西方人42—44

wheat小麦108—9

Whipple, Captain 惠普尔船长 28—31

Williams, Samuel Wells 塞缪尔·威尔士·威廉姆斯 24—25

Wong, Kwei-liang 黄季良 180, 183—85, 187

Woo Chung Yen 吴仲贤 196, 211, 224, 226

Woo King Yung 吴敬荣 213

Woosung, China 吴淞, 中国 234

Woo Tze Teng 吴子登 141—47, 160, 162, 165, 168, 232

Woo Yang Tsang 吴仰曾 118, 280

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 加州工党 156

Wuchang uprising 武昌起义 263—64

## X

Xianfeng, Emperor of China 咸丰, 中国皇帝 49, 66

xiuca 秀才 33

## Y

Yale College 耶鲁大学 15—19, 24—26, 31—32, 87, 121, 148, 151—53, 163—65, 172—73, 175, 252, 269

Yalu river, Battle of 鸭绿江战役 213

Yang Sew-nan 杨兆楠 180

Yangtze River 长江 263

Yang W “扬武”号 183

Ye Mingchen叶名琛50—52

Yoh Shu Tung叶绪东133

Yokohama, Japan横滨, 日本173

Yuan Shikai袁世凯206—10, 211—12, 222—24, 229—30, 233—34, 252—57, 262—63, 265, 267—68, 270—74, 279

Yuanzhi袁寨206, 210

Yung Kwai容揆143, 164—66, 172

Yung, Mary Kellogg玛丽·凯洛格131—33, 232

Yung Leang “By—jinks Johnnie” “胡闹的强尼”容良118, 141, 172—73, 175, 214—15, 217—18, 254, 280—81

Yung Wing容闳18—20, 23—35, 51—52, 54—79, 81—87, 111—13, 117—18, 121—22, 126—27, 129—33, 141—46, 153—54, 156—63, 172, 231—32, 258, 268—69

Yung Yun Foo容运福133

## Z

Zeng Guofan曾国藩71—77, 79, 81—83, 86—87, 89, 123, 145, 159, 209

Zeg, Ejah艾里加·曾 (曾笃恭)129

Zeng Rensheng曾兰生129

Zhang Zhidong张之洞225

Zhili province直隶省238, 253—54

Zhou Hanjian周传谏177

Zongli Yamen 总理衙门，见Foreign Office